

概要

新罗千年的
历史与文化

历史篇

資料提供 (按韩文字母顺序)

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
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
国立庆州博物馆
国立大邱博物馆
国立中央博物馆
国立清州博物馆
佛教中央博物馆
岭南文化财研究院
海印寺圣宝博物馆
NAVER
日本正仓院
權惠永
李泳镐

凡例

1. 本概要以新罗的萌生至附属于高丽时期为对象。
2. 以专刊内容为基础，分历史篇与文化篇进行了叙述。
3. 按具专业性教育书籍的标准进行了整理。
4. 执笔者从《新罗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执笔者中选定。
5. 韩文原稿通过了工作组的校阅和审校。
6. 外文版以韩文原稿为基础进行翻译，并通过了外国专业人士的审校。
7. 图片资料是根据专刊和资料集收录的。
8. 外文标注整理为学界通用的用语，固有名词的英文标记采用了罗马字母标记法。



发刊词

千年王国新罗最早完成了韩民族统一大业，绽放了灿烂的文明之花。它是凭借特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多方文化交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综合、系统汇编新罗历史的史书，不禁令人遗憾。这是我们庆尚北道的作为古代新罗根基而编撰本书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以此来完成我们所肩负着的历史使命，即用我们的双手开展寻找民族的根基，弘扬根基文化。

《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一部书可以说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丛书编撰工程。本丛书以“新罗国前身斯卢国的出现”、“古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统一三国的完成”以及“新罗延续至高丽”等历史发展时期为主线，整体叙述了新罗历史进程。并以简洁明快地描述并解释新罗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求浅显易懂、容易理解。

编撰并出版长达千年的新罗历史丛书，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新罗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的财富也是韩国文化的源泉，因此值得我们迎接挑战、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完成此项工作。《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编撰工作自从2011年以“如何编写新罗史”为主题举办学术会议以来，历经五年的艰辛工作终于完成。这部丛书是韩国136名新罗史专家学者们共同协力而完成的一部力作，共有30册，12000页之多。这无疑是集编纂委员、编辑委员、编写组全体成员智慧和热情的结晶。

《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编撰工作的意义非常之重大，并非整理过去的历史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通过本民族历史的重新整理的编写，找回民族自尊心、准确树立民族认同感的事情。编撰成果将会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宝贵资料，也会成为向海外传播曾经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流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国家新罗的历史文化的珍贵载体。对我们来说，铭刻千年历史进程中的大量故事、神话、传说以及文化遗产等等文化因素都会成为我们发展旅游事业取之不尽的源泉。

世界正以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如果说文艺复兴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工业革命推动历史步入近代社会，那么进入21世纪的现在，可以说世界正处在文化革命时期。同时也可谓处在物质文明的发展因‘智能’的出现而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这样的尖端技术革命的时代，相信只有称之为‘我们’的‘认同感’才可以成为我们设计未来的唯一的精神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衡量历史的尺度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历史价值始终不会改变，它会成为链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规定我们未来的生活。这便是通过了解历史所学到的智慧。新罗时期虽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的的确确是通过吸取新罗国的历史与文化精华，生活在现代并且走向未来。了解历史与文化就是寻找我们祖先的精神和灵魂的事情。

庆尚北道的道厅所在地即将迁移至安东、礼泉地区，并向世界宣告蓬勃发展的新庆北时代的开启。在这重新起飞的历史时期，编撰《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工程的完成，其意义重大。它将会成为庆北地区新千年之旅的精神、文化基础。期待《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编撰工程将成为开启新庆北时期的序幕，成为一部培养韩民族历史意识上不朽的大众历史书籍。

最后，谨向肩负着“编写不朽的民族史书”之使命，倾注满腔热情的执笔组以及相关人士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6年12月

庆尚北道知事

前言

在新罗千年历史进程中，最初700余年是三韩列国之一的斯卢国时期。自斯卢国兴起的新罗一跃成为王国之后，与先进的高句丽、百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从严格意义上讲，三国统一之前那段漫长的韩国古代史不应以某个国家为中心重新构筑，只有在三韩或者三国整体的有机框架内理解每个国家的历史，才能保证其客观准确性。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韩国古代史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藉此，研究者们一直不断地尝试着对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按国家进行总的整理、汇编工作。

在韩国历史研究中，北朝鲜当局以政治目的为先，有意把高句丽看作三国的正统，而百济和新罗贬为其附属国。北朝鲜从这种立场出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集中研究了高句丽史的现象已不再是鲜为人知的事实。期间，我们也曾持续不断地开展了整理、汇编相关加耶国、百济国历史研究成果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人力资源部设立加耶史政策研究委员会，旨在探求开发与整备加耶文化圈的理论依据。截止21世纪初，有釜山大学韩民族文化研究所为基地，历经数年进行了对金海地区加耶史迹的整理工作，同时进行了对加耶史和加耶考古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整理工作。而10余年前，忠南历史文化研究院在忠清南道预算支持下，历经三年，陆续出版了15册相关研究丛书以及收录各种文献、考古资料的《百济文化史大系》25册，另学界大受裨益。

从这种趋势和动向来看，庆尚北道于2011年12月以庆北文化财研究所为责任机构，着手开展此项《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华》编撰工作的意义匪浅。因为新罗的历史与文化，从狭义上讲是庆北地区传统文化的根基，但从广义上看也是韩民族历史的基干。综合整理截止目前所取得的有关新罗历史与文化研究丰硕成果的工作，是一项具有重新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意义的的工作。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相关新罗史研究在韩国史研究过程中一直做到了牵头作用。那是因为作为古代史研究资料中有‘双碧’之誉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大部分内容是以新罗为中心记述的。而作为辅助资料的碑文和出土文物等金石文资料中，属于新罗的内容最为丰富，较他国明显占优势。就拿被发现的

木简情况来讲，活生生地反映新罗社会生活的木简发现量也不亚于百济地区所发现的木简量。总而言之，我们对三国的了解以新罗最为丰富。然而，新罗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受高句丽、百济等国的影响。反过来想，我们籍以新罗的文化及社会制度，可以以此类推因缺乏史料而难以理解并构筑的高句丽、百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等，这一点也很有意义。目前韩国古代史学界以新罗史相关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奠定了理解高句丽、百济历史的基石和框架，这已然成为了一股趋势。

《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编纂委员会在出版发行相关研究丛书22册、资料集8册、概要2册及其韩国语版本和3种外国语版本的过程中，并没有满足于重新构筑乡土历史与文化史来触发普遍关注并鼓吹热爱乡土的意识，而是拟定复原韩国古代史作为最终目标，始终以此为我们信念和使命来履行此项工作。但这是一项有40多名专家参与，汇集270余篇文章的大部头编撰工作的宏大计划，期间也曾出现过预想不到的难关。因此作为属于庆尚北道所在地迁移工程内容之一的本丛书出版计划不得已推迟2年，为此表示歉意。并向庆尚北道行政府历届知事兼编纂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李周锡、朱洛荣、金玄基、金章周表示谢意。此外，我们仅代表本编纂委员会向接受我们全面委托，在5年期间出色地执行各种编撰工作的编委卢重国、朱甫墩、李熙濬教授和庆尚北道文化财研究院李东喆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忘我的付出。

2016年12月

《新罗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编纂委员会委员长 李基东

引言	010
----	-----

第 I 篇

新罗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斯卢国的形成	022
第1节 形成前夕	023
第2节 斯卢国的形成及结构	029
第3节 辰韩与斯卢国的发展方向	035
第二章 新罗的成立与发展	040
第1节 新罗的成立	041
第2节 部体制的出现与运营	053
第3节 地方统治的开始与方式变化	062
第4节 统治集团的矛盾与走向新秩序	073
第三章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及其运行	080
第1节 律令体制的成立与运营	081
第2节 领土扩张与统治秩序的确立	095
第3节 官僚体制的确立	114
第4节 迈向新统治秩序	128

第 II 篇

新罗的三国统一和开展

第一章 三国统一与中代的统治体制	142
第1节 金春秋执政与中代王权的成立	143
第2节 百济·高句丽灭亡与三国统一	156
第3节 中代统治体制与治国原理	168
第4节 佛教教学的发展与文化的成熟	183
第5节 国际关系的变化与中代王权的没落	200
第二章 下代的揭幕与开展	218
第1节 下代的揭幕	219
第2节 真骨贵族的分裂与相争	227
第3节 真骨贵族的联合	235
第4节 思想界的新动向	245
第三章 新罗的灭亡	254
第1节 王位继承出现异常	255
第2节 农民起义与豪族的兴起	260
第3节 后三国鼎立与新罗灭亡	269
第4节 从新罗到高丽	277

引言

历史划分

新罗的前身是位于现庆州盆地的斯卢国。斯卢国陆续征服周边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领土范围,逐步建立了古代国家——新罗。这说明斯卢仅指庆州盆地,而新罗却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其领土是以庆州盆地为中心的更广泛区域。新罗建国后,逐步完善其统治体制,将斯卢所在地定为王都。人们经常把斯卢和新罗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在内涵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新罗所指的范围更广,斯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由此可见,新罗在空间上指斯卢国领土扩展与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而时间上则指从其前身——斯卢形成到新罗灭亡这一历史时期。

据文献记载,新罗建于公元前57年,这包括斯卢国在内。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对此不能全盘盲信,但为方便起见,若以此作为新罗元年计算,那么截止到935年新罗灭亡,大约有一千余年。因此,人们常将新罗称为“千年之国”。

以斯卢国为前身的新罗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如果仅从时间轴去分析,我们将无法系统地勾勒出新罗具体的发展历程。因此,我们试图从新罗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切入,将新罗的发展历程进行切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新罗统一三国。

事实上,新罗的三国统一早在新罗时代就已受到高度的关注,这意味着当时人们将其视为重大变革期。正因如此,《三国史记》将这一时期记载为从上代(公元前57~公元654年)到中代(654-780年)的转型期,《三国遗事》也将这一时期记载为从中古(514-654年)到下古(654-935年)的转型期。此外,近代将三国统一后的国家命名为“统一新罗”,以此划定三国统一前后新罗的明确界限。因此,我们可以说,以统一新罗元年——654年为准,将新罗分成其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合理可行的。这是因为,三国统一对新罗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围绕新罗统一对整个韩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和内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上述两个时期还可再细分为几个阶段。据《三国

史记》记载,统一新罗又可分为前半部——中代和后半部——下代(780-935年),因为这两个阶段在政治和社会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国遗事》将三国统一前的新罗分为上古(公元前57-公元514年)和中古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就上古而言,划分的时间段本身就比较长,细究便会发现,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再次细分。以第17代奈勿王(356-402年)即位的356年为准,可将上古细分为前期和后期,这就是摆脱斯卢国,建立新罗的时期。

综上所述,新罗的千年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还可细分为五个阶段。本文暂以文献记载为准,将斯卢国元年定为公元前57年,但考虑到斯卢建国前的定基期,还需要添加一个新的时期,由此将新罗细分为六个阶段。由于各个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含义,以此为准便可系统地勾勒出新罗的发展历程。这正是本书以上述历史阶段划分篇章的原因所在。

历史资料与研究方法

重构新罗历史以《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主要史料依据。但和其他国家一样,新罗初期的历史也极为模糊,这是因为记载历史的文献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大部分文献都是神话或民间故事,且连这都是后来整理而成的,难免参杂各种后代因素。因此,我们不能相信流传至今的文献内容完全属实。

一般而言,新罗的初期历史是指前面所划定的上古前期。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新罗,而是斯卢国的历史。由于其记录的真实性本身存有疑问,学界将《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对该时期的记录特意划定为“初期记录”。不同学者对“初期记录”问题持有肯定论、否定论及修正论三种观点。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为修正论。虽然修正论里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基本上对“初期记录”的纪年、王名、记事是予以区别对待的。持修正论者认为,王名和记事内容不是完全捏造的,但将后代历史追溯附加的记事很多。他们都没有全盘接受记事的纪年,对实际发生的时期仍存在很大争议。

不能全盘接受《三国史记》“初期记录”有如下几个重要原因。第一,《三国史记》与距离当代更近的三世纪末期编纂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韩条》内容相差甚远。两部史书对同一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大相径庭。譬如,前者将新罗描述为成熟的王朝国家,而后者则记载为辰韩联盟中的斯卢国。这意味着其中一个记录是错误的。第二,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与“初期记录”内容严重不符。根据早期记录,公元前一世纪,庆州初期已经是拥有广阔土地的政治体——新罗的中心地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第三,将“初期记录”与金石文等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很多记录内容在六世纪之后才发生,却追溯数百年牵强附会。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官等制和六部制。第四,在“初期记录”中有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内容。譬如,讲述父子、兄弟、祖孙等血缘关系时,年龄相差太大,不合常理的记录随处可见。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依据“初期记录”对新罗历史进行重构应采取谨慎态度。须经过彻底批判史料的过程,以防歪曲历史。综上所述,研究新罗历史应以考古资料和金石文为主,以“初期记录”为辅,也就是说,应在有限的范围内参考“初期记录”。

严格来讲,“初期记录”的对象,即上古前期,与其说是新罗,不如说是斯卢国的历史。研究新罗史时,看待斯卢国的观点有两种,即前史论和前期论。前史论虽然认为斯卢国历史属于新罗的一部分,但只是将其视为新罗的前身,认为它并不等于新罗本身的历史。与此相反,前期论将斯卢国阶段正式纳入了新罗历史。

但前期论是基于“胜者为王、唯中央论”的认识,容易引起争议。虽然斯卢国是新罗的前身,但它并不是新罗本身,只不过是辰韩联盟体12国之一而已。如果按照前期论的观点来理解,会舍掉多种因素,使得初期历史变得贫乏。因此,以前史论的观点来研究初期历史合理且可行。因为除了斯卢国之外,还有很多政治势力和文化结合在一起方组成了新罗。

地理环境

大自然是对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一直以来,人类通过顺应自然、挑战自然、利用自然,不断突破极限,从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在此过程中,人类不断发展自我,有时还改造自我。

在大自然的各种因素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地理、地形。人类一直以来适当利用地理环境,选定居住区,从事农耕,形成聚落,提升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阶级不断分化,出现政治势力,进而产生了国家。从这个意义来看,要对一个政治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有正确的了解,研究地理因素不可或缺。当然,即使条件相同,根据其主体和利用方式,结果会完全不同。因此,地理、地形并不是影响人类生活的绝对性或决定性因素,而是相对性因素。新罗偏向东南却克服这种地理劣势,最终成功实现了三国统一,便显而易见地证明了这一点。

韩半岛地形主要以山地为主,东高西低,大部分河流自东向西流。起源于北方盖马高原的山脉偏于东部,沿着东部沿海往南延伸,在中间几个节点还形成了向西绵延的支脉。到江原道南端,其主脉转向西南,呈半圆延伸至南海岸。这就是贯穿韩半岛的脊梁——白头大干。白头大干有一个支脉从江原道南部渐渐变低,经过釜山到达南海岸。

新罗的主要活动空间——岭南圈位于其半圆之内。由于东南临海,西北被白头大干包围,岭南与外界隔绝,形成一种独立的空间。从整个韩半岛的地形来看,这是重要的地理特征之一。洛东江发源于与江原道的交界处,贯穿岭南中部,与来自各个山地的支流汇合,不断壮大,最终在东南部金海地区流入南海。

洛东江水流平缓,流程长,流量大,容易泛滥,到处形成冲积平原,使农业成为可能。以洛东江干流和支流为主,在溪流周边形成的冲积平原成为人们的聚居地。该支流的上游各处以较低的丘陵为中心,共形成了70多处独立盆地。自从人们居住在这些盆地并形成聚落后,其功能一直延续至今。形成聚落的初期,人们集中居住在洛东江干流和支流汇合处。这说明洛东江为居民交流互通发挥了桥梁作用,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巨大。从这点来看,称洛东江为岭南之母亲河也并非言过其实。在新罗发展过程中,洛东江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图1 韩半岛地形图

作用。

岭南圈以洛东江为界限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凡是大河,按照用途,其所发挥的作用也会大不相同。如果主要用途为人流和物流的通道,那么河流再宽也足以成为沟通的桥梁。长期以来,洛东江就扮演了这一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个特定地区便可以从中获利。比如,以洛东江河口的金海为基础形成的政治势力从早期国家形成到弁韩时期一直保持强大的实力。但一旦出现问题,断绝交流,河流往往就会成为隔离双方的界线。如自400年广开土王南征至加耶国灭亡期间,河流就扮演了分界线角色。如此这般,洛东江在岭南圈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也不例外。

斯卢国以庆州盆地这一小块空间为基础,发展成为新罗。庆州盆地的环境条件为斯卢国攻克其他政治势力并发展成新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庆州盆地是从内陆通过陆路走向大海时必须经过的交通要冲。同时,由于靠近东部沿海,从大海进入内陆时也是必须经过的关门。也就是说,庆州盆地兼具沿海和内陆的双重地理优势。而新罗以庆州盆地为中心,以岭南圈为基本的发展空间,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深受岭南地理环境的影响。

新罗历史的特征及其在韩国历史上的意义

新罗一直通过合理地利用自身地理条件而得到发展。在韩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北方局势给南方产生重大影响是重要特征之一。北方移民接连不断南下给整个南方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移民规模较少时,往往融入到当地居民及文化中,但一旦其规模庞大则会带来巨大变动,因为他们已拥有北方的先进文化与政治体制。这种移民带来的影响延续到313~314年乐浪郡和带方郡被高句丽灭亡才结束。

西北、满洲一带的移民与其文化经汉江或沿东部沿海南下,最后抵达岭南圈聚集、定居,使岭南起到类似于口袋的作用。岭南圈可以说是不同居民和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舞台。虽然我们常常将新罗人统称为韩族,但细究一番,其实



图2 以庆州为中心的交通图(『輿地图』庆州府)

不然。当然,统治阶层主要由韩族组成,但在不同时间和程度上,朝鲜、濊、貊、靺鞨、汉及倭等种族也不时地加入其中,为新罗人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毫无疑问,在新罗建国的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先进文化是相互融合发展的。

因此,从大陆和海洋流入的多种派系文化长期结合在一起发展是新罗人与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一般认为,新罗人和新罗文化的保守性很强。其实,这并不是在全面了解新罗文化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而是仅凭骨品制这一特殊的身份制度所具有的排他性与封锁性而做出的结论。

这种说法过于强调骨品制里面的某一个特定因素,难免有夸大之嫌。一直以来,人们将骨品制视为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以偏概全,用这种片面观点来判断整个新罗文化,断定新罗文化本质上具有保守性、封锁性。但不仅对骨品制的片面认识本身有问题,未经深入调查新罗文化的真实面貌,只凭长期形成的偏见而做出判断,也明显存在不合理性。

人们认为,新罗文化很保守也许是因为新罗在建国初期因地理弱势其文化相对落后于其他国家。但其内部体制完善到一定程度后,要赶上领跑者,走上开拓进取、开放发展之路是势在必行。因为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只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这些事实在如下实例中都可以不容置疑地得到确认。比如,在四~五世纪构筑的积石木椁坟中出土了各种高句丽和罗马玻璃等中亚地区的文物;就佛教传播而言,虽然新罗正式将其定为国教的时间较晚,但之后佛教在新罗以惊人的速度扩散,超出了周边先进国家。如果新罗没有开放进取的精神,不仅无法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实现三国统一,而且维持250年的统一国家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我们不可以对新罗文化的保守性妄下定论。新罗文化中充满了开放进取的精神,这一点在新罗的对外政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新罗能够实现三国统一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应归于优秀人才的智慧与力量,尤其是不同时期的统治阶层都具有杰出的外交能力。弱者要在强者间求生存只有一条路,就是有效利用强者的力量。直到统一前,新罗在三国中一直处于弱势,因此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承受来自百济和高句丽的压力。于是,新罗时而拉拢高句丽,时而拉拢百济来应对敌人,后来两国都成为敌国时,它又靠向了中国,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成为了胜者。新罗统治阶层

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准确把握国际形式变化,大刀阔斧地做出判断,才造就了这样的成果。从这点来看,新罗三国统一是一场外交政策的胜利,远远超出打赢一场战争的意义。我们从现代视角回顾新罗历史的过程中,不可忽视这一点。

新罗历经坎坷,最终打破分裂格局,成功实现不同政治势力的统一,为发展同一个民族与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之后韩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反复磨合,但新罗的三国统一可谓是民族统一重要性与必然性的起点。从这点来看,新罗的三国统一不仅在新罗历史中,在整个韩国历史中也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第 I 篇

新罗的形成与发展

斯卢国的形成

新罗的成立与发展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及其运行

第一章

斯卢国的形成

形成前夕
斯卢国的形成及结构
辰韩与斯卢国的发展方向

1

形成前夕

神话世界

任何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神话或民间故事的形式来讲述其历史的起源。虽然在新罗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创世神话,但三种建国神话及民间故事却依然流传至今。当然,这些神话和民间故事本身并不是历史事实,而且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参杂各种后代因素。但只要它不是由后代完全虚构出来的故事,其里面必然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性和新罗人的思维模式。因此,神话对研究新罗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可见,要准确地勾勒出新罗建国过程,从传说及民间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至关重要。

根据流传至今的一些史书,新罗的始祖为朴赫居世。在他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自称继承朝鲜血统的“六村”群体在庆州盆地定居生活。有一天,六村首领们在阙川附近聚集开会,在远处的南山脚下萝井周边有一股奇异的气韵悬浮着。于是,他们就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有一只白马在萝井旁边跪拜。稍后,那白马忽然腾空飞去,只留下了一颗紫色巨蛋。六村首领们打开巨蛋后,发现里面有个男孩,就把他收养带大了。男孩长大后,于公元前57年被推崇为王。

朴赫居世的诞生神话中有多少历史真实成分,很难判断。而且,在这里所记载的年份也未必可靠。但可以说,该神话象征性地讲述了拥有先进文化的外部势力进入到庆州盆地,逐渐发展成为统治势力的过程。也就是说,朴赫居世的诞生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物的出现,而是指以他为代表的朴氏族团进入庆州盆地的史实。虽然朴氏这一姓氏是后人添加的,但这代表着其群体的身份认同。

根据文献记录,尽管新罗历史从朴赫居世的诞生开始,但其王位并没有在一家一姓中被继承,因为名为“昔脱解”的人物成了新的统治者。

昔脱解的出生故事与朴赫居世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不是从天而降那么模糊不清,而是更加具体。关于他的出生地,有多婆那国、龙城国、玩夏国等不同说法。但不管怎样,他父亲是某一个国家的国王。昔脱解是卵生的。但父亲认为卵生不吉利,便将巨卵和宝物放入大柜里,装到船上送入大海。那船经过一番漂泊,首先到达了位于金海的金官国,但因当地居民感到诡异不敢接受而继续漂流至新罗领域。

朴赫居世即位后第39年,有一只船到达东海岸阿珍浦,昔脱解就在船上的柜里被发现。当时,正好在海边捕鱼的老妪偶然看见一只船,拽其到岸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船上的大柜,发现里面有一个孩子和各种宝物,便收养了那个孩子。那孩子长大后不仅学识渊博,还精通地理,后来进入庆州盆地,用计谋占领了由原本辅佐朴赫居世的日本倭人——瓠公所掌控的月城。之后,他娶朴赫居世之子——南解王的女儿为妻并被任命为大辅,继儒理王后成为第四代国王。

这说明,昔脱解在其他地区长期积累经验后才进入到庆州盆地。从他自称为冶匠可推测,当时铁器文化已相当发达。但由于他们数量寡不敌众,因此,进入庆州盆地后,一段时间内也坚持增强自身实力,做到厚积薄发后才发展成为强大势力。

昔脱解即位第九年晨曦,从月城附近的森林——始林中传出鸡鸣声。他马上派大辅瓠公打听,得知在那里有金色的小柜悬挂在树枝上,下面有只百鸡在鸣叫。打开柜子后,发现里面有孩子。昔脱解见孩子非常英俊,认为是上天赐福,便决定收养。孩子渐渐长大,凭借超凡智慧脱颖而出,便给他取名为阏智,因他

来自于金色柜子,于是取姓为金。从此,昔脱解将始林更名为鸡林,并把它当作国号。

阏智是传承新罗王位的金氏族团之始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阏智是金氏始祖,但不知为何只被任命为大辅,并没有成为国王,第六代孙味邹是第一位金氏国王。

如上所述,文献记录以传说的形式描述了新罗国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三股势力及其在相互融合中发展的事实。这也说明,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先后进入庆州盆地发展的,而其文化基础与派系也不尽相同。

进入四世纪,金氏将朴氏和昔氏赶下台,确立了单独的王位世袭制。因此,新罗也被称为金氏王朝。尽管如此,阏智却从未当过新罗国王,也不是新罗的建国始祖。只是从血统上来看,是金氏族团之始祖而已。其实,金氏族团的世袭体制确定之后,有足够的机会将阏智推崇为国祖,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意味着后人编纂新罗历史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对其世系和王名进行人为的修改、加工。王位转移到毫无血缘关系的群体,但没有更改国名,也没有将其视为王朝更替。这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事例。由此可见,由三个姓氏族团统治的时代与之后的国家,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也就是说,该时期不是新罗,而是斯卢国。

邑落的形成

建国神话或民间故事只反映出国家成立初期的原始形态,并没有表现出国家建设的具体过程及实际情况。因此,仅靠此很难准确勾勒出新罗的早期国家形成过程。所以,要了解人们在庆州盆地定居生活并基于阶级分化形成政治势力直到最后成立斯卢国的实际过程,不得不要完全依靠考古资料。

人们何时开始进入庆州盆地居住,其具体时间很难确定,因为在这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址。但在岭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已达数十处。尤其是,发现遗址的东海沿岸、浦项、蔚山及密阳等地都离庆州盆地较近,因此,不能排除这里曾是旧石器古人居住地的可能性。但旧石器时代

的古人主要靠狩猎采集为生,成群迁徙生活,没有长期留在一个地区。由此可见,即使他们住在庆州盆地也与斯卢国的形成没多大关系。

一般认为,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成群迁徙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人类开始在一个地区定居生活,最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随着农耕生活的开始,食物来源变得稳定,人们摆脱成群迁徙的生活,开始定居。这时,除了木材和石头之外,还用粘土来捏制陶器等易碎的生活用品。定居生活是形成聚落的基础。人类开始以特定地区为中心,集体生产,共同消费,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当然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原始共同体。

据推测,韩半岛新石器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八千年。根据陶器的模样、纹样、材质、制作方式等,新石器时代也可划分为几个阶段。在早期新石器时代,人们主要在海边、河边等走动方便、可狩猎捕鱼的地区居住生活。而且,陶器也是制作成携带方便的大小来使用。这些都说明,当时农耕并不是主要谋生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学会种植,农业在人类生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农业地位的提升意味着人类定居生活的正式开始。

韩半岛新石器遗址遍布全国各地。由此可见,这时与之前不同,人类在韩半岛大部分地区广泛居住生活。这不仅是因为人口的增长与扩散,也是因为外部居民的流入接连不断。

在岭南圈已发现了不少新石器遗址。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除海边、河边等外,沿着河流向内陆深处都可以发现居住遗址。当然,这是在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的结果。在清道梧津里岩荫遗迹里,发现了被推测为公元前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显而易见,在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类已进入到内陆深处居住生活。

在庆州盆地南川边校洞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碎片,在附近还发现了宅基地。在东海岸阳北面垵本里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宅基地。人们推测,由于当时聚落规模还小,应该不会超过十户。我们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在庆州盆地一带,但根据出土文物,可推测其居民数量不多,群体规模也不大。而且,他们与后来进入此地的青铜器时代居民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总之,新石器时代人类断断续续地进入到庆州盆地,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与斯



图1 庆州附近支石墓分布现状

卢国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

在公元前八~七世纪的早期青铜器时代,庆州盆地一带人口异常增加。以无纹土器为主要特征的宅基地在隍城洞、龙江洞及忠孝洞等地陆续被发现。从空间分布来看,虽规模较少,但可以确定已形成聚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特点在庆州盆地不太明显,但到了早期青铜器时代,其居民居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没有痕迹证明他们与新石器时代古人直接连接,那么可以说,他们是后来才进入庆州盆地并居住生活的人群。他们的居住地从河边低地到丘陵缓坡,再到山麓斜坡地带等,遍布各地。虽然规模不大,但从居住情况可推测,聚落从庆州盆地的各个河流、溪流周边开始形成。该时期的墓地遗迹有石棺墓。

到了早期青铜器时代后期,聚落数量大幅增加,规模也明显扩大。这反映出该时期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人口大幅增加,阶级进一步分化等变化。此外,新耕地开发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也随之扩大。这时,不同的共同体分别以特定地区为中心生活,界定出一定的空间范围。而各个共同体在相互接触、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其规模。从该时期的个人墓地——支石墓分布就可以推测这一点。

支石墓在庆州盆地山谷各处广泛分布,但不密集,大部分只有两至三座,在局部地区发现10座以上。极有可能是以支石墓10座以上聚集的地区为核心,将周边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运营体制。如果这时以特定中心聚落与周边小聚落交流连接的结构已经形成,那么,这可视为后来邑落的初期面貌。这说明在支石墓阶段,早期国家的基本单位——邑落开始萌芽并逐渐成形。

但这时,邑落为数不多,凝聚力也不强,也就是说,尚处于初期阶段。从支石墓随葬品极为贫乏的情况,可知其农业生产力不高,阶级分化与文化水平也极低。因此,仅凭邑落的形成,不能断定当时已达到早期国家的阶段。但可以推测,前面所讲的斯卢国基础——六村这一集体形式就是在支石墓阶段开始出现的早期邑落。

2

斯卢国的形成与结构

斯卢国的形成

自公元前三世纪起,在整个岭南地区开始出现木棺墓,与已有的支石墓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为起点,各种文化变动接踵而来。

除了墓葬制度之外,随葬品的质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支石墓阶段,青铜器极其罕见,主要以石器为主。但在木棺墓阶段,其青铜器随葬品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只有多纽镜、肩甲形铜器等用作礼器的异形铜器,但这却暗示着大变革即将来临。青铜器的变化说明人们的物质欲望大幅上升,即对青铜器的需求上升。可见,随着统治阶层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权力也大幅增强,他们需要与其地位相称的象征物。该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出现了粘土带土器、木棺墓呈现出明显的集群现象等,与之前派系完全不同。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广泛出现,而是局限在大邱等局部地区。就庆州而言,其变化在入室里尤为明显。考虑到他们的青铜礼器与湖西、湖南地区非常相似,这可能是受这些地区的影响或居民迁移所致。虽然这种变化不足以推翻传统土著社会,但不可否认它给当地带来一定的冲击。

给整个岭南地区带来一定变化的居民迁移很可能与公元前三世纪初古朝鲜准王被推翻有相关。准王被朝鲜裔遗民——卫满推翻。卫满原本处于中国统一王朝汉朝的诸侯国——燕国的统治之下，但他趁着政治社会混乱之际，流亡到箕子朝鲜，最终颠覆了准王。准王被推翻之后，大批移民南迁，主要迁至湖南地区，也有一部分迁至岭南圈，给当地带来影响。

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在岭南地区发生了新一轮文化变动，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都是之前所不可比拟的。在随葬品中不仅有细形铜剑、铜铎、竿头铃等更先进的青铜器，还包括短剑、铁矛等铁器。起初，这些可能都是通过居民之间的交流而传入的，但不久后，在短时间里大量流入此地，再后，便在当

地自主生产。此外，还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新型木棺墓。

这种文化变动，之后也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代表性文化遗址有庆州盆地的隍城洞、朝阳洞、竹东里、德川里和大邱的月城洞、八达洞等。那里的木棺墓与之前的最大区别在于都以铁器文化为主，而不是青铜器。同时，其变化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地区，而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几乎同时或短期内发生。可见，其传播速度极快。如果它是在短期内发生的划时代变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已有文化断裂的含义。从这点来看，那不是内部的渐进式变革所致，而是外部居民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结果。

当时，木棺墓集群到处形成。由于是特定群体的集体墓地，可以确定其附近已形成聚落。即使是同一个墓域里的木棺墓，根据其势力强大与否，墓地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也差异悬殊。权势者的木棺墓数量极为有限，也没有在同一个地区延续出现。这说明，那些权势者并没有在同一个群体固定继承。显而易见，当时虽然内部的阶级分化大有进展，但并未达到在同一个血缘集体传承的阶段。

从庆州盆地的多处墓域中可发现，在墓地大小、随葬品状态及种类等方面虽略有差异，但大部分基本相同，呈现定型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各群体之间不仅对物质文化互相共享，对葬礼和程序等葬仪文化也是一样。那些共享并不局限于葬仪文化，而是包括整个生活文化。整体文化呈现定型化特征，意味着各群体之间并不各自为政，而是长期接触、交流，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已形成了大规模关系网络，持续保持联系。

随着居民迁移，先进的青铜器与铁器文化传入庆州盆地，使当地各处产生了新的变化，规模和性质相似的邑落纷纷建成。譬如，在支石墓末期以阶级分化为基础形成的早期邑落更加具体化，也出现了全新的邑落。但还没有优势极为明显的群体，其规模与文化基本上都大同小异。这里的“邑”为中心区，“落”则为边缘区，将两者统称为“邑落”。木棺墓集群很好地证明，该种邑落在庆州盆地正式形成。

这些现象在从庆州盆地通往周边地区的交通渠道上广泛出现。文化共享现象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出现，说明这不是循序渐进的转变，而是急剧发生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主导该变化的特定势力。也就是说，这是多地同时发生

图2 (传)庆州竹东里出土的青铜器(李养璇收藏品)



的现象。由此可见,这不是通过自身进化而出现的,而是外部某种压力所导致的结果。一言以蔽之,这很可能是大量外部居民流入到庆州盆地所致结果。

在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庆州盆地以及整个岭南圈一带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变动,可以说,其主要原因是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灭卫满朝鲜。事实上,卫满朝鲜被灭之前,早已因内部分裂而逐渐衰弱,居民开始纷纷逃离,它的崩溃进一步加快了居民逃离的步伐。大规模移民南迁至汉江带动了连锁反应。当时,由多个政治体制组成的联盟体——辰国已坐落于汉江流域。大规模遗移民断续涌入辰国,使得联盟体的基础开始动摇,最后走向解体。他们与卫满朝鲜的遗移民一同南下,给岭南圈的土著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形势,各地反应各不相同,可概括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处于成长阶段的土著势力积极接受移民及其先进文明,形成更加成熟的邑落。如果遗移民数量较少,则可以在土著势力的主导下推动变化。这时,土著社会虽经历了一定的调整,但不会发生急剧变化。第二,当遗移民数量较多,拥有更强大、优秀的文化,压倒土著势力时,在拥有先进文明的遗移民主导下,对土著社会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性很大。第三,遗移民和土著势力旗鼓相当,达成适当妥协。这时,他们可能加强团结协作,逐渐改变已有的秩序。

哪一个地区以何种形式改变等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即使是同样的岭南圈,外来文化正式流入的先进地区与非流入地区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从庆州盆地出现的文化变化情况看,前者很可能是由遗移民主导发展的地区。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证明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述,朴赫居世的出现和斯卢国的成立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遗移民的主导下,在庆州盆地形成了许多新的邑落。虽然其程度因地而异,但已有的土著社会面临重新洗牌已是在所难免。在此情况下,他们寻找自救之策,互相团结、合作,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各个邑落之间以相互合作为基础,逐渐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关系网络。开始,它们之间的纽带比较松动,但频繁持续的交流使得其关系变得更加巩固。在此过程中,以庆州盆地为据点形成的早期国家就是斯卢国。

斯卢国的结构

过去,人们将这样形成的早期国家称为部族国家或城邑国家。但根据文献记录,组成这些国家的基本单位都是邑落。因此,一些人开始主张应该将其称为“邑落国家”。而且,“邑落”一词可有效解释早期国家的结构。因而,在本文中采用“邑落国家”这一术语。

大部分邑落国家均由多个邑落组成。当然,各个邑落大小不同,由它们组成的邑落国家的规模、范围也各不相同。不同的邑落拥有不同的边界范围和人口结构,也就是说,有一些邑落地广人多,但有些则不然。可能是地理位置与文化环境对这种差距起着决定性作用。

另外,邑落国家的结构也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以一个邑落组成的,也有以六七个以上邑落组成的邑落国家。由多个邑落组成的邑落国家,人口相对较多,空间范围也较广,在经济实力方面自然会占据优势。一般而言,地处交通要冲或拥有适宜耕作的广阔土地,则会形成大规模的邑落国家。斯卢国所处的庆州盆地正好是交通要冲。从各种因素来看,它都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邑落国家之一。

邑落的规模和内部结构因地、因时而异。随着铁制农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大幅提高,人口也急剧增加。伴随而来的就是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邑落的政治色彩日益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邑落内部也自然经历了自身的进化过程,邑落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也随环境而改变。

邑落国家刚出现时,各个邑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虽然不同国家情况略有差异,但各邑落的政治、经济实力基本上相差无几。尤其是在同一个圈内的邑落,几乎在同样的情况和水平上起跑。木棺墓的情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同时暗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各邑落为抢占制高点,将展开激烈竞争。

随着先进文化的不断流入与生产力的提高,邑落之间的差距日益悬殊,开始出现强大的邑落,而且,这种趋势逐渐固化。以这些强大的邑落为中心,邑落国家的内部凝聚力进一步得到加强。这时,发挥核心作用的邑落称为“国邑”。以具有政治向心力的国邑为中心,将多个邑落联合起来,就形成了邑落国家。因此,各邑落之间有了更明显的优劣之分。

但国邑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邑落之间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有些被淘汰出局,有些则冉冉升起,邑落国家的内部结构经过了曲折反复、跌宕起伏的历程。其结果是,中心地位转移至其他邑落中,即出现了国邑的移动。从斯卢国使用的王号中,也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在斯卢国,将最高统治者称为“尼师今”。之前,根据政治体制的性质先后被称为居西干、次次雄。“尼师”意为牙齿,“今”则为首领,相当于“干”的意思,尼师今即指牙齿多的长辈首领。牙齿数量多意味着见识广,智慧多,也就是指年长者。因此,尼师今与其说是政治上的绝对权力者,不如说是具有相对优势的统治者。该王号与由多个邑落组成的斯卢国极为相符。在新罗初期由朴氏、昔氏、金氏陆续继承王位,意思就是在这种族团里选出尼师今。虽然人们后来将其称为族团,但实际上它们都是邑落。

在组成斯卢国的邑落中,上述的三姓族团势力最强大。其邑落的首领成为尼师今则意味着该邑落成为了国邑。也就是说,国邑地位转移到尼师今所属的族团。这说明,尼师今虽然是政治首领,但随时会被更替。这一点如实地反映出斯卢国阶段的国家性质。也就是说,尚未达到由一个核心邑落发挥强大政治力量的阶段。从这点来看,该时期的邑落国家可以说是邑落联盟。

各个邑落国家使用国名,以展示身份认同。有时,随着国邑的更替,国名也会改变。譬如,据文献记载,廉斯国这一国名的存在,在一世纪初早已被确认,但一直到三世纪中叶前它已不见踪影。可见,《三国志》所记载的国名虽反映出三世纪中叶的形势,但其国名或国家形态不一定在公元前二~一世纪也存在。斯卢国也不例外。由于各邑落国家成立后,势力更替反复出现,国名也会随之改变。辰韩联盟体的出现,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点。

3

辰韩与斯卢国的发展方向

辰韩中的斯卢国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在岭南圈出现了以袋状壶和组合牛角形把手附壶等为代表的新型陶器。因其材质,统称为瓦质土器。瓦质土器与之前的粘土带土器相比,使用更为纯净细腻的胎土,在半封闭的窑里烤,可推测两者流派不尽相同。虽然它的发源地未能确定,但它呈现逐渐扩散到整个岭南圈的趋势。这意味着各邑落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关系网络。瓦质土器的扩散表明他们已开始在一定圈内相互共享文化。显而易见,当时已超越邑落国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建立起关系网络,而这即是一种联盟体。辰韩和弁韩也由此成立。

原本各自为政的不同邑落在保留一定独立性的同时,成为了邑落国家的成员。因为结合为更大的政治体——邑落国家,直接关系到其生存。一开始时,邑落国家通过攻占周边邑落,扩展领土,但因内部力量有限,达到一定规模后只能停止扩张的脚步。自然地理环境或外部政治势力也成了其扩张的绊脚石。因此,他们对周边可接触范围内的邑落国家给予认可并建立起关系网络。之所以改变态度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比起孤立分散,团结合作更有利于



图3 庆州朝阳洞38号古坟出土的瓦质土器

生存。譬如共同应对外部政治压力、交换剩余产品、共同参加远距离交涉,以节省费用、降低风险等。因此,对邑落国家来说,即使是松动的体制,保持联盟体还是大有裨益。联盟体成立初期,成员之间的关系松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邑落国家认识到其重要性,团结纽带逐渐坚固。据推测,初期主要是以经济联盟体形式存在,但后来逐步向政治联盟体转变。

虽然辰韩联盟体成立的具体时期与过程尚未明确,但可以确定辰韩在一世纪初前已成立。《三国志·东夷传·韩条》里的廉斯鎡史话证明了这一点。

廉斯鎡原本不是人名,而是指廉斯国首领,同时也兼任辰韩右渠帅。根据该史话,廉斯鎡因某种缘故逃离自己的邑落,前往乐浪郡。在途中,他遇到的一个人叫“户来”。户来对他说,包括自己在内的1500名汉人一起来伐木,却被辰韩抓捕,被奴役已达三年。廉斯鎡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乐浪郡,并担任乐浪郡向导回到辰韩,争取到辰韩人1.5万名和1.5万匹“弁韩布”作为对500名已死汉人的赔偿。

该史话发生在新朝地皇时期(20~22)。新朝是继前汉之后由其外戚王莽建立的朝代。由于这里已出现辰韩和弁韩一词,可以确定三韩在一世纪初前早已存在。此外,从右渠帅可以推测左渠帅的存在,进而可知辰韩已经形成一定的

组织结构。廉斯国退出辰韩联盟体反映出当时联盟体尚未形成足够的凝聚力,对成员也没有强制的约束。也就是说,联盟体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由各邑落国家自主选择。辰韩联盟体所属的邑落国家从原有的6个增加到12个便是重要旁证之一。

辰韩联盟体至少在一世纪初已存在。因此,其成立时期最晚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也就是说,在其组成单位——邑落国家成立的同时或成立不久后结成联盟体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辰韩联盟体的“辰”字与政治体辰国有关,那么主导建立联盟体的集体已具有结成联盟体的经验。因此可以理解为,随着居民移动而形成的邑落国家和联盟体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成立。

在辰韩联盟体刚刚起步时,组织运作松弛,可自由加入、退出,但也存在引领组织的盟主。当时,组成辰韩的具体成员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经济实力最强的邑落国家成为盟主。虽然不能确定辰韩初期的盟主是谁,但从地理因素看,优势明显的斯卢国担任盟主的可能性最大。只是无法断定当时的国名是否也是后来所说的斯卢国。由于其内部主导势力经常更替,不能保证在三世纪出现的国名在公元前一世纪也在使用。

辰韩变动与斯卢国

辰韩联盟体由公元前一世纪成立的多个邑落国家组成。由于凝聚力不强,在外部压力接连不断的情况下,很难保持初期原貌,经历了聚散离合的过程。此外,如同廉斯鎡那样,已有的邑落国家也因新兴势力的崛起导致内部势力更替,经历了相当长的风雨波折。同时,随着外部居民迁移,先进文化纷纷涌入,给当地带来了极大震撼。这种剧烈的变化延续至三世纪。在此过程中,除了邑落和邑落国家的内部出现变化外,盟主地位的转移也伴随而来。正是因为如此,将辰韩社会从头到尾,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研究,会缺乏合理性。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进入二世纪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动。当时,后汉王朝走向没落,对乐浪郡县的控制力也逐渐削弱。随着中国陷入动荡,乐浪郡县也出现

混乱,很多居民开始逃离那里,南迁至三韩社会。其中当然包括辰韩。

汉朝郡县的衰退反证出韩族社会逐渐强大。据《三国志·东夷传·韩条》记载,当时韩濊不断强大,威胁乐浪郡县。三韩社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以至威胁到乐浪郡县,最大的原因莫过于铁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该时期,木椁墓代替已有的木棺墓成为主流墓葬,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木椁墓与木棺墓不同,其随葬品摆放空间大幅扩大,外观规模也明显变大。同时,随葬品种类也发生了新变化,如除了相当多的铁制农具或武器外,也埋藏了改变形状的板状铁斧等大量规格化的铁制材料。铁制品的质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水晶、玉等象征权力地位的饰品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就权势者的木椁墓而言,从已有的墓域分离,在特定地区集中建造。

这些现象主要反映出生产力水平整体上升,财富集中于特定人群,政治、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在特定群体内代际相传。这种集中化并未在所有邑落国家同样出现。根据不同区域略有差异,但越是强大的邑落,其集中化程度越是明显。财富不仅集中于某一个特定人,还集中于某一个特定邑落。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斯卢国内部发生的变化,即大规模的木椁墓在斯卢国的朝阳洞、德川里等地被发现。

随着木椁墓的出现,除辰韩联盟体成员外,邑落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巨大变动。该时期,在斯卢国发生势力更替,即统治者从朴氏族团转为昔氏族团。昔氏族团进入斯卢国后,基于先进的铁器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势力,最后出了尼师今。这也意味着国邑的地位从朴氏族团转移至昔氏族团。虽然不能断言说,昔氏族团在已拥有木椁墓文化的情况下进入庆州盆地,但可以确定,在他们的推动下,斯卢国的铁器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而木椁墓文化就是其代表性产物。总之,铁器文化在昔氏族团的主导下发展。可能在这个时期,斯卢国作为辰韩联盟体的盟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随着后汉走向衰败,公孙氏在辽东趁机建立独立政权,并攻占乐浪郡县。公孙氏于三世纪初在黄海道一带设置带方郡,以防更多的居民逃离。但很快,取代后汉的曹魏东伐便开始占据辽东,掌控乐浪郡和带方郡,加强控制力。曹魏为了加强对三韩的控制力,赐予其统治势力邑君、邑长封号,发给印绶衣帻,以改造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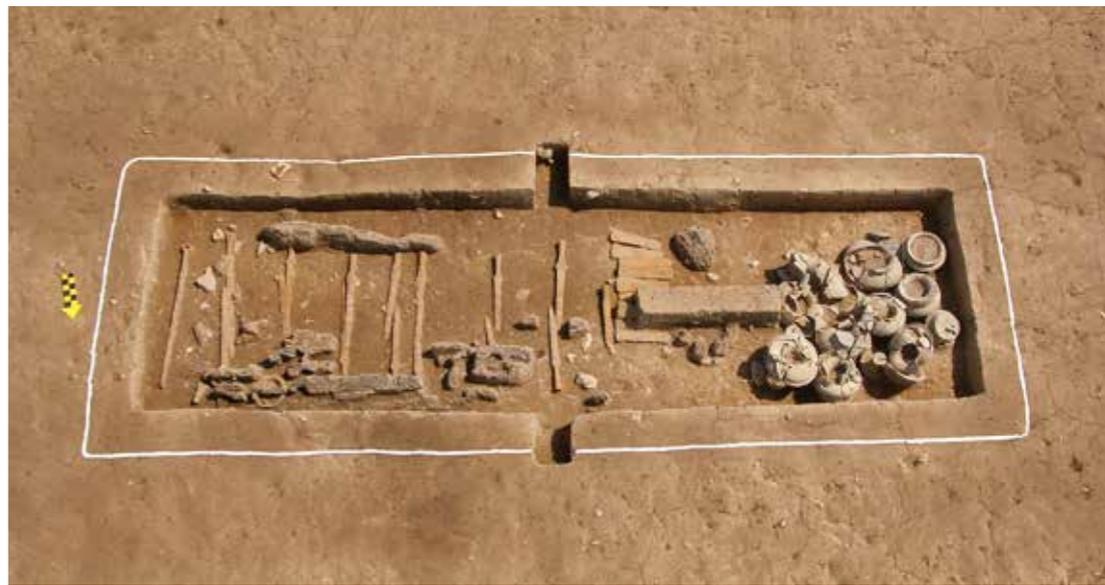


图4 庆州德泉里19号木椁墓内部考古发掘

地体制。同时,还试图将带方郡所管辖的辰韩12国中的8国纳入到乐浪郡管辖范围。由于这会导致辰韩社会的分裂与削弱,立刻遭到当地强烈反对。246年,土著韩族社会还向郡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虽然围绕发动战争的主体与结果仍众说纷纭,但这反映出三韩社会已达到了能与郡县抗衡的水平。

三韩社会乘胜追击试图直接与中国本土进行往来。自三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大约20年的时间里,马韩和辰韩与中国往来过十多次。虽然这些往来都以马韩和辰韩的名义进行,但实际上是其下属的几个邑落国家所主导的。参加往来的邑落国家数量没有规律,少时为3-5个,多时达30多个。这说明马韩和辰韩并没有严格的组织体系,各自按需求决定加入与否,是较松懈的组织体。尽管如此,这种往来肯定由盟主等强大邑落国家来主导。虽风险确实较大,但一旦参与其中并获得成功,会受益匪浅。从与中国本土往来的尝试中,可知当时人们对先进文明充满渴望。这也意味着三韩社会内部变革已开始萌芽。

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后,与中国的往来也随之被断绝,包括辰韩在内的三韩社会迎来新局面。而这给辰韩里的强大势力——斯卢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第二章

新罗的成立与发展

新罗的成立
部体制的出现与运营
地方统治的开始与方式变化
统治集团的矛盾与走向新秩序

1

新罗的
成立

从斯卢转为新罗

辰韩从三世纪末开始尝试与中国本土进行往来。但20年后,双方间歇式的往来却因不明原因而突然中断。在同一个时期,同样竞相与中国本土往来的马韩也并无二致。可见,交往中断的原因不在于辰韩内部问题,而在于往来对方,即晋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四世纪初,原居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匈奴等五胡南迁至中原农业地区,使得当地动荡不安,导致辰韩也无法与中国保持交往。

就在那时,位于满洲一带的高句丽方兴未艾,也把目光转向南部大同江流域,先后将在韩半岛扮演中国前进基地角色的乐浪郡(313)和带方郡(314)打败。高句丽攻占乐浪、带方一带一事给南方三韩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政治紧张局面日益高涨,北方遗移民纷纷涌入,都推动了辰韩政治、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面对这种紧急情况,辰韩内部出现了整合运动。这种邑落国家之间的团结与整合运动在盟主——斯卢国的主导下展开,但与之抗衡的强大势力也参与其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斯卢国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从此,辰韩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斯卢国虽是辰韩联盟体的盟主,但没有特殊的地位,只是其成员而已。也就是说,辰韩旗下的政治势力都是平等的主体,而不是上下隶属关系。正因如此,对外交往时,没有使用斯卢,而使用辰韩这一联盟体的名称。但它们都已具有能够体现自我意识的国名,即是独立国家,只是没有单独推进对外交往的权利而已。虽有大小、强弱之差,但它们基本上都保持了平等关系。

但在斯卢国主导下推进的整合运动完成后,情况则截然不同了。曾在辰韩旗下的政治势力几乎都归属到了斯卢国的统治之下。斯卢不再是辰韩旗下的成员,而成了统治势力。已有的政治势力都失去了独立性,不得使用国名。从此,辰韩成为了历史,被新罗这一新王朝取而代之。

在斯卢国主导下推进的辰韩整合运动大约在奈勿王(356-402年)时期结束。也就是说,奈勿王时期首次开始使用新罗国名,是新罗开始的起点。除了新罗国号外,最高统治者称号的改变等一些新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合运动接近尾声之际,有一些辰韩旗下势力拒绝并入新罗,而选择了脱离。譬如,辰韩12个成员国家之一的不斯国位于昌宁,在四世纪中叶将国名改为比自体,摆脱新罗加入到加耶势力集团。另外,位于釜山东莱的浚卢国原本在与辰韩处于竞争关系的弁韩旗下。但随着弁韩发展为加耶,浚卢国脱离弁韩被新罗吸收。这些都显示,辰韩转为新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聚散离合的过程。因此,从斯卢发展而成的新罗,其内部结构与组织自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将最高统治者改称为麻立干。

之前,斯卢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尼师今。尼师今意为齿痕或牙齿,是韩语“Imgeum(国君)”的词源。人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老成持重、见多识广,因此,长者受人尊敬。尼师今除了牙齿外,也指值得尊敬的年长者。尼师今与麻立干不同,只是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而已,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

麻立干是“麻立”和“干”的合成词。“干”相当于高句丽和扶余的“加”,指族长或首领。“麻立”则相当于“宗”或“头”,意为“第一”或“头领”。因此,麻立干是指“第一首领”、“第一族长”,也就是“干中干”、“王中王”的意思。麻立干因属下率领很多“干”,故此而得名。这里的“干”包括王都和地方的权势者。因此,麻立干这一称号正符



图1 庆州浅泉地区41号积石木椁坟内部

合覆盖王都和地方的新罗。新罗成立的同时便更改首领称号,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麻立干这一王号之外,也有不少例子可证明当时出现的巨大变化。其中,坟墓外形和内部的变化尤为值得注目。自四世纪中叶起,在庆州盆地一带开始出现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墓葬制度。根据它的内部结构,称之为积石木椁坟。

积石木椁坟与之前的坟墓一样要搭建木椁,但不同点在于,在墓坑和木椁之间及其上面堆砌人头大小的砾石,堆积到一定厚度后,再在上面封土,是一种结构奇特的坟墓。围绕积石木椁坟的起源,有北方起源说、本土发生说、二元派系结合说等,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该坟墓将坟头尽可能堆高,以使外形显得更大。这种外形巨大的坟墓一般称为高冢古坟。高冢古坟主要在四世纪中叶出现在岭南地区,其内部结构因地而异。除了庆州盆地外,在其他地区大部分都采用竖穴式石椁(室)结构。积石木椁坟除一些特殊情况外,大都在新罗王都一带建造。因此,这被认为是新罗建国统治势力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力而建造的。在王都的高冢古坟,比起其他地区,其规模更大、更密集。这反映出政治与经济力量集中于中央,并且王都和地方在政治上处于上下隶属关系。

麻立干时代是在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背景下出现的。麻立干为炫耀自己的地位,把包括坟墓在内的宫廷、房屋、宫墙以及神殿等都修建得雄伟高大。同时,通过服饰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日常生活方式也大有改变。统治者死后建造的坟墓外形与在此出土的随葬品都反映出这一点。由于当时人们认为生与死并非完全隔绝,而是相续的,因此,尽量将更多的生前物品埋藏在里面,以延续活着时的生活。华丽的随葬品都明显证明麻立干等统治阶层所享受的生活多么奢侈豪华。

新罗的发展及与前秦的通交

前面列举的几个例子与新罗国号的使用几乎同时发生。与此相关的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新罗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正式亮相。辰韩这一名称不仅在

内部,在对外交往时也不再使用。这如实地反映出辰韩已完全被新罗取代。此外,在四世纪末,新罗已与中国北方强国——前秦进行过两次往来。

新罗奈勿王于337年在高句丽的引见下首次派使节与前秦往来。虽然不是独自派使节赴前秦,但以新罗的名义首次出现在东亚国际舞台上,这本身就意义重大。这预示着外交时代即将来临。新罗因地理位置因素,前往前秦时,高句丽是必经之地。这也意味着新罗早已与高句丽保持着紧密的友好关系。

又过了5年,即382年,新罗第二次遣使跟随高句丽使臣至前秦。当时,新罗使臣为卫头。他与前秦王苻坚间的对话流传至今。虽然对话只不过是只言片语,但可以了解到新罗的内部动向及局势,值得注意。下面,就将对话内容做一简单介绍,以助理解。

符坚：“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耶”

衛頭：“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

两个人的对话暗示着新罗刚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名号的改变。虽然它所指的对象不太明确,但从其内容,可以推测是麻立干。由于两国之前已有接触,因此,这里的名号与其说是国号,不如说是麻立干更为恰当。当时,中国将新罗国王称为“楼寒”,而这被解释为麻立干的简称。从中可以推测,麻立干称号的使用始于377年至382年之间。卫头的故事说明新罗在变革大约完成之际使用麻立干,有以示大功告成之意。

麻立干是比尼师今更强大的政治统治者。从此,王位不再由几个血缘群体轮流继承,而是在特定群体中世袭。虽然后来出现姓氏才追溯附加,但那就是金氏。

新罗建国时占主导地位的势力是金氏族团。金氏是组成斯卢国的各种势力中最晚进入庆州盆地的群体。因此,起初他们的势力微弱,但逐渐积累实力,最后登上了霸主地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赢家,是因为第一位金氏国王味邹王和其父仇道等杰出人物发挥卓越能力并在军事行动中取得成功。尤其是在通过军事行动占领的地区得到很多金银等新物资,为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之

前,铁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物资,因此拥有高品质铁矿或先进的炼铁、冶炼技术的群体,往往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掌握了政治霸权。朴氏和昔氏族团得到尼师今地位也与铁文化密不可分。

但随着炼铁技术的普及化,铁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人们需要更有价值的稀缺物资,即金银。金氏族团正好独自拥有金银产地和采矿及细工制作技术。主要证据为,他们后来将“金”字定为姓氏,积石木椁坟里的随葬品中包含着大量的黄金制品。后来,新罗长期成为闻名遐迩的黄金国度。金氏族团何时、以何种方式掌握金银细工技术及具体产地何在等问题尚不明确,但据推测,他们率先得到了乐浪、带方被灭后逃离此地的技术人群。同时,洛东江中上游一带的金泉和义城等的原地名与黄金有关,因此被认为那里很可能就是新罗的黄金产地。而那些地方都是奈勿王祖父——仇道通过军事行动占领的地区。由此可见,金氏族团以那些地方为经济来源的可能性很大。

金氏族团以金银为经济基础,吸收先进的军事技术,最后掌握了政治霸权。其实,这些先进技术大部分来自于高句丽。当时,金氏族团积极与在新罗周边地区最先进、最强大的势力——高句丽往来、交流。正因为如此,谈到金氏族团的发展过程,研究高句丽的影响必不可少。

国际关系变化与归附高句丽

在新罗成立之际,东亚可谓是大动荡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五胡纷纷南下,进入中原地区,导致统一王朝——晋国灭亡,而其中心势力南迁建立东晋。五胡在北方先后建立新王朝,但都短命而亡,动乱不断,史称五胡十六国时代。

此外,该时期韩半岛也陷入动荡。高句丽南下攻占乐浪、带方后,其影响波及到汉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马韩受此影响开展政治整合运动的过程中,百济势力不断强大,最后百济于369年吞并了整个马韩地区。与此同时,与辰韩处于竞争关系的弁韩也推进整合,但最终失败告终,以加耶之名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进入四世纪后,随着在韩半岛的统治秩序出现重组,各国分别开展积极的外

交战略,以便占得先机。所谓的外交时代逐渐到来。实力相对较弱的新罗暂时只能观望事态发展。百济则率先进入洛东江流域,把触角延伸到加耶。百济一方面拉拢与之一海相隔的倭国结为同盟,对新罗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试图与新罗建立友好关系,以期与高句丽一决雌雄。

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新罗逐渐倾向于高句丽。新罗认为,比起百济,选择高句丽对自己更为有利。新罗早已与高句丽进行直接交流,已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对高句丽来说,为牵制欣欣向荣的百济也有必要与新罗携手合作。新罗有许多强大势力,但高句丽与新兴势力之一的金氏族团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高句丽不仅给他们提供武器、武具及马具等先进装备,还提供战略、战术支持等,作为回报,得到了金银等财物。也就是说,两国之间的利害正好一致。新罗还在高句丽的引见下与前秦通好。另外,百济持续与东晋交往,从中吸收先进文明,对抗高句丽。

新罗趁热打铁,向高句丽进一步靠拢。391年,广开土王即位后,奈勿王将实圣遣往高句丽作为人质,以巩固友好关系。对奈勿王来说,实圣既是僚婿,又是竞争对象。因此,将实圣遣往高句丽,一方面能加强与高句丽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削弱他在国内的势力,可谓是一举两得。高句丽原本要求奈勿王亲自拜访,以表明附属关系,但他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要维护起码的自尊和自主性,最终委婉拒绝。

奈勿王为了达到国内外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北方强国——高句丽。结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句丽的文化如潮水般涌进新罗。研究四到五世纪新罗文化便可发现这种现象极为明显。尤其是400年新罗遭到加耶和倭国攻击时,广开土王派兵救援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那时,广开土王对百济怀恨在心,虎视眈眈寻找复仇的机会,因为他的祖父故国原王(331-371年)因百济突袭而死。正如“广开土王碑”所显示的那样,高句丽一直将百济蔑称为百残,摩拳擦掌欲报仇雪恨,并为此推行南进政策,准备迁都平壤。广开土王于396年渡过汉江,攻入百济王都,百济阿莘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阿莘王上缴一千名男女和一千匹细布,并立誓为奴,将其王弟及10名大臣交给高句丽作为人质。高句丽与百济议和让百济不堪重负,一蹶不振。

百济遭受耻辱后,将责任转嫁给新罗,挑拨离间,怂恿加耶和倭国攻击新罗。其实,百济对新罗过于靠近高句丽早就看不顺眼,一直寻找打击新罗的机会。之所以百济未能出面打击新罗,是因为自己于396年遭受致命打击后尚未得到恢复,而且广开土王前往平壤,密切观察百济的动向。399年,在百济的挑动下,倭国和加耶联合攻击新罗,成功攻陷其王城——金城。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奈勿王逃亡至北方边境,立刻请求高句丽援助。对此,广开土王于400年派遣5万步兵和骑兵,援助新罗,最终高句丽与新罗联合夺回金城,追歼逃敌至任那加罗的从拔城,击败倭国与加耶士兵,收复了失地。

高句丽派兵救援大获成功后,在新罗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新罗的寐锦,即国王亲自前往高句丽朝贡。寐锦是包括“广开土王碑”等在内的多种资料中出现过的新罗王号。一些学者虽将其视为尼师今,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麻立干的另一个称号。之前,奈勿王对高句丽提出的入朝进贡要求表示拒绝,但这时寐锦开始亲自前往高句丽承认臣属关系。有一些人认为该寐锦是奈勿王,但考虑到碑文内容,这很可能是实圣王。新罗国王亲自入朝进贡说明高句丽对新罗拥有巨大影响力。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句丽文化如潮水般涌入新罗。

第二,以这次事件为契机,高句丽士兵驻扎在新罗王都与地方的要冲。这很可能是新罗寐锦前往高句丽时两国达成协议的结果。新罗无疑沦为了高句丽的属国。这种情况正是与“广开土王碑”上将其描述为属民相符。此外,高句丽将奈勿王的三个儿子抛在一边,将10年来做人质的实圣立为王,10年后又将实圣赶走将讷祗立为国王等事件,都明显证明高句丽对新罗的内政干涉极为严重。新罗自400年以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隶属于高句丽,政治独立严重受挫。但那同时成为一种契机,使新罗能够在高句丽的保护伞下,为东山再起打下基础。

第三,新罗与加耶的国界线以洛东江为界。之前,昌宁的比自钵属于加耶七国之一,可知在洛东江以东地区也存在加耶的政治势力。这说明洛东江并没有发挥新罗与加耶的国界线作用。但以高句丽派兵援助为契机,洛东江成为了划分两个政治势力的国境线,其作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高句丽援助新罗摆脱危机、驻扎士兵等行为,在一定期间内确实为新罗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高句丽过度干涉新罗内政,它开始成为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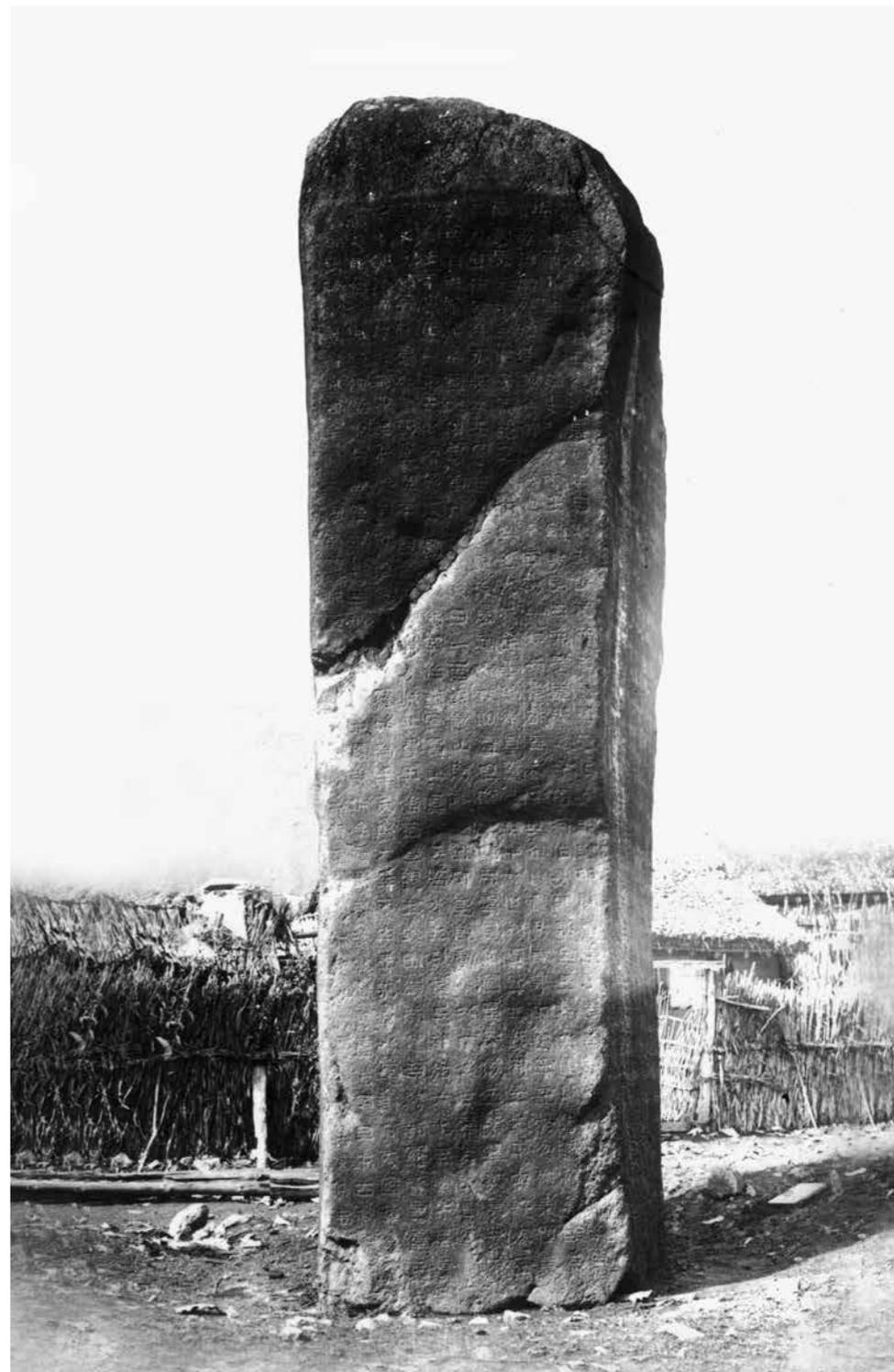


图2 广开土好太王碑

碍新罗发展的桎梏。新罗对此感到不满,谋求自立之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为到高句丽做人质的讷祗弟弟而展开的拯救行动。

罗济同盟与谋求自立的新罗

自从于400年广开土王派兵援助新罗在洛东江流域击败加耶和倭国联盟势力后,新罗一直隶属于高句丽。高句丽完成任务后,大部分兵力撤回本国,但一部分仍驻扎在新罗王都和要冲。高句丽在干涉新罗内政的同时,还要求巨额经济回报。开始,新罗迫不得已接受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罗也开始提出抗议。此外,高句丽还挑动新罗内部矛盾,并巧妙利用这种矛盾来加强对新罗的控制。这种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实圣王和奈勿王长男讷祗之间的斗争。两人既是五寸关系,也是岳父和女婿关系。实圣王原本想借高句丽力量赶走讷祗,但以失败告终后,反而导致自己被驱逐。由此,讷祗得到高句丽的支持成为国王。

与实圣王一样在高句丽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的讷祗王原本要维持已有的关系,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确信这会严重阻碍新罗的发展,便开始谋求摆脱高句丽的干涉,走向自立之路。讷祗王并非是软弱可欺的人物,即位后立刻试图救出在国外做了十几年人质的两个弟弟。当时,靠正常的外交渠道无法使两个弟弟回到本国,因此讷祗决定采用非正常渠道,派朴堤上救出弟弟。围绕朴堤上的出身,有王京、梁山等不同的主张,但最近,主流观点认为,他出身于蔚山的可能性最大。朴堤上继去高句丽拯救扑好后,又前往倭国成功救出了未斯欣,但他自己却在倭国不幸被捕而死。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新罗隶属于高句丽,但并未通过正常外交手段来将扑好接到本国。这意味着新罗和高句丽两国之间出现了某种问题。由于当时高句丽占据优势,因此,新罗一开始时很可能尝试以正常渠道来处理问题,但无法得到预期结果才决定使用非正常渠道。这也反映出当时新罗和高句丽的关系并非发展得一帆风顺。

该时期,高句丽内部也明显分成实圣派和讷祗派,两派针锋相对。在新罗,反

对正常外交渠道的一派对讷祗的即位表示不满。因此,讷祗王不得不派朴堤上开展人质拯救行动。在高句丽里讷祗派的支持下,人质拯救行动获得成功。这些经验使讷祗王切身感到自立的重要性。而摆脱高句丽的唯一方法就是向百济靠拢。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为此提供了大好机会。百济认为这是巨大的危机,率先靠近新罗,而恰好迫切需要与百济携手的新罗则欣然接受百济要求,罗济同盟于433年终于结成。

如前所述,新罗建国后在国际关系发展历程中面临了各种风风雨雨,但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启迪,使之成为其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新罗认识到弱国要生存必须要利用强国。六世纪中叶,真兴王时代的新罗大刀阔斧地做出决断,同时与高句丽和百济为敌并大获成功,也许正是得益于初期所积累的这些经验。

新罗与高句丽关系的破裂及变化

虽然罗济同盟成立,但新罗无法公开打出反对高句丽的旗帜。新罗在一段时间内采取双重外交战略,权衡利害得失,适当调整政策。一方面与高句丽保持友好关系,寻找可乘之机,走自主发展之路;另一方面与百济保持友好关系,为应对来自高句丽的压迫做好准备,采取双轨政策。这时,新罗将外交方向定为亲百济和反高句丽。

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先爆发冲突的地点不是中央,而是边境地区。450年(讷祗王34),在悉直(今三陟)野外狩猎的高句丽边将被新罗何瑟罗(今江陵)城主杀害。边将和城主的具体身份很模糊,但他们俩都不是中央派遣的地方官或军官,而是当地权势者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这是在两国不同领域内的权势者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发生后,高句丽表示抗议,在新罗边境地区发动军事报复行动。新罗对此立刻表示谢罪,使其告一段落,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两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和对立局势日益高涨。454年(讷祗王38),高句丽突然袭击新罗北部。第二年,高句丽攻击百济时,新罗还派兵援助百济。如此这般,新罗公开试图与高句丽进行军事对决,准备彻底告别高句丽。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据《日本书纪》记载,从464年之前的某一个时期开始,大约有一百余人的高句丽士兵在新罗王都驻扎。但具体从何时开始驻军不得而知。400年,高句丽南征大功告成后,主力部队都回到本国,一部分士兵仍留在新罗。虽然其士兵数量因情况而变化,但他们继续留在新罗的可能性较大。或者他们在讷祗王即位时暂时撤军后,可能又因某种原因再次被派到新罗。不管怎样,考虑到464年的驻军规模很小,可知其目的不在于援助新罗打击外敌,而在于以军事顾问的名义监视新罗内部动向。从这点来看,高句丽驻军也有可能是455年两国矛盾达到高潮并发生军事冲突后暂时妥协的结果。此外,据《三国史记》记载,该时期倭国一直多年大规模袭击新罗边境,因此也不能排除新罗为应对外敌而请求高句丽援助的可能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高句丽士兵驻扎在新罗王都是不争事实。这也说明两国关系虽经历风雨,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破裂的状态。

然而,464年新罗突袭驻扎在其王都的高句丽军队,并将他们斩尽杀绝。在《日本书纪》,以民间故事的形式记载了当时的情景。一百人左右的高句丽士兵中有一个士兵在休假期间回本国,对引路的新罗人典马泄漏出高句丽即将攻击新罗的消息。典马中途偷偷回到新罗,汇报从高句丽休假兵处获取的消息。结果,新罗抢先发动攻击,杀死了所有高句丽士兵。那时,死里逃生的士兵回到本国,立刻禀报了情况。新罗与高句丽由此反目成仇。

虽然那里面确实参杂了不少民间传说故事的因素,但不能断定其基本框架也是虚构的。其实,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是历史事实。《三国史记》中对该时期前后的描述也证实了这一点。该事件爆发后,新罗积极采取应对高句丽攻击的措施。如果上述内容属实,那么可以说,在长期经历风雨波折的过程中勉强维系的两国关系,以464年事件为契机彻底破裂。新罗认为高句丽发动反击是早晚之事,遂采取了多方面的应对措施。尤其是以此为契机,新罗得以能够全面完善军事体系,建立新的统治秩序。

2

部体制的出现 与运营

六部的成立

在四世纪中叶,新罗终于实现辰韩各种分散势力的统一,但相应的统治秩序并非一蹴而就。由于传统秩序依然坚固,导致新的统治体制要落地生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入新罗的地区虽然失去了独立性,但本土势力尚未完全瓦解,仍维持一定影响力。因此,要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需要长期的探索与实践。

斯卢国原本由多个邑落组成,其中发挥政治中心作用的邑落特称为国邑。但随着新罗的成立,这种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辰韩社会统一后,斯卢国逐渐加强内部凝聚力,并推动邑落组织的重构,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组织“部”。

部这一名称是后来借鉴高句丽制度而引入的。与新生国家新罗不同,当时高句丽已拥有先进文明,对新罗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新罗建国之后,斯卢国旗下的邑落并未直接转为部。斯卢国的主导权从昔氏族团转移到金氏族团也发生在这个时候。部是各邑落经过全面重构之后出现的结果。有一些邑落相互整合,以丰富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形成规模更大的部,而有一些则被吞并消失。因此,斯卢国旗下的邑落数量和新出现的部数量并不完全一致。此外,经

过组织重构过程而诞生的部在性质上与邑落存在根本性差异。与邑落相比,部的内部阶级分化程度更加明显,因而共同体性质相对较弱。

围绕部的成立时期,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是尼师今时代;其二认为是麻立干时代。但考虑到组织重构的情况,后者显得更有说服力,因为邑落改为部本身就说明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新罗建国等于部取代邑落的过程。

但新罗的核心统治集团——部的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该集团成立并再过相当时间之后才称为部。根据六世纪初的金石文,有时将该集团称为部,有时则省略名称便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那时部这一名称尚未得到普及。据推测,该名称于五世纪后期被接受,新罗之所以将其称为部,是因为其集团功能类似于高句丽的五部。

新罗的六部表面上类似于高句丽的五部,但其实两者在规模、结构、运营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高句丽五部的每个部相当于称为“那”或“那国”的邑落国家,而各那(部)由多个邑落组成。譬如,培养国王的桂娄部原本是一个独立国家。与此相比,新罗的六部将整体加在一起才相当于或稍大于斯卢国。如果新罗六部和高句丽五部对比,六部总体规模仅相当于高句丽的一个部。这种特征使得两个国家在统治结构和政治运营方面产生了根本性差异。

新罗六部分别为喙(梁)、沙喙(沙梁)、牟喙(牟梁)、本彼(本波)、习比(斯彼)及汉祗(汉只)。有些人主张在新罗成立初期就已形成六部,而有些人则主张起初只有三部,但各部在开展激烈竞争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其规模,其中势力最强大的部再分化为三个或两个,最终形成了六部。前者认为,组成斯卢国的六村,即六个邑落直接转为六部,但对两者之间的差异及发展过程没有解释。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理解,斯卢国在转为新罗的过程中,不仅是外形没有变化,在内部开展整合运动时也几乎没有出现重构。但在成立一个新国家——新罗的过程中,内部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的观点难免遭到质疑。因此,六个邑落直接转为六部的观点缺乏合理性。

后者是对前者表示质疑而出现的新观点。它以部具有动态性与自立性为依据,认为部本身具有强大的政治独立性,使得各部之间也存在差异。在新罗建国

的过程中,斯卢国旗下的各邑落整合为三个大邑落并分别转为部,而这三个部的规模、权限及结构都各不相同。同时,各部争相参与对外军事行动,按照其结果获得不同的战利品,使得各部规模和结构之差进一步拉大。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像喙那样势力强大的部再次出现分化,最终形成了六部。

与较早形成的前者观点不同,后者是根据金石文资料而提出的新观点。虽然新观点尚未得到完全证实,但这明显表明,今后需在认识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对其成立过程、性质及功能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部体制与会议体

六部一般被认为是统治者共同体。由于部就是斯卢国内部的胜利者聚在一起而成立的组织,因此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这里除了斯卢的统治者之外,也包括划归中央的地方权势者。部是斯卢内部组织经过重构而成立的,故在此过程中,已有的体制出现改变是理所当然的。

在部体制下,统治阶层为推动组织重构而采用了干制,即给各部的权势者——赋予“干(包含由此分化出现的干群)”称号。但就王京的权势者而言,由于他们按照势力大小、优劣已开始等级排序,因此没有千篇一律地赋予干称号。也就是说,干也出现了等级分化。这后来发展成为赋予给王京人的京位。

采用干制,说明在统治者共同体内部出现了一定的组织重构。也就是说,随着部体制的成立,形成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统治体制。由干组成的强大统治势力之首领就是“第一干”、“首领干”,即麻立干,新罗建国为斯卢国扮演王都角色提供了重要支撑。当然,要彻底摆脱斯卢国的认识,真正使其发挥王都作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至少其种子已经播下,而王都的成立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地方”也存在。

干称号除了王京六部的权势者之外,地方权势者也可以获得。虽然已有的独立国家都归入新罗管辖内,但当地权势者的权力基础尚未完全被瓦解,完全控制地方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中央赋予干称号,以示对他们地位的认可。这后

来发展成为赋予给地方民的外位。

如此这般,干刚开始出现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中央与地方之分。这与六世纪对王京人和地方权势者分别给予京位和外位,以明确区分身份等级形成明显对比。之后,中央不断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度,大幅削弱地方民的势力。

在麻立干初期,王京人与地方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对待。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仍在保留辰韩时期的秩序。在中央集权制度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随着中央不断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度,地方权势者的权力基础逐渐被侵蚀,对地方民的歧视也浮出水面。

从当时麻立干的地位和威力来看,他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虽然他是新罗国王,但基本上仍是喙部的部长。虽在六部部长中排名第一,却并未具有绝对权力。新罗的国家大事都在各部部长以及相当于该地位的权势者参加的会议体内进行讨论。由于六部之间优劣明显,因此能参加会议体的人数也因部而不同,如势力强大,包括部长在内的多数人 can 参加,势力较弱则只有少数人可参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日益悬殊。该会议体由称为干的统治阶层组成,相当于高句丽或扶余的“诸加会议”,因此,将其称为“干群会议”或“诸干会议”。麻立干就是干群会议的主席。

所谓的部体制就是这样以由部权势者组成的会议体为核心单位进行运营的统治秩序。在部体制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会议体的运营,因为新罗所有国家大事都在该会议决定。部体制说明新罗仍未完全摆脱之前的共同体性质。

参加干群会议的资格并未限定于王京人。至少在表面上,只要拥有干称号,地方权势者也可以参会。其实,起初他们也有一定的权利干预中央政治工作。虽然因距离限制,无法参加所有的会议,但会引发纠纷的外交问题或涉及到军事行动的战争等核心案件都会在地方权势者也参加的会议体上决定。譬如,讷祗王即位后为被高句丽扣为人质的两个弟弟谋求救援方案时,边远地区的权势者也都参加了会议,并决定派朴提上前往高句丽。在部体制的初期阶段,具有干称号的地方权势者也能参与新罗中央政治工作,这说明当时仍未摆脱辰韩政治体制的影响。

在部体制阶段,没有专门负责某一事项的官府,也没有官职。但各部已具有

初始形态的官僚组织,兼具官职和级别的性质,负责实际工作,体现内部等级。但不是所有部都处于对等地位。六部中,喙部和沙喙部分别以麻立干和葛文王为部长,其统治阶层范围较广,自然称为干的权势者也多,辅佐这些权势者的人员也相对多些。可以说,在麻立干时代尚未形成以国王为首的统一官僚体制,各部拥有不同的初步官僚组织,就仅涉及到部的事件而言,各部自主决策、执行落实。

在麻立干时代,统治阶层分为决策群体与执行群体,如干层属于前者,奈麻层属于后者。共同决策、共同执行的结构,是部体制运营的主要特征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尚未有特定群体确立排他性、优越性地位,要共同应对问题的共同体性质仍然存在。

由于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围着部转,因此麻立干的地位远不如后来的国王,往往受到其他部的牵制。尤其是在规模、地位上与喙部势均力敌的沙喙部部长是麻立干的强大竞争对手。沙喙部部长被特别地称为葛文王也说明这一点。因此,有些人主张当时分别以麻立干和葛文王为首的两大机制并存,形成二元化统治结构。在麻立干时代,除了沙喙部部长外,还有很多葛文王。譬如王妃的父亲和国王的弟弟也称葛文王,但他们的葛文王称号仅限于自己,唯有沙喙部部长可以世袭,拥有实际权力。这时运营葛文王这一独特制度与当时出现的家系分化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范围的王族圈里,垄断王位继承权的王家或王室观念开始萌芽。

部体制运营及其局限性

在麻立干时代,六部一直扮演着政治运营的核心角色。六部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并在制定新罗国家发展方向方面起到核心作用,由六部部长及各部权势者参加的会议体决定、执行国家大事。

但六部的地位不尽相同。除了人口结构和规模方面的差异外,大体分为势力强大的部和势力较弱的部。六部中喙和沙喙属于前者,其他四部则属于后者,当

然四部之间也有一定的优劣之分。各部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拉大。从这一点来看,部体制本身就难以为继。由于以势力强大的两个部为中心加强政治凝聚力,而其他四部的势力走向衰弱,自五世纪后,部体制也开始走上瓦解之路。

部体制走上瓦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内部结构。六部分别以多个小群体组成,而它们都以不同血缘关系为基础。因此,有些人将该小群体称为“部内部”。从表面上看,六部各自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独立共同体。但实际上,它们由血缘、政治立场与理想各不相同的小群体组成,这是因为它们是以中心邑落为主与周边小群体结合而成的缘故。这些小群体又分为主流和非主流,存在巨大优劣之分。各个小群体之间也竞争激烈。婆婆王为其儿子祗摩寻找配偶时,汉歧部旗下的两个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的对决,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点来看,部体制本身便是危如累卵,其结构具有随时会倒塌的可能性。各部的内部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等级分化。总体看来是同一个血缘群体,但实际上由多个血缘关系组成,而不同家族群体还处于激烈的政治竞争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围绕奈勿王的接班人,其晚辈直系血亲和实圣王之间爆发的政治斗争。其实,他们俩同样属于金氏族团,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但随着家系的分化,即使有血缘关系也因政治理想不同,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矛盾。

从婚姻情况中也可以了解在部旗下的多个血缘群体出现了家系分化。麻立干时代前后的婚姻关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互不相干的不同血缘群体之间的婚姻,即所谓的族外婚;另一种则是同一个群体内的婚姻。在麻立干时代之前,这两种婚姻形态已经明显存在。在同一血缘群体里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婚姻形态,背后自然会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与理由。如果在同一个群体内的婚姻固化,持续出现,那么这意味着其本身就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惯例。最终会形成一种相互排斥关系,产生不同的政治理念。这种性质孕育出了后来的骨品制婚姻。麻立干时代的国王婚姻关系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以开创麻立干时代的奈勿王为准,察看其前后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具体情况。

金氏族团打好稳定政治基础,可追溯于奈勿王祖父——仇道时期。仇道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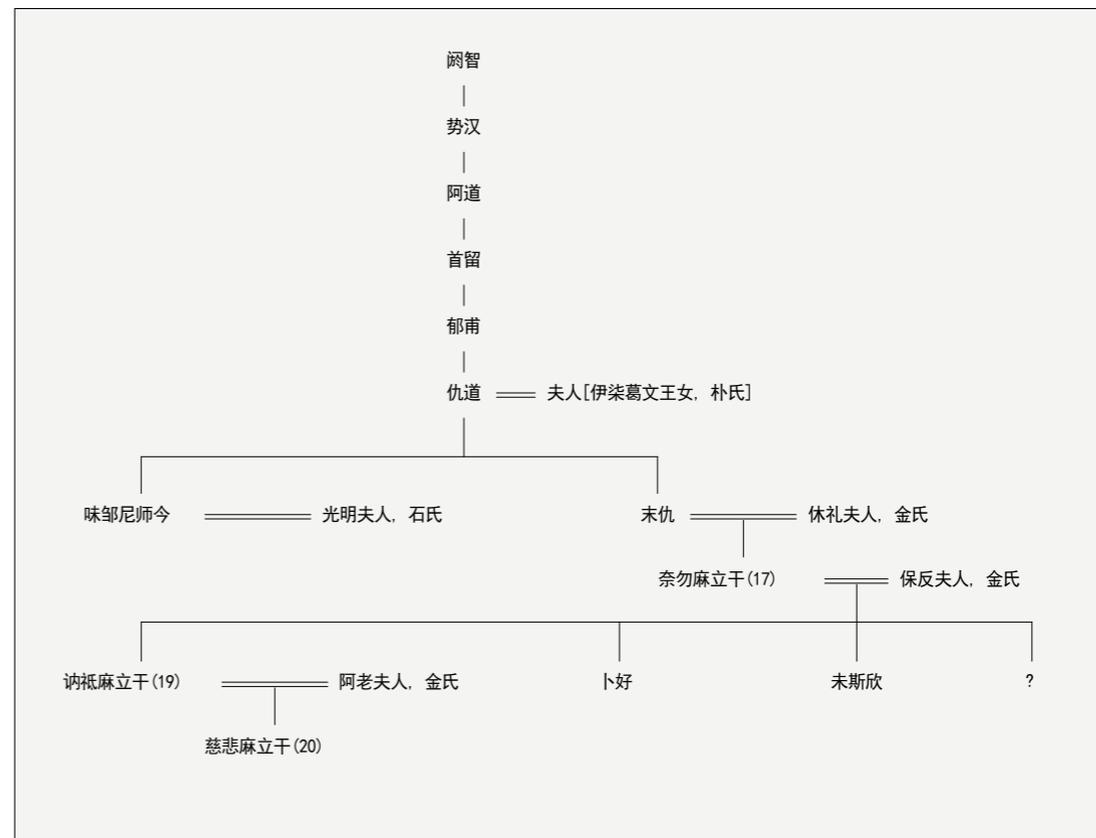


图3 奈勿王家系图

了味邹和未仇两个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叫大西知。大西知就是实圣王的父亲。《三国史记》关于大西知的出身只简单记载为金氏始祖阙智的后代,没有具体记载其家谱。但《三国遗事》将他记载为味邹王之弟弟。考虑到实圣被奈勿王送到高句丽做过10年的人质和虽然得到高句丽的帮助但归国后继承奈勿王成为国王等因素,可以确定他与奈勿王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因此,将两者记载为四寸关系的后者更具说服力。那么,仇道不仅是奈勿王的祖父,也是实圣王的祖父。也就是说,仇道有三个儿子,即成为尼师今的味邹、奈勿王的父亲未仇以及实圣的父亲大西知。

味邹和大西知两个兄弟都与昔氏结婚,但唯有未仇与金氏休礼夫人结婚。虽然休礼与未仇之间的血缘关系不太明确,但可以肯定这是金氏族团的近亲

结婚。味邹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分别与奈勿和实圣结婚。四个人是堂兄弟姐妹,这可谓严重的近亲结婚。金氏族团的近亲婚姻惯例便是从末仇开始的。

奈勿王的长子讷祗与其政敌实圣王之女儿结婚,两个人是六寸关系。讷祗的儿子慈悲与舒弗耶末斯欣之女儿结婚。由于末斯欣是奈勿王的第三个儿子,也是讷祗的弟弟,因此慈悲相当于是与四寸亲属结婚的。慈悲的儿子炤知娶伊伐食乃宿之女儿善兮为王妃。乃宿就是后来在真兴王时代编纂《国史》的居柴夫之祖父,也叫仍宿。那么,善兮与居柴夫之父亲勿力是兄妹关系。由于居柴夫是奈勿王第五代孙,因此乃宿(仍宿)是其第三代孙,即曾孙。炤知也是奈勿王第三代孙,也就是说他与乃宿是兄弟关系。这样看来,炤知与善兮至少是六寸关系,两人婚姻也是近亲结婚。

如上所述,奈勿王的晚辈直系血亲中成为麻立干的人物几乎都与八寸以内的亲属近亲结婚。在麻立干时代,国王近亲结婚已成了一种惯例。这种近亲结婚现象与之后的中古前期形成鲜明对比。从经过与炤知王的政治斗争最终继承王位的智证王,到其儿子法兴王,再到其接班人真兴王,都没有与金氏结婚,而是与朴氏族团结婚。三代连续与朴氏结婚意味着当时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炤知王与智证王虽然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两个家系在婚姻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不仅说明他们在政治立场、理念上存在不同,也证明像直系、旁系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家系分化。

其实,这种现象在奈勿王之前已经开始出现。奈勿王的祖父仇道与朴氏结婚,两个伯父味邹王和大西知也都与昔氏结婚。当时,主流婚姻方式是族外婚。但唯有末仇与金氏结婚,而这种现象持续传承。大西知的儿子实圣也与奈勿一样,与味邹王女儿近亲结了婚。

如前所述,在麻立干时代前后,其统治阶层的婚姻方式可分为两种,即近亲结婚和族外婚。原本后者是主流婚姻惯例。他们将与其他血缘群体结婚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手段。但在末仇之后的麻立干时代,近亲结婚成为国王等统治阶层的主流婚姻模式,尤其是继承麻立干地位的家系出现了严重的近亲结婚。奈勿王的直系亲属近亲结婚其实并非由于这是当时的惯例,而是因为一种特

殊情况所致。近亲结婚是在统治阶层不与其他群体结婚也可以保持稳定的政治基础的背景下才出现的。换言之,这说明开创麻立干时代的金氏族团主流势力已拥有强有力的政治基础,自称为正统。但另一方面,尽管是同一个金氏族团,仍有一些人选择族外婚,主要是旁系。他们为与直系血亲竞争并保持优势,需要加强与其他血缘群体的关系,因此仍追求族外婚。

在麻立干时代,因统治体制不稳定、家系急速分化等原因,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出现任何契机,其统治根基就会随时发生动摇,而与高句丽关系的破裂所引起的地方改革则为此提供了直接契机。

地方统治的开始与方式变化

地方组织整编

新罗是以斯卢为据点拥有广泛领域的国家。新罗建国后，斯卢地区自然扮演起王京的角色。斯卢是新罗核心政治势力的根据地，也称为徐罗伐或徐伐。如今的首都——首尔一词便来源于此。

王都的成立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地方也存在。新罗是以王都与地方两个中心为基础成立的国家。当时，组成新罗地方的基本单位是辰韩时期的独立邑落国家。它们随着并入新罗逐渐失去独立性，相互对等的关系转为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开始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代表身份认同的国名转为地名使用或被新地名取代。国名直接转为地名使用，说明当地已有的统治基础并未完全瓦解。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权势者的部分统治权被剥夺，但其地位相当程度上仍保留着。与此相反，国名被新地名取代，意味着当地统治势力完全被瓦解。主要是地方权势者向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或不配合时，中央政府便会选择顺从新罗的新势力来取而代之。这样，新罗整个领域经历了重新洗牌的过程。

新罗中央政府开展地方组织重构时采用了两种方式：一为村制；二为干制。

村一词原本是指在三世纪的中国三国动乱时期，被出于自卫目的而筑起的防火墙所包围的地区。高句丽将它用来指由多种聚落组成的村落。新罗则从高句丽引进村制，一开始指地方的特定政治据点。高句丽的村是地方行政基础单位——城的下级单位，而新罗的村则相当于高句丽的城。也可以说相当于已有邑落国家的基础单位——邑落。六世纪后，村成为派遣地方官的行政基本单位便说明了这一点。之后，村的意义逐渐扩大，包括组成它的下级聚落。总之，新罗的村开始只指地方据点，但逐渐开始包含下级单位，具有双重意义。但这种村制并不是在整个地区同时推行的，而是先对一部分地区试行之，逐渐扩大了其范围。设定为村之后，中央政府便给当地权势者赋予了干这一新的称号。

如前所述，干称号不仅王京的权势者可以获得，地方的权势者也可以得到。但仅对编制为村的地方赋予干，以便对当地权势者的统治权给予认可。开始，拥有干称号的地方权势者与王京权势者享有同等的待遇。麻立干给地方权势者赋予干称号的同时，作为保证其地位的信物赐予衣服和相应的首饰等所谓的“威势品”。被推测为地方权势者的墓地里出土了冠、冠帽、耳环及项链等首饰品、腰带、象征军权的各种刀剑类等。这些随葬品与中央积石木椁坟里的相差无几。虽然其外形规模、质量并未达到王京最高级人物，但可以说与其下一级旗鼓相当。这明显表明，地方权势者虽然其地位没有达到少数最高级别的王族，但确实受到相当高的待遇。

但就大小类似的地方墓地而言，其里面的随葬品呈现出高度相似性。这说明中央政府对获得干称号的权势者赐予了几乎相同的威势品。当然，根据地方势力的规模和政治重要性及权势者的忠诚度等因素，威势品也略有差异。正因为如此，同样的干也逐渐出现不同阶级，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分化过程。这可以说是后来外位制的初始形态。

间接统治及其方式

地方权势者以一个村为基本单位取得干称号，因此他们往往被称为“某某村

干”。被称为村干的权势者发誓忠于中央政府并获得当地的统治权作为封赏。他们与过去在邑落国家时代具有独立地位不同,这时要借助中央政府的权力对地方居民行使统治权。但他们的统治范围并不局限于村,也包括之前附属于自己的一定范围。所谓的村相当于邑落国家时期的国邑,发挥了据点作用。因此,其他已有的邑落自然隶属于村干的统治下。村干以从中央获得认可的村为基础,也影响到其他邑落,使得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村干行使统治权。新罗对地方权势者的统治权给予认定,使之行使邑落国家时期的权限是两者之间妥协所产生的结果。

随着新罗统治体制的完善,编制为村并获得干称号的对象也逐渐增加。换言之,称为村干的地方权势者显著增加。中央政府增加村干,鼓动他们争相忠诚于新罗,将触角逐渐渗透到村落各个角落。

各村以村干为首,建立了一定的组织体制。村政由多个当地势力参与的组织体来运营。该组织就是后来村司的前身。与中央政府一样,他们也组织起地方权势者参与的会议体,讨论重大事项。虽然尚未成熟,但地方组织体还形成了以政务人员为主的初步行政结构。鉴于高句丽的情况,他们也可能对一定的职位向中央汇报其名单,以获得批准。

中央政府之所以利用村落内部组织来统治地方,是因为其统治体制尚未成熟,无法直接派遣地方官。地方权势者虽失去了独立性,但没有失去了政治基础。他们从中央政府获得相当大的自治权,作为回报向中央政府纳贡。这样,中央政府不必派遣代行王命的地方官,以地方权势者的纳贡为媒介,对地方行使统治权的方式称为间接统治。间接统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出现的过渡统治方式。

虽然是同样的间接统治,但中央政府的控制与管理水平也因地区有所不同,因为各地方势力的地位和存在形态各不相同。主要可分为三种:一是归属于中央并纳贡而获得几乎完整的自治权;二是已有的地方势力被迁至其他地区,全面开展组织重构,使新势力取而代之;三是已有的权势者几乎维持原来的政治基础。

在间接统治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势者之作用和功能的依存度较大。但

也并不是任由他们随心所欲,行使政治权力。新罗中央政府也建立了各种监管体制,如向军事要冲派遣中央军队,加以控制;也随时派遣监视官进行监察;有时国王亲自巡狩,以便安抚当地权势者。此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诱导各地区权势者开展忠诚度竞争,以防他们相互团结等。如果出现起兵谋反,试图脱离统治范围,中央政府便会发动军事惩罚,彻底打垮其政治基础。

但是,不派遣地方官而利用当地势力的间接统治,只不过是过渡期暂时沿用的方式而已。随着中央的统治体制不断完善以及内部需求的增加,派遣代行王命的地方官问题,自然被提上了议程。由于新罗的统治基础逐渐稳固,内部生产力大幅提升,其必要性也越来越增加。而且,周边局势变化也为其注入了催化剂。新罗中央政府在五世纪后期,对一部分地区先派遣道使等地方官,紧锣密鼓地为直接统治做好了准备。

地方势力的成长与整编

长期隶属于高句丽的新罗开始尝试摆脱其管制,谋求自主发展之路。在此过程中,新罗密切跟踪国际形式变化,不断积累宝贵的外交经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它在六七世纪三国争霸时期,准确把握国际局势并作出了正确判断。新罗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曾遭到高句丽的压迫而陷入严重的困境。这虽然带来了危机,却也同时为新罗改革内部体制并再次腾飞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新罗在与高句丽对抗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并未完全依靠与百济的同盟关系。当时,新罗认为已有足够的实力与高句丽抗衡。因为在麻立干时代得到快速发展,基础进一步巩固,使得新罗对未来充满信心。摆脱高句丽的尝试就是在这种成长的背景下进行的。

新罗的迅猛发展与地方统治息息相关。新罗根据自己的国情,适当控制地方,不断增强了总体国家实力。五世纪建造的高塚古坟变化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规模变得巨大,数量也大幅增加,随葬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

明显的提高。而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央统治势力,也包括地方权势者。也就是说,地方统治的成功不仅带动了中央势力的成长,同时也带动了地方权势者的成长。

新罗能在短期内快速成长,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人们新开发多种形式、用途的铁制农具,极大地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如耒、镐头、铁耙子、凹字形铁锄刃、铁铲、锄头及镰刀等。在皇南大塚这一大型高塚古坟出土了20件铁耙子和14件凹字形铁锄刃。同一个时期的其他王京高塚古坟和地方权势者坟墓也是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出土了各种农具。这些农具说明当时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由当地权势者来管理、控制,而站在其顶峰的首领就是麻立干。

另外,该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构筑的水利设施和牛耕的普及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建设了不少水利设施,如429年(讷祗王13)修筑了长达2170步的矢堤。根据《三国史记》记载,牛耕始于502年(智证王3),但考虑到已出土了更早时期的犁,可以确定牛耕出现的时期比之前认为的更早。到了智证王时代,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从国家层面对牛耕应用进行了大力推广。据说在438年(讷祗王22),国家教老百姓如何使用牛车,并且不仅限于牛车,还包括养牛、驯牛等技术。因此,可以说牛耕等畜力耕作方式也在比我们认为的更早时期已被引入。

前面所举的例子都足以证明在麻立干时代,农业生产力已大有提高。而这促使新罗对王京进行组织重构。如前所述,虽然其主要目的在于应对高句丽的攻击,但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力发展使之成为可能。结果是人力、物质资源都集中在王京,以至达到饱和状态。王京仅靠已有的结构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资源。为了解决该问题所实施的王京组织重构策略之一便是坊里制。

采用坊里制直接带动了六部改革。490年(炤知王十二年),新罗首次为王京开设市肆,即市场,以保证来自各地的物资交易顺畅,这也显示出地方的人力、物质资源集中到王京的情况。首次开设市肆不仅说明物资已超出了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积累了不少剩余物,也表明来自地方的物产丰富了很多。但这时还没有达到需要国家出面控制、管理的水平。那以后大约再过20年,即到了509年(智

证王十年)才开设东市,也说明这一点。

在地方生产的物产涌入到中央,意味着国家已经形成相关管理体制。新罗于487年(炤知王九年)首次在各地设置邮驿,并向当地官厅下令维修官道。邮驿的职能是为使中央政府的信件或政令迅速传递给地方提供支持。在各个交通要冲设置邮驿意味着新罗组织交通网络,以便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提供便利。同时,为有效利用邮驿,新罗还命令官厅维修、管理官道。官道是指国家直接管理的公共国道。这些都说明随着物产的增加,系统控制地方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物产逐渐集中在中央,进一步拉大了中央统治势力内部的贫富差距。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直接影响到政治实力,在统治势力内部自然出现了各种矛盾与分裂,尤其是六部中喙和沙喙这两个强大势力与其他四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正如以喙与沙喙部为中心推进坊里制那样,整个王京都经历了组织重构过程。

除了王京之外,对地方组织的重构也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推动地方组织重构的主要动因是筑城工程。虽然关于在地方各地推进筑城工程时征发力役的方式与规模等方面,没有具体文献记载,但从468年(慈悲王十一年)的泥河筑城事例中可知,主要征发对象为十五岁以上的人群。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中央政府为调查年龄、性别等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一种人口普查。在当地负责该工作的组织也随之成立。当然这种工作在各地区的最高首领——村干的领导下开展,但在其属下负责实务的组织也不可或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了规模相似的地方统治组织。

在五世纪后期,随着与高句丽的关系每况愈下,新罗大力推进筑城工程,需要征发大规模人力。为此,政府开始对各地方居民进行组织管理。之前,地方组织运营各自为政,但从此后其组织结构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趋同发展态势,即国家直接介入地方居民管理后,开始形成统一的管理组织。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对整个地方进行系统、有效的管理。由此可见,当时的筑城工程为国家全面推进地方组织重构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开始,对一些筑城工程紧迫的地区率先开展组织重构,之后逐渐扩大了其

范围。虽然各地方组织体制尚未完全一致,但至少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地方居民的组织管理不仅促进了税收制度的完善,也为组建由地方居民组成的军队创造了条件。其实,之前在地方已存在尚未成熟的、以村干为首的自卫组织,以保持当地秩序,但其规模的扩大和地方行政制度的完善为组建地方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幅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在各据点建造的高塚古坟之外形与随葬品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麻立干时代,中央政府并未对所有地方给予同等对待,而是根据政治、军事重要性给予了不同的待遇。从高塚古坟的规模、数量及文物质量中,可以推测出这一点。中央通往地方的交通要冲、与敌对势力相邻及类似于此的地区,其高塚古坟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从中出土的文物也丰富且精致。除了陶器等生活用品外,很多威势品的水平都很高,仅次于中央最高级别。这如实地反映出麻立干时代地方权势者所享受的政治待遇。中央政府之所以对地处遥远或要冲的权势者给予优厚待遇,是为了防止其脱离或造反动乱。而那些地方势力以丰厚的支援为基础,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得到了快速发展。

与此相反,就离王京较近、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范围内或较早并入新罗的地方而言,其高塚古坟规模和数量都不大。这是因为在未派遣地方官而通过当地权势者统治地方的间接统治时期,中央政府从离王京近的地方着手,不断削弱当地半自治基础,以消除潜在威胁势力。

派遣地方官与直接统治的开始

对中央政府来说,对地方权势者的成长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放任不管。在其势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必须要对其采取控制措施。在与高句丽为敌之际,新罗已开始谋求控制地方势力的方案。也许,高句丽在与新罗爆发矛盾的情况下,曾鼓动新罗地方势力脱离中央,如援助位于高句丽通往新罗的路口或离其较近的边境地区居民,以利用他们对新罗的抵制情绪。高句丽于400年推进南征后,其兵

力驻扎或经过的地区都接触过他们的先进文化,如庆州北部的荣州、奉化及东海岸兴海以北等。因此,高句丽很可能尝试将那些地区拉拢到自己阵营中,甚至《三国史记·地理志》出乎意料地将这些地区标记为原本属于高句丽领土。高句丽能够于464年全面推进吞并新罗的策略离不开这种前期准备工作。在那种情况下,新罗也不能对地方袖手旁观,需要改变已有的统治方式。由于新罗已公开与高句丽为敌,加强地方统治已刻不容缓,这种政策表现为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筑城工程。

以地方要冲为中心推进的筑城工程对新罗意义非凡,因为它给麻立干时代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以此为契机,新罗不仅可以对地方居民组织进行管理,还可以削弱地方权势者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新罗为控制他们经济实力的发展,可能将筑城所需经费的相当一部分交由地方权势者来负担。新罗采取这些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遏制地方势力的成长。

新罗以对抗高句丽与筑城工程为契机,在积极推行地方控制政策的同时,还对地方居民进行了组织管理。虽然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没有以组织管理为前提,征发大规模筑城劳动力无从谈起。这种组织管理从489年(炤知王十一年)使“游食百姓”种植耕作的措施中可以推测。在此,“游食百姓”的对象模糊不清,但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其对象并不是因为没有谋生手段而游手好闲的人,而是指可以不劳而食的权势者。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令地方权势者开始从事农业,并且这不是针对特定地区,而是针对全国的。可见,在全国范围内对地方权势者的改革拉开了帷幕。

就这样,以为筑城工程征发人力为契机,中央政府对各地方居民进行了组织管理,使得国家权力渗透到各个地方的角落。可见,来自外部的危机反而给新罗提供了进一步加强内部凝聚力的机会。对地方权势者的改革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中央对地方居民的组织管理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可能村主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引进以取代村干制的。

村主制何时开始实施尚不明确。但这一职称可见于建于503年的“迎日冷水里新罗碑”,因此,至少在该时期已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而建于501年的“浦项中城里新罗碑”里面看不到村主一词,将类似于此的权势者称为村之干支。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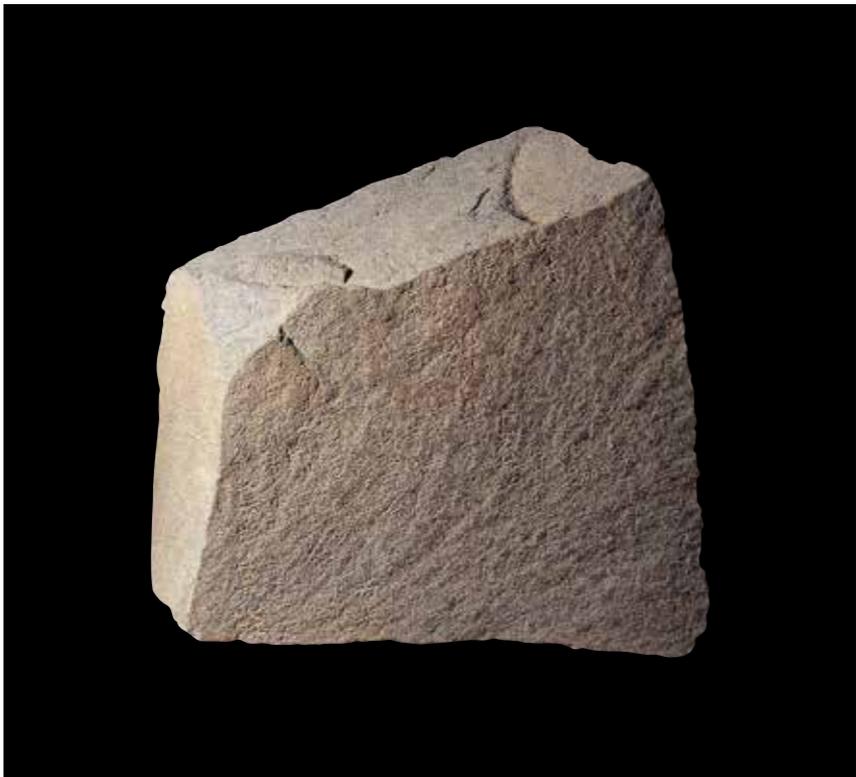


图4 浦项冷水里新罗碑

即使这样也不能断定说,村主制自501年至503年全面推行。可能村主制从之前某一个时期已经开始实施,但未能广泛推广并在一定时间内两者混用。也就是说,村主制并非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而是循序渐进地扩散。从这点来看,首次实施村主制的时期不会与此相距很远。

从村干制转为村主制表明对地方组织的重构全面展开,其主要动机很可能来自于464年以后正式推进的筑城工程。事实上,新罗要应对高句丽的攻打,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筑城和由地方居民组成的军事组织。因此,新罗很可能一方面为筑城征发人力,另一方面对地方权势者进行组织重构,并在此过程中引进村主制。村主制与村干制不同,地方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性,隶属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从已有的干支中筛选出对中央顺从、忠诚的权势者并优先赋予了村主这一职称。



图5 浦项中城里新罗碑

其实,实施村主制也包含着以地方组织管理为基础,削弱地方势力的目的。因为当时地方权势者的力量确实巨大,中央政府迫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村主制并没有一次性地在全国全面推行,而是从最紧迫的地区开始,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由于村主制的实施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深入渗透,因此,它对地方统治有着非凡意义。中央政府实施村主制的同时,派遣地方官,以逐渐实现对地方的直接统治。

麻立干时代首次派遣地方官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中古期对设定为行政单位的城村派遣地方官——道使,而该职称就出现在“冷水里碑”与“中城里碑”里。因此,在五世纪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央向地方派遣代行王命的道使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也与村主制一样,首先对政治、军事方面迫切有需要的地区优先派遣,之后逐渐扩大了对象范围。虽然首次派遣的时期不能确定,但这很可能与村主制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实施。关于此,值得注意的事件是497年(炤知王19)中央政府令“群官”各推荐一名能够担任牧民官的优秀人才。这里其推荐主体是群官尤其引人注目。由于群官可以说是指六部所有的权势者,因此至少从表面上看,等于是让整个六部推荐牧民官。而这时的牧民官就是作为地方官派遣的道使。这可能是首次派遣道使,也可能是增加其数量的措施。但考虑到让每人推荐一人的情况,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可以说从比之更早的某一个时期起已经开始派遣道使。那么,487年实施的官道维修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道使里的“道”意为官道,“使”则意为国王的使人。官道维修里面包含着派遣道使的事实。即使不然,它与道使还是不无关系。

在麻立干时代后期,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变动。一是随着新罗试图摆脱高句丽干涉,周边紧张局势快速升温。新罗为了应对高句丽攻打,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这为统治体制的变革营造了气氛。二是地方势力快速发展,达到政府不得不管制的程度。如果中央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可能会带来巨大威胁。无巧不成书,原本为对付高句丽而推进的筑城工程为地方管制提供了理由与契机。于是,新罗开始对地方居民进行组织管理,也开始派遣地方官。但在此过程中,中央和地方问题同时爆发,而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上,统治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日益凸显。六世纪初的“冷水里碑”与“中城里碑”内容都如实反映出这种情况。

4

统治集团的矛盾 与走向新秩序

内部体制的整备

高句丽一直认为百济才是新罗与自己为敌的幕后推手。据文献记载,高句丽使节芮悉弗于504年出使北魏见到世宗宣武帝时说,“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意思就是,过去高句丽对夫余和涉罗行使影响力,能够确保黄金与珂并奉献北魏,但现在不能。

对于这里的涉罗,有人认为是济州岛,有人则认为是新罗,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但后者更为合理。虽然外交辞令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但当时新罗与百济关系确实很亲密,以至于高句丽认为新罗被百济吞并。在此情况下,百济还火上加油发起挑衅,触动了高句丽敏感的神经。

百济盖鹵王(455-475年)即位后,推进以王族为中心的改革措施并获得成功,实现了统治体制的革新。但这给高句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体制改革成功后,满怀信心的盖鹵王于469年向高句丽南边先发制人发动攻击,扩展领土,还在青木岭设置大栅,不断发起挑衅,并于472年首次遣使至北魏,递交国书诚恳请求征讨高句丽。高句丽得知该消息后忍无可忍,决定对百济不再袖手旁观,为

全面发动战争做好了准备。

475年,高句丽猛烈进攻百济,最终成功攻占王都汉城,抓到盖鹵王,并送到高句丽的根据地阿且山城杀死。其实,百济遭到高句丽攻击后,盖鹵王立刻将其弟弟文周派到新罗请求派兵援助。但文周从新罗借到一万士兵回到百济时,汉城已被攻陷,变成一片废墟,盖鹵王被抓走,高句丽早已渡过汉江撤回到阿且山城。文周当场即位,背离汉江迁都至锦江流域的熊津,重建百济。新罗听到该消息后,切实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事实上,自从464年以来,新罗早已预料到高句丽会大举进攻,开始采取防范措施。467年(慈悲王10)还修理了战舰。考虑到前后情况,不能排除是出于应对倭军的考虑。但这主要是新罗因预测高句丽会沿着东海岸南下而采取的防范措施。果然不出所料,高句丽于468年(慈悲王11年)率靺鞨兵进攻东海岸北边悉直城。新罗则大规模征发十五岁以上的何瑟罗人,在主要通道——泥河筑城应对高句丽。

在第二年的469年,新罗制定了王都的“坊里名”,其意义远远超过制定坊里名称本身。虽然当时仍在部体制下,但新罗在王都规划中首次引入坊里制意味着对王京的改革。而且,王都改革本身也包含着对已有六部秩序的重构。也就是说,引进坊里制来推行王都的行政改革可解释为对六部体制的重构。虽然六部制并未由此完全被解体,但无论何种形式都给其体制带来了巨大改变。考虑到后来的情况,其变化主要体现为进一步巩固以喙部和沙喙部为中心的体制。从表面上来看,势力最强大的喙部和沙喙部引进坊里制,对其他四部加强控制。在六世纪初期的金石文中,除喙部和沙喙部之外的其他部里,不仅是干群,连奈麻都看不到,正是这次改革的结果。虽然六部的根基尚未瓦解,但不可否认它重组为以喙部和沙喙部为中心的体制。综上所述,新罗为了对六部制进行改革,在王京引入坊里制,而这也是在应对高句丽攻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新罗将军阿滄伐智和级滄德智于463年倭人入侵阳山时,曾联合出征打败敌人,立下赫赫战绩,而在473年时分别任命为左将军和右将军。两人开展军事活动的时期为慈悲王和炤知王时代。

新罗首次引进将军制度的具体时期和背景不得而知,但这时存在左、右将军制度,意味着已对军制进行过改革。后来,官府的主要长官职都为复数,正是来源于此。设置左、右将军可能是六部重组为以两部为中心的体制时伴随而来的军制改革之一。也就是说,高句丽的军事攻击等外部因素推动王都行政及军制改革,使得新罗整体秩序获得重构。

新罗不仅对王都行政进行改革,也对地方进行了组织管理。以修建于470年的三年山城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筑城工程。三年山城因用三年的时间征发人力建成而得名。可见,筑城工程中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这也反映出新罗为应对高句丽攻击有多么用心良苦。471年在笔老城,474年则在一牟、沙尸、广石、沓达、仇礼及坐罗等地修建城墙。虽然不能确切了解这些城墙的具体位置,但据推测大部分可能位于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冲。

随着受到高句丽攻击的忧虑日益加深,新罗在改革六部的同时,为防御王都,还于473年维修了明活城。从这里用了“维修”一词和考古发掘,可知之前其筑城基本上已得到完成。对它进行维修可能意味着将土城改建为石城。明活山城规模庞大,位于庆州东部,具体位置为从庆州经过吐含山山脚楸岭通往东海岸的路口,一直发挥着防范倭军从此入侵的作用。该时期对其进行维修的目的不仅在于防范倭军,更在于防范即将爆发的高句丽攻击,以便用作避难所。事实上,475年新罗国王听到百济汉城被攻占消息后,立刻迁至明活山城,直到488年维修完成月城后才返回。其间,明活山城大约承担了十几年的王城作用。

正如新罗所料,高句丽于475年攻陷百济后,于481年率靺鞨军,沿着东海岸不断南下,达到了庆州北部弥秩夫(今庆州浦项兴海)。新罗在百济和加耶的联合帮助下,勉强击退了高句丽。484年,高句丽攻击内陆母山城时,新罗也与百济联合打败了高句丽军队。之后,在各地爆发的战争中,新罗时而孤军奋战,时而与百济联合攻打高句丽,克服了危机。整体上看,自464年至五世纪后期,新罗虽经常遭到高句丽攻击,但皆成功将其击溃转危为机,不断完善新的统治体制。

事实上,引发高句丽攻击的第一个导火索是新罗抹杀驻扎在新罗的高句丽士兵。面对危机,新罗切实做好准备,打败了高句丽的反复攻势,但百济却遭到致命打击,失去汉江流域,被迫南迁。这时的经验促使新罗培养外交能力,有效

应对未来变化,进而推动内部改革,重新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就这样,新罗与外敌交战的同时,不断磨练、改变自己。

统治集团矛盾爆发与智证王即位

随着统治体制的完善、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各统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在家系分化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再加上利害关系问题,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是必然的结果。炤知王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开始谋求解决方案。具体事例如下:

炤知王一即位就给百官给予升爵一级的奖励。虽然这里的爵所指的具体内容无法确定,但也许作为官等制的初始形态,包括经济奖励。国王即位时,一律提升官爵的事例并不罕见。后来,真兴王和圣德王等即位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也就是说,提升官爵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才实施的的政策。炤知王选择这种措施与当时统治势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不无关系。

尤其是于487年(炤知王9年)在奈乙修建神宫,非常引人注目。炤知王即位二年和七年,即分别于480年和485年到始祖庙拜祖并亲自祭祀。特别是485年时,将管理始祖庙的人员增加至20家,以便修整始祖庙,而且两年后还另行修建了神宫。

奈乙是指始祖出生的地点。关于奈乙的本意,有太阳、萝井及国井等多种解释。虽然其始祖所指为谁不太明确,但主流观点认为是朴赫居世。尽管如此,围绕在奈乙神宫供奉的主神仍存争议。如有与始祖庙里的主神一样是指朴赫居世的说法,视为金氏始祖金阏智和奈勿王、味邹王等的说法,视为天地神的说法,认为是举行祭天仪式的地方等等,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人们一致认为,奈乙神宫是在新罗确立中央集权体制的过程中,为团结分裂的血缘群体而修建的,是具有宗教含义的象征。在始祖庙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为何又偏偏设立供奉其他主神的神宫,其意图不太明确,但也许他们追求不同以往的向心力。也就是说,统治势力内部出现严重裂痕,以至于需要修建新的神宫来团结纽带。

虽然始祖庙仍保留着,但其作用较之以前大幅减弱。炤知王于495年亲自前往神宫,举行祭祀,也许就是在说明始祖庙的地位已被取代,其功能也大部分转移至神宫。之所以做出这样判断,是因为从此之后几乎看不到始祖庙发挥政治作用的事例。修建神宫除了取代始祖庙功能之外,还具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象征性意义。也就是说,其最大目的在于弥合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使之重新走向团结。

就在这个时刻,炤知王回归月城的事实耐人寻味。这至少应该是以外部威胁因素已得到解决为前提的。但与此相反,第二年,即从489年开始,分别于494年、496年、497年,新罗几乎每年都与高句丽交战。当然,这些都是新罗面对高句丽对本国边境的攻击进行防守的战争。495年,百济遭到高句丽的攻击,请求新罗出兵援助。新罗派德智将军拯救百济。由此可见,新罗国王从明活山城回归月城后,与高句丽的交战反而变得更加频繁。这意味着迫使他搬迁到明活山城的根本原因并未得到解决。尽管如此,炤知王还是回到月城,这说明其目的并未只涉及到高句丽问题,而是向国内外宣布临时避难结束,以提高国王的权威,进而加强内部团结。496年开展宫廷重修工程也与此息息相关。

前面所列举的例子都在说明炤知王为加强统治势力的团结付出了莫大的努力。反过来讲,这也意味着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和矛盾极为严重。广为人知的射琴匣故事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射琴匣故事只在《三国遗事》里有记载。下面简单介绍故事,以供参考。

炤智王即位十年戊辰 幸於天泉亭。時有烏與鼠來鳴,鼠作人語云“此烏去處尋之或云神德王欲行香具輪寺,路見衆鼠含尾恠之,而还占之‘明日先鳴烏尋之’云云,此說非也..”王命騎士追之南至避村,今壤避寺村,在南山東麓.兩猪相鬪留連見之忽失烏所在。徘徊路旁時有老翁自池中出奉書。外面題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使來獻之,王曰“與其二人死莫若不開但一人死耳。”日官奏云“二人者庶民也,一人者王也。”王然之開見書中云‘射琴匣。’王入宮見琴匣射之。乃內殿焚修僧與宮主潛通而所好也。二人伏誅。

该故事虽不能全盘相信,但有一部分还是历史事实,如僧人进到宫廷里行佛事,他们与宫主等妇女有着密切的关系等。炤知王最终杀了僧人和宫主,可见他们对他们持反对立场。也就是说,当时佛教已经渗透到宫廷,围绕是否接受佛教

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考虑到炤知王杀死了僧人和宫主,可以推测,主张接受佛教的一派暂时遭惨败。

根据故事内容,主张接受佛教的一派是宫主。宫主与僧人私通意味着前者与佛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宫主可能不仅仅指某一个人,而是指主张接受佛教的某一个群体。虽然这里宫主具体所指是谁不太明确,但如果是炤知王的王妃,则该故事可能会显得有些戏剧化。她是伊伐淦乃宿之女儿善兮。我们应格外注意这一点,因为善兮是居柴夫的姑姑。在524年的“蔚珍凤坪新罗碑”上,将居柴夫的父亲勿力记载为拥有一吉淦官等的人物。考虑到其官等,可肯定其在智证王时代也有政治活动。

他的儿子居柴夫小时曾出家为僧,在真兴王时代的政治、军事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居柴夫与智证王家族有联系,自己曾出过家,在信奉佛教的法兴王和真兴王时代扮演过核心角色等,纵观各种因素,可知他的家族很可能是积极推进接受佛教的派别之一。随着金氏族团出现家系分化,坚守传统统治意识形态的派别和主张接受符合新时代的佛教等高等宗教的派别针锋相对。这最终引发了炤知王暗杀未遂事件。企图谋杀国王的事件足以令我们推测出当时宫廷内激烈的对立局面。但可以推测主张引入佛教的一派势力较薄弱,基础尚不牢固。

这种对立局面还反映到地方政策上。六部原本已在各地具有政治、经济基础,在当地发挥着影响力。但中央政府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筑城工程详细了解各地情况,并推进地方组织改革,以加强控制力度。随着中央权力的渗透,六部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除了六部里面的喙部、沙喙部及其他四部之间发生矛盾外,甚至其内部家系之间也发生了利害冲突。也就是说,以筑城为契机,对地方组织进行改革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炤知王晚年出巡捺已郡(今庆北荣州)时所发生的事情。

500年(炤知王二十二年),炤知王出巡捺已郡,住在当地权势者波路之家。炤知王受到隆重接待,并与其女碧花过夜。这说明以炤知王为部长的喙部族团与特定地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炤知王来往捺已郡时所经过的古陞郡(今庆北安东)的一个人物——老姬,指责其出巡及行为举止。虽然,其内容充满儒学色彩,不可全盘相信,但这说明国王与特定地区保持特殊关系引起了周边地区的不

满。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根据地区不同存在差异。古陞郡出身的老姬不仅代表着地方权势者,也代表着王京统治势力的立场。炤知王偷偷将碧花带到宫廷别室生活并与之私通生子的事例也说明这一点。

不可否认,当时统治势力内部围绕引入佛教问题、地方组织改革问题存在严重的矛盾。前面所列举的两个事例也暗示着这一点。其实,在开创新时代的过程中,阵痛不可避免。阵痛的强度和振幅越大,对立与摩擦也就越激烈。两股势力尖锐斗争,最后爆发冲突已成必然。

在麻立干时代末期,新罗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一场赤裸裸的斗争,即炤知王和智证王之间的对决。炤知王是寐锦王,而智证王则是与之旗鼓相当的葛文王。前者为国王兼喙部部长,后者为沙喙部部长,是二号政治人物。随着家系分化,两人除归属不同外,政治立场也相去甚远。寐锦王要坚守传统,而葛文王则追求新时代,前者排斥佛教,而后者要引入佛教。首次对决中,前者获胜,而第二次对决以后者获胜告终。

根据“冷水里碑”内容,智证王即位前原本是沙喙部部长兼葛文王。据史书记载,他在讷祗王去世后,以64岁高龄顺利即位。但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即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譬如即位时年龄过大、出身于沙喙部、对炤知王晚年的记录存疑、智证王即位年度记录存在差异、葛文王在政治上扮演核心作用、智证王即位后大力推进改革政策等。

由于智证王是沙喙部出身的葛文王,按常理难以继承王位。对炤知王的晚年记录以他与捺已郡的碧花私通生子而结尾,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智证王并未顺利登基,而是通过政变获得的王位。正因如此,他一即位就积极推进各种措施,构建新秩序,为法兴王实现改革政策,即颁布律令、引入佛教、改革官僚组织等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他还向洛东江及东海岸扩张领土等,留下了不少政绩。正因如此,智证王被评价为引导开启新时代,即为中古期的开创奠基开路的人物。

第三章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及其运行

律令体制的成立与运营
领土扩张与统治秩序的确立
官僚体制的确立
迈向新统治秩序

1

律令体制的
成立与运营

智证王的改革措施

在正常的政治情况下,原本非法即位的智证王以64岁的高龄登上王位后,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新政策,以建立全新的统治秩序。主要有如下几项措施:

第一,智证王即位第三年,即502年发布了禁止殉葬之令。在炤知王去世时,虽保持殉葬制度,但殉葬者限制为男女分别5人,但这时完全被废除。殉葬制度从何时、以何种方式引入到新罗不得而知,但一开始时殉葬人数没有强制性规定。而以炤知王去世为契机,暂时限制为10名,经过该过渡期后相关惯例被彻底废除。禁止殉葬制度的背后有着尊重生命的佛教思想与劳动力需求增加等时代背景。这给整个丧葬制度带来了变化,如两年之后的504年制定了丧服法。

关于丧服法的具体内容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这表明将王族和贵族的葬礼仪式、方法、程序及规模等都由国家来管控的坚定意志,这也暗示着以国王为首的新统治秩序指日可待。这种潮流不仅给王京的统治阶层,也给地方权势者带来了巨大影响。

第二,504年首次推广使用牛耕。实施牛耕的目的在于鼓励农耕,提高农业

生产力。考虑到用于牛耕的农具——犁早已出土,可知牛耕并不是这时首次引进的。推广使用牛耕意味着国家将掌控养牛、管理农具、动员农民等事宜,直接控制地方权势者。一言以蔽之,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力度。由此可见,推广牛耕与国家控制葬礼仪式一脉相承,都旨在掌控地方势力。

第三,公元503年正式定国号为“新罗”。之前,新罗、斯卢、斯罗及徐罗伐等国号被混合使用,但它们不仅标记法不同,其内涵也有所差异。大体上可分为新罗派系和斯卢派系。斯卢派系是基于斯卢国的国号,范围较小,仅指庆州盆地。由于斯卢起到新罗王都的作用,也指六部。而新罗则指以斯卢为中心并入新罗领土的更广泛区域,其外形会无限扩大。之前,新罗这一国号主要在对外交往中使用,而斯卢则往往用来区分王京和地方。这样两个名称长期并用,但智证王将其统一,宣布将新罗定为正式国号。同时解释称,新罗一词来源于“德业日新网罗四方”。

正式定国号为新罗意味着至少从表面上已实现了王京和地方的统一。新罗国王也从此摆脱小国——斯卢国王的形象,成为了包括更广泛区域的大国帝王。为此,开始使用中国式王号来取代麻立干。从此,中国式的王这一称号唯有新罗国王使用。群臣为新罗国王上尊号,也是由于此。这大幅提高了新罗国王的地位,也将新罗国王定为直接统治整个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为形成天下观念打下了基础。制定新罗这一国号标志着新时代即将开始。

第四,新罗国王亲自将全国划分为州郡县,由中央进行统一管辖。当然,当时的行政单位名称并不是州郡县,而是州郡城(村)。但统一规范全国行政区划名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以新罗国王为中心,对全国地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将其置于中央管辖之下,展示出国家对广施德政的坚定意志,而这正符合其国号和中国式王号的使用。为此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张、守卫领土。因此,新罗首先对东海岸设置了悉直州,派遣异斯夫担任军主。不久后,新罗就沿着东海岸北进拓境,占领江陵一带,到512年,还征服了地处郁陵岛的于山国。以此,为向全国各地派遣地方官开展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兴王颁布律令

法兴王(514年-540年)作为智证王之长子继承父亲的路线,以父亲的改革措施为基础,致力于完善国家统治体制。由于他期望实现佛法大兴,因而除了新罗王名“牟即智王”外,还使用了具有“法之大兴”之意的佛教式王名——法兴王。法兴王称号并不是他去世后给予的谥号,而是在世时使用的王名。他被称为法兴王的最主要原因是将佛教公认为国教,但其称号还具有弘扬律法的内涵。法兴王不仅振兴了佛法,还倡导律法并使之扎根落地。

法兴王即位第七年,即520年首次颁布了律令。新罗律令来源于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律令经过高句丽和百济传播到了新罗。律令是由刑法之“律”和行政法之“令”两个体系组成的法令。在中国以成文法形式发展的律令与汉字、儒学等一同传播到新罗周边地区,逐渐成为国家管理的基本框架。新罗颁布律令意味着其社会变得复杂,需要建立制度框架,进行规范化管理,而律令则包含着国家管理所需的基本因素。新罗从智证王时代开始积极推进改革措施,不断完善国家统治体制,迫切需要能够容纳其体制的结构框架,而律令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布的。

对律令的具体内容仍众说纷纭,但大体可分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其内容包括新罗国家管理相关的整体法律法规;二是低估当时新罗政治社会发展水平,认为律令内容仅限于百官的公服制及其服色规定。一直以来,前者因没有文献证明,被视为只是不着边际的推测而已。

但建于550年的“丹阳新罗赤城碑”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观点,因为这里写有土地制度及其运营相关的佃舍法编目和年龄等级等。这明显表明当时的律令超出单纯的公服制,涉及到更广泛的内容。不仅如此,1988年发现的“蔚珍凤坪里新罗碑”显示新罗律令包含着更加具体的内容。在建于524年的凤坪里碑上写有“大教法”和“奴人法”一词,前者是指律令颁布本身,而后者是律令的具体编目。奴人是对并入新罗的隶属民之总称,奴人法是规定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性质的律令编目。此外,碑文里的杖六十、杖百等词显示当时已存在杖刑。杖与笞、徒、流、死一同组成五刑,这说明当时引进了中国之律。法兴王时代的新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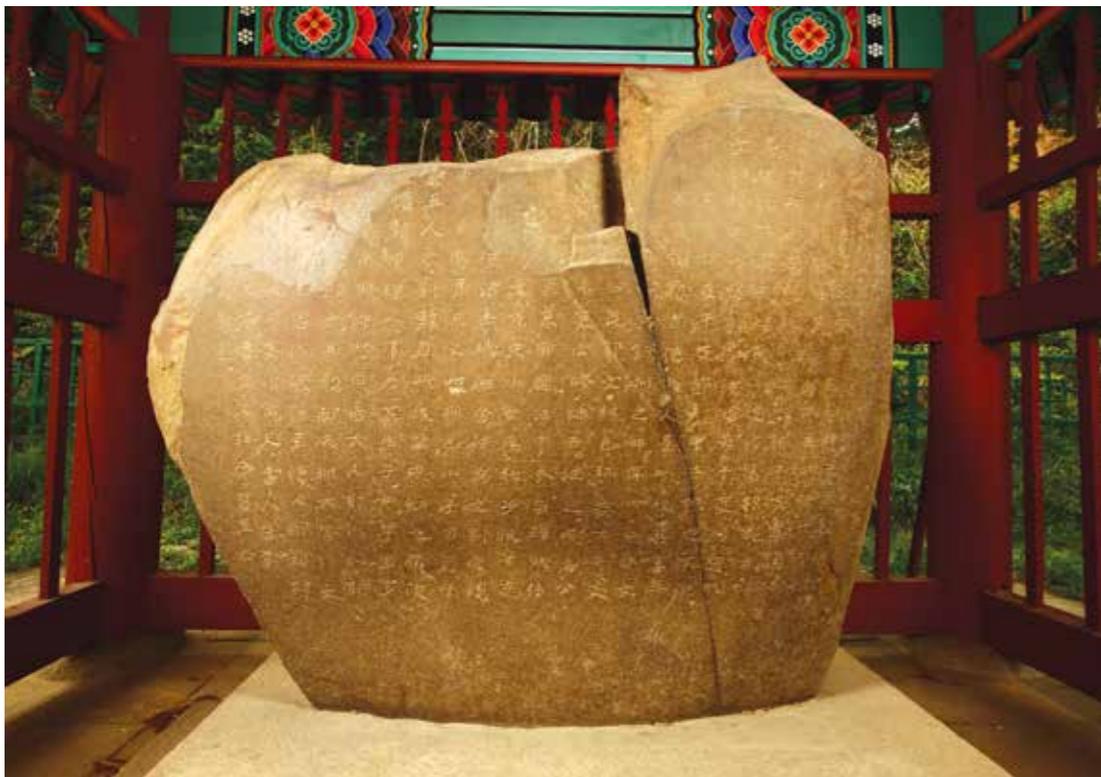


图1 丹阳新罗赤城碑

律令是将中国之律和新罗之令相结合而形成的。

刻有具体编目的金石文资料被发现后,我们可以确定新罗律令并非是单纯的公服规定,而是包含国家经营管理的法令。进而可以推测,当时制定的骨品制、官等制及官职制运营相关的编目也会一定程度地包含在里面。虽然五刑并不是新罗固有的刑法体系,但这种体系的形成本就意味着在新罗社会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在法兴王时代迫切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能力,颁布律令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举措。

引入律令的目的并不在于适用严厉的法律压制居民生活,而在于实现儒学的根本思想——仁。在从共同体社会转为中央集权贵族国家的过程中,统治势力很可能试图坚守已有的秩序或恣意任性。因此,法兴王倡导“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民”,即所谓的“王土王民思想”,实现王道政治,以从源头上

遏制地方首领或贵族等统治阶层任意掠夺。法兴王根据成文法,至少从表面上要公平执行法律,对所有居民进行公民化,稳定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他归根结底要建立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而稳固统治秩序的关键在于按照合理的原则管理官僚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兴王决定将统治秩序纳入到律令框架内。如此这般,颁布律令给整个新罗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公认佛教为国教与设立上大等

政治社会变化要求与之相符合的新统治意识形态。在早期国家时期,统治阶层仅靠从天而降等神话或民间传说,也足以粉饰形象,确保地位。当时这种形象已在各个共同体深入人心,说明这确实促进了秩序的维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个政治群体结合形成大规模政治体制的情况下,现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管用。要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需要全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佛教作为新宗教被引入。

与新罗处于竞争关系的高句丽、百济已于四世纪后期引入佛教并定为国教。新罗在与高句丽、百济及中国往来的过程中,早已认识到佛教的存在,但其社会尚未成熟到能接受、了解佛教的程度。然而,进入六世纪后,随着政治社会出现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新的统治意识形态。

佛教在新罗奉为国教之前,早在五世纪初已开始在一些地区传播扩散。首次接触佛教的地方是一善(庆北善山)等离王都较远的边远地区。讷祗王时代,高句丽僧人阿道来此地开始传教。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是高句丽边境地区通往新罗王都的交通要冲,或者是因为高句丽士兵400年南征后就在这里驻扎。不管怎样,之后,佛教逐渐向善山周边地区扩散,最后在王京也出现了不少佛教信徒。

然而,488年深入王宫的“焚修僧”试图暗杀炤知王未遂的事件,说明当时在王室内部围绕佛教引入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由于佛教支持派和反对派双方针锋相对,佛教自从该事件到定为国教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坎坷。智证王即位

也是这种矛盾爆发的结果。信奉佛教的智证王登基后未能立刻定佛教为国教,是因为当时反对派势力依然顽固。但智证王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从禁止殉葬等措施开始,循序渐进地扩大了改革范围。到了法兴王时代,随着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佛教公认的时机也逐渐成熟。

随着法兴王颁布的律令逐渐落地,王权也不断得到加强。法兴王为巩固军事基础,于517年在中央官府首次设置了兵部。将分散在六部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中央,而建立中央军队则意味着国王军权的强化。当然,其成功的背后有着律令颁布做基础。法兴王颁布律令后,即521年派使节随百济至中国南朝梁,在外交舞台上展示了新罗的存在。当时在中国是南朝笃信佛教、出家为僧的梁武帝在位。他对佛教的崇尚不仅影响到百济圣王的佛教政策,进而对法兴王的佛教公认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新罗当时还是有很多贵族坚守传统,反对佛教。因此,要立佛教为国教,一场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

法兴王即位第14年,即527年命近臣异次顿在传统苏涂信仰的中心地——天镜林修建具有弘扬佛教之意的兴轮寺,却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虽然这是法兴王与异次顿共同策划的,但为了平息反对,法兴王迫不得已采取极端措施,砍下他的头颅。然而,那时发生了异乎寻常的现象:砍头瞬间,白色血液涌出,头颅远飞到王京北部小金刚山的栢栗寺。法兴王以此事为契机,成功抵制反对势力,正式将佛教定为国教。

与高句丽和百济都直接从与之往来的中国王朝引入佛教不同,新罗佛教是自下而上传播到王京和王室,并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坎坷后,才被公认为国教。这一点是唯有新罗佛教才有的特征。新罗公认佛教为国教晚于其他国家,但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并被积极应用到国家统治上,正是因为它具有的这种特征。

关于佛教被公认为国教的时间仍存争议。有一些人以兴轮寺重新开工于535年为由,主张佛教是这时才被公认的。他们认为考虑到531年设立贵族会议的议长——“上大等”一事,法兴王将其位置让给贵族,以换取佛教公认。但按照这种观点,由上大等主导的大等会议起到牵制国王的作用,也就是说国王的权力大幅受限。

但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法兴王于528年颁布法令禁止杀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禁止杀生本身以公认佛教为前提,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佛教在该时期被公认为国教。新罗第一个寺庙——兴轮寺修建工程又过一段时间之后才重启,是因为需要时间来平息与反对派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是说,两派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之后,才开始修建。从这点来看,设立上大等一事也需要重新解释。

“上大等”主管由“大等”组成的大等会议。上大等也叫上臣,大等是“大”和尊称复数词尾“等”的合成词,意思为“臣”。与臣相对应的就是“君”。因此,大等会议是以君王的存在为前提而诞生的臣子会议体,而“上大等”就是主管其会议的议长。因此,大等会议包含着严格区分君臣的意义。上大等不仅是臣子,也是将君王和臣子联系、仲裁的桥梁。参加大等会议需要一定资格,如拥有一定水平的官等或具有特定身份的贵族等。新罗的国家大事都在这里讨论,并经过国王的批准后落实。正因如此,大等会议后来被称为“和白”。和白是指“达成协议(或和议)后上报”。也就是说,做出重大决定时,如果出现意见分歧,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意思。主要特征是会议决定采取全体一致原则。当然,其结果要上报(白)给国王。

大等会议是明确区分君臣的会议体。由上大等代替国王主管会议意味着国王的地位大幅提升,因此,设立上大等不可能是君臣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综上所述,围绕佛教引入问题开展的斗争最终以法兴王胜利告终,结果是设立隶属于国王的官职——上大等,使得国王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

在大等会议诞生之前,由其前身,即部体制下的会议体对国家大事做出决定。如前所述,只有六部权势者,即被称为“干”的首领层才能参加会议,故将其称为诸干会议。根据各部的规模和地位,参与人数也各不相同,这反映出六部之间也存在优劣之分。诸干会议的代表就是麻立干。当时新罗国王是喙部代表兼最高统治者,但没有绝对性权力,也就是说国王受到会议体决定的限制。

但由大等组成的新会议体——大等会议取代诸干会议后,其代表地位转移到了上大等。由此,国王的地位出现了巨大变化。之前,国王被称为麻立干或寐锦王,但从530年代开始被称为大王。这说明国王地位超出单纯的第一首领,成

为了超越性存在。因此,将大等会议的代表地位交给上大等并不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将一般贵族官僚和大王完全区分开来。被称为大王的新罗国王已超出了单纯的贵族代表地位,被提升为超越性存在。

总之,新罗定佛教为国教并不是妥协的产物,而是以异次顿的殉教为契机,国王在激烈的斗争中所获胜的成果。从此,没有势力能够向王权发起挑战。同时,随着佛教成为国教,王权也随之上升,国王任命亲信为上大等。上大等的任务不在于牵制国王,而在于支持国王并为其辩护。当然,之后王权经过几番起伏,上大等的角色也随之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开始时它还是支持国王的角色。法兴王即位第23年,即536年首次使用建元这一年号也标志着国王的超越性地位。

除了国王地位大幅提升外,六部体制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随着部之强大独立性的消失,自麻立干时代起长期维持的六部体制完全被瓦解。在部体制下,国王也只不过是六部之一的喙部部长而已。因此,标记国王的名字时,在名字前面加所属部的名称。但随着国王被提升为大王,不再使用所属部的名称。这说明国王的地位已超出了部长的地位。

部体制的解体并不是在法兴王时代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智证王靠实力即位后持续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解体。这时,六部已经开始以势力最强大的喙部和沙喙部为中心运营,使得已有的部体制难免走向衰退之路。在此过程中,围绕佛教引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国王获胜,结果导致原本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的部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从此,六部只用来划分王都区域。就这样,部体制解体、消失后,以超越性存在——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贵族国家正式诞生。

法兴王为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于即位27年后的540年去世,其坟墓修建于哀公寺北部山峰。其实,哀公寺是后来才修建的,其准确位置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就位于仙桃山(西岳)下面。在文献里具体记载王陵的位置,始于法兴王。之前,新罗的王陵都在庆州盆地中心部的大陵园共同建造。那里除了王陵之外,其血族及其他统治势力的坟墓也都建在一起。在同一个地区形成统治势力的坟墓群,说明他们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而法兴王的

陵墓从中分离出来另行建造,意味着共同体意识开始瓦解。这与使用大王称号成为超越性存在及代表共同体的部体制的瓦解等息息相通。

制定骨品制与新体制

法兴王继承、深入发展智证王实施的各种改革措施,使得新罗的统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王成为超越性存在,相关制度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这是由于若没有制度支撑,则无法保证新统治秩序的维系。颁布律令和公认佛教也是在此背景下推进的政策。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骨品制这一身份等级制度的诞生。

随着中央集权贵族国家的诞生,支撑其体制的基础,即统治集团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之前,统治集团是部体制下具有强烈共同体意识的首领阶层,而那时则出现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贵族官僚。当然,官僚制度本身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基本框架已经成型,因而需要能够适当维持贵族官僚的制度,骨品制由此诞生。

说起骨品制的起源,若不附加任何条件,也许要无限地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以制度形式出现,是始于法兴王第七年颁布律令。之前,其统治组织大体只分为干和负责实务的其下属而已。他们的地位大部分世袭,确实具有身份制度的特征,但那种政治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制度性保障。

随着在法兴王颁布的律令上出现骨品制编目,情况大有改变,即一直以来只是按惯例享受的特权开始以成文法律制度得到保障。骨品制这一身份制度正式诞生后,发挥了有力规定统治阶层的作用。当然,一开始时骨品制并非完整,但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它也逐渐成形。也就是说,骨品制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一成不变的形式和内容,而是按照统治体制的变化进行改革、运营管理。

人们一直认为骨品一词由“骨”和头品之“品”组合而成,但这不得不令人产生质疑,因为头品的词干是“头”而不是“品”。这里的“品”只不过是意为“头”之等级的词尾而已。因此,骨品并不是单纯的骨与头品的合成词,而是由原本分别存在的骨品和头品两个概念结合而成的。这时,“头”是指某一个“脑袋”,这里含有数量越

多,地位越高的意思。虽然不能确定“头”具体指什么样的“脑袋”,但它通常用来表示人或动物的数量单位,因此,可以说表示下属人数或可拥有的动物数量或一个人对这种数量的承受能力。正因如此,头品数值越高,身份地位也越高。

骨品区别于头品,两者意思也不尽相同。对于“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如骨头、血等,但这应与“头”的概念联系起来理解。这时的“骨”是指“头”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指骨髓。因此,比起单纯意味着表面的“头”,其里面的核心部分——“骨”更受重视。如同头品一词因对头划分等级而诞生那样,骨品也因对骨划分等级而来。

如上所述,骨品和头品原本是分别并存的,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两者统称为骨品制。从此,骨品有了两种含义,狭义上只指骨之品,广义上包括头品,而后者就是如今广为使用的骨品含义。

骨品制由骨品和头品构成,前者又分为圣骨和真骨两个等级,后者则分为六个等级,共划分为八个等级。但法兴王即位第七年颁布律令时,这种完整结构尚未形成。因为最高等级的圣骨直到真平王时代才出现。所以,在法兴王时代,骨只有一个等级,而头品也很可能还没有细分为六个等级。头品起初分为几个等级很难确定。但可以推测,真平王时代将骨细分为圣骨和真骨后,头品也随之细化发展,最后形成八品结构。八品姓骨一词也来自于此。

骨品制运营的核心在于严格区分骨品和头品。骨品和头品之间存在无法超越的壁垒,骨品是最高等级统治阶层所属的身份阶级。他们以搞政治为特长,垄断所有排他性特权,尽量防止特权的开放。因此,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外,不允许骨品的分化。圣骨从骨中分化出来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况所致。与此相反,头品的分化相对容易,因为以骨品阶层为中心执政的过程中,头品分化往往成为维持已有体制的手段。因此,这种新出现的下级头品,易得也易失,很容易消失殆尽。同样的道理,圣骨从骨中分化出来之后,也具有容易消灭的性质。

制定骨品制之前,新罗统治阶层分为干层和非干层。干层主要负责新罗整体政治运营,而非干层则在其属下负责实际政务。由于不同角色都需要不同专业性,因此,其地位自然世袭传承。但随着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逐渐完善,干层和非干层分别都出现了角色分化,伴随而来的就是优劣等级。不仅是干层内部出

现了明显的界限,在非干层内部也开始出现了等级细化。

干层里的最高等级阶层为维持自己的特权,设定严格的界限,以防下级干层跨越。也就是说,虽然是同样的干层出身,但再严格划分为“骨”和“头”。最高等级阶层最关注的就是干层内部的界限。当然,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也严格维持、管理下级干层和上级非干层之间的界限。因此,骨品制可以说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干层骨品、干层头品及非干层头品。他们之间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严格地固定发展,禁止各阶层跨越界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有利于保持身份秩序,更有益于稳固以骨品制为主的新罗统治体制。总之,骨品制是以三个等级为基本结构运营的身份制度。

骨品制运营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仅限于王京人。在骨品制的等级秩序下,地方民完全被排斥在外。因此,另行建立了针对地方民的身份制度。从这点来看,骨品制是以新罗前身,即斯卢国统治阶层为中心的身份制度。也就是说,骨品制是保持王京统治者共同体的基本手段。而更为具体显示出其结构的,便是官等制。

官等制的结构与运营

骨品制是从出生开始根据父母血统决定社会地位的集体身份制度,而“官等制”则是既与之密切相关、又与官僚组织相联系运营的制度。官等也称为官位、官品、官阶等。官等是在官僚制度秩序下,显示个人所占位置的一种身份标志。由于官等制基本上受到骨品制限制,因此,要正确了解官等制,除了官僚制外,还应在骨品制框架下去研究。反过来,通过官等制则可具体了解骨品制具体结构。

之所以骨品制、官等制、官职制紧密连在一起,是因为它们三者分化之前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四世纪后,新罗政治社会不断得到发展,统治体制也随之完善,使得三者也开始分化。但这时没有完全摆脱已有的体制,还是连在一起运用。在麻立干时代的部体制下存在的干,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当时,不管是王京

还是地方,只要是实力强大的权势者都能获得干之称号。从得到“干”称号的首领在血缘上世袭传承其地位层面看,它具有身份制特性;从其本身就包含着职务范围层面看,它具有官职特性;从在官僚组织内显示等级层面上看,它又具有官等制特性。这种三大因素原本结合在一起,而随着新罗政治体制的发展,逐渐分化。大舍、舍知等“官等”,后来也发挥官职作用,都证明这一点。

三国各自完善统治体制,其官僚组织也逐渐成形。在此过程中,三国都出现了官等制,并在接触、交流中相互借鉴、彼此影响。这使得在官等制运用方面,三国有很多共同点,但又因国情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政治社会基础形成背景与过程存在差异所致。

新罗官等制的最大特征是其分为京位和外位,形成二元化结构。京位只针对王京人,外位只针对地方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官等制。虽然高句丽和百济的官等制情况不得而知,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文献资料证明他们也采用二元化的结构。因此,可以说官等制的二元化结构是新罗所独有的特征之一。

之所以三国中唯有新罗对王京人和地方民适用不同的官等制,是因为新罗对地方民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与其他两国存在不同。也就是说,三国对待地方民的方式和认识上存在根本性差异,产生了三国统治秩序的差异。高句丽和百济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是不歧视地方民的,采取积极包容的态度,但新罗则截然不同。

新罗虽然运用两套官等制系统,但主要以针对王京人的京位为主。针对地方民另行制定外位官等制,说明新罗将地方民纳入到不同于王京人的身份结构中。中央政府将地方民排除在骨品制外,目的在于与地方民划清界限。除新罗前身——斯卢国出身之外,其他地方民都纳入到不同的身份制度,以使他们保持隶属民意识。直到六世纪,将地方民称为奴人也证明了这一点。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完善,三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激化,外位也走向消亡之路。到了七世纪后半叶的统一初期,外位完全消失,统一为京位。但新罗仍未摆脱以外位制为基础形成的对地方民的歧视观念。人们常常说新罗社会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的官等制——京位,由17等体系组成,法兴王7年颁布律令时,几乎都

已完成。但《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说儒理王九年(32年)已经形成17等官等制。然而,这是后代追溯附加的。最近发现的六世纪初的几个金石文资料都显示当时仅存在17等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时尚未完全形成以国王为中心的官等体系。六部部长分别直接管理自己的官僚,保持一种多元体系,但六部也并不是拥有独立的官等制。从官等名称相同的情况来看,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的控制。每个部的官等者数量有所差异,这说明各部虽然独立管理,但基本上还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即向中央正式上报、得到批准。就这样,到六世纪初,新罗还没有形成以国王为中心的统—官等制,而是存在多元形式。这是因当时尚未摆脱部体制下的政治体制所致。

但随着律令颁布,京位逐渐完整,形成从角干(或伊伐滄)到造位(或先祖知)的17等体系。在律令里面骨品制作为一个独立的编目出现,官等制相关规定也随之包含在里面。同时,与骨品、官等联系运营的公服制度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条目。之前官等数量极为有限的京位逐渐得到完善,颁布律令时就形成了17等官等体系。之后,这种17等官等框架基本上维持不变。虽然只分化到17等的原因及其意义等不得而知,但它还是成为新罗官等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当然,之后也按需求设置了新的官等,如在第一等的“角干”之上新设了大角干、太大角干等,但这些并不是常设官等,而只是临时性官等而已。

另外,在将京位和骨品制结合运用的过程中,到了统一期制定了重位制,为受身份限制的官僚打开了破格晋升的道路。但重位制仅适用于阿滄、沙滄、大奈麻及奈麻等几个官等,而这也是在17等框架下实施的。这深刻展示出新罗统治阶层对坚持17等官等框架的强大意志。

通过重位制的存在,可以了解17等官等体系可分为以下几类。首先,大体可分为干群和奈麻以下两个群。干群官等可再分为大阿滄以上和阿滄以下,奈麻以下的群可再分为奈麻群和舍知以下两个群。这说明官等和骨品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成立过程与基础上也存在差异。起初,在官等和官职未分化的情况下,形成了由干和奈麻组成的官僚组织,但随着职能的分化,其组织也逐渐增加。以两者为中心,首先干群很快分化,奈麻以下群则到了六世纪几乎一次性成立。由此,可以说京位以向下分化为主要特征。

各个官等本身具有不同职能和等级,同时划出了身份界限。由于初期官职为数不多,因此官职与官等混在一起运用。但随着官府的设置,新的官职纷纷出现,官职和官等也开始联动运营。据推测,《三国史记·职官志》所记载的基本体系是到了真平王时代所形成的。总之,官等与骨品制、官职相结合运营,但其原则和体系并不是在法兴王时代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循序渐进形成的,也没有完全摆脱起初的性质。

另外,针对地方民的个人身份制度——外位,在形成过程和时间上,与京位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建于501年的“浦项中城里新罗碑”,“干支、一伐(壹伐)体系”和“干支、壹金知体系”两个外位体系并存,可见当时外位体系尚未统一形成。这种现状延续到503年的“迎日冷水里新罗碑”阶段。但到了524年的“蔚珍凤坪新罗碑”阶段,从最高等级的干支到阿尺,形成了4等级的外位体系。因此,可以推测,之前颁布的律令中包含着相关内容。之后,随着发动征服战争,扩大领土,不断改革、加强地方统治体制,以4等级为基板框架,上级干支开始分化。外位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干支为中心向上分化。最后,包括最高级别的岳干在内,完成了11等级体系。在下级官等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干支这一上级官等不断分化的原因是,要在新并入地区拉拢当地权势者。

外位制的运营说明新罗已经构成了一套系统而严密的地方统治体制。外位本身具有身份制特性,但与骨品制相比更具灵活性。譬如给积极配合中央统治或立下军功的地方民给予外位形式的奖励。新罗能够成功实现地方统治,正是得益于对外位的积极利用。但由于其运营过程存在矛盾和局限性,随着三雄争霸逐渐接近尾声,该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从这点来看,外位制是一种过渡期官等制。

2

领土扩张与 统治秩序的确立

真兴王即位与只召太后的摄政

法兴王为新罗摆脱部体制走向中央集权国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自己晚年皈依佛教,致力于弘扬佛教。法兴王死于540年,但因没有儿子,当时年仅7岁的多麦宗(或深麦夫)即位,就是后来的真兴王(540-576年)。如此小小年纪就能即位,是因为当时新罗的统治体制已颇为完善。

但真兴王不是法兴王的儿子,而是外孙子兼侄子。他根据哪一个身份登上王位不太明确。真兴王是法兴王的女儿——只召与立宗葛文王结婚后生下的儿子。考虑到立宗是法兴王的弟弟,两个人的婚姻是极为严重的近亲婚姻。从“蔚州川前里书石”中可以了解真兴王即位前的情况。

川前里书石是指位于蔚山太和江支流——大谷川边的巨大岩壁。在其上面包括岩刻画在内刻有许多字。根据其内容,徒夫智葛文王一行于525年来到此河边并首次刻字,故得名书石谷。徒夫智葛文王是真兴王的父亲,即立宗。又过了14年的539年,这次真兴王的母亲只召夫人怀念丈夫立宗在结婚前来此游历的事情,与自己的母亲保刀夫人和小儿子多麦夫一起来玩,也刻字留下了足迹。



图2 蔚山川前里书石乙卯铭

从那以后,书石谷在新罗王京便闻名遐迩,许多权势者慕名而去,使之成了名胜古迹。在那里多处可看到许多名人的名字,尤其是花郎的名字多见,由此可见,那里是他们游山玩水的主要场所。

虽然在书石谷没有痕迹证明法兴王亲自去过此地,但可以看到对法兴王的尊称“另即知太王”、“圣法兴大王”等,可以说当时高级王族的名字几乎无不例外地出现。540年法兴王去世后,真兴王正式登基。而于539年只召夫人前往书石谷时,立宗葛文王并没有陪同去自己曾访问并首次留下足迹的地方,只召夫人一行都在怀念525年的事情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立宗早已死亡。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真兴王才继承了王位。

其实,立宗即使未死,也很难登上王位。虽然他和法兴王一样是智证王的儿子,但属于沙喙部的葛文王,而只有喙部出身才能即位,所以按常理,他不能成为国王。智证王原本是沙喙部出身的葛文王,而即位后属于喙部,因此其长子法兴

王自然可以继承王位。但是他的血缘正统性仍属于沙喙部,因此葛文王的地位由次子立宗继承。如果按照之前的体制,真兴王理应成为沙喙部的葛文王。但这时部体制已经瓦解。

值得关注的是,真兴王的母亲是喙部出身的法兴王女儿。从这点来看,真兴王也有可能通过继承母亲的血统而得到了即位的正统性。当然,随着法兴王被称为大王,部体制已经瓦解,不再受出身或所属部的限制,但年幼的真兴王能够顺利即位的原因还是在于其血统。这也为只召摄政提供了正当性。

只召太后摄政后,实施了大规模赦免,并将所有官僚的官爵都升高了一级,以便确保摄政的正当性。同时,她特别重用异斯夫。只召太后在摄政二年,即541年将异斯夫任命为兵部令,命其掌管中央和地方军事。这无疑使异斯夫掌握实权。显而易见,只召太后摄政时对异斯夫的依存度很高。

异斯夫与智证王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因此,与其孙子真兴王也是有亲属关系的王室一族。智证王与炤知王展开权力斗争时,他很可能支持前者。这意味着智证王与异斯夫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正是在这种背景和卓越能力起作用的背景之下,智证王于505年首次设置悉直州时,将刚刚过20岁的异斯夫任命为该军事要冲的军主。异斯夫果然不负智证王的期待,沿着东海岸往北扩展领土,于512年成功征服了于山国。进入六世纪20年代后,在法兴王攻占洛东江下游的金官加耶时,他也当先锋立下了赫赫功绩。只召太后不仅是因为血缘关系,还因对异斯夫的经验 and 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才请他帮助摄政。

由此可见,在真兴王即位初期,实际统治者 of 异斯夫。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编纂《国史》。异斯夫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建议编纂新罗历史,并将居柴夫推荐为编纂国史的总负责人。因为居柴夫不仅是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王室一族,也是志同道合者。由此,在居柴夫的主导下整理编纂的首部新罗历史书——《国史》问世。虽然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不少史书根据该书编写了新罗初期的王室谱系。尤其是在确立金氏统治体制的情况下,并未以金氏为中心重新整理谱系,而是仍将朴赫居世定为新罗建国始祖,承认昔脱解的存在和三大姓氏交替为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到了统一期,虽有以金氏为中心重新编写历史的尝试,但最

后还是承认了三姓交替为王的事实,也可能是因为首部史书已有相关记载。异斯夫建议编纂史书时说“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基于儒学思想提出了“述而不作”的修史原则。编纂《国史》本身就说明异斯夫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

异斯夫通过编纂《国史》为新罗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兴王五年(544年),异斯夫在自己担任兵部令的情况下,又增设了兵部令一人。之后,除了上大等和执事部的侍中之外,其他中央核心官府的长官职都采用了一职二人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掌管军事的兵部之重要性更加凸显,同时也出于互相牵制的目的。事实上,异斯夫在自己作为兵部令掌管军事的同时,还需要治理政务,确实需要增设兵部令一人。就在当年编制中央核心军队——大幢,也与此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异斯夫在改革军事体制、编制大幢的过程中,增设了兵部令。大幢是新罗的核心军事力量,不仅护卫国王,在扩展领土的征服战争中也发挥核心作用。以这种军事改革为基础,真兴王即位后,在一场左右国家命运的决战中获得胜利,成功夺占了汉江流域。

原本由法兴王推进修建的兴轮寺到了只召太后摄政时,即544年终于完工。这时,她首次允许僧人出家为僧,为佛教和政治的结合铺路。梁武帝于549年派使节同新罗僧人觉德一起送佛舍利到新罗。据说,真兴王当时率领百官到兴轮寺前迎接。可见,新罗为成为真正的佛教国家,走向辉煌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真兴王亲政与夺占汉江流域

真兴王于540年7岁登基,并在即位的第12年——551年一成年就立刻宣布要亲政。使用“开国”这一年号是标志性举措之一。虽然法兴王开启了使用年号的先河,但真兴王即位时并没有改变年号。没有遵守一世一元制很可能是因为只召太后摄政时要继承法兴王的政策。从这点来看,真兴王宣布亲政的同时,将年号改为“开国”耐人寻味。他明确表明了要走出自身政策道路的立场。将年

号定为“开国”,尤其引人注目。在国家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使用有“创建国家”之意的“开国”一词,显示出真兴王对亲政的坚决意志。也就是说,它并非指单纯的“创建国家”,而显示着其“为新罗开创新局面”的强烈意志。从要开创新时代的决心中,可以看到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君王的面貌。他的确按照他的意志,推进各种新政策并获得成功,为新罗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真兴王宣布亲政的当年就出行娘城(今清州),预示了未来政策的主攻方向。其实,这种政策从只召太后摄政时已经开始。高句丽于548年率领濊族军队对百济的独山城发动突袭。对此,百济向新罗请求派兵援助,真兴王则立刻派朱玲将军率领三千兵力援助。到了550年,这次百济攻击高句丽的道萨城,而高句丽发动报复性战争,攻陷了百济的金岬城。之后,高句丽和百济围绕两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后,在两国因长期战争而精疲力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时,新罗异斯夫则乘虚而入同时攻占了两城。异斯夫扩建两城并部署一千名甲士捍卫那里。这无论对新罗还是三国关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暗示着新罗在不久的将来,会将百济也一同视为敌人。两国于433年结成军事同盟后,虽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也保持了基本框架,但这次事件预示着这种关系即将会破裂。归根结底,这是新罗为夺占汉江流域而进行的前期准备。真兴王宣布亲政后就首先出行刚刚攻占的娘城地区,也是其政策的重要一环。

真兴王巡行娘城时,得知大加耶的乐圣于勒不久前流亡至新罗,并与其弟子迁移到娘城附近的国原(今忠州),便立刻将他们召到河临宫演奏。真兴王听完于勒的加耶琴演奏后,第二年就派遣阶古、法知、万德三人受业于勒门下,以传其琴艺。于勒根据他们的能力,分别传授了加耶琴演奏、唱歌、舞蹈。不久后,真兴王亲自欣赏了他们的演奏,龙颜大悦地说如同之前在娘城听到的演奏,对他们给予奖励,将其定为新罗大乐。但是一些臣子以加耶琴曲是亡国之曲为由,反对将其定为大乐。对此,真兴王说,大加耶灭亡是因大加耶王淫秽所致,与乐曲毫无关系,将自己的立场坚持到底。通过该故事可以看出,真兴王重视礼乐,也可以预测他将会追求王道政治。由此可以推测,真兴王在“开国”这一年号下要打造的新罗,与王道政治有关。

551年,百济为实现夺回汉江流域的夙愿,请求新罗派兵援助。新罗向百济派

兵后,百济与新罗、加耶结成三国联军,为进军汉江展开激烈战争。事实上,根据之前的文献,这是新罗首次尝试进军汉江流域的行动。但据建于550年的“丹阳新罗赤城碑”记载,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新罗与百济结为联军之前,已经单独发动攻击,成功占领了高句丽管辖的南汉江上游。据赤城碑记载,成功完成该任务的人就是新罗名将异斯夫。也就是说,新罗早已制定计划,凭借单独的力量尝试进军汉江流域。从这种意义看,新罗一举占领道萨城和金岷城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新罗暗地里已经开始落实其进军汉江的计划。百济却对新罗的内心和立场毫无察觉,不惜代价在自己的主导下拉拢新罗,以期攻占汉江流域。而新罗隐藏内心算盘,表面上装作接受百济的要求,实际上落实了自己的规划。

新罗与百济联合进军汉江战略,在居柒夫等八名将军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当时,高句丽正面临内外双重挑战。从外部看,突厥在北方建国等北方局势陷入混乱;从内部看,贵族斗争不断,根本就无暇顾及南方局势。这对百济来说,是夺回过去的王都所在地——汉江流域的绝好机会。最终,百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汉江流域纳入囊中。百济除了过去的王都——汉城之外,还得到了今日的南扬州——平壤等六个郡。新罗则掌握了京畿道东部及江原道山区的十个郡。

然而,曾试图攻占汉江流域的新罗这次开始虎视眈眈地覬覦百济手下的六个郡。事实上,这并不只是因为新罗所掌握的十个郡在人力、物资等领域上不如百济的六个郡,而是为了实现与真兴王的开国相符的远大理想。在深层次中,也包括真兴王欲不依靠百济而独自与中国进行交流、交涉的计划。新罗不惜冒险与长期保持同盟关系的百济为敌而尝试独占汉江流域的原因,就在于此。新罗趁百济松懈,采用了暗度陈仓的计谋。首先,新罗有意泄漏了自己与高句丽缔结密约的信息。当时的两国密约仍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其密约程度达到何种水平也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百济获取这种信息后,认为形势十分严峻,于552年向倭国要求派兵援助,但未能如愿以偿,553年,百济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无奈之下从汉城主动撤军。结果,新罗没费一枪一炮就拿下了百济所掌握的汉江一带。

新罗在整个汉江流域设置新州,将金庾信的祖父,也是在该战略中立下赫赫

战绩的金武力任命为首任军主。将汉江流域命名为有“新地方”之意的新洲,也十分耐人寻味。因为该地区不同于洛东江流域或东海岸,是全新的领土,正好符合“开国”年号。这标志着真兴王开启了名副其实的新时代。而三国关系由此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管山城战斗胜利与新时代的开启

百济认为,如果高句丽和新罗联合攻击,自己无胜算可言,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地从汉江流域撤了军。百济虽然避开了与新罗正面交锋,但这次的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由于两国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战,从表面上看,两国同盟关系仍然有效。其实,百济避开交战慌忙撤军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百济圣王还将自己的女儿送给真兴王为妃,以期隐藏自己的心计,并表示同盟关系仍然有效。百济表面上表现得对新罗毫无反感,但实际上是在为发动报复之战赢得准备的时间。

新罗对百济的算盘心知肚明,却假装一无所知,顺应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却早已预见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开始采取防范措施。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554年7月完成的明活山城修筑工程。据近来发现的“明活山城作城碑”记录,新罗从551年开始征发全国居民修筑明活山城。考虑到这正是新罗与百济联合进军汉江的时期,其目的在于应对战败时高句丽会发起的反攻。之后,新罗继续开展修筑工程,直到554年完工。但这时其防备对象从高句丽转为百济。这也说明三国关系陷入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

正如新罗所料,百济在明活山城修筑完成之际,针对王都发动了全面攻势。百济认为,夺回汉江流域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重大战争,向新罗开启了全面战争。但因在百济内部遭到反对,这种决定也来之不易。反对派主张对夺回汉江流域战争,应追究战败责任,也认为如果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经济、军事将不堪重负。因此,经验丰富的元老大臣都表示,应采取谨慎态度,先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时机。与此相反,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的王子馥昌则坚持强硬态度,主张



图3 庆州明活山城作战城碑

应立刻发动战争。虽然徐昌还很年轻,但由于他拥有实权且即将替代年老的圣王成为国王,因此,他的主张最终被接受。百济在进军汉江战争失败的冲击中尚未得到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还是派出三万名精兵出击,与新罗交战。

以徐昌为总司令官的百济士兵避开经由益山、南原直接越过六十岭或八良峙的路线,从益山、锦山、沃川迂回到秋风岭或其北方的华岭等处不断往北进攻。也许这是百济考虑到新州的军事动向而采取的战略。徐昌一开始大举进攻,气势咄咄逼人,成功攻陷管山城并掌握周边一带,立下了不少战功。新罗虽派遣角干于德和伊滄耽知来防御,但最终全部失利。新罗焦急万分地派维护汉江流域的军主金武力率领新州兵力前往管山城援助。

徐昌在管山城战斗获胜后,马上将捷报传给王都泗泚城的圣王。圣王一听

到战胜消息,为表彰功劳、激励士气,冲向战场。但圣王听到捷报后没有认真查看周边情况,就连忙率领极少数兵力前往战场,还一时心急选择了捷径,埋下了无法挽回的祸根。圣王没有按照徐昌进军的路线走,却选择了从泗泚城直接到管山城的捷径,最后被新罗抓住。原来,从汉江流域率领新州兵力前往管山城的金武力早已命令“三年山郡”出身的地方权势者——高干都刀埋伏在其路口。圣王被抓,对百济来说,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圣王被抓到了新州军主金武力的大本营。金武力对先发制人的百济追究责任,以百济发动攻击破坏长期同盟关系为名义,处死了圣王。圣王被砍后,金武力将尸体送还百济,头颅则带到了新罗王都。百济听到该消息后,士气极度低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面对新罗气势汹汹的攻势,百济手足无措,大部分精兵战死沙场,只有徐昌带领少数士兵死里逃生。由此,管山城战斗以新罗的胜利告终。该战斗后,百济遭到了致命打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而新罗则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管山城战斗并不是百济单独发动的,加耶和倭国等虽参战士兵不多,但还是参加了联军行动。新罗对一直与百济保持同盟关系的加耶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百济因圣王的死亡和管山城战斗的失败,内部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根本就没有余力去帮助加耶。因此,新罗乘势而为,一鼓作气向加耶发动了全面攻势。

真兴王为攻占加耶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准备工作。555年,从上州分离下州,在洛东江附近的比斯伐设置了州治。当年真兴王出行北汉山,安抚、鼓励地方民,进而观察高句丽的动向。同时,将东海岸的州治搬迁至江陵以北的比列忽。这也说明新罗已经吞并了不少高句丽南部的边境地区。另外,新罗还将沙伐的上州州治搬到了甘文。当年,原本在汉江新州的州治往北移动,搬迁至北汉山。州治的移动情况说明新罗密切观察高句丽动向,不断扩展领土,进而为攻占洛东江以西的加耶做好准备。新罗将上州州治搬到甘文的目的在于阻挡百济的援助,并对加耶施加压力。此外,新罗在比斯伐部署主力部队,尝试直接渡过洛东江,以阻止加耶南北强大势力——安罗和加罗(大加耶)结成联盟。

新罗首先攻占相对软弱的安罗后,又向北方的大加耶发动进攻,于562年成功占领了整个加耶地区。从此,加耶退出历史舞台。根据561年真兴王亲自巡幸

兴建皇龙寺与标榜转轮圣王

真兴王改年号为“开国”并成功占领汉江流域后,内部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随之增强。他首先决定兴建宏伟华丽的王宫,因为那是有效炫耀王权之崇高威严的最佳方法。本来他于553年要在月城东部新建王宫,但恰巧在王宫选址处出现黄龙,便改变计划修建了寺院。

由于出现黄龙的原因,寺院刚刚完工时被称为黄龙寺,而后来正式定名为皇龙寺。更改寺院名称的背后别有深意。黄色原本在五方色中代表中央,因此往往成为象征皇帝的颜色。从这点来看,皇龙寺意味着其位置就是天下之中,也包含着新罗国王为皇帝的观念。正因如此,之后在很长时间内,皇龙寺成为新罗佛教的中心地,与国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建于561年的昌宁碑里有“四方军主”一词,该词说明新罗已具有天下观念,即将自身领域视为四方。同时,他们认为管理、统治天下的主人是新罗国王,也就是皇帝。新建王宫是显示国王威严的方式之一。将黄龙寺改名为皇龙寺也同样源于此因。由此,皇龙寺成为新罗国王与佛教相结合的中心地。

在王宫拟选址突然改变为寺院的背后,该处本身就不适宜居住,也起到一定作用。当时,新罗人将皇龙寺的北边称为龙宫,因为那里是平时涌水、常年积水的低湿地,故而得名。因此,要兴建王宫必须要开展大规模工程,对低湿地进行填滩造地工程。但其用途突然被改变了。其实,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历史性工程,若只是说因黄龙这一模糊不清的借口而突然改变规划,确实难以被人们所理解。那只不过是后来被粉饰、包装的结果而已,实际上另有背景和缘由。

皇龙寺始建于553年(真兴王14),经过很长的时间,到了566年才竣工。与第一座寺院兴轮寺相比,对它确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说明其背后肯定有着不同寻常的目的。当时被指定为国家宝物的三宝中有两个,即丈六尊像和九层木塔,都位于皇龙寺。从中可以推测它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皇龙寺完工后,其寺主成为代表佛教界的“国统”,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将王宫拟选址突然改为寺院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也许他们认为解决实际、现实问题更重于兴建大规模王宫来显示国王



图6 挖掘后维修的皇龙寺遗址

权威。新罗在王权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积极利用刚刚被公认为国教的佛教,因为它正好符合新时代的统治意识形态。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撑,王权很难得到巩固。但仅靠公认佛教,又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因此,真兴王在修建皇龙寺的前后时期,致力于构建统治意识形态。在已建有兴轮寺并允许人们出家为僧的基础上,还于550年设置了僧官职——大书省。大书省负责撰文上奏辅佐国王,僧人担任此职,意味着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但仅靠大书省也无法支撑日益增强的王权,因此要采取更有力措施的主张日益高涨。将兴建王宫计划突然改为兴建寺院,也是这种背景下所做出的决定。

然而,当时新罗对佛教了解并不深刻。所以,考察其突然改变目的兴建寺院,应该看得到特殊的原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僧人惠亮从高句丽流亡新罗一事。他是在新罗于551年成功夺占汉江流域时,离开高句丽跟着居柒夫来到新罗

的。居柴夫年轻时出家为僧并游览全国时,曾有一段时间进入高句丽境内,与正好讲经的惠亮见过面。由于他深知惠亮的能力出众,便在惠亮进入新罗后立刻推荐给真兴王。虽然象征性意义较大,但真兴王新设最高僧职——国统,并将惠亮任命为此职。考虑到惠亮当时兼任国统和寺主,可能起初他的驻锡地为当时唯一的国家寺院——兴轮寺。如果真兴王将兴建对象从王宫改为皇龙寺是为了用佛教达到政治目的,那么在当时情况下能提出这种建议的人物只有一人,即国统惠亮。真兴王采纳惠亮的建议,将王宫改为皇龙寺,为佛教和政治的结合打下了基础。由此,新罗佛教、高句丽佛教以及以高句丽佛教为媒介的一部分北魏佛教因素,都开始融合在一起。

皇龙寺历时很长时间才完工,其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可见一斑。皇龙寺的寺主兼任国统一职意味着他在佛教界扮演了核心角色。真兴王继续积极接受惠亮的建议,以皇龙寺为杠杆,将佛教利用到政治目的上。当时,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真兴王标榜自己为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标志着当时佛教和新罗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转轮圣王是佛教经典里最理想的君主,他根据佛法拓展领土,建设帝国,治理百姓,最终打造出佛国土。这里,领土扩张被包装为弘扬佛教的行为。转轮圣王的强大权威和力量被比喻成金轮、银轮、铜轮、铁轮的战车之轮。古印度统一大帝国孔雀王朝的帝王——阿育王被视为转轮圣王的现实典范。这种对转轮圣王的认识在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尤其北朝将佛教作为统治意识形态,最后形成了皇帝就是佛陀的“王即佛”观念。梁武帝时代在南朝也形成这种意识并传入到百济。百济圣王正是受此影响而诞生的王名。而新罗真兴王也正式标榜自己为转轮圣王。

真兴王的长子被起名为东轮,次子为舍轮(铁轮),都说明他标榜自己为转轮圣王。这种意识是在将自己看成金轮的前提下形成的。据黄草岭碑和摩云岭碑,他巡狩边境一带时,有两个僧人随同前往,也说明这一点。真兴王于574年铸造主尊佛——丈六像。据说是转轮圣王的典范——阿育王铸造佛像失败后,将材料送出去,而真兴王正好用其材料成功铸成了丈六像。这说明真兴王自诩超越阿育王。貌似他打败在自己之前自称转轮圣王的百济圣王后信心大增,也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民间传说,575年时丈六像的眼泪流到脚跟,预示着第二年真兴王的驾崩。从中可知,丈六像就象征着真兴王。真兴王崇尚“王即佛”思想,而皇龙寺就是这种护国佛教的中心地。后来,有民间故事说慈藏所见的神人子——护法龙就居住在皇龙寺,也反映出这种情况。王宫突然改为寺院的背后,也有着实现“王即佛”思想的意图。

新罗起初决定另行选址新建王宫,是因为月城空间狭窄,其承载能力已达到了极限。王宫新建工程被取消后,只能继续使用已有的月城。虽然政治理念中心转移到了皇龙寺,但居住生活的王宫还是需要改造的。因此,月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王宫空间以月城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建。包围月城周边的护城河用途出现变化,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护城河的主要功能是护卫月城,一部分利用南川,另一部分由人工挖掘包围。据考古发掘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城护城河的规模逐渐缩小。这说明护城河原本的防御功能逐渐萎缩、消失。护城河防御功能的消失意味着月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当时月城空间确实狭小,担不起王宫的角色。在文献记载里开始出现包括本宫或大宫在内的各种宫廷名称,也证明了这一点。以指月城的本宫或大宫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东宫、北宫、南宫等多种别宫纷纷在月城外修建,形成一种宫城集群,以弥补月城的不足。以真兴王放弃新建王宫计划为契机,王宫的整体结构出现了巨大改变。这也可以说是新罗对改革王京城市结构的尝试。因为新建王宫的计划里很可能包含着王京的城市规划。

进入六世纪后,新罗得到快速发展,人口、政治、经济实力也随之增强。这使得新罗仅靠已有的王宫和王京无法维持下去。其实,这种迹象从五世纪末已经开始出现。那时通过派遣地方官、设置邮驿等来加强地方统治,而由此所获得的人力、物资自然涌入到王京,使得已有体系达到超负荷状态。当时在王京首次实施坊里制,开设市肆的原因就在于此。到了六世纪,还另行开设东市,说明这种现象仍在延续。那时除了王宫之外,整个王京也需要与之相应发生改变。法兴王去世后,其坟墓未被建在王京中央大陵园内,而是建在了郊外地区,其中就有着王京的城市规划。

事实上,在新罗建国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市结构与道路网络,无法支撑日

益增加的人口、经济、行政组织。原本包括新建宫城的城市规划,随着其对象改为皇龙寺,只能以它为中心开展。真兴王自称转轮圣王,其政治重点自然转移到皇龙寺,而王宫则以月城为中心,向外修建各种别宫,其周围被官厅建筑包围。此外,也需要建设城市网络,以确保居住区稳定、物资有效管理及交往。为此采用的就是坊制。“坊”指方形,是具有一定规格、布置得井井有条的行政区划单位。据文献记录,坊制始于慈悲王时代,但考虑到当时情况,只是一部分实施了部的下级单位——里制而已。事实上,对整个王京设定最小组成单位——坊,是到真兴王时代规划新建王宫时才开始的。只不过是其规划改为皇龙寺后,新罗的城市规划也以此为中心开展而已。皇龙寺不是单纯的佛教寺院,而是作为王京中心,以此为准推进城市规划,进而在政治、宗教上掌管整体新罗。真兴王以皇龙寺为中心,不仅掌控统治权,还成为了宗教统治者。

培养新人才与创立花郎徒

真兴王宣布亲政后,要为新罗开创新局面,培养新型人才是刻不容缓的课题。在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扎根落地的过程中,已有部体制下的人才只不过是绊脚石而已。因为需要献身、尽忠的对象不再是六部或其部长,而是改为了新罗国家与国王。国王追求的是王道政治,律令也是为此而推出的制度手段。

要稳固王权和统治体制,需要一种常设机构。而要运营这种机构,需要完善的官僚组织。因此,真兴王已经对在政治、军事方面至关重要的兵部、上大等进行了制度改革。但关键在于确保能够有效运营这种机构的人才。仅靠具有传统共同体意识的人才无法引领新的时代。可见,新时代方兴未艾,开启了新人才时代。

之前在部体制下,由于各部具有独立性,因此按照不同方式培养、选拔人才。这也是来自于传统共同体意识的方式。但在六部已瓦解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培养符合新体制的新人才。为此采用的就是“源花制”。该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以两名女子为首,招收年轻学生组织起来。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其实从只召太后

摄政时已开始。当时,选拔年轻美丽的女性作“源花”,招收数百名未成年男孩进行培训,国家从中选拔适当的人选任命为官僚或军官。

然而,以女性源花为组织领导,而且是两名担任此职,埋下了重大隐患。原本将组织分为两部分的目的旨在引导善意竞争,互相学习,提高实力。但首任源花南毛和俊贞之间发生矛盾,前者被后者所杀。这也是在寻找新人才培养方式的过程中出现的事件,可见其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源花制失败后,需要重新探讨人才培养方式。

之后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花郎徒”正式诞生。这次将首领定为男性而不是女性。花郎意为像女性一样相貌俊秀的花美男,可见源花制的阴影仍未消除。为了显示这不是强制而是自发性组织,组织结构没有限为两个,而是任其自然。这是从源花制失败中吸取教训而采取的措施。花郎制运营的特征就在于此。国家并未主导成立该组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支持,以使其自发性组织的特色更为凸显。总之,花郎徒并不是纯粹的国家组织,而是具有半官半民特征的特殊组织。

花郎徒创立时间不太明确,在《三国史记》中记载为它于真兴王37年(576)创立。但562年新罗对大加耶全面发动攻击时已出现花郎斯多含,因此可以说至少在那时已经存在。《三国遗事》里首次出现的花郎就是薛原郎。花郎徒正式创立的时期很难确定,但谈到其创立,真兴王时代著名的居柴夫值得关注。因为花郎徒的教育内容和他出仕前的童年经验非常相似。

居柴夫具有很特殊的经历,即出仕前曾出家为僧。当时他游历四方,甚至越境进入高句丽,参加高僧惠亮的讲经活动。居柴夫回国成年后在朝廷当官,并将自己周游天下时遇见的僧人等无数文士都投入到《国史》撰写中。他的童年经历对其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仔细看居柴夫的经历,可以发现这与花郎徒的经验非常相似。花郎修炼道义、享受歌乐、周游全国山水名胜古迹,了解地形地势。通过这些活动相互团结、修炼身心,享受风流,培养浩然之气。尤其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活动,这种经验非常有利于军事活动。虽然其活动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集体为单位不得而知,但这确实与居柴夫出仕前的经历极为相似。另外需要关注的是他与惠

亮的相逢。因为在花郎徒的组织结构中存在与之相关的特点。

花郎徒由花郎和郎徒组成,前者为指导者,后者为其属下的青年。他们都是15岁以上至19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但花郎徒组织里还包括僧人。当时,可能和尚沙弥僧不需要批准,但要成为正式比丘僧,必需要得到国家批准。因为成为僧人可免税免役。由此可见,花郎徒里面的僧人并不是未成年人。从总体上看,他可以视为花郎徒成员,但实际上是指导花郎徒的教师。偶尔可以看到僧人名字后面加“师”字,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知识分子,指导年少花郎和郎徒。主要教育内容为文字、阅读经典等基本素质培养。这些僧人都是经过国家批准后安排到花郎徒的。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将花郎徒视为纯粹的民间组织。

僧人教育花郎徒的同时,仔细观察他们的优缺点、实力及功过等并反映到人事绩效评估上,根据国家要求推荐适当人选。到了八世纪初,真骨贵族金大问撰写了花郎传记——《花郎世记》,对于花郎的作用一言概括为“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表明他们履职尽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居柴夫小时出家后的经历、与惠亮交流、两个人成为转轮圣王的核心势力提出建议并成功修建皇龙寺等,纵观种种因素,可以推测花郎徒也是在两个人的建议下创立的。正如兴轮寺僧人真慈师和未尸郎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新罗人将花郎视为弥勒之化身。弥勒为拯救未来之佛,而新罗人认为其以花郎的形体出现在现实中的新罗。这种观念包含着新罗靠花郎的力量实现弥勒这一理想世界的寄托。弥勒世界也是自称转轮圣王的真兴王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从这点来看,花郎在真兴王将新罗打造成新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当时代表性新型人才,而花郎徒就是培养其人才的先锋组织。真兴王培养这种新人才的目的,在于基于开国理念树立新国家形象。

综上所述,花郎徒就是真兴王宣布亲政后,以修建皇龙寺为契机,接受居柴夫和惠亮的建议,旨在培养人才而创立的新兴组织。花郎徒刚刚创立时斯多含就出兵征伐加耶,为所有花郎树立了光辉榜样。花郎徒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传承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花郎徒组织陆续出现,自然形成了竞争关系。每个花郎徒都拥有独具特色的名称。金庾信所属的花郎徒是信奉弥勒菩萨的

“龙华香徒”。它们已拥有名册,叫“黄卷”或“风流黄卷”。花郎徒成年后,为出仕离开组织,这时虽然在名册上删除其名字,但会有新的人物取而代之,使得组织不断得到传承。

花郎徒是真兴王为了培养开创新时代所需的人才而创立的组织。从僧人作为教师参加其活动、使用佛教式王名、真兴王自称转轮圣王等中可知,创立花郎徒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佛教理想世界。但其教育内容并不局限于佛教,而是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讲信义等基本道德伦理。现实中所需的这些道德观念,后来被高僧圆光整理为“世俗五戒”。花郎徒追求佛教的弥勒世界,但同时培养现实政治社会中需要的基本德目。由此可见,花郎徒组织虽表面上倡导佛教,实际上却包含着丰富的儒学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较之里面的宗教因素,现实因素更加凸显。从这点来看,花郎徒可以说是一种过渡性人才培养方式。也就是说,它是在按照儒学政治理念追求王道政治并开创新时代的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产物。正因如此,新罗进入中代正式推进王道政治时,花郎徒开始走向衰退,而以儒学经典为中心的教育机构——国学,登上历史舞台。

官僚体制的确立

太子册封制的失败及真平王即位

真兴王宣布亲政后,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譬如领土扩张至三倍、大幅扩大人力及物质基础、修建皇龙寺、为统治体制奠定思想基础、创立花郎徒为培养国家未来顶梁柱打下基础等。于564年首次独自登上东亚国际舞台,就是多年厚积薄发的成果。这等于新罗对外正式宣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世界成员。从这点来看,新罗这时为三国统一奠定了基础的说法并不为过。

这时,摆在真兴王面前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才能使得成果长远持久。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稳定统治体制,有效管理地方,使得隶属民融入新罗人,在当地落地生根。为此,每次需要时,真兴王便采取重新部署、弥补、迁移州治,推进人口迁徙等措施,加强对村落的统治力度。另外,为弘扬佛教,还积极开展佛事,引入佛经。但从564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派使节至南朝或北朝,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这说明新罗以内部治理成果为基础,开始将目光转向国际外交。当时的经验促使新罗能够密切关注国际动向并将之为自己所用,最终成为实现三国统一的赢家。

568年,真兴王为了响应新政策,将国号改为太昌,意为“大力繁荣”,以此表明稳固内政的坚定意志。为此,真兴王要指定接班人,维护政局稳定。而将王位传给谁,不仅关乎自己的政绩能否保持下去,也事关国家命运。因此,真兴王对接班人布局费尽心思,用心良苦。

最终,真兴王在即位第27年,即566年,将长子铜轮册封为太子。册封太子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之在即位之前积累相关经验,更在于防止日后可能会发生的王位争夺战。由此,新罗首次实施了太子册封制。之前,或是完全没有这种原则,或是相关制度尚未成熟等,王位继承体制本身存在不少问题。其实,在没有确立国王权的情况下,这种局面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在由“国人”组成的会议体决定王位继承问题是新罗长期以来的惯例。因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兴王在位时册封太子,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尝试。这也离不开真兴王的政策大获成功的事实。真兴王试图通过太子册封,从制度上规范王位继承制度。

真兴王指定太子,正式宣布确保王位继承的稳定性。但出乎意料的是,六年后的572年,太子铜轮突然死亡,真兴王未能如愿以偿。之后他是否再次册封太子,没有文献记录。考虑到真兴王有次子舍轮,铜轮太子也有儿子,他也许会针对二人权衡再三。而这为下一任国王——真智王(576-579)继位的正统性争议种下了祸根。

铜轮太子死亡前几个月,真兴王将年号从太昌改为具有“广为救助”之意的“鸿济”,有着深远意义。使用“太昌”仅过四年,就再次将年号改为鸿济表明了广为救助、广为抚慰的意志。真兴王可能这时已经下定决心对铜轮进行王位接班人教育。

但太子始料不及之死给真兴王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当年12月,为悼念战死的士兵,在外寺举行了为期七天的八关筵会。虽然这里外寺所指的对象不太明确,但很可能是指王宫外的所有寺庙。可以说,这是给为新罗献出生命的所有战死者而举办的追悼会。可能真兴王认为没有提前举办这种仪式,才发生了太子死去的凶事。从中可以了解到真兴王在抚慰自己悲伤的同时,为王位继承问题费尽心思。第二年,他投入巨大的财力和精力铸成了象征自己的丈六像。这很可能是为了缓解太子册封失败所带来的冲击。

真兴王于576年8月去世后,被安葬在法兴王坟墓附近,以表示他是正统继承者。他的次子舍轮(或铁轮)继承王位成为真智王。舍轮虽然是次子,但哥哥死后,他按照父子相传原则登上了王位。如果真兴王的孙子——铜轮太子的儿子即位,则很可能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因此最终真智王登基。

真智王即位时较年轻,在继承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定的波折,权力基础本身非常不稳定。但居柴夫凭借卓越的政治能力就任为上大等,辅佐国王治理新罗。上大等一职于531年首次设立,哲夫就任为首任上大等后是否有人接任不得而知,但很长时间处于空位状态。从这点来看,居柴夫的就任意味着上大等的复活。之所以居柴夫被任命为上大等,是因为真智王即位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真智王的即位给新罗内政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也许百济已察觉到异常征兆,向新罗发动了攻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真智王在即位第四年——579年突然去世。而他的死亡至今仍然存疑。《三国遗事》对真智王记载为“因为荒淫无道,为国人所废”。这里“荒淫”一词明显地将废位的原因归咎于真智王自己的过失。虽然不知是政治动乱导致真智王荒淫,还是真智王荒淫导致政治动乱,其前后关系不太明确,但不可否认在真智王执政时期,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引发了不少混乱。最终,真智王即位后仅过四年就被国人废黜王位而死。这里的国人是指贵族会议——“和白会议”的成员。可能在和白会议对真智王的去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废黜王位。之后,掌管“和白会议”的居柴夫也引咎辞职。

其实,真智王的问题是铜轮太子死后没有顺利完成王位继承所致。也就是说,是当时没有完全熄灭的争端火种重新爆发的结果。这种情况使得政治陷入困境,导致真智王不顾政事陷入荒淫。就荒淫的具体内容而言,从他要贪占有夫之妇——桃花女的故事中可以了解一部分。可能违背正常婚姻关系的出轨行为,成了主要问题。

真智王被废黜后,铜轮太子的儿子成为国王,就是真平王(579-632)。真平王即位后,王位继承权重新回归到真兴王的直系亲属。有些人将其解释为铜轮系和舍轮系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但当时的真兴王家系分化水平不高,没有达到发生对立的程度。真智王的儿子龙春在真平王的保护下,在宫廷成长,后来被任

命为掌管整个宫廷运营的内省私臣,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智王被废黜和真平王即位可以解释为,追求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势力和追求以贵族发言权为中心的统治体制的政治势力之间所展开的斗争。虽然部体制已经纳入到新的体制内,但追求以部体制为中心分散权力的势力尚未消失,而是虎视眈眈成为核心势力。他们对以王权为中心的体制持有反感,而这一点在真平王时代也显现出来。

统治体制的稳定与制度改革

被贵族会议推举为王,本身就说明真平王的即位并不顺利。虽然真兴王数年来巩固的体制并非瞬间土崩瓦解,但确实变得脆弱、不稳定。真平王即位时年龄较小,也起到了助推作用。如何才能恢复、稳固统治体制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课题。

真平王一即位便任命弩里夫为上大等,接任此前辞职的居柴夫。有些人认为弩里夫就是赤城碑里记载的大阿干内礼夫智或在真智王二年(577)击败百济军的伊滄世宗。虽然弩里夫的政治立场或理念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辅佐真平王治国。另外,真平王即位第二年,即580年将金后稷任命为兵部令。弩里夫和金后稷是在真平王在位初期的国家核心决策人物。他们分别负责政治和军事。值得注意的是弩里夫是传统名字,而后稷则是汉文名字。这种汉文名字的使用始于僧人和国王,对一般贵族后稷来说,是较早引入的。由此可以推测后稷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前沿人物。

后稷原本是指中国周朝传说中的农业始祖。借用后稷名字起名,说明他的家族已深受儒学熏陶。真平王沉迷于狩猎不顾政事时,后稷引用儒学经典来进言,甚至他死了之后也没有放弃,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他是智证王曾孙这一点也值得关注。后稷与真平王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他追求王道政治理想,并积极支持真平王。这种思想与后来金春秋和金庾信推崇儒家思想试图开创新时代一脉相承。

真平王六年(584)改年号为“建福”。为何刚即位时没有改元不得而知,但这时才改元也有其原因和背景。这或许是因为真平王成年后为宣布亲政而采取的行动。

真平王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直到他即位13年(591)之前,设置了很多新的官府和官职。如果将其视为第一步官制改革,那么,第二步则开始于真平王44年(622)。

首先是第一步官制改革。之前,从兵部等与军事相关的官职开始,设置负责监察的司正府和负责财政与机密的禀主等,只设有基本官府和官职。但到了真平王时代,中央官府的整体框架成型。在真平王即位第三年(581)设置了负责官吏人事的位和府,第六年(584)依次设置了负责税收贡纳的调府、负责马政和车乘的乘府,第八年(586)设置了负责礼仪和教育的礼部。由此,到了统一期成立的六典框架基本成型。但其所属的官员尚未齐备。

在真平王执政前半部设置的四个官府中,除了位和府之外,在其他三个府都设有令和史两个职位。其中令为长官,形成二等官制。唯有位和府没有设置长官一职,只设有负责管理实际政务的大舍和史。但从只设有两类官职的层面看,位和府也属于同样的范畴。这种二等官制的传统来自于兵部。当时兵部也只设有令和史。但到了真平王11年(589),其他官府逐渐形成二等官制时,在兵部的令和史中间新设了弟监,发展为三等官体制。这不仅说明兵部成了新罗官府组织结构的标准,也反映出军事组织的重要性及引导作用。

真平王时代的官府以二等官制为主要特征。之后经过真德女王到统一期的神文王时代,受唐朝官制影响,发展为五等官制。但这时官府分为部和府两种。两者根据政治重要性来区分,始于真平王时代。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当时在部下面设立了下级组织——属司。第一次设置的属司就是真平王时代在兵部属下设立的船府署,部署了大监和弟监各一人。这就是属司的前身。真平王46年(624),在礼部和禀主(之后从之分离出来了仓部)分别设立了大道署和赏赐署。在真平王执政前半部所推进的官府改革,于13年(591)设置领客府令二人后,告一段落。

在同一年完成的南山新城修筑工程也需要关注。到目前为止,与南山新城

修筑相关的石碑共发现了10座。这些碑文证明,在修筑南山新城的过程中,除了王京居民之外,还征发了新罗全国居民,是一个大规模历史性建筑工程。之前在王京附近修筑明活山城时,也曾向全国征发劳役,但在规模和范围上与南山新城不可比拟。因为领土大幅扩大,之前已经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将该城命名为新城也值得关注。所有碑文开头第一句话都以誓言开始,即南山新城完工后如果三年内倒塌就受到惩罚。这不仅表现出新罗人宣誓效忠国家,也说明南山新城的修建与官制改革不无关系。之后,以南山新城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佛事活动。可见,新罗成为佛国土的旅程,以新城修建为起点。这也象征着真平王13年官制改革正式落下帷幕。

从真平王13年以后,官制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到了真平王44年(622)才将一直分头管理的大宫、梁宫及沙梁宫统一并置于内省旗下,设置长官一人——私臣来统一掌管。这意味着对整个宫廷组织都进行了改革,也预示着第二步官制改革的开始。第二年,即真平王45年(623),在兵部设置了大监二人。每次改革官制都是率先从兵部开始,首次形成了令、大监、弟监及史四等官制,足以证明该事实。以此为起点,真德女王时,整个官府都改编为四等官制。兵部一直引领着官府改革,是因为当时军事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真平王46年(624),首次设立侍卫府并设置大监六人,担任国王护卫。这与之前设立内省统一掌管宫廷事务一样,都是旨在加强王权的措施。

从新罗官制组织发展层面看,真平王时代意义重大。到了真平王执政后期,其官制改革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当时,以设立掌管整个宫廷事务的官



图7 庆州南山新城碑第1碑

府——内省为契机,要进一步加强王权。这也与当时三国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息息相关。

新的外交尝试

真平王修筑南山新城后第二年,即592年,就对明活山城和西兄山城进行了改造。虽然那时是否也向全国征发大规模人力不太明确,但可能性还是很大。此外,当时为管理、控制王京西北部,还修建富山城,打造了西北部重要的军事要塞。由此,王京的防御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这是新罗高瞻远瞩、准确把握东亚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及时采取的措施。真平王11年(589),圆光到南陈求法。当时正是隋朝统一北朝后向陈国步步逼近的时期。这种局势直接影响到新罗,使得三国局势战云密布。真平王加强王京防御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进的政策。

隋朝于589年灭掉陈国,给南北朝分裂时代画上了句号。分裂数百年的中原出现统一王朝,给三国带来了巨大冲击,三国也需要重新树立外交关系。文帝建立隋朝后,不仅对高句丽国王、百济国王还是对新罗国王,都采取册封政策。这预示着三国重建新秩序的时机即将到来。

在三国上空乌云密布时,百济推波助澜,向新罗发起了先发制人的攻击。百济因新罗背叛而失去了对汉江流域的掌控权,在管山城战斗中惨败后,一直等待时机报仇雪恨。对战败须负主要责任的威德王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致力于战后重建,从而使百济一定程度上从战争创伤中恢复了元气。继慧王和法王的短期执政后,到了武王时代,百济开始向新罗发动了攻势。在真平王24年(602),百济利用从泗泚城通向新罗的捷径,即经过小白山脉到达新罗边境向阿莫城发动攻击。之后,两国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百济不打全面战而打持久战,逐渐吞噬新罗领土。另外,高句丽也从603年开始,时而向新罗发动进攻,导致各边境要地炮声不断。新罗成为众矢之的,韩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新罗饱受两国攻击后,在走投无路之下向刚刚成为统一帝国的隋朝靠近。对四面受敌的新罗来说,隋朝是唯一的靠山。新罗几乎每年派遣官方使节团或僧人紧密观察隋朝内部动向及国际局势。长期饱受高句丽攻势困扰的新罗,在真平王30年(608)命圆光撰写乞师表(请求军事援助的函件),请求隋朝征讨高句丽,正式开启了对华外交之门。虽然高句丽对新罗的攻击没有结束,但以乞师表为契机,新罗为寻求生存打响了积极的外交战。

在此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罗设置了专门负责对隋外交的官府。首次设立专门负责外交的独立官府,说明当时外交越来越受到重视。外交方向逐渐成为关乎新罗国家命运的关键所在。在三国紧张局势日益升温的情况下,统一帝国隋朝的出现,使得东亚秩序迎来了重组的兆头,外交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东亚逐渐融入到通过外交连成一体的全球体系中。

对于设置专门外交机构存在不同的文献记录。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真平王13年(591)设置专门的外交官府——领客府。领客府顾名思义就是接待客人的部门,也就是专门负责接待国外使节的官府。进入统一期后,景德王将其改名为司宾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它的实务并不局限于接待外宾。只是因为接待外宾组是外交实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如此命名而已。总而言之,领客府是以接待外交使节为主要实务并负责整体外交事务的官府。

但同一本书里的《职官志》却对领客府有着不同的记录。根据该书记载,原本设有倭典,而真平王43年(621)将其改为领客典。按照此说法,领客典来源于倭典,之后再升级为领客府。一直存在到621年的倭典和于591年设立的领客府之间,到底有何关系,确实有些模糊不清。在《职官志》里面偶尔可以看到后代的事实追溯附加的案例,因此也不能排除591年的领客府就是倭典的可能性。但考虑到591年是新罗正式开始对隋外交的时期,也不能忽视领客府的设立。可以推测,它可能主要负责对隋外交。

对这种不同的记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应该统筹考虑两个不同记录,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能新罗之前在没有正式官府的情况下接待外宾,到了591年才设立领客府,指定两位高级官员,而倭典作为另外一个组织已经存在,专门负责对倭外交。虽然它的设立时间不得而知,但也许是加耶被新罗灭亡之后

的时期。到了621年,新罗废除倭典,设立领客典来统一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

如上所述,之前针对不同国家设有不同的外交窗口,而到621年之后将其整合为领客典。当时废除倭典,意味着外交窗口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新罗由此表明将专注对唐外交的意志,正式开启了外交战时代。从这种意义上看,设立领客典是新罗外交历史中的里程碑事实。

正好当年新罗向隋朝之后的唐朝首次派遣使节,可能设立领客典与此不无关系。唐高祖为回应新罗派使者入朝,立刻诏令“通直散骑常侍”庾文素前往新罗并送玺书、画屏及三百匹绸缎。领客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设立领客典表明了新罗要为以唐朝为中心的外交倾注全力的意志。中国南北朝分裂时期,新罗一时重视对倭外交,但在中国出现统一帝国后,外交重心自然出现了转移。到了统一期,倭典重新被设立,但这时并非隶属于中央行政官府,而是隶属于掌管整个宫廷事务的内省。这说明新罗与倭国主要是以王室为中心保持的特殊关系。

新罗开展外交战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形式变化,更是因为其内部基础已得到充分巩固。新罗定佛教为国教后,积极引入佛经,派遣僧人留学国外把握国际局势变化,并大幅提高了对文字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说,为正式开展外交战做好了各种准备。但从圆光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时外交主要以僧人为主,还没有专门负责外交的专家。随着外交越来越重要,选任外交专家的必要性也随着增加。领客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从这点来看,该时期对新罗外交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释迦族意识与王室整顿

佛教在法兴王时代被公认为国教,经过真兴王时代,不断得到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尤其是它以皇龙寺为中心,与政治紧密连动,作为国教逐渐扎根落地。皇龙寺的寺主自然兼任国统,担任国王的政策顾问,代表佛教界。由此,新罗佛教与政治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自从真兴王以转轮圣王自居后,这种现

象更为明显。他高举佛教思想的旗帜,推动了各种征服行动,使领土扩张不再是扩大人力、物资的行动,而被粉饰为弘扬、实现佛法的途径。真兴王对新吞并的领土进行巡狩时,僧人陪同前往也说明政治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虽然新罗公认佛教晚于其他国家,但佛教很快就落地生根并传播到全国各地。

新罗作为佛教国家的面貌不断成熟。皇龙寺的修建经过投入长期的时间和精力后,终于在566年完成。不久后,又开始铸造安放在里面的主尊佛。据民间传说,其材料都是来自国外,从材料、铸造技术及丈六像的规模等看,其难度之高可见一斑。修建皇龙寺后,新罗一直尝试铸造与之相称的主尊佛像,经过多次的失败,最后在真兴王去世两年多前,即574年成功完成。据说,铸造后第二年丈六像流泪,预示了真兴王的死去。从中可以推测,丈六像象征着标榜转轮圣王的真兴王。新罗修建皇龙寺和丈六像,为政治与佛教的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平王继承真兴王的政策,高度重视佛教,并积极将之应用于政治领域。首先,他修建了称为“内帝释宫”的特别寺院。帝释是在天上统领天上、天下所有事物的佛教最高天神。之所以将寺院命名为帝释宫,是因为帝释就是主要的信奉对象。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将寺院用“宫”和“内”字来命名。这是因帝释宫像内佛堂一样修建在王宫里,故而得名。但考虑到真平王乘坐轩车到寺院的故事,也不能断定它修建在王宫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在王宫附近修建国家寺院——皇龙寺的情况下,另行修建直属于王宫的内帝释宫,说明这与提升王室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释迦族意识也证明了这一点。

高僧慈藏从638年至643年六年?到唐朝留学,在中国的五台山曾见过文殊菩萨。当时,文殊对慈藏说:“汝国王是天竺刹利种王,王预受佛记,故别有因缘,不同东夷共工之族”。这里的刹利是指印度贵族阶级——刹帝利,也就是说,他们将新罗王视为起源于此的特殊血统。这表示新罗王族具有独特的血统。由此可见,当时新罗人的普遍观念已经传播到中国。

虽然借用了佛教传说,但这说明新罗王室已造出一种特殊现象,足以令外界认为新罗国王拥有特殊血统。真平王的名字为白净,王妃为摩耶夫人。而白净和摩耶正是释迦摩尼的父亲与母亲的名字。真平王的两个弟弟分别为伯饭和国饭,这两个名字也来自于白净的弟弟们——释迦摩尼的叔叔。从中可知,真

平王家族以释迦摩尼家族自居。新罗王族被称为刹帝利的原因就在于此。事实上,真平王家族已超出单纯的刹帝利,被认为是释迦摩尼家族转世投胎在新罗。之所以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新罗为使王族与贵族拉开层次,明确区分,实施了王族神化政策。虽然这种神化意识何时开始尚不能确定,但这很可能是真兴王自称转轮圣王后进一步推动家族神化的结果。这种神圣家族意识的目的在于提高新罗王室的权威,而伴随而来的就是王室改革。

真平王七年,即585年,在大宫、梁宫、沙梁宫等三宫分别设置了一个私臣。大宫是指国王居住的本宫,而梁宫和沙梁宫分别指位于梁部和沙梁部的别宫。考虑到各部原本具有独立性,过去这里是各部首领,即部长居住的住宅。随着部体制的解体,这些住宅自然被纳入到王室管辖内,并设置私臣来负责管理。尤其是自从中古期起沙梁部出身的智证王即位后,一直是他的后代继承王位,事实上两个部几乎并无二致。因此,国王在大宫居住,同时掌管梁宫和沙梁宫。虽然法兴王执政后,王权大幅提升,成为超越性存在,但部体制遗留下来的残余并未彻底消除。从这点来看,在三宫分别设置私臣可以视为王室改革的第一步。

后来,文武王灭亡百济后,第二年(661年)在论功行赏时,将本彼宫拥有的财货、田庄、奴仆赏赐给金庾信和金仁问。可见,这些宫已拥有各种形式的财产。所以,负责管理宫的私臣除了宫内一般事务外,肯定会掌管其财产。而其目的在于将国家财政与行政和王室财政与行政相分离,并系统管理王室财政。可见,新罗的中央集权贵族国家制度迈向了更高水平。

事实上,虽然部体制已瓦解且王权得到了确立,但部、国家及王室的财产一直没有完全分离。到了真平王七年,以王权巩固为基础,在三宫设置私臣,正式推进分离工作。很多中央官府正是该时期新设、重组的。也就是说,以中央官府的组织改革为契机,将王室事务从中完全分离出来,首次尝试将国家行政和王室行政完全分开,打造二元化体系。但三宫仍然存在,其本身就意味着已有体制尚未完全被消除。

到了真平王44年,即622年,设立内省,统一管理三宫,并在其中仅设私臣一人来掌管三宫。虽然同样是私臣,但分管三宫的私臣和统管三宫的私臣,其地位不能相提并论。没有设两名官员也反映出其地位之高。私臣的官等范围类似于中

央核心官府,但从它不是两名而是一名来看,两者差距依然悬殊。之后,私臣下属组织逐渐得到完善。这些都显示出王室事务和中央行政开始完全分离。这种分离以王室地位大幅提升为前提。也就是说,随着王族被神化,王室事务从中央行政官府完全分离出来。最终,王室概念和王族范围也出现了巨大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因骨族分化而出现的圣骨。

圣骨的诞生与王位继承

真平王借用释迦摩尼家族的名字来给自己家族起名,其目的在于标榜神圣家族,提高王室与王族的地位,但同时也有确保王位继承权的目的。因为若自称“净饭王”的真平王能生出儿子,那儿子自然是“释迦摩尼”,进而理所当然地可以成为堂堂正正的王位继承者。这样才能实现完整的神圣家族,也能有力支撑当时大力提倡的“王即佛”思想。如果象征着释迦摩尼的儿子登基,那么新罗将超越印度,成为真正的佛国净土。

然而,可惜的是真平王的期待终究化为泡影,因为他虽用尽千方百计,还是与儿子无缘。新罗的“释迦摩尼”未能诞生。而这暗示着今后很可能围绕王位继承权发生斗争。真平王没有儿子,但有三名女儿。长女为德曼,就是后来继承真平王登上王位的善德女王。她结过婚,但其丈夫不太明确,只是被推测为其叔叔伯饭。次女为天明,与被废的真智王儿子龙春结婚,生了后来成为武烈王的金春秋。三女为善花,广为流传的《薯童谣》就是描述她与百济武王结婚的故事,据传说,是她建议兴建的弥勒寺。

在真平王的不断努力下,王室的地位和权威大幅提升,但他没有儿子继承王位。其实,法兴王、真兴王及真智王都不是嫡系继承者。也就是说,进入中古期后,王位继承从未顺利实现。真平王虽然从实际、制度层面上不断加强统治体制,但他一直具有一种忧患意识,认为如果没有确保王位继承的稳定性,就无法保证体制稳固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计划生出“释迦摩尼”来继承王位,但该计划却面临了付诸东流的危险。

事已至此,真兴王随机应变,想出了圣骨观念。其实,他能够对自己家族神化也有其正当性和背景。除了善花出于外交目的与百济武王结婚外,其他两个女儿都是近亲结婚。铜轮太子也与其父亲真兴王的妹妹万呼夫人结婚,也就是和他自己的姑姑结了婚。真平王王妃摩耶夫人的父亲是福胜葛文王,虽然血缘关系不太明确,但他被推测为很可能是在昌宁碑里面没有名字的葛文王,也就是真兴王的弟弟。

智证王被评价为实际上开启了中古时代的人物。值得关注的是,他之后的婚姻关系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为与朴氏联姻。从智证王到法兴王再到真兴王都与朴氏结了婚。二为近亲结婚。智证王的儿子兼沙喙部葛文王立宗不同于其父,他与法兴王之女、即自己的侄女“只召”近亲结婚。而从东轮太子开始,其直系亲属都继承了这种近亲结婚。在中古期,王室内部婚姻主要以这两种方式为主,但从真平王时代后几乎无不例外地近亲结婚。真平王能够对自己家族神化的正当性和背景可能就在于这种近亲结婚。也许,他是为了标榜、保持神圣家族,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近亲结婚。

近亲结婚导致王室和王族范围大幅缩小。在确立金氏王朝的奈勿王和智证王时代,王室和王族的范围很大,但随着以国王为中心近亲结婚,王族的范围大幅缩小。也就是说,从起初的喙部或沙喙部缩小为金氏族团,而这次又因近亲结婚而进一步缩小。设立内省将国家财政和王室财政完全分离,也是这种结果的产物。王室范围的缩小意味着王位继承权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群体。而其背后的支撑因素就是神圣家族意识。

真平王用神话将神圣家族包装为上天赋予的身份,即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天使从天而降,奉玉皇大帝之命,赐予玉带,真平王则奉天承运,跪下受领。之后,每次举行郊祀(离开王都在郊外祭祀天地)、宗庙大祀时都会带上此玉带。这就是新罗三宝之一的天赐玉带,标志着“君权神授,受命于天”。

在这种思想观念下,已有的骨族意识也需要应时而变。在已有的体制里,干层里的最高级别群体被称为骨,意为“核中核”。但这次在现实世界里出现了神圣家族,他们是唯一享有佩戴天赐玉带资格的特殊阶层。这意味着骨族的分化和圣骨的诞生。骨族是否一开始就被称为真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

圣骨的出现,骨族分为两种,即真骨和圣骨。前者为范围较广的王族,而后者为中古后期出于政治目的而诞生的神圣王族。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唯一享有正当王位继承权的群体。于622年从中央官府完全分离设置专门掌管王室事务的内省,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里内省所掌管的范围也仅限于圣骨。

如上所述,圣骨是在真平王追求神圣家族意识的背景下,从已有的骨族分离成立的最高级别骨族。在成立圣骨的过程中,骨品制改革也伴随而来。圣骨出现后,头品也进一步分化。最终,骨品制形成了八品结构。由于真平王时代设置了很多官府和官职,因此需要重新设定身份与官等制的关系。而在重组的过程中,更加严格执行了骨品制。同时,这也是官僚制改革的过程。研究新罗官僚制的发展历史,需要格外关注真平王时代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真平王推动行政官府重组的过程中,骨品制也自然经历了改革的过程。在圣骨诞生之际,骨品制改革基本上告一段落。从薛鬪头的案例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虽然文献记录将薛鬪头简单描述为新罗贵族子孙,但根据他的行为举止,可推测其为六头品。据说,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时诉苦说,新罗用人论骨品,若不属其族,即使有功有才也不能逾越。终于,他于621年离开新罗前往中国。这说明七世纪初新罗已经实施了骨品制改革,而薛鬪头对六头品的地位大幅下降深感不满。

骨品制改革是在官僚制改革和圣骨诞生的背景下实施的。如果说头品改革与官僚制有着密切关系,那么骨品制改革则与真平王以王位继承为目的所打造的圣骨息息相关。骨品制与官僚制相结合严格执行。真平王原本要生儿子确定王位继承权,但最后没能如愿以偿。于是,他另辟蹊径,以神圣家族的名义,创造了圣骨这一新的骨品,目的在于使神圣家族独享王位继承权。但其计划推行并不顺利,最终导致了一场冲突的爆发。

迈向新统治秩序

善德女王的即位与金春秋·金庾信

真平王为防止重蹈覆辙,希望自己能有儿子继承王位,认为这样才能稳定传承自己所积累的政绩。但在最后得不到儿子的情况下,他希望自己女儿能够继承王位。于是,他利用圣骨概念,指定德曼为王位继承者。这时他的弟弟伯饭和国饭似乎已死,但即使他们活着,真平王也很可能会坚持将王位继承给自己的直系亲属。

真平王为德曼继承王位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准备工作。他之所以能够尝试将王位传给女儿,是因为通过官僚制改革,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大幅得到加强,而且他自己也长期执政,使得统治体制得到巩固。

但到了真平王晚年,一些人开始对德曼的即位表示反对。真平王去世前一年,即631年,伊滄柴宿和阿滄石品谋反,但事前被发现,主谋柴宿被抓住,在东市处以斩刑,被诛灭九族。石品逃离至百济,却在因想念家人回到新罗时被抓处死。对他们严惩不贷,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德曼继承王位,更是为了杀一儆百,对反对派起到警示作用。虽然柴宿谋反以失败告终,但这清楚地表明当时围绕

德曼的即位确实存在争议。事实上,女王的即位在新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一直将男性继承王位视为天经地义的时代背景下,女王即位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即使提前采取了应对措施,也积习难改,不可能一步到位。

632年,真平王死后,正如他所期望,德曼继承王位成为善德女王。但她即位时肯定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关于即位的过程,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可能实施了严格的控制、管理,以提前平息反对声音。镇压柴宿的谋反为此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也是得益于真平王在长期执政中使统治体制得到了完善。第二,也许神圣家族或由此诞生的圣骨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圣骨观念可能被用于女王即位和平息争议。第三,金春秋和金庾信等人物积极支持善德女王,也可能助了一臂之力。由于他们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即使是反对派势力强大也可以进行镇压。

虽然这些种种条件都起了作用,但女王能够即位的关键原因,在于反对派接受了支持派提出的妥协方案。其实,女王的即位只是暂时性或一次性的可能性大。尤其是,善德女王已年老体弱,也许很快就需要新王位继承者。而当时,成为继承者的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上大等。于是,他们拿上大等官职进行了一场协商交易。

上大等弩里夫于真平王十年(588年)死后,伊滄首乙夫接任其位。首乙夫可能是真平王七年担任梁宫私臣的首盼夫,或者考虑到其名字,两者至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当时是将国王的亲信任命为上大等,但自从首乙夫之后,真平王好像一直没有任命上大等,使得该官职长期处于空缺状态。时隔40年后,善德女王在即位第一年将乙祭任命为上大等掌管国政,打开了上大等复活的开端。在善德女王即位的同时,将乙祭任命到长期处于空缺的上大等一职,不同寻常。上大等职位的复活是反对派以接受善德女王即位为代价换来的。可以说,善德女王的即位是与上大等一职交换来的,也是反对派和支持派之间交易的产物。

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但最终达成妥协。这是因为如果矛盾爆发导致内乱,则新罗的未来发展可能无从谈起。加之百济和高句丽分别对新罗施加压力,统一中原的唐朝也纷纷征服周边地区,整个东亚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升

级。在此情况下,如果新罗内部出现分裂,也许会引发灾难性后果。因此,互相对立的两派决定各退一步,达成妥协,等待下一个时机的到来。

对女王即位提出强烈反对的当然是传统贵族。他们反对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追求通过继承部体制的会议体来行使贵族发言权的体制。他们接受上大等一职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们计划占领上大等一职,牵制国王,使之代表贵族的立场。由此,上大等的性质出现了巨大变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代表贵族立场的人物被任命为上大等。

相反,支持女王即位的一派站在与传统贵族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追求建立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支持派里面不仅有传统贵族,也包括具有新理念和志向的势力等,由各种各样的群体组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试图开创新时代的金春秋和金庾信。

金春秋的祖父是被国人废位的真智王,父亲是龙春(或龙树)。如果真智王没有被废,按常理,龙春应继承王位成为国王。但除了父亲真智王被废问题之外,他的出生背景也存在疑点。考虑到真智王废位的理由、他的年龄及桃花女传说等种种因素,可知龙春不是通过正式婚姻出生,而是真智王和桃花女之间私生子兼遗腹子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在真平王的庇护下在宫廷里成长的真骨贵族,甚至曾出仕被任命为内省私臣。但因没有正常即位的资格,而一直受到传统贵族的牵制。虽然他与真平王的次女天明结了婚,王位继承者资格却并没有由此就能够得到恢复。当然,两人所生的金春秋也具有同样的问题。

金庾信的曾祖父是金官加耶最后的国王——仇衡王。由于他是金官加耶的后裔,传统贵族一直将他视为异己分子。他的祖父武力曾在真兴王时代进行的许多领土扩张战争中冲锋在前,立下了赫赫战功。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来自传统贵族的牵制。金庾信的父亲金舒玄和母亲万明——真兴王弟弟肃讷宗的女儿之间的婚姻故事或者金庾信妹妹文姬和金春秋之间的婚姻故事等,都显示出他当时受到贵族牵制的情况。

金春秋和金庾信都因出生背景而遭到传统贵族的牵制和排斥。因此,两人同病相怜,相濡以沫,友好交往。两人对传统贵族都持有反感,并在此过程中认识到新罗社会具有的局限性和矛盾。尤其是,同辈的两个年轻人同心同德,共同

站在善德女王一边,积极给予支持。他们认为,善德女王的即位是能够改变新罗社会的划时代变革,并将其视为走向未来发展之路的绝好机会。他们试图通过支持善德女王,实现自身的目标。他们靠近权力核心不仅是为了打破现实,也是为了开创新罗新时代。女王的即位为他们实现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后,善德女王成功即位,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实现理想的大门。

摇摆不定的统治体制与对唐外交

善德女王通过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妥协登上了王位。由于其统治体制靠两派之间的牵制与均衡维持,因此她无法实施有效的改革措施,唯一的选择就是保持现状。善德女王执政以后一直异常偏重佛事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如果推进政治改革,就会破坏这种牵制与均衡状态。

这导致在善德女王时代,支持派和反对派在如履薄冰的状态下,各自为政,暗中较劲,为即将到来的未来做准备。两派一方面相互牵制,另一方面则各自增强实力,等待时机。而善德女王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她只能注重修建芬皇寺、灵庙寺等寺院及瞻星台等不带政治色彩的项目。

善德女王因压力过大,身体逐渐衰弱,在即位五年后,即636年就达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因此,为了祈愿恢复健康,在皇龙寺设百高座聚集高僧讲《仁王经》,允许百名出家当僧人。《仁王经》里面包含有很多关于护国的内容,因此也被称为《护国经》,也就是说,认为善德女王健康得到恢复等于护国。同年,百济兵力入侵玉门谷。虽是少数且新罗立刻采取措施进行了镇压,但不久后,高句丽又攻击汉江以北的七重城,导致新罗国内外形势更趋严峻。

到了善德女王11年,即642年,百济出兵攻打洛东江以西地区的40余个城,这相当于全面战争。新罗认为大难临头,向唐朝请求援助,却未能如愿。百济还向洛东江以西地区的军事据点——大耶城发动了攻击。结果是洛东江流域的旧加耶地区大部分被收入了百济囊中。那是百济武王于600年即位后,以智异山山

脚为中心逐渐吞并新罗领土的结果。随着在离王都不远的地区纷纷爆发战争,新罗内部笼罩着一片不安情绪。新罗和百济之间的冲突即将要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其实,百济义慈王于641年即位后,第二年就发动宫廷政变,以铲除反对自己的政治势力。那以后便为平息其内部不稳定局势而向新罗不断发动攻势。

大耶城被攻陷本身,给新罗带来了巨大冲击,而更大的问题是担任总司令官的大耶城军主是金品石。金品石贪婪好色,不仅贪图跟随自己从王京过去的幕僚之妻,还贪图地方权势者的妻子,严重损害了内部团结。更甚的是,百济发动全面攻势时,金品石带着妻子到城外投降。大耶城出身的竹竹坚决主张要抵抗到底,但金品石还是不顾反对投靠敌人,却被处死。他身为总司令官的所做所为,严重违背了连一般人都认为该遵守的世俗五戒。在新罗内部,大耶城被占和金品石的行径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但品石是当时支持善德女王的势力之一——金春秋的女婿。还没等从失去女婿和女儿的悲痛中回过神来,金春秋就遭到政治攻势,被逼到边缘。长期维

持的势力均衡面临崩溃危机。反对派当然不会放过金春秋。因此,金春秋在无路可退之下必须要全力寻求突破。最后,他请求善德女王派自己前往高句丽请求出兵援助,向大耶城进攻,以报仇雪恨,一雪前耻。当时在高句丽,渊盖苏文发动军事政变赶走荣留王,立宝藏王为高句丽国王,自己掌控权力。渊盖苏文由于长期与新罗保持敌对关系,态度十分强硬。因此,在他执政的情况下,新罗向高句丽请求援兵,简直是缘木求鱼。金春秋到高句丽请兵救援与其说是为了取得可视性成果,不如说是冒险去高句丽,以平息对自己的批评之声,并刺探高句丽的内部动向。果然,高句丽对新罗的请求提出无理要求,要新罗把汉江竹岭一带领土立刻还给自己。金春秋对此表示拒绝,因而被关进牢里。但他前往高句丽之前已经为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他巧妙利用高句丽的内部矛盾与分裂,凭借贿赂、计策成功逃离。

与高句丽交涉失败后,新罗将目光转向唐朝,于643年陆续派遣使节前往唐朝,请求援助,以期渡过难关。当时,新罗恳切地发出呼吁说百济和高句丽联合发动攻击,新罗兵临城下、危在旦夕,请求唐朝伸出援助之手。尤其强调说百济和高句丽串通一气,以刺激唐朝出兵。对此,唐太宗在抚慰新罗使节的同时,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唐朝发动小规模边缘兵力和契丹、靺鞨兵力进攻辽东,新罗可以暂时摆脱危机;二是赐给新罗数千个红服和红旗,这样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来攻时会以为是唐朝军队,必定会退兵;三是新罗为百济所轻侮是因为女王当政,因此,如果新罗同意唐朝派王族当新罗王,那么就立刻率领数百艘军船和军队,以保全新罗。新罗使节对这三项建议无法选择。虽然当时对新罗来说,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第三项,但将唐朝王族奉为新罗国王确实是无理的条件。唐太宗严厉斥责不知所措的使节,说其拙劣无能。

其实,唐朝早已决定向高句丽发动全面战争,并正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因为唐朝于640年征服高昌后,剩下的唯一强敌就是高句丽。唐朝为了顺利征服高句丽,收集大量信息,密切关注内部动向,完全做好了准备。唐朝从隋朝三征高句丽的失败中吸取深刻教训,扎实做好准备工作,以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三项建议是唐太宗为拒绝新罗请求而提,而唐朝已选择的计划正是对新罗毫无效果可言的第一项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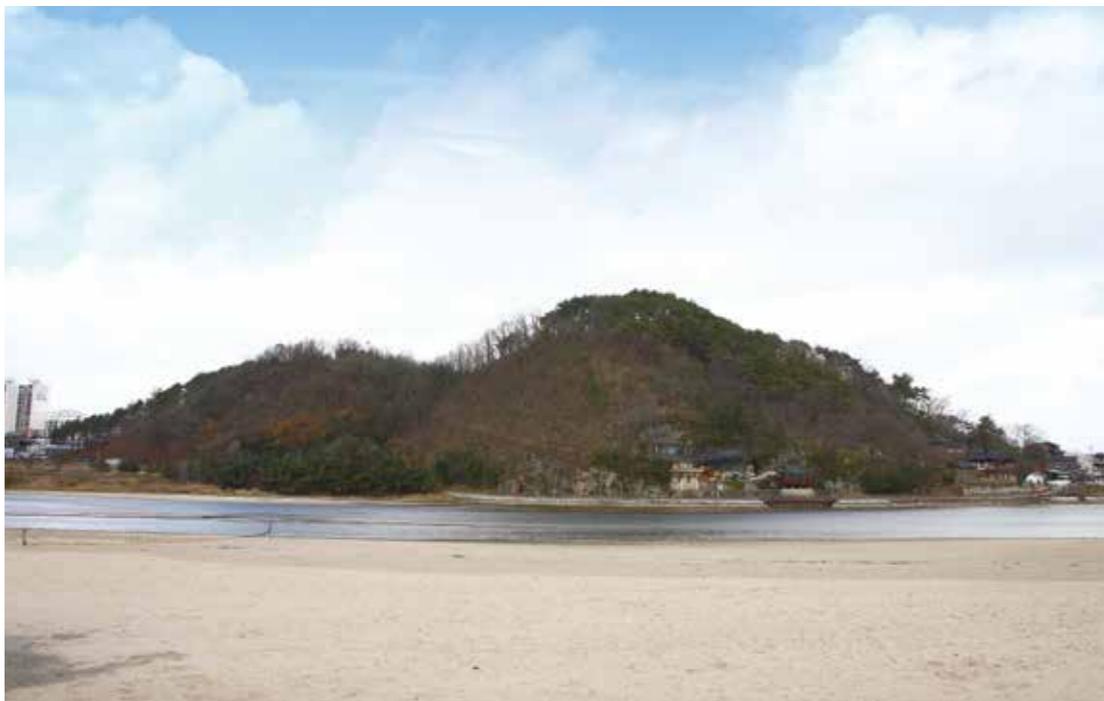


图8 陕川大耶城

但唐太宗所提出的建议反而在新罗朝廷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唐朝说起出兵条件时,对女王当政提出了质疑。后来,反对派以此为基础,提出“女主不能善理”口号,发起政治攻势。唐朝言辞通过使节传到新罗后,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因百济的攻势而本来就不稳定的新罗内政来说,犹如火上浇油。善德女王即位时形成的牵制和均衡原则开始被打破,新罗形势危在旦夕,一触即发。

修建皇龙寺九层木塔

在新罗因百济攻势陷入危机而遣使唐朝请求出兵援助之际,曾入唐求法的慈藏结束五年的在唐生活,于643年3月返回新罗。善德女王认为慈藏是能够突破目前危机的最佳人选,遂请求唐太宗准许慈藏返回新罗。其实,善德女王在其出家之前也曾请求其担任台辅一职,甚至还威胁恐吓称,如果不应命会被斩首,可见善德女王对慈藏的信任。当时,善德女王因两派势力明争暗斗、针锋相对,脚下如履薄冰,认为能化险为夷的人物只有慈藏。但慈藏却坚决拒绝称“吾宁持戒一日而死,不愿一生破戒而生”。善德女王不得不允许他出家为僧。

慈藏的父亲茂林是真骨贵族,出身名门望族。茂林没有儿女,因此祈求千部观音送子,发誓若自己能够留下后嗣,就使其出家当僧人,之后才得到了慈藏。慈藏当官,结婚生子后,出家为僧。善德女王可能对他做官时发挥的卓越能力给予高度认可,才将其推举为台辅一职。

慈藏在唐生活的五年期间,除了求法活动外,还去长安拜见唐太宗,受到热情款待。他不仅对唐朝内部动向非常了解,也已深知新罗因百济攻击陷入危机而遣使唐朝请求派援兵相救的事实。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说是慈藏到了太和池时,神人(或圆香禅师)对他说“新罗以女为王,有道而无威,频遭周边国家之入侵,若回归本国在皇龙寺建九层塔,则周边国家皆会陆续降服”。这说明慈藏对新罗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回国前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他已经知道既然善德女王请他归国,肯定就会向自己寻求克服危机的策略。这也意味着善德女王对他寄予了很高的厚望。

慈藏回国后,建议善德女王在皇龙寺修建九层木塔,表示这样会使新罗邻国——九夷自然归属于新罗。其实,僧人安弘早已提出过修建九层塔的建议。他长期在中国留学的过程中,看到隋朝文帝之后在中国实施的各种佛事,625年就提出了这种主张。但当时新罗并未面临巨大危机,因此他的主张没有被采



图9 庆州皇龙寺遗址刹柱本记

纳。慈藏应该在离开新罗之前并非对此一无所知。但这次慈藏则基于新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克服危机的方案,提出了在皇龙寺修建九层木塔的建议,因而被新罗立刻采纳。慈藏为了平息反对声,提前将其粉饰成了神人的预言。善德女王也没有其他能够克服危机的方案,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她本身高度信任慈藏,而且连反对善德女王的势力也信奉佛教为统治意识形态,得到他们的同意也非常顺利。

其实,慈藏建议修建九层木塔的背后另有政治目的。考虑到当时新罗的国内外处境,即使是慈藏的建议,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佛事工程也会显得不切实际,甚至离谱。在国家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余力推进大规模建筑工程。对新罗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增强军备,应对百济的攻势。而且在国家核心寺院——皇龙寺里修建九层木塔也不一定就能保证迅速缓解对外紧张局势。尽管如此,却依然不惜投入巨大的经费修建九层木塔,其背后肯定有着某种政治目的。

这时,值得瞩目的是,新罗从百济招来高级技术人才。新罗给百济提供很多宝物来请求其派来匠人。百济接受新罗的要求,将匠人阿非知送到新罗。一直向新罗发动攻势的百济突然接受新罗的要求,事出有因。义慈王发动政变后,内部混乱尚未结束,也需要对刚刚攻占的新罗领土进行重组、管理,这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而正好就在这时,新罗要求派遣匠人。百济很可能将其视为新罗发出的休战信号,认为新罗暂时不会采取敌对措施。同时,百济认为新罗较之军备,更注重建筑工程,这对百济更有利,于是就接受了新罗的要求。

而这正中了新罗的下怀:新罗修建九层木塔,向百济要求送匠人,以观察其应对方式和动向,以拖延战争爆发,尽量赢得时间。如果计划成功,两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进入休战状态,新罗可以谋求内部稳定、摆脱危机。这就是新罗不惜投入巨资修建九层木塔的目的。由于两个国家正好利害一致,百济决定派遣阿非知,使两国暂时进入休战状态。

此外,新罗也有谋求内部稳定的目标。从唐朝传来的“女主不能善理”,在新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之后,新罗内部分裂带来的危机重于来自外部的威胁。这给善德女王的支持派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原本为克服对外危机而开展的外

交活动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国内情况。新罗国内局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急需采取对策。如果在外部威胁有增无减的情况下,雪上加霜,内部分裂持续升级,那么新罗很可能会走向灭亡。由于这种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反对派也对九层木塔的修建表示同意。对于修建九层木塔的目的,表面上说是为了使周边国家归属于新罗,但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日益升温的内部分裂。

修建工程的总负责人为金春秋的父亲龙春。在龙春的指挥下,命令两百名小匠修筑九层木塔。龙春是站在善德女王一边的人物,也支持慈藏,因此,九层木塔的修筑可以说是在善德女王支持势力的主导下完成的。但慈藏、龙春及春秋对传统新罗社会的认识、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态度不尽相同。这一点,在后来金春秋成功即位后逐渐显现出来。总之,修建九层木塔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与反对派达成妥协,克服新罗眼前危机,加强团结、恢复内部稳定。

在皇龙寺修建九层木塔,原本是一种佛事,但实际上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善德女王在面临国内外双重危机、陷入两难境地的情况下,为克服危机而采纳慈藏的建议亮出的最后底牌,其中包含着重建皇龙寺将政治与佛教重新混为一体的目的。但两派通过该工程要达到的目的却各不相同。围绕唐朝出兵攻打高句丽的事件与结果而爆发的矛盾就说明了这一点。

毗昙之乱与迈向新时代

在皇龙寺九层木塔工程接近尾声之际,出现了新动向,即唐朝向高句丽发动了全面攻势。唐朝于640年攻灭高昌后,紧锣密鼓地准备攻击高句丽。于641年还派陈大德侦查高句丽从边境到王都的地形地势及军事情况。他完成任务后回到唐朝,编写《高丽记》递交给了唐太宗。

唐朝在向高句丽发动全面战争前,如此做好彻底准备是为了防止重蹈隋朝的覆辙。隋炀帝建国不久,在没有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向高句丽发动了三次征伐,终因战争失败的后遗症走向了灭亡。唐朝建国没多久,基础还不牢固,而且,太宗即位时发动的政变余波尚未完全平息。但唐朝坚持向高句丽发动攻击

也是为了以战争取胜为契机,彻底解决国内外存在的问题。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的原因也在于此。

唐太宗为战争获胜制定通盘作战计划,于644年将司农丞“相里玄奘”派到高句丽,以观察高句丽内部动向并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之后,相里玄奘于645年到百济和新罗传递太宗的诏书,敦促参加远征高句丽。对此,两国的态度截然不同。百济拒绝唐朝的要求,在唐朝攻击高句丽时反而趁机向新罗发动了攻势。新罗则与百济不同,派遣了三万或五万兵力。考虑到在《唐书》记载为五万,这可能是新罗通知给唐朝的数字。

但新罗的派兵决定也来之不易,因为在新罗内部围绕派兵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表示,也许百济会乘虚而入发动攻击,而赞成派则表示,唐朝的强烈请求难以回绝。双方最后达成妥协,表面上将派兵人数定为五万,但实际上派了三万,以备百济突袭。果然不出预料,百济趁机攻占了西部边境的七个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也以失败告终。这导致在新罗围绕责任追究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对此,派兵战争结束的645年11月伊滄毗昙被任命为上大等,也耐人寻味。

上大等一职于善德女王五年(636年)由水晶担任,后来具体情节不明。而到了645年,毗昙出任此职。考虑到前后情况,毗昙被任命为上大等,与派兵不无关系。尤其是此后不久毗昙的举动清楚地表明,他就任为上大等,是派兵结果所致的产物。

战争失败自然给主张出兵援助的一派带来不利影响。虽然派兵造成的损失程度不明,但战败本身和百济抢占新罗领土成了问题。因此,主张参战的一派明显处于劣势。不管是替代水晶还是占上原本空缺的位置,强硬派毗昙被任命为上大等,都是为了平息该风暴而使用的筹码。一直主张积极靠近唐朝开展外交活动并主张参战的一派是善德女王支持派,而反对参战的一派就是善德女王反对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毗昙。虽然毗昙成为上大等后,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实际上这简直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之所以毗昙一派接受支持派建议,是因为上大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很大。这时,善德女王年事已高、时日不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虽然内部冲突暂时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在台下仍然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争议的最大焦点就是善德女王以后的继承问题。反对派提出唐太宗所说的“女主不能善理论”来反对女子为王。而当时因种种原因无法成为国王的金春秋及支持女王的一派则提出“圣骨男尽论”,即没有了圣骨男人,试图将善德女王的四寸妹妹胜曼推举为王。在双方围绕该问题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情况下,金春秋前往倭国。因为在倭国成立大化改新政府后,引领其改革的主要人物高向玄理于646年9月访问新罗,金春秋就在他归国的12月以回访为借口跟随前往倭国。金春秋能够前往倭国是两派达成协议的结果,但各自打着不同的算盘。

“女主不能善理”派趁金春秋不在之机,准备造反。“圣骨男尽”派前往倭国不仅是为了外交,更是为了收集与女王即位相关的一切信息及动向。在倭国已有两位女王继承王位的案例,如593东亚首次成为女皇的推古和642年即位的皇极。在倭国,女皇即位是在天皇没有正统接班人的情况下死亡时,为了防止皇位争战,作为妥协将皇后推举为王的结果。这都是以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暂时性方案。645年,推动大化改新的一派成功执政后,皇极立刻退位,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信息给支持女王即位的一派提供了极好的证据。金春秋虽然以回访为理由前往倭国,但真正的目的在于收集与女王即位相关的信息及动向。

然而,趁着女王支持派首领——金春秋不在之际,上大等毗昙于647年1月初与廉宗等人串通,以明活山城为据点,高举“女主不能善理”旗帜发动了政变。这里的“女主”当然指善德女王,但也针对即将即位的真德女王。善德女王在政变刚刚开始后的1月8日去世。她并未被杀害,而是在年老病弱的情况下,因谋反受到刺激而亡。之后,继承善德女王即位的就是真德女王。

毗昙之乱直到1月17日,持续了十多天。统治阶层分为两派对峙交锋,整个王京因政变陷入了动荡漩涡中。一开始时,毗昙一派占上风,包围王军的据点——月城并发动攻势。但在王军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名将金庾信出谋划策,振作王军士气,克服危机,到了1月17日,转败为胜,成功镇压了毗昙之乱。新政权一上台,便对直接参加毗昙之乱的30人处以斩刑并诛灭九族,严惩不贷,以求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由此,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第 II 篇

新罗的 三国统一和 开展

三国统一与中代的统治体制

下代的揭幕与开展

新罗的灭亡

第一章

三国统一与 中代的统治体制

金春秋执政与中代王权的成立
百济·高句丽灭亡与三国统一
中代统治体制与治国原理
佛教教学的发展与文化的成熟
国际关系的变化与中代王权的没落

1

金春秋执政与 中代王权的成立

历史评价金春秋

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人把自己的历史时期分为上代、中代、下代,再将太宗武烈王以后到惠恭王在位期间(765-780)划定为“中代”,认为这一时期是新罗中兴时期。这说明武烈王金春秋掌权期在新罗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现今历史学界也认为新罗“中代”是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最鼎盛时期。

金春秋在位的七世纪前期,东亚正处于剧变。隋、唐统一五胡十六国,整合长期分裂的中国,向周边国家显示强大的力量。从此,五世纪以来东亚各国因势力均衡而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被打破,东亚各国的安定受到威胁。为抗衡强大的隋、唐势力,高句丽一边强化对契丹·靺鞨部落的牵制的同时制定用武力收回被新罗抢占的汉江流域的战略方针。由此从六世纪九十年代起,新罗和高句丽两国间进入史无前例的激战状态。然而趁高句丽攻打新罗北部之际,从西部猛烈进攻新罗,直接挺进洛东江方面。新罗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危机状态。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金春秋灵活应对国际政局的变化,欲以摆脱现

状。首先接受儒家政治理念,对内利用王道政治大量革新中央集权体制;对外成功地结成“罗唐军事同盟”来奠定未来三国统一的战略基础。金春秋设计“罗唐军事同盟”,并非简单依附于唐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这是金春秋的外交路线,是想利用唐朝先进的国家体制和东亚战略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谋求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战略设想。他的外交策略成为了维持三百年新罗统一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新典范。

不可否认,历史学界到目前还普遍认为金春秋是引进“唐”这个外国势力,消灭同族国家百济和高句丽的“背叛者”,否定金春秋的政治外交策略。然而单单搬来近代民族主义衡量金春秋“背叛宗族”行为,难免有些过于牵强。又在没有理解金春秋“亲唐外交”的政策内涵和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一味地断定是“慕华主义”、是“引狼入室”行为是对当时国际局势和政策不甚理解的结论,在所难免以偏概全之嫌。

春秋与毗昙,名字与历史

金春秋654年即位,尊为太宗武烈王。事实上,早在647年镇压上大等“毗昙之乱”时期已经掌控了新罗最高权力。“毗昙”乃佛教小乘经典之名。而“春秋”则是孔子所著史书之名,是儒教的象征。春秋和毗昙是七世纪前期新罗政坛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都是领袖级人物。而毗昙的没落,隐含着新罗的国家政治理念由佛教转向儒教的这一“时代变化”。如果说毗昙设想继续维持以佛教为统治理念的理想国家,即“真骨联立”王国,那么春秋的政治目标在于建立以儒教王道政治为基础的“国王为中心”的集权体制。

在当时,佛教作为新罗国家的统治理念仍发挥其威力。从佛教所提倡的理想君主“转轮圣王”或“王即佛”的观点看,佛教也为加强新罗王权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在花郎徒当中也有僧侣辅佐花郎并教育、指导郎徒,还利用宗教的力量来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团结新罗人民、培养国家意识等方面均起到了作用。但是,佛教毕竟是宗教,当新罗需要创建一个能够战胜内忧外

患的强大的政治体制时,佛教却显现其本质上局限起不了作用。

当时,儒学在新罗逐渐扩大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影响。真平王之后,儒学和中国礼制逐渐变成整顿新罗官僚组织理念基础,还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中实践道德的原理。圆光高僧结合儒教思想所提倡的“世俗五戒”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此外,有文献《壬申誓记石》中讲述在真平王三十四年(612年)两名新罗青年三年内熟读《诗经》、《尚书》、《礼记》、《左传》等儒教经典后,发誓将为国家忠诚的故事;《论语》名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已然成为当代统治阶层中流行的座右铭,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儒学早已渗透到新罗社会。强首和父亲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儒家和佛教对新罗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即:

“要学佛教还是儒学?”

“我要学儒学,佛教已经远离世俗。”

很显然,儒学的政治地位逐渐扩大。诸如强首等致力于儒学的青年一代后来成为了拥戴金春秋政治革新以及“罗唐同盟”外交的核心势力。

儒学之所以在新罗迅速崛起,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阶层积极接纳并普及的意识。面临三国对峙局势,深谙儒学的官吏用汉文制作文书能够行之有效地征收税捐、迅速动员兵力,已然形成文书行政,服务于国家。然而接受儒学的目的并不止于此。儒学的根本在于孝,而孝最终归结于“忠”。上述《壬申誓记石》中发誓要学儒学的青年们,他们的最终目标也是“为国忠诚”。正如提倡“君君、臣臣”的纲领,儒学给人们灌输了对王权绝对忠诚以及服从意识。除此之外,儒学所提倡王道政治的“爱民”内涵中,理所当然要求具备“文德”还要兼备“武德”。因此,即使他们发动战争让百姓死在战场上,还可以美其名曰“为国捐躯”。

诸如“毗昙”之类的佛教式名字尚为流行之时,大胆起名“春秋”,这对幼年金春秋形成自我意识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在后来金春秋的行迹中清晰可见。儒家礼法中,有“冠礼”的成年礼,此时赋予“字”。金春秋是最早使用这种“冠礼”给儿子的新罗人。648年,金春秋觐见唐太宗时,首先要求参观唐朝国学举行孔子

释奠仪礼和儒家讲堂。等他回国后立即奠定国学基石,接纳儒学和中国文化,其态度相当坚决,立竿见影。由此可以说,自从“毗县之乱”以后,金春秋为确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实施了诸多革新政策、接受礼制、建构罗唐外交的蜜月期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中,显然看出其父龙春为他取名“春秋”的深刻寓意。

真德女王即位及其意义

647年正月,金春秋和金庾信镇压上大等毗县和廉宗等旧贵族势力的叛乱后,完全掌控新罗政局。毗县反对女王统治而发动“毗县之乱”,但金春秋等镇压叛乱之后,还大张旗鼓地拥立女性国王,即真德女王。金春秋聚集了大量身份低等的骨品出身人物以及身无背景势力的地方人才来扩大其政治势力。他把这些人安插在国家公共秩序中每一领域,为此不惜扩充官僚组织,以此来确立以国王为首的集权体制。当然他的这些举措招来贵族联合体制中真骨、大等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不难想象其矛盾的尖锐性。

新罗自法兴王以来,虽然历代国王自称“太王”加强王权,但就以真骨权势废除真智王的事件看,新罗的王权尚有一定的局限性。新罗国家像是一座虚拟建筑,由国王和真骨势力共同运营,不由得哪一方掌控一切。国王和真骨势力分割食邑或禄邑的经济权和军事权,再由真骨负责当地再生产的方式统治国家。也就是说新罗国家由国王和真骨两股权力共同统治。生产力相对不稳定、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脆弱的古代国家新罗来讲,或许真骨联合体制更加有利于及时应对财政危机。这与实行全国一元化统治,整体掌控国家财政的国王体制相比显得灵活些。

事实上,维持新罗国家体制绝对需要真骨势力的协助。国王不作独断专行,经过真骨贵族“会议”协商来决定政策。另外,真骨贵族“会议”成员之一,即名为“大等”是经过真骨家族共同推荐,再由国王追任的方式选用。这跟高句丽时期录用“大对卢”或者在渊盖苏文家族中继承“部大人”职位的方式是一样的。此外,主持大等会议的上大等一职,虽然是国王任命,但本质上与大等集团没有区

别。无论选用方如何,真骨希望新罗国家发展这一点上和国王的想法无二致。但如果国王想独占国家成果、想破坏真骨的既得权或者在真骨联合体内发生任何事情,那么真骨势力都绝不会坐视不理。当时,真骨看不惯王权逐渐壮大,密切注视辅佐王权的以金龙春、金春秋父子和金舒玄、金庾信父子为首的王党派的动态。

当然,当时真骨势力也意识到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是新罗所面临的国家课题,也是新罗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很清楚正处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国际局势之下,现有的国家权力分割的体制不利于开展国家总体战争,将会引发问题。即便是这样,真骨势力仍担心对王室以改革为名壮大势力后将会夺走他们的既得权。因而不安和不信的阴影笼罩着真骨集团,真骨贵族之间因利害关系的交织错杂,尚未找到斩断乱麻的解决方法。整个局势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

此时,善德女王推行“亲唐外交”策略,试图利用外交力量阻止高句丽、百济的入侵。但唐太宗却对此不以为然,侮辱新罗使臣说新罗是“女人为王的小国,所以高、百两国瞧不起才攻击”。再加上,642年发生金春秋女婿金品释的暴行和投降,使得百济抢占大耶城的事情后,王室以及王党派行使权越发越小。大耶城位于现在的陕川地区,是洛东江西岸的重镇。大耶城等40余座城邑的沦陷,意味着新罗把从前属于加耶的土地全部落入百济手中。从此新罗失去了小白山脉这条安全防线,跟百济仅以一江之隔而对峙。假如百济军跨过洛东江,说不定连首都庆州将会随时沦陷。新罗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

金春秋冒着生命危险赶赴高句丽说服他们出兵。“请兵”是苦肉计,金春秋试图用苦肉计来缓和王室和王党派所面临的紧张局势,摆脱四面楚歌之困境。不料,渊盖苏文并没有答应金春秋的请求,“请兵”外交终归失败。加上唐太宗攻打高句丽的东征也因645年安市城之战的惨败而受挫。在安市城战役中,新罗以同盟军派遣三万兵马北上协助唐远征高句丽,而百济趁机夺走了新罗西部边境的7座城邑。此时新罗社会变得人心惶惶,女王的领导力跌到谷底。新罗统治阶层内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高句丽、百济灭亡的忧虑逐渐变为现实,明若观火。

此外,还有加重新罗内政不安的因素,就是善德女王后嗣中没有能继王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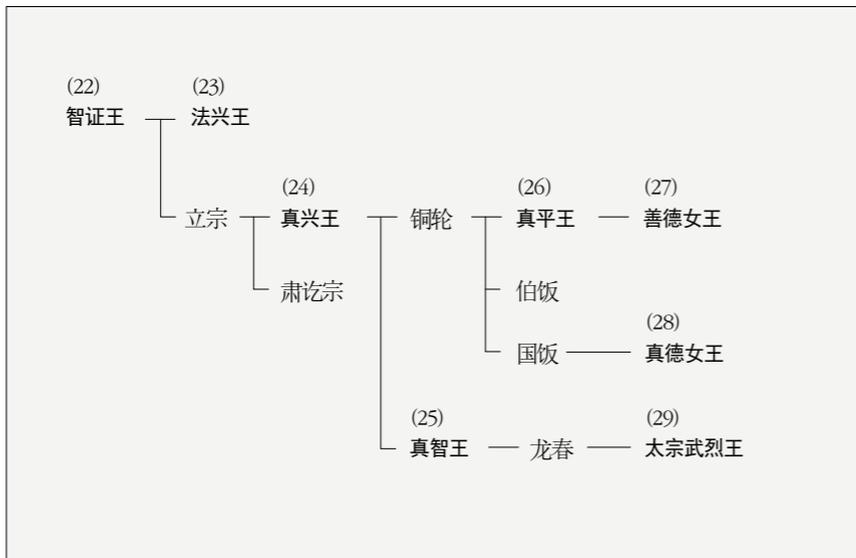


图1 真兴王-太宗武烈王王系图

圣骨血统男性。当初,真平王选不到圣骨血统男性,不得已立善德公主为王。而在善德女王的圣骨血统中,也只有其堂妹“胜曼”(真德女王)符合继位条件。按照真平王所定“圣骨血统继位”的法规,王党派这次也别无选择余地,只能拥立女人为王。然而,善德女王所推行的“亲唐外交”失败,加上国家面临亡国危机之际,真骨势力对女人为王的现实极为不满。其结果,上大等毗县纠合真骨人于647年正月发动叛乱,高喊“女主不能善理”。

但“毗县之乱”被镇压。打败毗县叛党的主力是金春秋、金庾信的政治势力。在镇压过程中,金春秋凭借远见卓识一举打败毗县,抓住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绝好机会。细想,“毗县之乱”等于是王权和真骨大等两股势力的抗衡,而最终王权取胜意味着新罗将要确立中央集权体制。金春秋断然否定毗县“女主不能善理”的主张,大张旗鼓地再次拥戴了女王。或者说金春秋完全可以自立为王,但他以再立女王来标榜“臣权”不可介入“王权”的原则,捍卫了“王权”的神圣和绝对性。

金春秋渡唐外交和亲唐政策

真德女王即位二年(648),金春秋不顾花甲之年远赴中国觐见唐太宗。作为实权势力的金春秋亲自出马进行曲折多变的外交交涉一事,足以证明当时新罗政局内忧外患的严重性。乍一看,金春秋似乎将新罗国家命运下注到对唐外交的成败上。他把这次渡唐外交当作是战胜眼前的国家危机,重新打造崭新的、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家的最佳方案。而亲唐外交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新罗将确保友军、谋求内外稳定。与此同时,他还考虑到通过此行亲身体会中国先进文化,设计未来的新罗国家。

由此,金春秋在觐见唐太宗时要求参观国学中举行的释奠仪礼和国学讲论教育。释奠是祭奠孔子的仪礼,国学是儒学教育的殿堂。对金春秋的这些要求,或者可以说是他以表明慕华意识和热衷儒学的倾向,想以此俘获太宗之心。但从中也能看出金春秋想借用儒教的政治理念来改革新罗国家体制的梦想和抱负。事实上金春秋早就关注通过儒学教育的人才培养。因此他向太宗阐明外交目的之前,先说明自己对唐朝儒学及其教育的极大兴趣。唐太宗听罢心悅,还特别款待金春秋,赠送御制碑文《温汤碑》、《晋祠碑》和新编历史书《晋书》,并赐予他仅次于新罗王的“特进”官衔。很显然,唐太宗是权当未来新罗君主来礼遇金春秋。

从表面上看金春秋只对唐朝国学表示关心,而实际上他是在隐藏入唐的真实目的。这与之前遣唐使节一来便伸手求助,要求抵制高句丽、百济的做法明显不同。因此唐太宗反倒好奇,迫不及待地询问他入唐目的。时机已到,金春秋详细说明目前三国形势并请求援助新罗,互相签订密约。唐太宗和金春秋二人对话被视为密约。密约内容是到后来罗唐战争开战之后才被公开。当新罗军占领百济领土之后便向唐朝举反旗时,唐将军薛仁贵写了谴责新罗的信递给文武王。文武王在回函中提到过密约内容,即当初先考(金春秋)觐见太宗时,太宗口头约定“进攻高句丽并非出于对土地和财物的野心。平定百济和高句丽后,平壤以南的百济土地全部归属新罗”。

这就说明,当时太宗和春秋讨论征伐高句丽的新战略,双方都对罗唐合作与

军事同盟给予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改过去东征高句丽的策略,谋划依次征伐百济、高句丽的战略。这种战略计划很可能出自金春秋。在之前百济向唐朝派遣朝贡使比新罗更为频繁,因此太宗有可能没有考虑到征伐百济的事。而金春秋面对唐太宗始终隐藏自己的心事,极力讨好太宗,博得太宗欢心之后始谈外交话题。应该说出自金春秋的谋略赢得唐太宗欢心,且给太宗一个挽回安市城战役惨败的一张王牌。

上面提到过,645年唐朝远征高句丽时新罗曾出三万兵马攻打高句丽南部助战,而百济却趁此时机夺走了新罗的七座城,这明显是助战高句丽的举动。正如《隋书》记载,唐太宗也已经觉察百济的靠近高句丽的动向。唐太宗经历安市城之战溃败之后,认为有必要分散集中在辽河一带的高句丽防御力量,再者为解决进攻平壤城的军需物资而迫切需要新罗的军事援助。结果,金春秋和唐太宗在消灭高句丽的利害关系上达成一致,制定了先灭百济而归新罗,新罗作为东征高句丽的南方基地的战略方针。在当时虽未确定准确具体出兵时间,但罗唐联军“先灭百济,后征高句丽”的作战计划已出台无疑。“先灭百济,后征高句丽”的战略方针中可窥视金春秋作为外交终结者的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讲,百济毁于金春秋那三寸不烂之舌也不为过。金春秋此番度唐之行,最大的成果是达成罗唐军事同盟,虽然是口头协议但它的意义至关重要。整个过程中,金春秋充分展示非凡的外交手腕,有效提高了其政治地位。

归国后,金春秋很快就着手构建新的统治体制,接纳唐朝相关体制。他的这些举措,与其说炫耀新罗与唐朝结成军事同盟,不如说为自己继承王位营造势力基础。649年,金春秋接受唐朝的官服。次年,新罗向倭国派遣了身着唐制服的使者而招来日方强烈不满,甚至有些官员提出要求进攻新罗。这事情并非是简单的外交摩擦,而是在显示唐服所蕴含的威力。由此看出新罗周边国家对“罗唐同盟”非常在意,密切关注新罗和唐的动向。金春秋的如意算盘初获成功,发生效应。

随即,金春秋加快照搬唐朝体制的步伐。650年,下令真骨执掌牙笏,放弃新罗传统年号改用唐朝年号“永徽”。恰逢唐高宗刚登基之际,真德女王亲题《太平颂》赞美唐朝太平盛世,将把诗歌编织在丝绸上,让金春秋之子法敏奉呈唐王。

这不仅体现罗唐关系的密切,还标志着新罗皈依于天朝的国际秩序。

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体制

金春秋推行的亲唐政策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战略。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接纳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儒教礼制、国家仪礼等来加强王权、确立中央集权体制。金春秋自真德女王五年(651),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首先他解散原有的稟主设立“执事部”和“仓部”这两个独立的官府,强化了国王的秘书机构和财政机构。“执事部”是国王直属机构,专门负责王政机密。“执事部”的机能是在国王和执行国王政令的行政机构之间,并直接接受王命,沟通和控制下属机关。另外,设立“仓部”同时再设其下属机构“赏赐署”。“赏赐署”负责财政以及奖赏为国献身或有功人士等事宜。金春秋通过设置这些机构牢牢掌握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还借以物质奖赏拉拢人心,引导新进士流为国忠诚,集结大批为国效忠国的势力。

651年改革中最值得一提的事是,将把中央官署组织改为令(长官)、卿(次官)、大舍、史四等级制的组织机构,此奠定了培养行政官僚的国学基础的事情。起初只设有博士、助教及其下级职位大舍、史等各二人的职位。虽说规模不大,但它标志着是通过儒学教育来培养人才的教育机制的开头。设置四个等级制国学,跟新罗各官署分四等级的制度有密切关系。四等级制是一种分管行政指挥或业务,专管专治,提高效率的行政措施。它需要具有国学修养的大舍、史等负责实务的行政人才,而且不断扩充人才。可以说,国学在实现机构四等级制过程中起到必不可少的打底作用。

尚未设立国学之时,是通过花郎徒培养罗国所需的人材。花郎徒选拔人才取决于真骨子弟,即花郎的关系。这与贵族荐举制类似。花郎和郎徒之间关系表面上是与公共关系而实际上是私人性质的关系更浓一些。因此花郎推荐而被选上的郎徒等于是贵族家的家臣。总之,花郎徒具有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机构由真骨贵族机构转向国家公共机构的过渡期的性质。金春秋为完成王权

国家的官僚体制,需要用以儒家的教育体系改善花郎徒的局限性。因此他在觐见唐太宗时要求参观释奠和国学,旋即建立国学基础。

“国学”这个名称,到目前还没有史料证明在真德女王年代就使用。或许国学在当时未免起步阶段。实际上,金春秋实施照搬唐朝国学的策略遇到不少压力。虽说毗昙势力已被除掉,但朝廷内部还存在反对其改革的真骨贵族,并且他们正面临着三国统一大战在即的严峻现实。在这关键时刻,金春秋与其冒着加深内部矛盾的风险走改革之路,不如保持低调密切关注政局动向。事实上直到其孙神文王时期才完成“国学”得以实施。

真德女王五年新设王宫侍卫府,也就是禁卫军。侍卫府内有三徒,即三个部队。这与真平王时期的侍卫监相比,禁卫军扩充人员和改编规模的力度均很大。这一举措能够提高王权的地位,更能显示强大的武力预防真骨贵族的内乱。上述中提到过利用设置执事部、仓部来掌控经济和财政,那么侍卫府的设立,意味着强化军事力量,做加强王权的有力后盾。这也是金春秋高明的政治手腕。

真德女王五年,新罗的礼部、音声署、大道署、典祀署等有关仪礼的官府机构有大幅度的整顿和完善。音声署掌管音乐;大道署也叫寺典、内道监,管理王宫内寺院;典祀署掌管祭祀仪礼。儒教所推崇的‘礼’在‘乐’中完成,二者不可分离。设立这些官署的同年元月,在朝元殿主持贺正仪礼显示了国家仪礼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国王在朝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新年贺礼。贺正礼是从视觉上展现王权的绝对权利。金春秋接受儒教国家仪礼的目的就在于此。后来自己登基后这种国家仪礼得到进一步强化。

金春秋所推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是为自己登基做新罗国王而做的铺垫。实现王道政治,需要事先做好行政体制上的调整和铺垫,这直接影响执政的成败。此外,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精心挑选亲信安插在国家机关的各个要职,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金春秋的政治策略,是为即将到来的继承王位而准备的应对策略。金春秋的王位继承是件危机四伏的艰难路程。

金春秋登基

654年真德女王驾崩,当时金春秋作为继位第一人选尚为获得真骨势力的完全认同。以此在真骨势力主导的“和白会议”上决定由上大等阙川临时摄政。摄政其实是过渡性执政,是国王年幼或没有合法继承人时采取的措施。然而,选阙川摄政意味着选定继位人的原则尚未出台。

然而阙川固辞摄政。因为他明知无法与当前最具实力的金春秋较量,哑巴吃黄连只好邀请金春秋即位。金春秋的即位加强了“亲唐外交”,更加壮大了以金庾信为首的新贵势力的政治基础。上大等阙川不能无视新贵势力,主动推举金春秋继承王位。金春秋经“三让”之礼后即位。所谓“三让”是古代圣贤的辞让之礼。金春秋“三让”表面上遵循古圣贤之礼,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礼法回复家族荣誉。当年被“和白会议”废黜王位的真智王就是春秋的祖父,而如今让“和白会议”诚心邀请他继承王位,不仅恢复家族荣誉还把自己即位更加合理化。

太宗武烈王即位后,即追封父亲龙春为“文兴大王”、母亲天明夫人为“文贞太后”,确立自己王权的正统性。有关五庙制的成立,过去学界说法不一。有文武王时期创设之说法和神文王时期创设之观点。但追封大王制是武烈王首开先河,从这一点看很有可能是武烈王采取新加五庙的措施,因此即便说是太宗武烈王引进了五庙制也不无道理。

假如真智王未被废黜,那么金春秋的父亲龙春应该会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春秋对此耿耿于怀。按照传统的仪式追封父亲为葛文王之后并不觉得心满意足,索性引进唐朝五庙制,彻底改变新罗宗庙制度的框架。五庙制是供奉在位国王的直系先祖的祭祀仪式。过去真智王和龙春因废黜而未被供奉。现在金春秋先为先祖恢复大王的名誉,继而在宗庙立牌位祭享。这也是金春秋赋予自己血统的正统性、抬高自己身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措施。如果说中古时期王室是通过极具佛教色彩的圣骨仪式来强调他们和真骨等其他血统的区别,那么金春秋则以接受新的儒教仪礼来凸显中代时期王权的力量。

调整仪礼与律令

太宗武烈非常清楚儒教礼制和仪礼具有象征王权的绝对性和核心意义,而且视而可见。如前所述是他最初引进朝见百官的“贺正礼”,又在即位第四年(657年)设立“大日任典”等改革措施中显而易见其所瞄上的政治效果。

“大日任典”下属有典仪、典谒、典引、典事等官职。这些官职便是负责进行各种各样的仪礼。典仪承担告知仪礼的程序;典谒和典引负责引导国王和官员的出入次序。负责王室业务的内省下属引道典中也有上引道、位引道、官引道等担当相关仪礼的职称,所属官员也该是专门负责国家仪礼。配备如此细致的官职官员负责仪礼,说明中代初期的国家仪礼已经相当发达,也说明金春秋引进国家仪礼用它来确保自己绝对权威,且利用得游刃有余。

任何仪礼都是通过具体形式来展现。整个仪礼进行中负责官员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对仪礼程序的熟知程度决定着仪礼的严肃和庄严,也决定着按次序引导国王和官员的行为仪礼行为进行得行云流水。仪礼成为彰显中央王权的重要形式。它是将把中心和周边、上级和下级等权利关系的礼制用视觉化来显示。再复杂的关系,在这里也变得显而易见。严肃地等待,忍受多次反复的“再拜”过程中,中央获得了权威,周边则接受权利地位的上下关系。

以此相同,文武百官的贺正礼也有可能由大日任典负责进行仪礼。凡此仪礼均在王宫朝元殿的中央空间举行。正如“百官”指文武百官,全新罗所有的官员们都聚集到‘南面’的新罗国王面前进行仪式,这标志着新罗国王收罗文武百官。最后,州都督等地方官所呈上奏文转达到国王,中央官员和六部遴选的代表高喊高呼“万岁”,结束庆典仪式。此时在地方,都督等地方官也率领各村主们朝国王方向举行朝拜仪礼。在中央集权国家,往往在王都举行的仪礼也包括地方,这是仪礼所指向的本质。国王行驶绝对权利,仪礼则是向人们展示其权利视觉化的演绎场。

太宗武烈王在即位后,对理方府格六十余条重新法制化,进一步强化律令政治。理方府是真德女王五年时金春秋亲设置的官府,掌管刑律与立法。在文武王七年(667年)扩大重组为左、右理方府,这歌机构是支撑中代王权的核心

官署。“理方府格”是引进唐朝律令格式来完善既有新罗律令的措施。在唐朝“格”,是指发生问题而难以适用现有律令时,由皇帝颁布“敕令”制定新的原则,当中挑选具有恒常性的原则以法典形式整编成册。“格”超越了低于律令下位法的性质,相对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太宗武烈王金春秋推行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以法律维护改革的信条。这一点从两个方面可知:一方面完善现有的律令,重新改编“理方府格”;另一方面文武王二十一年(681年)“遗诏”中还有指示革新“律令格式”的内容。这些足以证明中代初期金春秋加强法律建设的程度。事实上,当时新罗的律令统治体制相当成熟,达到了即借鉴唐朝律令同时还根据新罗国情调整内部条规,灵活运用法律。可见金春秋不是盲目照搬中国文化,而是基于新罗国情创意地接受和运用。

太宗武烈王即位第二年(655年)册立法敏为太子,再给自己诸多儿子赐予高官,进一步强化王权的稳定以及王室权力牢固。656年,二子仁问游唐归来便任命其为军主;658年,又任命儿子文王为执事部中侍,以此构建了由直系亲属统治的体制。660年,赐予亲信金庾信为上大等,为王权专治化构建基础。

金庾信身上有加耶血统,这在注重血统的新罗可谓政治瑕疵。但太宗武烈王大胆任命金庾信为上大等,这就意味着上大等作为贵族势力的代表已丧失其核心功能,逐渐依附于中代王权。随即,以往以上大等为核心的贵族联合体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与此相反,在新罗中代体制下国王任命的宰相和处理国王出纳和掌管个官府的执事部的权限相对强化了。太宗武烈王正是通过亲唐外交,把唐朝当做后援势力;在内,通过启用自己的儿子和金庾信等亲信势力稳定王权之后,终于发动了西征百济的战争。

百济·高句丽 灭亡与三国统一

罗唐联军攻击与百济灭亡

659年10月,唐朝决定出兵远征百济,且严密封锁出征消息。不仅不向新罗通报,并且阻止金仁问和当时来唐的倭使归国。唐朝正式向新罗通报出兵消息是在660年3月末,这时唐军紧锣密鼓地做好了出兵的准备。同年6月8日,唐朝13万大军从莱州(现山东省蓬莱)出发向百济进攻,满载唐军的1900艘船首尾相接,鱼贯千里。

太宗武烈王也率领五万新罗军配合唐军而出征,但他没有立刻进攻百济泗泚都城,而是到新罗北部南川(现京畿道利川)先扎营。这是一方面为便于跟唐军联络而另一方面阻碍百济防御主力而采取的迂回战术。6月21日,太子法敏在德物岛(现京畿道德积岛)迎接唐军司令官苏定方,约定分海路和陆路进军,7月10日在泗泚都城的南部会合。

唐军在新罗水军的带领下沿着沿岸航路南下南阳湾后,绕过泰安及安眠岛,7月9日进入锦江河口伎伐浦。太宗武烈王军队经沙罗之停(现忠北清州)南下,停留在今突城(现庆北尚州),金庾信率领的五万新罗军越过通往百济的要

塞——炭岬。为攻打位于锦江中游的泗泚都城,唐军从锦江河口伎伐浦沿着干流逆流而上,而新罗军则从锦江上游越过炭岬进攻泗泚。炭岬和伎伐浦是通往泗泚都城的重要关口,罗唐联合军到这里却看不到百济有任何防御措施。结果,在660年7月初,新罗军和唐军共有十八万罗唐联合军突袭百济。百济起初并没有察觉唐朝出兵计划,现在发现敌人攻打进来也没能好好应对。

百济在唐军抵达德物岛后才知晓遭到进攻,忙不迭地准备对策。但罗唐联军直取泗泚城的战略以及水陆两路夹攻和奇袭令他们惊慌失措、措手不及。



图2 罗唐联军进攻百济图

百济义慈王执政后期因强化王权政策而与贵族产生矛盾,使得国内政局极为混乱。因此在罗唐联军逼上门口了,仍在争论不休拿不出对策。百济面临大战束手无策,在黄山伐交战中百济将军阶伯和5千敢死队顽强抵抗,直到壮烈牺牲也没能延迟百济灭亡。

临战之际,义慈王派佐平等最高官僚和王子们去向唐军致歉文,并送上财物和食物笼络唐军,哀求唐军撤退,但这一切都被苏定方拒绝。泗泚都城被四支军团包围,沦陷在眼前。7月13日夜晚,义慈王逃到熊津(现忠南公州)想在那里整顿队伍抗击敌人。不料熊津方领袖寔进投降唐军,在7月18日也被唐军活捉,投降。7月29日太宗武烈王抵达泗泚城,8月2日义慈王在王子和群臣目视下亲自向太宗武烈王和苏定方献酒,亡国君主的悲哀在百济贵族的痛哭声中淹没。700年百济社稷不堪一击,仅就几天的功夫被摧毁。9月,苏定方押着义慈王、王族、大臣以及百姓1万2千余人凯旋而归,留下1万唐军与7千新罗军驻守。

消灭百济复兴运动

百济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军事上劣势不如说是中央政权惊慌失措、坐以待毙的结果。然而,战争只有在泗泚城和熊津城等百济的中心地区展开,因此其余大部分地方的军事力量基本保存得完好无损。所以说罗唐联军和百济的战争,并没有因义慈王的投降而结束,反而自那时起重新开始。泗泚城被沦陷以后,相当激烈的百济复兴运动一直持续三年。

百济复兴运动是起初是自发的、无组织形式的运动。百济人面对唐军的掠夺和杀戮,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后来组建以福信和道琛等核心领导层以后,开始具备比较系统的组织形式。福信将把避难到倭国的百济王子夫余丰迎回来拥立为王,并请求倭国的协助与支援。对此,倭国派了3至4万名以上的士兵等,毫不吝惜地提供物资和人力的支援。

百济复兴军兴起大部分是从自己出生地或者或者势力根据地或者是上任管辖区,正如黑齿常之和福信在故乡聚集势力抵抗唐军。义慈王投降当时,百

济尚有5方37郡200城的地方组织不战而降,其地方势力没有完全崩溃。很多地方官以自己管辖的方城、郡城为中心起兵加入复兴运动。驻扎在泗泚城的唐军在复兴军的猛烈攻势下多次被孤立。初期复兴运动从百济西部和北部地区兴起,到661年已经扩大至百济东部和南部地区,收复城邑达200余座,其活动领域扩散至全国。复兴军首领道琛怱唐军归去,甚至嘲弄唐军说“你们何时归国?”。百济复兴运动的气焰高涨,使得唐朝不得不选派增援兵,文武王也亲自率新罗军迎战百济复兴军。

罗唐联军对战百济复兴军是在662年7月,新罗军开通熊津道,为唐军解围之后。而此时复兴军内部因领导权问题出现了矛盾,道琛被福信杀害。谁主复兴



图3 百济复兴军的主要根据地图

军的掌权问题一直不断,后来夫余丰和福信之间的也出现意见相左,最后在663年夫余丰处死福信。复兴军由于内部矛盾,部分人向唐投降而另一部分拒绝与夫余丰会合,因此其势力迅速减弱。百济南部平原地区生产农作物,复兴运动初期因得到南部物资供应,但后来南部逐渐被新罗占领,加上倭国军粮支援也断了,复兴军后援物资愈发不足。

百济周留城是复兴军的重要根据地。663年7月,就在周留城与罗唐联军对峙。新罗文武王率领金庾信等28名将军,为此战倾注了全部军事力量。罗唐联军制定了绕过水陆要塞加林城(现忠南林川),直攻周留城的战略。文武王率领的新罗军和刘仁愿、孙仁师率领的唐军联合从陆路攻打周留城,以刘仁轨和杜爽、曾是百济太子的夫余隆等唐军为主力从水路逼向白江口(现锦江河口)。

周留城内复兴军向高句丽和倭国请求派兵支援。高句丽为预防唐军袭击自卫家园没有派兵。而倭国派了支援军,组成百济、倭国,即百倭联军对战罗唐联军开展了一场大决战。663年8月18日,罗唐联军彻底包围周留城。8月27日,唐水军在白江口和百倭联军交战,歼灭400艘船,获得大胜。丰王仓皇逃到高句丽。罗唐联军乘胜气势继续攻打周留城,于9月7日攻陷。罗唐联军从熊津联合起兵,开战不到50天便消灭百济复兴军。当时出逃的复兴军和百济流民很多逃到倭国。

此后,新罗以镇压百济复兴军为名目将势力扩大到百济全域。唐朝派使杜爽向新罗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开会盟划定新罗与百济界限。新罗还是以彻底消灭百济复兴军为借口拒绝会盟,随着复兴军基本被镇压,新罗亦无法坚持拒绝会盟。唐朝于665年8月任命夫余隆为熊津都督,在就利山与文武王会盟,强化了唐朝对百济境域的统治权。

攻陷平壤城与高句丽灭亡

百济灭亡的第二年(661年),唐朝立即派远征军包围高句丽平壤城。这次派军采取海路进攻的策略,从前是经过辽河进攻高句丽。唐军因急功近利多次被

反遭包围,危机时刻新罗军北上攻大高句丽,为唐军解围并提供粮食和物资,唐军才得以安全撤退。当初金春秋和唐太宗能够对‘先灭百济’的战略达成一致的心理原因就是实现唐朝东征直取平壤城。百济的灭亡着实给高句丽防线带来极大的威胁。

中国隋炀帝或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后援没有得到保障。从辽河到平壤城的长长战线上,如果没有充分的粮草供应,这等于是战略上致命弱点。现在情况不同,罗唐联军一举消灭了百济,并且在高句丽南边有新罗这个坚实的军事基地。在新罗的军事和粮食援助下,可从南北两侧攻打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城。除此之外,因为有了新罗支援军粮,即使在冬季作战也变得高枕无忧,因此唐朝打出了长期战的战略方针,准备耗尽高句丽战斗力而作战到底。

战争局势对高句丽十分不利。加上高句丽王渊盖苏文于664年10月去世,其内政也出现了混乱和危机。渊盖苏文曾发动政变杀掉荣留王之后掌握的政权,因此没有相对牢固的政治基础,始终处于薄弱的状态。他不相信别人,只相信儿子和亲族等有血统关系的人。因此中央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儿子们身上。渊盖苏文一死,他的儿子们开始围绕着王权展开明争暗斗、你死我活,这一点渊盖苏文本人是未曾预料。渊盖苏文弥留之际留下“兄弟间要鱼水同心”的遗嘱,但遗嘱对被权利欲冲昏了头的儿子们那里毫无用处。长子男生在出去巡逻期间,弟弟们造反夺走了他的权力。男生一气之下带领国内城和10万户投降唐朝,后来在666年9月成为唐军的马前卒出战。高句丽内讧不断,影响了其他将领的意志,防守比列忽地区(现咸南安边)的渊盖苏文之弟渊净土也在同年12月举十二城投靠新罗。比列忽地区十二城指江原道北部和咸镜南道南部一带,渊净土的投降给罗唐联军开出了东部战线,现在也可以从平壤城东部攻击了。

高句丽因长期战争而疲惫不堪,再加上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和叛乱,过去强大的军事力量自行瓦解了。667年9月趁高句丽内乱之际唐军发动总攻,辽东的新城随即攻陷。到第二年(668),罗唐联军不费吹灰之力陆续攻占扶余城、比列忽、临津江等,长驱直入逼近平壤城。同年9月高句丽被灭亡,消失在历史舞台。

平壤城战役中新罗军的功劳极大。攻打平壤城最重要的战役是蛇川之战,

蛇川乃平壤城外部防线之一。卑列城州行军总管金文颖等在蛇川野外交战高句丽太大莫离支男建率领的军队,开展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时共同作战的唐朝士兵被敌军阵势吓倒,丧失战斗力而畏缩不前。金文颖的新罗军与高句丽军队顽强对战,毫不退让。比如大幢地区少监本得表现异常勇猛,为胜仗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时唐军一直观战,直到新罗军已获胜才装模作样地参与战斗。此次战役中包括韩山州少监金相京等众多将领战死。另有牙述人沙湊求律参与蛇川水战,虽立战功但因违抗军令、误闯险地而未获认可。以此看出新罗军严明军纪。

蛇川之战大获全胜,为攻陷平壤城打好桥头堡。此后,斧壤人仇杞所带领士兵攻下平壤城南桥;围护平壤城的周边小城也被比列忽人世活所带领的部队逐个攻陷,平壤城的外部防线完全崩溃。另有誓幢幢主金遁山破坏平壤城外的高句丽阵营,逼近平壤城。如此战局的优势完全倒向新罗军。随即黑岳令宣极攻平壤城大门,南汉人北渠军攻平壤城北门。曾被誉为铜墙铁壁的平壤城此时在勇猛的新罗军面前再无回天无术了。高句丽军主述脱被韩山州少监朴京汉所杀。

平壤城战役中新罗地方出身的将士表现勇猛,功劳极大。这说明文武王对地方人的待遇和政策适当而有效。实际上新罗王权已经准备好包括百济·高句丽遗民的三国遗民整合政策。平壤城虽被攻陷但仍有高句丽残余势力在地方进行抗唐斗争,一度兴起重建高句丽王朝的复兴运动。高句丽复兴运动将会成为新罗与唐朝之间战争的重要变数。

爆发罗唐战争

668年,高句丽灭亡。罗唐联军强攻猛击之下高句丽虽已消失,但新罗对此无法过于高兴。在这之前的663年唐朝把新罗境域命名为“鸡林州”,封新罗王号之外,还加封文武王为鸡林州大都督。很明显,这是把盟国新罗当作归属唐朝的一个地区。新罗不能只相信金春秋和唐太宗所签订的口头密约,即“平壤以南的

百济土地全部归新罗”,一味地等待或者坐以待毙。事实上高句丽已被灭,唐朝东征下一个目标就是新罗,这一点明若观火。

与此相关,新罗在668年至700年间向日本派遣使臣多达25次,令人关注。第一次派遣使臣约在高句丽灭亡前一个月。此时倭王也在担心罗唐联军的攻击倭国,所以格外欢迎来使,还向文武王和金庾信赠送船舶和绸缎等各种礼物表示友好。因此新罗和倭国结束了660年以来的两国交战关系,恢复了邦交。

新罗和高句丽恢复邦交,符合两国的利益。新罗在高句丽灭亡之前派遣使者,是为应对将来要发生的对唐战争,拉拢倭国联合抗唐的外交策略。因为消灭百济、高句丽且占领该地区的唐军正气焰高涨,兵力无比强大,对新罗来讲是难以应付的对手。假如连倭国也站在唐的立场,那么新罗的存亡就难以保障。第一次向倭国派往使臣后,新罗向倭国派遣大阿湊以上的真骨贵族或高层人士,每次都送上厚重的礼物。总之,在对唐战争爆发之前,新罗已做好万般准备。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新罗面对即将爆发的对唐战争感到不安与恐怖。

668年,唐朝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地区归属为自己的领域。高句丽灭亡后,百济领土的归属问题成为焦点,罗唐间矛盾也为此浮出水面。此时的新罗公然进攻百济领地,收复百济土地,同时收容高句丽复兴军,扩大兵力对抗唐军。终于在670年3月,由新罗将军薛乌儒和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将军率领的二万部队联合起来跨过鸭绿江,攻打驻扎在乌骨城的唐军前哨部队靺鞨骑兵。从此,长达7年之久的罗唐战争正式打响,而新罗先攻击唐。曾经是一个弱国的新罗能够先发制人,这里面隐藏着与罗唐战争有连环关系的西域“土蕃(现在的西藏)”问题。

罗唐战争的过程和新罗的胜利

660年以后,唐朝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了百济与高句丽战线,而此间在西域有土蕃急速发展壮大,其势力逐渐压过亲唐的吐谷浑兵力,控制了丝绸之路。669年9月土蕃突袭天山南路。第二年唐朝不得不把薛仁贵率领的驻韩半岛兵力调



图4 新罗对唐朝战争图

回增援土谷浑战役。因此辽东或韩半岛北部地区的唐军大大削弱。670年3月新罗军的作战半径扩大到鸭绿江以北的乌骨城。同年7月薛仁贵所率领的10万唐军在大非川(现中国青海省共和县附近)和吐蕃军交战,被吐蕃全部歼灭。趁这时机,新罗已控制了大部分原百济领土。唐朝虽派来增援反击,但基本没能起到作用。672年新罗在泗泚城设立所夫里州,宣布百济领土已归新罗。新罗是在改编地方行政体制来强化了对原百济领土的控制力。

671年7月唐军攻下高句丽复兴运动中心安市城,先稳定了辽东地区。672年4月吐蕃派遣使节到长安见唐高宗和武则天(武后)讲和之后,两国关系得到和解。旋即唐朝派全部兵力赴韩半岛。672年7月抵达平壤安营扎寨,准备和新罗决战。此前,新罗军继续北进在黄海道地区与唐军发生激战。开战初期,在载宁战役中新罗获胜,但随后的石门(现黄海道瑞兴)战役中,被高侃率领唐精锐骑兵大败,几乎全军覆灭。从金庾信赶走其生还的儿子一事中,可以看出此次溃败给新罗朝野带来的打击程度。同年12月,唐军又攻陷了高句丽遗民守卫的白山山,连前来救援的新罗军一同被击溃。此后新罗军从全线后退,在要塞地区修筑城墙抓紧防御。因此双方在临津江流域展开了拉锯战。

直到673年冬,唐军持续不断地攻打新罗。但在673年12月,吐蕃煽动东突厥等天山地区各个部族封锁天山北路,唐朝不得已再次调回兵力。为此罗唐战争暂时处于停战状态,直到675年2月。唐朝于670年被吐蕃夺走天山南路后,想利用天山北路,但此时北路也受到威胁。于是把全部兵力投放到这里加强防御。此事对于新罗来讲是天赐良机重整旗鼓。

新罗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肃清朝廷内亲唐贵族,笼络高句丽、百济遗民。不仅向高句丽、百济贵族们颁发官爵,还封高句丽王族安胜为“高句丽王”,率领高句丽复兴军和本地区居民迁至益山金马渚生活,允许自治。新罗一边在笼络高、百遗民,一边扩充长枪部队(长枪幢)、连弩部队(弩幢),还在唐军必经的路口修筑坚固的山城,准备和唐军打持久战。

675年1月,吐蕃又派使节到长安向唐朝要求和议。同年2月,唐军再次攻打韩半岛。刘仁轨率领的唐军南下至临津江以南,攻下七重城并将其作为前进基地,随即攻下了买肖城(现京畿道杨州)。但在675年,新罗军在买肖城大破唐军;第

二年在锦江河口伎伐浦与唐水军交战,结果唐军基本被剿灭,此番战争最终以新罗军的胜利而告终。

唐高宗在676年以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韩半岛的统治意图,不承认新罗占领大同江以南地区归属新罗。因此追封高句丽、百济王孙为“高丽朝鲜郡王”、“百济带方郡王”,令他们生活在自己故国首都,伺机借助他们的力量再次攻打新罗。实际上在678年9月,唐高宗试图再次攻打新罗,但因征伐土蕃这当务之急而未能实现。

上面提到过,唐朝在征伐吐蕃的大非川之战中惨败而放弃了安西四镇。在678年为收复失去的安西四镇又派十八万大军再次与吐蕃作战,不料再次大败。无奈之下,唐朝决定暂且对吐蕃采取防御战略。从高宗后悔说“过去东征高句丽、渡百济、频繁派兵耗费国家财力”的内容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财政的困难,这直接影响东征新罗的战略。

而新罗为迎战唐朝军做出了万般准备,但因唐朝处于即征吐蕃又来伐新罗的两难之境,因而实际上没发生大规模交战。也因为如此,新罗在这场战争中可以采取极其有利的战略。事实上,罗唐战争和土蕃和唐朝间的两条战线双向交叉,如同齿轮般咬合在一起处于半离合状态。罗唐战争中新罗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能够获胜,在其诸多原因中积极利用土蕃战况的外交手段占很大比重。唐朝连连被土蕃捆住手脚、被新罗击败的情形之下只好放弃一统世界的野心。不仅如此,唐朝溃败及其影响面波及到戈壁滩。直到7世纪80年代突厥帝国再次复兴,很快就统一了游牧世界。而在696年,中国东北辽西一带的营州(现辽宁省朝阳)地区发生了契丹族酋长李尽忠之乱。尤其是李尽忠之乱,为高句丽遗民重新崛起建立渤海国提供了绝好机会。

对唐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回顾历史,在中国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导致中国版图分裂近300年。但自七世纪隋、唐统一后,在东亚地区掀起涡流欲以重新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就拿唐来说,630年,征服东突厥帝国;635年,征服吐谷浑王国;646年,征服薛延陀接受蒙古高原许多游牧民族国家降服;640年,消灭高昌国后把势力扩张到土耳其斯坦一带的诸多内陆亚细亚国家。而一直拒绝臣服于隋、唐世界秩序的百济和高句丽也分别再660年、668年被唐朝征服。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隋、唐帝国出现后,在东亚形成了“一元化的世界秩序”。但这只是重复隋、唐所标榜的主张而已,是不够全面的判断。所谓“秩序”是强加于周边国家的,是周边国家拒不认可的。实际上,隋、唐建立后到罗唐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东亚历史是战争不断,很多周边国家和部族在强大的隋、唐势力面前或者屈服、或者被消灭。接连不断的战争时代不应该描述成确立世界秩序的时代。况且,当时尚有一些反对唐一统世界、强烈挑战的周边国家也依然存在。这一点从发生在东北亚地区罗唐战争、西域地区土蕃与唐的战争中可以得到证明。此外,突厥、土蕃、维吾尔、南诏等逐渐强盛起来的周边部族,轮番威胁唐帝国的所谓“世界的连环性”也已然存在的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

过去学界只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过程,即过渡期的现象便断定了已确立世界秩序。这种观点相当于没有同等看待构成世界要素“中心”和“周边”,而偏向“中心”以偏概全。众所周知,五至六世纪的东亚国家相对保持了“中心”和“周边”的势力均衡,七世纪以后的东亚秩序也基本维持了均衡关系。可以说,渤海国的建立标志着这种势力均衡的具体化,而这一过程中新罗的三国统一,尤其是在罗唐战争中打赢唐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罗唐战争是隋、唐东征高句丽而发生的冲突的继续,在古代东亚世界秩序的确立中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换句话说,新罗的三国统一的意义不应单纯从新罗消灭百济、高句丽一地点上考虑,更应该从遏制以“中国”自居的隋、唐一统世界的野心,引领“中国”与周边国家世界共存的新国际体制来判断才可。

中代统治体制和治国原理

反思“王权专制论”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新罗的中代是鼎盛时期,此时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其认为中代是“以王权专制化来压制贵族势力;通过太子制度稳定武烈王血统的王统。还重组政治机构来完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扩大作为国王秘书机关的执事部的机能,再把地方(包括占领的地区的)领土改编为九州五小京,完善了中央集权统治。结果,相继出现了圣德大王神钟(艾米列钟)、佛国寺、石窟庵等体现统一新罗时期灿烂文化的不可朽作品。”

上述新罗中代的“王权专制”的形象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不需要任何怀疑。然而一个国家向王权专制化以及中央集权化发展并加以完善,果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当我们认为真骨是压榨百姓的权力机构时,集权于一身的国王是成为保护百姓的守护者了吗?此前我们一直认为新罗的政治结构用以“王权对臣权”来过分简单化,而且还认为这是国家发展的必然、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金春秋接受唐朝援助,建立罗唐联军消灭高句丽、百济,完成了三国统一的

大业。但在国内政治来讲,王权的专制并没有按照他多希望的方向发展。新罗国家要维持下去,仅仅王权还需要真骨势力的协助,而且是绝对的。新罗如同一座大厦,建立在国王和真骨势力共同统治的基础之上,因此不管是真骨的专横还是王权的专制,都有可能成为对新罗国家政权的威胁。

然而在另《三国遗事》的时代划分中,将把金春秋及其血统承接的时期归划为“下古”。明显这与《三国史记》的时代划分不同,它没有把金春秋及其血统统治时期特化为新罗“中代”,而归属到走向下坡路的新罗“下代”。这表明针对新罗历史有不同的史观。或许对新罗人来讲,“中代”可能不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新罗乡歌中有一首叫《安民歌》,这首歌是当时著名的乡歌作家忠谈师献给景德王的歌谣。新罗乡歌是借用中国古汉语的音和训来标记的“乡扎”形式记录下来,因此不易看懂。根据韩国国语学界对《安民歌》的解释,它是利用反语的手法表现了“民之不安”的社会现实。从这一例中也能探知一些当时新罗的真实状况。

我们所见不到的,但新罗人切身体会的“中代”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我们看浮雕,它仅凸显一面,聚焦之处肯定华丽无疑。但我们也无法了总是处在阴暗的浮雕的背面或者里面将是如何?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金春秋及其王权统治过程之外,尚无法展现新罗时期的整体形象,只有把“中代”王权所塑造的浮雕中光与影子全部放在视野之内时,才能完整地了解“中代”社会。

金钦突之乱

676年,文武王驱逐唐军后尽量减少与唐朝的正面冲突,为维持和平关系而做了不少努力。首先新罗实际已占有了大同江以南原高句丽领土,但为了避免给唐朝刺激,在汉江以北地区没有及时实施郡县等行政规划和支配。其次新罗多次派遣使谢罪并要求与唐恢复两国关系。但唐朝始终没有承认新罗政权,一再伺机发动侵略。

文武王为镇压倭兵而修建感恩寺,但在他生前未能修完,临终留下遗言说

“葬礼在东海大石上举行,我死后要变大龙,护佛卫国”。这件事从一方面说明当时新罗的处境,除了唐在伺机入侵之外,还有倭国也频繁挑起纷争使得新罗受两面夹攻,令人十分头痛。总之,经历罗唐战争之后,新罗的对外关系变得极其不安,如坐针毡。

那么,新罗的内政又如何呢?罗唐战争过程中,文武王出于防止内部分裂,强化王权的目的对真骨贵族势力以“付唐辈”或“逆贼”的名目进行大规模的肃清运动。这是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是以战争为借口除掉政敌真骨势力。眼看含冤而死同僚的贵族虽有不满,但在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越变越强的王权面前只能缩手缩脚、屈服于王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愤懑情绪越发严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681年,文武王去世。神文王即位不久便诛杀了自己的岳父金钦突,罪名是图谋逆反。不仅如此,还命斩杀所有受牵连的众多贵族,包括主谋连同下层参与者也没有放过,斩草除根。甚至对当时兵部令金军官及其儿子以知情不报为名下令自尽。

神文王处决金钦突之乱后,颁布国书谓“国丧中不料发生叛乱”云云,似乎对金钦突之乱事前一概不知而感到无比震惊。然而我们从其即位后,按部就班地收拾叛乱、斩草除根的一系列举措中,不难看出神文王即位之前已经对逆谋有所了解。反而可以说,神文王为提前肃清真骨核心势力,确立专制王权而利用金钦突逆谋。

即使是国王的岳父也不可能抗拒王权。金钦突之乱中可推知当时王权与真骨势力间你死我活的矛盾。朴、昔、金三姓交叉掌权的现象看,新罗国家尚未有特定家族确立一个神圣的权威,独占权利,维持排他性统治地位。这一点在新罗灭亡之际,朴氏家族重新掌握王权的事实中也得到证实。自法兴王以“太王”称号进一步强化了王权之后,虽作为能继承王位的神圣的家系而出现了“圣骨”仪式,但正如真智王被废所表明,新罗王权仍然无法轻视“大等会议”这个代表真骨势力的组织。

中央集权体制与引进宰相制

开创中代王权的金春秋一直为摆脱真骨势力、削减真骨权势而处心积虑。前面也提到过,他所推行的亲唐政策并不是单纯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引进唐朝先进的儒教政治理念和礼制、仪礼,以此来强化王权,这应该是本来的目标。后来善德、真德女王即位后,出现了一些“国相”、“宰相”等新的官职名称,也跟上述想法不无关系。当年金春秋赴唐觐见太宗时,他的正式职位是“国相”。

在新罗,国家大事均由大等们的和议表决,这被称作“和白”。“和白”会议一般在南堂、政事堂以及被视作神圣之处的四个灵地举行。六世纪前期为止,所表决的内容都以国王和大等共同名义来颁布全国。而自法兴王十八年(531年)设上大等职能机构后,在大等会议上表决的内容由上大等上奏国王,然后国王对上奏内容进行最后裁决,再下赐或颁布。这种国事裁决程序基本定型。然而到了金春秋执掌政权的中代时期,由“上宰相”代替“上大等”支持“和白”会议,显然出现了变化。

这种“宰相”的制度来自唐朝。“宰相”一般指辅佐天子,统领百官,治理国事的职位。后来高丽继新罗建立政权后,也承接了宰相制。高丽时期的“宰相”职责也是商议政事,制定政策。这意味着“宰相”职能是通过自由议论国事、向国王提建议或接受国王的咨询,以此来辅佐国王最终决策,维护国王的绝对权力。新罗国王分别任命上大等、兵部令、侍中、内省私臣(殿中令)等为“上宰相”(1人)、“南北相”(2人)、“第三宰相”(多名)。由此可见,金春秋所引进的“宰相”制度是一种政治改革的措施,其目的便是加强王权的影响力。国王任命“宰相”,而宰相会议的议案从原则上须获得国王的御裁方能施行。很明显,三国统一后朝廷的任命权和决策权集中到国王的手中,王权无比强化。

任命高级官员为“宰相”的这套行政制度有效地改善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行政体系。中代时期王权以宰相任命权和国政最策权决为基础,钳制真骨贵族,正式启用了新的国家运营体系。“宰相”与过去的和白会议的成员“大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等”采用的是真骨权门共同推荐后,再由国王追认的形式。也就是说,“大等”具有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性,而“宰相”职位是国王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的官职。

“一统三韩”意识和包容高句丽·百济遗民

统一三国的完成给新罗人带来极大的自豪感。金庾信玄孙金长清在《金庾信行录》中,记录有673年金庾信临终前对文武王自信地说的话:“三韩成为一家,新罗虽未至‘小康’即太平,但已实现了社会稳定”。始建于神文王六年(686年)的清州市中出土的新罗寺迹碑碑文中也有“合三韩而广地”之句,也说明新罗人的自豪心里。

这里所说的“三韩”与马韩、辰韩、弁韩的历史无关,指的就是合新罗、高句丽、百济形成的“三国”之意。可以说形成“三国”的概念经历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最重要的是,隋唐帝国向东扩张,东征政策引发了对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认知,了解到了三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这一历史真相。当时的罗·丽·济三国在血统、文化上相差无几,远没有达到被划分为不同民族(ethnic



图5 清州云泉洞寺迹碑

group)的程度。且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也会屡屡发现此三韩在语言、血统、风俗上类似的记录。总之,中国人认为三国是性质相同的国家群体而统称为三韩或三国。651年,唐高宗在寄百济义慈王的国书中也用了“海东三国”一词,又用“三韩”来标记。

最初作为不同的古代国家而建立起来的三国,在经历无数次的相互间政治反目、战争的过程中,出现了对立意识的及其高涨的局面,很少有共同体意识或纽带感。这种三国对峙的局面终于在七世纪后期出现转折,迎来了被升华为同一历史共同体的历史时期。首先,高句丽、百济国家的灭亡成为了直接原因,丽·济遗民被合并到新罗成为一国国民。其次,当罗唐联合军消灭百济、高句丽后,唐朝对新罗虎视眈眈,欲以收服。此时,新罗一方面不惜与唐发动战争,而在另一方面施行了“民族包容政策”引导三国百姓抵抗共同的敌人唐朝的战略。这一点成为了三国之间有机融合、统一的直接契机。

660年,太宗武烈王消灭百济之后,任用百济人才为官各尽所能、人尽其才。后来文武王亦沿用这种包容政策。新罗消灭高句丽后随即面临与唐朝战争,于670年新罗联合高句丽复兴军在乌骨城对战唐朝先头部队取得胜利。乌骨城战役的胜利足以说明新罗所施行的采纳高句丽人才的包容政策行之有效,大放异彩。在文武王十二年(672年)8月新罗军与高句丽士兵协同作战,无数次打败唐军,获得了大量战果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

文武王为提升新罗王权的神圣地位做不少努力。先是把先王武烈王的庙号定为与唐太宗相同的庙号,称为“太宗”,又册封高句丽王族安胜为高句丽王(后称为“报德国王”)。以此显示其为率领诸侯国的中心国之君主。此外,朝廷中设立左、右司禄馆,实施禄俸制,稳定了辅佐王权的头品官僚阶层的经济基础。头品是被真骨贵族联合体势力所排斥的底层。文武王大量吸收头品阶层人才安排到国家行政体系内,施行了一系列革新政策。

不仅如此,还向百济、高句丽贵族和各地方势力赐予新罗官衔,即抚慰遗民又统摄遗民势力。过去新罗制度来看,中央政权仅对王京六部出身的人赐予京位官衔,对于附属的地方人赐予外位官衔,这是一种具有歧视意义的二元官衔制。但是,随着三国间战争愈演愈烈,为唤起地方势力的积极参与和响应,一改

过去的制度,对于战事有功的地方人赐予在京官位,令其居住都城的事例也逐渐增多。到了文武王时期,在对唐战争之际为笼络百济、高句丽遗民以谋求更为强大的国家力量,向丽·济遗民也开放了在京官位。凡此种种,文武王最终取消外位官衔,将官衔制和在京官位合二为一。统一管制,不分三国,这就标志着原有王京六部的核心权威被解体,更是意味着统一后的三国国民同为新罗臣民。

新罗政权尤其对百济、高句丽的僧侣和舆论阶层特别关注,格外厚待。逐渐掌握各地区的山川祭祀等活动,祭祀权归属到中央政府。这是考虑到僧侣和山川祭祀活动有可能成为集结地方势力的据点,因而先行控制,以免后患。这些措施集中体现了新罗的京位一元化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即中代王权的政策方向。

设立国学与中央官僚机构的革新

神文王即位后,继承太宗武烈王和文武王的政策。同时为强化王权实施了更为大胆的政策。神文王即位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以“逆反”为名除掉自己岳父金钦突势力。这是杀鸡给猴看,不容许任何人敢对王权挑战。由此开始神文王不断推出加强王权的政策,调整了原有权力结构。神文王在制度上设计并完成了统一后的新罗体制。

神文王在即位第二年(682年)创设了国学。其目的是以儒教政治理念为基础进行人才教育和培养官僚。事实上,国学早在金春秋执政时期就已开始准备,直到这一时期才实现。国学是头品阶层能够步入政坛的捷径。六头品强首和薛聪为开辟此路径作出了极大贡献。尤其是薛聪,他完成书写文字“吏读”帮助新罗施行文书行政体系;又在“九经”文献中添加“口诀”为儒家经典的韩国语教育奠基了基础。

薛聪的《花王戒》中说“治理花国的花王牡丹起初喜爱玫瑰,后又看到老姑草忠诚的样子而内心产生了矛盾,最后被老姑草恳切的忠言所打动,崇尚正直的道理”,婉转地表现了自己希望神文王能摆脱真骨体制,完成以官僚制为基础的

统治体制的愿望。也从侧面展现了头品阶层渴望在政治上的发展。

新罗在统一三国后,为统治增大的领土和人口而急需完善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组织。神文王设立位和府、工匠府、例作府等,均按照中国的六典组织来对中央政府进行体系化。即位第五年(685年),在各官府内设了负责行政业务的舍知。舍知与文武王时期所设最低级行政级别“史”一同完善了令、卿、大舍、舍知、史这一行之有效的五等级官僚体系。大舍以下负责实务的行政官僚均由受过国学教育的头品阶层来充员。

九州五小京与天下观

新罗占领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后,重编州、郡、县。起初使用的“州”的行政单位指新罗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设立的军政性质的地方机构。随着统一战争结束“州”变成了行政直辖单位。神文王五年(685年)设立完山州(现全罗北道全州)和清州(现庆尚南道晋州)两个州后,基本完成了国土规划,共设有“九州”。

新罗逐步向北扩张领土,即跨越小白山脉、汉江成为韩半岛霸主的过程中,首都所在地也随之被推移至国土东南端。为弥补这一不均衡的局面,从智证王时期推行了在首都以外地区设“小京”统管全国的方案。除了原有的金官小京(现庆尚南道金海)、北原小京(现江原道原州)、中原小京(现忠清北道忠州)之外,在神文王五年(685年)增设西原小京(现忠清北道清州)和南原小京(现全罗北道南原),整備完善了“五小京”制。然后统一部署中央贵族和原加耶、百济、高句丽等国的贵族们迁移到这些小京去生活。由此形成了地方政治、文化中心。

新罗行政制度将其全域分作九州,这是借鉴中国夏王朝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而作。从中可以看出新罗政权的一统意识和天下观。在原三国领土中,神文王有意安排各三个州,显示现在的新罗帝国是整合原来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形成。神文王整编九州具有“新罗平定三国”和“三国交融,成为一统天下”之意。不过,整编后的新罗九州版图中不包括过去归属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新

罗帝国封高句丽王族安胜为“高句丽王”令其定居于益山金马渚，网罗高句丽王室为其诸侯国。

上面提到过新罗王室对“一统三韩”无比自豪，因此把金春秋的庙号称为“太宗”。唐朝皇后武则天于神文王十二年(692年)派来使者指责说：“你们的先王金春秋和我们的太宗文皇帝使用同一庙号，这是极为逾份之举。必须尽快改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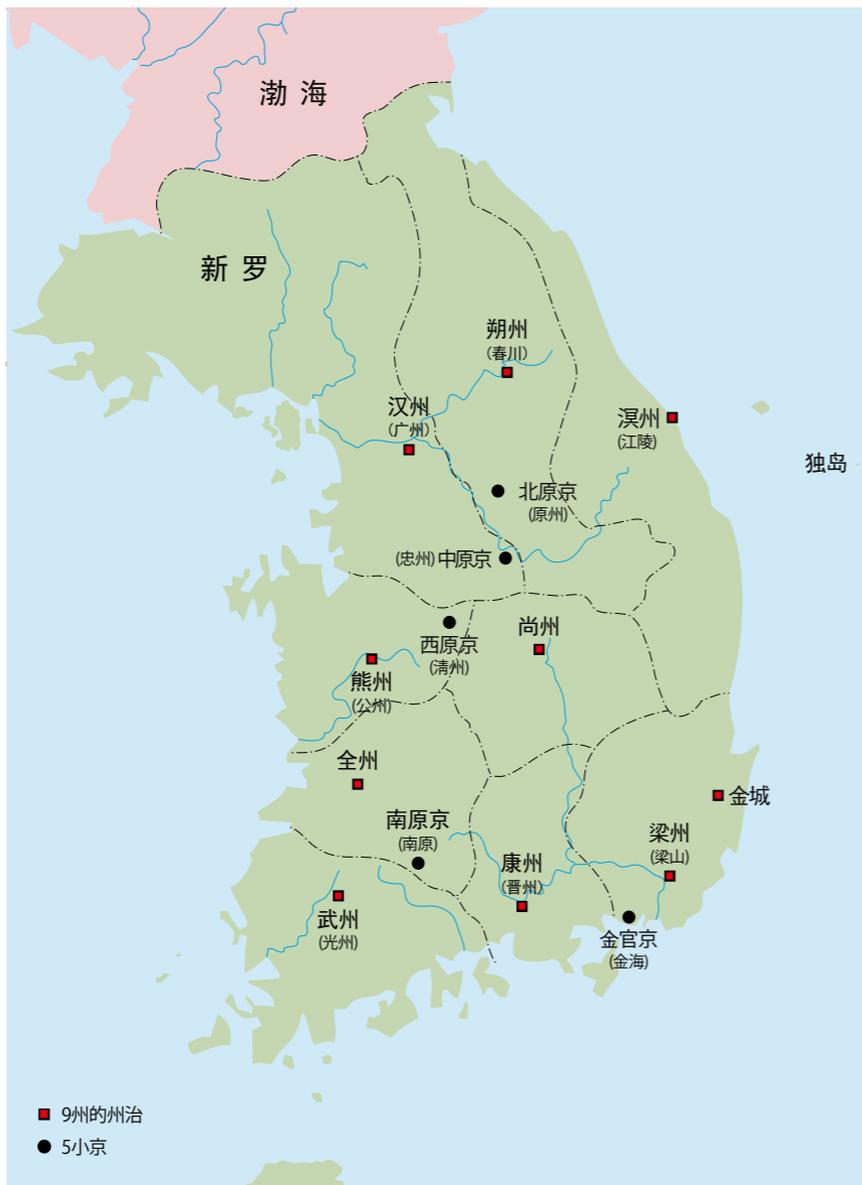


图6 九州五小京图

来。”时，神文王一口回绝唐朝的要求，说“先王实现‘一统三韩’，功劳极大。我们决定用‘太宗’这一庙号”。

新罗王室的这种自豪感也传到了后世。景文王(861年-875年在位)在追认大通为月岳山月光寺住持的教书中也说，“以前我们的太宗大王为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中而感到心痛，于是征服三韩，实现了统一”，对此事大书特写。太宗武烈王和文武王籍以合并百济、高句丽的功绩在新罗宗庙中以永不撤毁的不迁之主资格被供奉。

此外，神文王将原有的新罗军队和高句丽、百济、报德国(安胜统治的高句丽国)以及靺鞨等整合编为中央军团，最终完成了新罗中央军事组织，即“九誓幢”。“九誓幢”中只有三支军队仅由新罗军构成，其余六支分别由高句丽构成三支军队、百济构成两支军队、靺鞨构成一支军队。中代王室曾向倭国派遣使节时，也将报德国(即高句丽国)或肃慎(即靺鞨)的使节一同派去，以此向倭国炫耀新罗帝国正在统治这些国家和民族。神文王在即位第七年(687年)举行了五庙祭，在祭文中尤其强调了“异域使臣献上珍宝修造职贡(朝贡)”的事实。由此不难理解其自负的心理。

《新罗村落文书》与地方统治

《新罗村落文书》亦称“民政文书”、“帐籍”。这是记录户口和征税情况的文书台帐，是新罗地方官衙调查管辖区域经济情况向中央报告的文书。这本被保存至今的台帐文书是孝昭王四年(695年)调查和整理西原小京附近4个村落的内 容，是我们了解当时新罗地方统治状况的珍贵资料。这本文书在日本奈良县东大寺正仓院被发现，当时1933年。

《新罗村落文书》中记录着县和村落的名称、规模(周长)、户口数量、马牛数量、田亩规模、桑树、松树、桃树的拥有数量等。而且文书每三年为周期而制作，若有传染病和饥馑等灾害时随时更改或补记文书内容。这本文书是新罗帝国为提高赋税效益而制作，分细目记录得非常详细。它也告诉我们新罗帝国

的中央政权对地方农民的统治力度很大。

新罗的地方社会来看,最底层的农民居住在自然形成的村落,几个自然村合起来便形成一个“县”级行政单位。代表几个自然村的人叫“村主”。那么,中央派遣地方官吏到村里,在村主的帮助下管理、监督村民,施行征税和人力调动等。村民若有迁移,根据个人情况须到官府报告“转入”或“转出”情况,这是义务。记录

中可以看到,地方官在文书中还记录了那些躲避赋税而偷逃的人,可见新罗国严加控制百姓动向,把他们紧紧束缚在各个地区。

《新罗村落文书》中记着四座村子的情况,共有43户人家,总人口约442名(男性194名,女性248名),奴婢25名。村民按男女、身份不同来区分;再按年纪大小分为老、除(免除部分税捐者)、丁(负担税捐的壮丁)、助(能帮助壮丁的青少年)、追(少年)、小(儿童)等六个等级进行记录。此外,还记录了四个村子有61匹马、53头牛、4249株桑树的经济林。从田地规模和马牛数量以及桑树数量来看,这些村落经济水平与后来朝鲜时期的普通村落相比,条件明显要好。因此,有人提出此文书中记录的村落可能是作为新罗王室的财政来源而受到特别管理的村落。

从村落文书中可见,统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代人头税体制逐渐被抛开。当时新罗施行按每户财产规模而分作九个等级的户制,藉此计算出整个村落该承担的税捐量的计烟数。这种九等户制和计烟的换算方式是太宗武烈王所定《理方府格》来实现的一种赋税制度。统一战争期间,因社会不安而出现了较深刻的农民阶层的分化现象另新罗政权担忧,为了防止农民没落,不影响国家税收的稳定,太宗武烈王进行了赋税制度革新。即在原有的人头税基础上考虑各户的经济水平而征税。但在村落文书中,与相关土地的记录相比,有关户口条目数量更多、更仔细,并且对各个年龄段的统计记录尤为详细。由此推测,每户人家的财产计算标准中壮丁的数量最受重视,其程度甚于土地。

此外,村落文书中还可发现“村主位畝”、“官谟畝”、“内视令畝”等各种条目的土地。其中,“村主位畝”是分给村主的免税地;“官谟畝”是分给地方官衙提供管理运营资金的田畝;“内视令畝”是分给地方官吏内视令的职田。这些田畝是由农民在村主的监督下耕种,收获的粮食作为地租交纳给官府或官僚。这一时期土地的所有关系名誉上是“烟受有畝”,即以举国上下皆为王土的观念之下,认为是国家给予的土地,但实际上是私有土地,还可以做交易。



图7 日本正仓院所藏 新罗村落文书

“荷札”与赋税征税

古代税捐以现物形式交纳给中央。此时官府为确认纳税者而用木片制成记录纳税者住所、人名、税额等的标签，挂在装税捐的包裹上。这被称作“木简标签”或“荷札”。木简指为记录文字而对木头进行加工制成的竖长木片。“荷札”是在古代东亚社会纸张尚未普及时广泛使用的标记方式。由于征来的税捐输送到最终目的地，即中央府库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人们用耐久性较好的木头制作这种标签。

先在木简上端钻个孔，之后在上端左右各挖了V字槽用绳子系起来，挂在税捐包裹上。有时直接把标签插在包裹捆绳上，为此将木简下端削得很尖。位于庆尚南道咸安的城山山城中发掘出约在560年代制作的新罗荷札500余件。被发掘的“荷札”中记着纳税者的住所、名字、税额。可见当时新罗政权以村落为单位掌握纳税者并制作户籍。此次发掘出来的“荷札”比《新罗村落文书》(695年)还早130多年。这说明新罗政权为了赋税早已对全国各地的百姓进行普查、登记了。在庆尚北道庆州雁鸭池里也曾有新罗时期木简标签的出土。这些情况说明，利用这种木简记录并输送税捐的方式到三国统一以后继续沿用。

中央的行政官署根据各州、郡、县调查上报来的村落文书来统计全国的户口数和计烟数，并掌握各地方行政单位的经济实力。然后由调府或仓部再根据统计资料赋予各地的税捐和徭役，制定国家的赋税政策。赋税政策下达到各地后，地方官命村主将各村纳税者该缴的税捐一一记录在木简标签上，挂在税捐包裹上运送至中央。中央的征收官府将准备好的税收台帐和税捐上所附的木简标签进行对照，确认税捐交纳与否。

废除禄邑制与中代统治体制的局限性

完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和税收制度后，神文王在即位第九年(689年)废除过去针对官吏施行的“禄邑制”，改为由官府支付粮食的“禄俸制”。这种官收官供

的禄俸制曾在文武王时期针对头品阶层施行过，但跟之前的禄俸制有不同之处。这次发放禄俸的对象不仅限于头品，扩大到包括真骨在内的所有官僚。禄邑是相关地区的租税由真骨贵族代替国家直接领取的制度，因此废除禄邑制等于是取消了真骨贵族管辖所属地方的制度。神文王的这一改革，不仅强化中央集权，还给真骨贵族沉重的打击。

同年，神文王提出首都从庆州迁至达句伐(现 大邱)的计划，但遇到真骨势力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首都是一个象征性空间，在那里浓缩着已有的统治体制。神文王试图迁都，摆脱真骨贵族的大本营庆州打造中代王室的新空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说明中代王室所推行的强化王权政策并未得到真骨贵族的全面支持，很可能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图8 咸安城山山城木简

新罗进入中代,特别是到神文王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显著的强化。国王在完善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组织的基础上行使了强大的专制权力。然而,支撑这一新的政治运行体系的杠杆并不是已经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头品阶层为优先的官僚体制。取代大等会议的势力还是持有特权的少数真骨家族。新罗政权几乎被金春秋一家垄断,其儿子和女婿、孙子们独霸宰相职位,连新罗王朝的一等功臣金庾信之孙也被核心权力所排斥。中代支撑核心权力的力量极为封闭。头品阶层欲进入官场仍须真骨贵族的举荐,因此权力更加集中到少数真骨手中。

新罗中代,文武王和神文王在实施强化王权的政策过程中经流血肃清而急于实现,因此他们不敢相信他人,只好把自己家族的成员摆放到推行政策的前面。新罗的政治体制始终是以真骨为中心的封闭的结构,而到了中代权力更加集中,其幅度也变得更狭窄了。这一点势必要导致政局的不稳进,矛盾愈来愈深化。仅就中代时期不断出现真骨势力的叛乱一事,很能说明问题。

即使政权不稳定,但中代王权在神文王之后还持续了八十多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百济、高句丽的灭亡后,新罗的赋税地区比以前增加了1.5倍以上;二是三国统一后几乎没有国防费支出,所以国家财政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实。实际上,支撑中代王权的力量既不是强化了的王权,也不是独霸宰相职的血统,是雄厚的国家财政基础。被权力疏远而心怀不满的真骨贵族也在富足的物质待遇面前很容易得到平息。废除禄邑时新罗政权未遭到真骨势力的抵抗,是因为给了他们多于禄邑的禄俸。当时真骨的大宅称作“金入宅”,值得顾名思义。

然而,国家财政出现问题,俸禄不及时发放,那么,被压抑的真骨们会随时起来造反。就在禄邑废除七十年后的景德王十六年(767年)真就出现了真骨反抗势力的重新复活的现象。

4

佛教教学的发达与文化的成熟

中代王室的佛教政策

在中代社会,佛教对政治理念的作用减少,却作为思想或信仰来抚慰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和悲伤作用相对增大了。所以还在中古时期极具国家宗教性质的新罗佛教,到了统一以后接受并融合高句丽、百济相对发达的教学与教理研究成果,成就了多样的佛教思想。

新罗国家体制逐渐完善的中古时期,“转轮圣王”和“真种说”等神圣的佛教理念为确立王室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百济与高句丽的不断入侵,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再者经历毗昙之乱之后,新罗政权无法仅靠佛教来获得贵族和百姓对王室的支持。

太宗武烈王以后,中代王室不再是从神圣的佛教理念中寻找其集权的正当性,而是从强调君主的道德涵养以及德治为本的儒教政治理念中寻找认同感,藉此施行各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曾有僧侣劝说“龙乃飞禽走兽,不适合国王”,但文武王仍为保护国家和百姓不再受到倭寇侵犯而期望自己死后变成东海之龙。可见新罗强调的是国家政权为百姓带来实惠的儒教政治理念。

文武王还采取措施抵制佛教寺院敛财壮大,危害百姓。他在664年下令不准向寺院捐献财物或土地等,抵制财富集中到佛教寺院。669年,还设立负责佛教团体僧政的官署—“政官”(又称“政法典”);在国家寺院里也设立管理机构,把核



图9 庆州感恩寺遗址全景



图10 庆州文武王水中陵(太王岩)全景

心寺院的运营权划入中央行政体制内。中古时期的佛教寺院和团体自主解决相关佛教的问题。但到了新罗中代佛教寺院和团体被划到国家管理对象,国家统一管制。

中代王室虽在政治上无比重视儒教,但这并不说明王室远离或忽视佛教信仰。寺院还是作为祈求国家安宁的祈福处被利用。文武王临终留下遗言要按照佛教方式为他举行葬礼。事实上新罗为他举行了茶毘式葬礼,这是首次。中代王室特意在都城的四方建立“愿刹”为先王祈求冥福。

甚至在中代初期,由于刚刚统一三国旋即又发动罗唐战争而民心惶惶、政局极为不稳的时候,王室听信密教,试图举办咒术仪礼等来稳定民心。679年,文武王招来密教僧明朗下令修建四天王寺,祈祷新罗军击退唐军。另在太王岩附近修建感恩寺祈愿镇护国家。感恩寺修建工程到神文王时期才完工,后来变成了自述国家危机的“万波息笛”传说的舞台。神文王还接纳密教僧惠通的建议修建了奉圣寺。

明朗和惠通是赴唐朝留学归来的密教僧。他们一改过去单纯背诵咒文的密教仪式,制作守护新罗国家的天王、神王、龙王等护国神的具体形象,展示了使人通过五官来直接感知的密教作法。四天王寺的木塔塔基上用浮雕塑造了良志塑像,良志塑像是活生生地展现四天王眷属一神将和夜叉想象的写实主义作品。四天王寺是新罗王室策划而成的里程碑作品,它期待借以四天王信仰来治愈战争的苦难和安抚民心。

684年,神文王在四天王寺、奉圣寺、感恩寺、灵庙寺、皇福寺等设置“成典”。“成典”是国家官厅,它负责寺院的修建、运营以及提供经济支持等事务。具有护国或王室愿刹特色的“成典寺院”在新罗王室的全面支援下繁盛起来。

新罗王室以祭奠先王为名在诸多成典寺院内修建了巨大的造型。神文王妃神穆王后在皇福寺为去世的神文王修建三层塔,制作了佛像进行供奉;神穆王后与孝昭王死后,圣德王在皇福寺塔内奉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以祭奠两王后的功德。后来《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作为新罗造塔信仰的经典经书而倍受瞩目。另,景德王为纪念父王圣德王而计划制作重达二十吨的“圣德大王神钟”,经多次失败,到了惠恭王时期才完工。

中代时期在地方也开始修建寺院。676年,高僧义湘从唐朝带回新佛教思想—华严学后,获国家支援在荣州太白山修建了浮石寺,作为传授华严的传法道场。683年,新罗王室采纳宰相忠元的建议,在屈井县(现庆尚南道梁山)行政官署的位置上修建了灵鹫寺。

佛教的大众化与传播“阿弥陀净土信仰”

进入中代,佛教对新罗政治的影响力虽然变小,但佛教对大众信仰和善行活动的影响反而扩大了。中古时期,通过高僧圆光和慈藏法师接受《占察经》和《阿弥陀经》并进行普及活动,为佛教教化大众打下基础。新罗统一后,这种佛教教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在都城的下层民中也出现一些持有佛教信仰的人。中古时期的佛教是在王室和贵族中流行,而统一后出现了街巷佛教,一群僧侣在市场和村庄之间向平民百姓通俗易懂地介绍佛教,和平民百姓朝夕相处进行布教活动。

惠宿生活在真平王年代,他和安弘都是当时有名望的僧侣。曾想过要去中国留学,但后来来到农村生活,向一般民众传播佛教信仰。他把自己的大腿肉献给沉迷于狩猎的国仙(花郎),令其领悟到杀生之过。惠空是长工出身,是一位发展中代佛教教学的高僧。他当上僧侣后住在破烂小寺里,头戴簸箕到马路上跟大众一起边唱歌跳舞边进行布教活动。大安也是一位因布教而闻名的高僧。他拒绝王室邀请,装疯卖傻,一直生活在广大百姓中间。

新罗中代佛教的大众化过程中,元晓为新罗佛教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他是高僧,但在佛教实践中,自称小性居士游走在街巷和村庄,通过歌舞来传播佛法,展现了在佛法面前僧俗不二的思想。他还阐明了众生通过念经可达到极乐往生的“阿弥陀净土信仰”。后来人们对元晓评价说因为他“卑贱的人也能了解佛教,十之八九会念诵阿弥陀佛”。

到统一时期,阿弥陀信仰面向全国广泛传开,在各地争相制作阿弥陀佛像,甚至出现了奴仆也可在西方净土往生的事例。阿弥陀信仰之所以广泛流行是

因为念经往生的教诲令一般人所容易接受。再加上普度众生为名的“观音菩萨信仰”深入人心,《法华经》在民间广为传颂。有一首新罗乡歌,说的是“向芬皇寺千手观音祈求,盲童也可以睁开眼睛”,由此可见当时观音信仰的在民间流行。

圆测与唯识思想的发展

统一前后,新罗僧人为学习佛法,不辞辛劳远赴唐朝、远渡印度求道。阿离耶跋摩和惠业是新罗人,他们到印度佛陀迦耶的大菩提寺和那烂陀寺研究佛经,终生未能归来。圣德王时期,慧超途经中国,赴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佛教圣地朝拜。最后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这部著名的旅行传记。在新罗尚有很多人像阿离耶跋摩、惠业及慧超一样不断地渡海求法。

由此,新罗中代出现了韩国佛教史上佛教教学的鼎盛时期。他们研究从唐朝和印度传来的大量佛教理论,树立了独到的佛教思想体系。尤其是圆测、义湘、元晓所提出的佛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还构筑了东亚佛学发展的基础。这种佛教教学和研究中,最先崭露头角的僧人是圆测(613-696年),他研究中国的唯识思想并做出了进一步发展。

东亚佛学,自南北朝时代以来非常流行提倡人人成佛的“如来藏”思想。当时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摄论系唯识学中也融入了如来藏思想。但玄奘(600-664年)自印度归国后,根据自己在印度研究唯识思想的经验,提出了当时国内摄论学中的一些问题。玄奘认为唯识是探求并说明看不清事物而导致错误认识的学问,唯识和如来藏思想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当初地论学把唯识和如来藏思想区分开来是正确无误的。

圆测生活在真平王时期。他幼年时渡海到中国留学,对摄论学造诣很深,但以玄奘归国为契机,改变对旧唯识学的错误认识,接受并很快掌握了玄奘新唯识。他还通晓印度和西域各国语言,在玄奘的佛经翻译工作中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当时玄奘忙于翻译自己带回来的佛经,无暇顾及解释新唯识的著述,此时圆测为玄奘翻译的新唯识经论进行注释,令新唯识理论具备系统化。为此,

他被玄奘的新进弟子窥基等所怨恨和诬告,背上了盗用玄奘思想的污名。但在658年以后,他得到唐朝皇室的信任和支持,担任西明寺主持,创立了仅次于窥基的慈恩学派的西明学派,进一步巩固了作为唯识学者的地位。

圆测最初学旧唯识思想,接受中观立场。因此他能够广泛包容中观与唯识所认为的“空”和“有”的对立立场,力图克服它,这一点和玄奘的唯识不同。也就是说,圆测唯识思想是在旧唯识的框架中加入有逻辑性的新唯识理论而完成的



图11 中国西安西明寺圆测塔

理论体系。圆测的唯识思想因随其弟子道证于692年回国而传入新罗。

特别是道证的弟子太贤,通过《成唯识论学记》等大量著述,在圆测的理论基础上融入窥基的慈恩学说,还参照华严学的见解,完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新罗的唯识思想。元晓也撰写了论证中观和唯识的比量相同的《判比量论》,指出空有的争论来自对语言的执着并强调超然姿态。元晓也作过对玄奘所翻译的论述内容跟旧唯识学论述的比较和综合,他的观点是在旧唯识基础上理解新唯识。

义湘与华严学的发展

华严学与唯识学均为新罗中代表佛学的学问。华严学以《华严经》的内容为基础,强调所有存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的佛教思想。唐初智俨(602-668年)法师确立了华严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华严学反对玄奘的新唯识,力图通过“法界缘起”来阐明佛祖和众生的共同性。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华严学具有宣告中国固有佛学诞生的意义。

华严学是通过真骨出身高僧义湘(625-702年)传到新罗。文武王元年(661年),他赴唐朝留学在智俨门下学习并接受华严学。义湘归国后曾住在皇福寺,不久便与门徒一起进入太白山创建浮石寺,开始讲授华严学。义湘的华严学思想尽在他所著《华严一乘法界缘起图》中。

法界图对华严思想的核心概括为七言三十句诗句,文章以中心为基点,呈现出一种上下左右旋转的图表形状,黑字代表众生,贯通文字的红线代表佛祖的启示,白纸代表众生所生活的世界。这象征着众生的世界就是佛祖的世界,他们生活的空间是相互关联的一乘法界的缘起构造。也就是说,相互关联,如果一个不存在,其他的也无法存在,说出了一和多的相入相即,最后论证了众生与佛祖是同质的。法界缘起强调了“现象世界看起来有差别的所有一切其实通过相互依靠,才显露出各自的面貌,因此实际上所有一切都是作为无差别的中道而存在的”这一点。

《大乘起信论》说,一切存在皆是众生所具有的一心之显现,其分为真如门和生灭门,但两者是分一心为两面,即静的一面和动的一面而已,实际上是同

一。元晓以此为基础,综合了各种佛教理论。元晓宣称起信论是“众论之首,乃是消除众论之主人”。元晓为佛教的大众化而做出的出于“僧俗不二”的所有行动,可以说是在实践他提倡的尘世与出世间所有存在均为一心之显现的“一心”思想。

元晓以《起信论》为基础阐明了“一心”思想。“一心”思想以新罗教学研究之精髓在东亚佛学中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元晓深化了通过涅槃和摄论来理解的如来藏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起信论的“一心”思想。元晓撰写《起信论疏》、《金刚三昧经论》及《华严经疏》等著述阐明了一切之法皆为不受时空限制的相入相即的广荡世界。

元晓以《起信论》和《金刚三昧经论》为依据,主张相互对立的理论只不过是从不同侧面解释真理,佛教的根本目的是领会超越不同的绝对真理,即“一心”。元晓主张“和净论”也是从“一心”思想出发,认为相互对立的理论其实不是对立的。他在《十门和净论》中,认为当时佛学中相互对立的理论其实是从不同层次、不同方法解释同一真理的样貌;还强调为发现真理的真面目而应该摆脱语言或概念的束缚。也就是说,在承认佛教教学的多样性,同时又试图从更高层次上进行和净统一。元晓的著述流传到了中国和日本、甚至传到印度引起了极大反响。

新罗实现三国统一后,迈向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过程中,积极支持佛教教团使得佛教教学和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而新罗佛教界的思想追求是以唯识、华严、如来藏思想为中心展开,呈现着相互连贯性,令新罗佛教哲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新罗佛教社会出现如此活跃的景象,预示着往后佛教教团的活动中心从都城转向地方社会。

除此之外,新罗佛教教学的发展引发了印刷术的发展。义湘所撰《一乘法界图》,起初想以版刻出版流通,但从佛国寺释迦塔内供奉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来看,所使用的是木版印刷术。这一时期中国和日本的版刻术大体上为压印水平,释迦塔内的《陀罗尼经》是使用后世木版印刷相同的方法印刷而成,从这一点可见新罗印刷术的发展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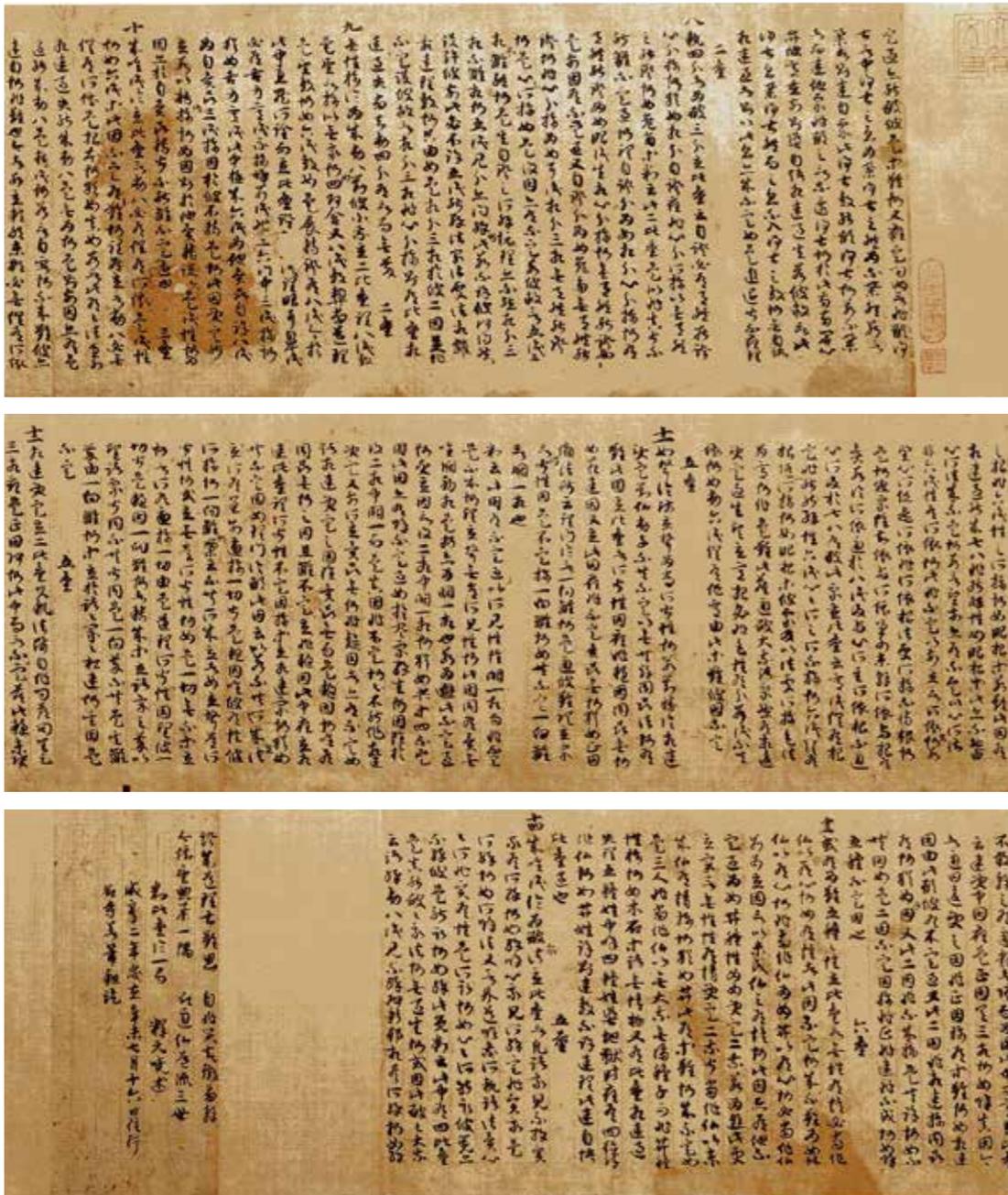


图13 元晓的判比量论

都城景观与成典寺院

在新罗都城的四方入口处均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成典寺院”。南侧为四天王寺,北侧为奉圣寺,西侧为灵庙寺,东侧为奉德寺。目前寺院已倒塌,无法看到其辉煌灿烂的面貌,但看到保存至今的四天王寺的雕像“绿釉神将搏”和奉德寺的圣德大王钟等,不难想象当时这些寺院的威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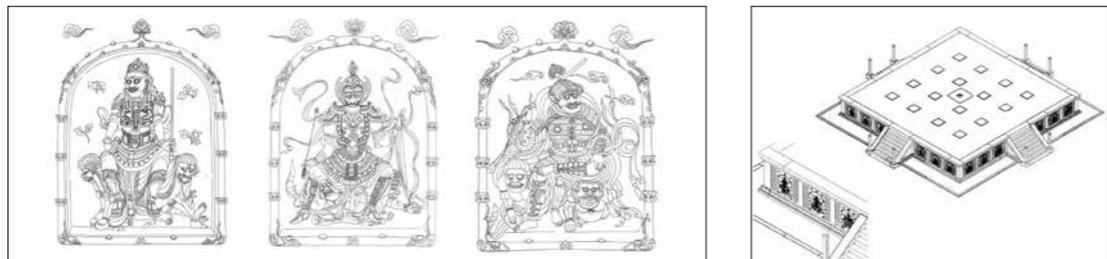


图14 庆州四天王寺遗址出土塑造像

四天王寺是引领罗唐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正如位于四天王寺上面狼山上的善德女王葬地被视作切利天一样,四天王寺被认为通往须弥山顶切利天的佛国土新罗之入口、界线。结果四天王寺不仅仅是位于新罗都城最南侧的空间,而且是密教仪礼中佛国土新罗的入口,也是四天王守护的佛国土的界线。

神文王时期修建奉圣寺而兴起的,由密教僧惠通主导的新的成典寺院体制,是把四天王守护的新罗佛国土变成视觉化的结果,也是在都城四方修建成典寺院的过程。新罗中代王权通过位于都城四方的成典寺院展现了密教的曼荼罗式世界观,试图将都城庆州打造成天下中心、由四天王守护的佛国土的中心。

在都城四方修建的成典寺院沿着从这里朝向四方伸展开来,随着官道与天下9州相连。各地来京城的人在都城入口首先见到的是“成典寺院”。在成典寺院举行各种国家仪礼,祈求王室或国家安宁。进京的人被华丽庄严的佛教寺院及其仪礼所震慑,想象新罗王权永不灭亡。

此外,在都城四方的边界定期举办祭路神仪式,阻挡疫病、邪气等不净带入都城。此时会竖起男根作为阳物驱赶阴气。这种阳物后来变成标志村庄境界的“长生柱”。通过修建成典寺院和在四方路口举办的辟邪仪礼,将把新罗都城改变成与地方隔绝的神圣空间。通过这种独特而非日常的仪礼、仪式景观,都城才能升华到整个国民心目中的中心,首都。

新罗借以都城庆州独特的景观和象征性仪礼来展现国家权力的威严以及中心地位。都城就像一座巨大的“剧场”。在都城这一“舞台”上举办的国家仪礼,不论征税进京的地方人还是居住都城的官吏们都能感受到权力的威严,唤起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和附属意识。

新罗中代王权虽有与唐朝保持事大关系的意愿,但在处理“太宗”武烈王庙号的问题中所表现的那样,尚未失去罗唐战争中所获得的自信。成典寺院等新罗独立的国家仪礼是赖以祈求“护国、王室的永存”的国家意志而创造出来。中代王室欲以国家性质的仪礼期望新罗国家成为天下中心,再把支配国家的绝对性以视觉化来彰显。

文书行政的发展与创制“吏读”

新罗官府之间文书行政体系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文书虽用汉字记录,但不是古汉文。韩国语是尊称、时制等词尾和助词相对发达的胶着语,而古汉文与韩国语语序不同,理解起来有很多难处。新罗人在习用古汉文,同时借用汉字创制了新文字体系“吏读”,记录的自己的言语。

新罗人在密密麻麻的古汉文之间想象着“空格”,在那里附加自己独有的句读、助词及语尾等,把古汉文转换为胶着语标记方法。因此,“吏读”的标记,大体上词干作“释读”,附加词干后面的词尾、助词以“音读”为主,也就是“训主音从”。“吏读”标记后来成为在古汉文文章中添加韩国语特定词尾“吐”来解释汉文经书的标记法。

六世纪中期新罗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韩国语“助词”或“先语末词尾”等,这和同一时期高句丽、百济的文字不同。说明新罗人利用汉字来标记自己言语的努力持续不断。据了解,高句丽在六世纪以后的韩国语标记法基本没有得到发展。

七世纪末,新罗人已能用汉字较完美地表达出自己的话语。新罗超越了在句子末尾加“之”也就是“-다”来表现终结词的高句丽式标记法,还开发出“过去型词尾”、“尊称型词尾”等先语末词尾标记法。比如,要标记韩国语“보다”利用汉文“见”,用词干释读(训读),语末词尾“-다”音读为“-之”,附在词干“见”后,即用“见之(보다)”来标记。这种标记原理进一步发展,比如,韩国语“보았다”是“见过”,这时在语末词尾前插入过去型词尾“在”,那么可记录为“见在之(보았다)”;“보셨다”则是尊称,这时在过去型语尾前插入尊称型词尾“赐”来标记,记录为“见赐在之(보시었다)”。

在七世纪中期已被使用的“吏读”标记法与后来出现的“乡札”相比,亦毫不逊色。三国统一后,新罗引进了唐朝律令文书格式,但就记录其内容时使用了“吏读”标记法这一新罗独有的文书格式。“吏读”标记法对高丽、朝鲜也产生影响,成为官方文书使用吏读标记的典范。从后来朝鲜时期也使用“吏读”记录文书的情况看,新罗人开发吏读一事,体现了想用自己的标记法来记录自己的言语的

自主意识。

另,新罗人解释中国典籍时,在文章的句子之间附加标点符号或解释文章的顺序。这时,他们用吏读做一些简单记号;或者在文章句子之间标上助词或词尾等。这样,就可以阅读文章同时便理解其语法关系,有助于翻译成韩国语理解。古汉文章句间添加词尾“吐”称的标记方式叫作“口诀”,薛聪对“口诀”的整理和汇编做出很大贡献。薛聪在国学讲授儒家经典时就利用添加“口诀”训导。新罗“吏读”和“口诀”成为后来日本“片假名”和“ヲコト点”的渊源。这一点在重新书写古代东亚汉字的接受及翻译历史上可称为宝贵资料。

“木简”与新罗宫廷日常

古代木简是较方便的记录工具。仔细考察木简所记录的内容,可知它是包括有简单的文字练习到复杂的国家行政等古代社会的各种记录。即使是片面的记述,其中也蕴含着当代社会的信息和语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曾在新罗时期王宫后苑雁鸭池(月池)和王宫月城的城壕(孩子)的遗址出土的木简中,便可了解当时新罗宫廷内外的日常和社会文化。

先看看雁鸭池出土的木简。其中有“门户木简”,是有关新罗王宫护卫系统的记录。在新罗时期,事先选定各宫门的护卫人员,然后制作标记护卫名字的门户木简。还有监督者也持有“门户木简”亲自检查护卫是否认真实际执行任务、是否按时站岗。检查过的木简,用以发放护卫食物的依据。新罗的宫廷护卫门户木简系统后来传到古代日本,在日本古代宫殿遗址出入文物中也有发现了类似新罗门户木简。

在看看王宫月城的城壕中出土了标记“医药处方笺”的木简。雁鸭池出土文物中虽有过相关医药处方的,大约在八世纪使用过的木简。然而,月城城壕木简中出土的“医药处方笺”中,清楚地记录着在六世纪学习中国医书的情况、熟知药效和药量后开具的医药处方等信息。在“真兴王巡狩碑(568年)”的碑文中有“药师”字样,想必他们就是使用“医药处方笺”给王或贵族开具处方的人物。



图15 月池出土木简

另在王宫后苑雁鸭池出土的食物罐子上挂着的木简标签记录中,发现大量带有“醢”字的水产加工品的名字。当时在韩国西海岸地区盛产盐,多用它来制作鱼虾酱等腌制食品;而在庆州所在的东海岸地区产盐不足,因而利用谷物发酵水产品的“醢”类更多一些。雁鸭池木简中所记录的大量“醢”,可能

也与有关联。这种记有“醢”字的木简中还发现有“高城醢”。据推测这是至今在东海岸地区大量制作食用的“鲷鱼食醢”。

当时新罗王室将这种水产加工品装进大缸、小瓶里存放仓库进行保管。由于是发酵食品,所以在木简标签上标明制作日期,按存放时间来确认发酵期限和食用日期。雁鸭池木简标签的出土,揭开了现在人们想象不到谜团,即古代新罗宫的烹饪法和饮食文化。



图16 俯瞰庆州月池全景

国际关系的变化与 中代王权的没落

改善罗唐关系

韩半岛上发生的三国统一战争,不仅是该地区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且是中国隋、唐以及游牧民族契丹、靺鞨还有日本也直接或间接地介入的古代东亚地区世界大战。新罗和唐朝的关系到文武王八年(668年)以后,双方因新罗占领百济领土、针对高句丽遗民的合并政策而形成的矛盾而导致了罗唐战争。由此自文武王八年以后到圣德王二年(703年),两国关系处于断交状态。

与唐断交的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期间,新罗确立了新罗为核心的小帝国。新罗王将高句丽王族安胜安置金马渚册封为“高句丽王(报德国王)”;标榜天下“九州”改编地方编制;使用“上表”“诏书”等皇帝级别的行政文书;武烈王庙号封“太宗”等等一系列措施中,不难看出统一新罗政权的小帝国意识。虽然这种意识的维持时间不长,也就是从文武王到神文王期间,但很显然,在这期间新罗积极开展了标榜新罗帝国为世界秩序的理念性、制度性工作。

新罗多次下诏书令册封国高句丽(报德国)使节团跟随新罗使节前往日本,有时还让肃慎人也参入使节团。很明显,新罗在向日本展现自己是统治高句丽、肃慎

(靺鞨)等的小帝国。甚至他们以藩属国来对待日本来使,举行朝贡式外交礼仪。

到了七世纪末,东亚局势发生了变化。深受唐朝压制的突厥、靺鞨、契丹、奚等东北亚诸多民族开始复兴,唐朝的权威收到极大的威胁。新罗借以对唐朝不利的东亚局势,试图重新构建改善罗唐关系。神文王三年(683年)新罗赐“金”姓给报德国的安胜,令其居住在都城,这是一项专给唐朝看的措施,不惜降低国格。换句话说,新罗为改善与唐的关系欲取消本国内部册封的报德国(高句丽),以此来显示自己国家的地位。也因为如此,导致了在神文王四年(684年)的报德国叛乱。后来新罗镇压报德国,最终完全消灭了新罗内部的“小高句丽”。神文王在六年(686年),新罗派遣使臣于唐朝请赐《礼记》,武则天赐了《吉凶要礼》。凡此种种,均为神文王为谋求与唐和解而做出的措施,说明神文王逐渐接受唐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礼仪形式。

期间发生了高句丽人大祚荣逃出营州(现辽宁省朝阳),摆脱唐军追击,联合高句丽遗民及靺鞨于698年在东牟山建立了渤海国的事情。渤海国的屹立直接威胁唐朝的安慰,唐朝面临更为艰难的国际局势,无法继续坚持与新罗的冷战关系。因此,在新罗圣德王(702年~737年)和唐朝玄宗(712年~755年)在位时期,以渤海与唐朝战争为契机,罗唐间迅速改善两国关系,恢复到罗唐战争之前的友好程度。

渤-唐战争与新罗参战

719年,大祚荣(渤海 高王)去世,其长子大武艺,即武王即位。他即位后使用“仁安”年号,明确了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性质。继而致力于扩张领土,连连合并了多个靺鞨部族。仁安国王的谥号为“武王”,这也表明他生前留下的巨大业绩有关。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武艺即位后大举开拓领土,东北许多蛮夷畏而称臣”。新罗于圣德王二十年(721年)七月在北方国境修建长城的事情也跟武王的领土扩张不无关系。

又在727年,渤海国第一次向日本派遣了使节。当时的外交文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即“忝富列国,滥愬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夫余之遗俗”,文中可看出武王

自豪的口气。渤海向日本派遣使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与唐拉近关系的新罗。此时渤海与唐朝因东北部黑水靺鞨问题而对立。对立的起因是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对武王征伐感到威胁便派使臣到唐朝求援。唐玄宗把这些地区当作唐朝领土,设置黑水州派遣官员治理。对此举,渤海认为这是唐朝对渤海进行前后夹攻的孤立政策而感到不满。

武王为摆脱这种孤立处境,考虑一方面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来,而另一方面派弟弟大门艺武力征伐黑水州。大门艺认为盲目征伐黑水会令渤海自取灭亡,所以反对北征黑水州。但在武王坚持己见强烈要求之下,大门艺只好向黑水部出击。大门艺到国境线再次劝告武王撤销讨伐,武王对此极为愤怒,改派堂哥大壹夏统率军队召大门艺问罪。而大门艺逃往唐朝。

围绕大门艺的遣返交涉,唐朝和渤海之间的紧张气氛达到高潮。732年,武王命将军张文休进攻山东半岛的登州,杀害了刺史韦俊。为此,唐朝采取措施,一是派大门艺到幽州征集军队准备进攻渤海;二是派遣大仆员外卿金思兰到新罗,要求新罗于733年(圣德王三十二年)进攻渤海南部边境地区。唐朝考虑仅凭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完全制服渤海,索性采用以夷治夷策略,把新罗引进来对付渤海。

不出预料,新罗积极响应唐朝的提议。新罗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是阻止渤海南下;二是藉此一举消除与唐朝因罗唐战争而酿成的隔阂。据当时新罗向唐朝呈报的文书看,上面记载新罗向渤海进攻,由于严寒季节冰天雪地而冻死士兵过半,无奈之下只好撤军的内容。不过,当时新罗似乎没有派遣大兵力进攻渤海。当初大祚荣逃离营州,跟唐朝关系紧张时,新罗反倒赐给他“大阿谿”的官职,帮助他稳定局势。这是新罗的战略,是从渤海建国初期开始就采取的政策。圣德王重建罗唐亲善关系后,针对唐朝和渤海之间的矛盾基本保持灵活的态度,时而助长时而观望。新罗的这种政策非常有效。735年,新罗对唐朝以夷治夷的策略将计就计,要求溟江(现平安道大同江)以南作为新罗领土而获得唐朝认可。罗唐战争直到此时方可谓正式结束。

另外,渤海武王死后其子文王即位,唐朝最终也跟渤海讲和。唐册封文王为“渤海国王”,渤海和唐朝间也恢复了和平关系。罗唐战争以后发生剧变的东亚

世界局势,终于形成了以唐为轴心,新罗、渤海、日本等共存的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各国之间频繁派遣使者,民间交流愈发活跃。在此同时,新罗、渤海及日本相继接受唐朝先进文化,致力于自国的发展,文化也随之兴盛。

新罗与渤海的关系

新罗和渤海作为邻国,在相互交流、互相竞争中共同并存了约220余年。最近有学者提出新罗和渤海之间存在同族意识,甚至主张渤海理应归入韩国史。但这种逻辑性飞跃很可能影响韩国史的体系化,产生反作用。

新罗人对待渤海看作是继承高句丽的敌对国家。《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新罗人轻蔑渤海人称他们是野蛮人,用锯齿利爪吃人。此外,新罗人将过去的因纺织比赛“嘉俳”而生成的中秋节改称纪念击败渤海的节日。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新罗对渤海的强烈愤慨。崔致远曾在致唐外交文书中描述渤海说他们是继承高句丽的毒瘤般的存在。

根据中国资料可知,渤海有通往邻国的五条要道,其中一条是“新罗道”。新罗道从渤海上京出发,经过东京、南京,最后到新罗泉井郡(现咸镜道德源)。当时从位于豆满江流域的渤海东京至新罗泉井郡之间有39个驿,而渤海的南京就位于其中。在《三国史记》记载中有两处提到过渤海和新罗之间通过“新罗道”交流的事实。还有在日本文献中也有唐朝使节韩朝彩沿着这条“新罗道”经由渤海到新罗的记录。这条通道不仅连接渤海和新罗,有时还成为了渤海使臣前往日本的要道。777年1月,渤海使臣从南京的吐号蒲出发前往日本。总之,新罗和渤海之间虽有过互派使节的记录,但几乎未发现两国之间曾有过经济交易或友好的外交关系的内容。因此,仅凭《三国史记》派两次使节的记载和有关新罗道的渤海资料说是两国之间有同族意识,不足以首肯。

在韩国史体系化问题上,新罗和渤海间的“同族意识”诚然重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后代人是如何评价两国关系问题。首先,新罗很清楚渤海国继承高句丽的事实;其次,高丽统一后三国后也认为自己跟渤海有姻亲关系,所以在渤海

灭亡之际积极接纳其贵族和遗民。再次,从宋代徐兢撰《高丽图经》或高丽史家李承休编《帝王韵纪》来看,高丽知识分子基本认为渤海是高丽国的前史。朝鲜后期,柳得恭(1748~1807)撰写《渤海考》,主张新罗统一后的时期应该看作是接续三国时代的“南北国”时期。他在“渤海考序”中说,“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为南北国。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柳时严正地告诫我们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时期。

目前,我们生活在南北分裂时代,那么我们的后人会如何评价这个历史时期呢?或许会称为“南北韩时代”?对我们来说,为了克服南北分裂的悲剧,积极应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史进程,应该冷静分析新罗和渤海的对内对外政局和各国的历史,从中寻找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戒混淆是非,将过去的“南北国时代”和现在的南北分裂看作是一回事。我们在新罗和渤海及其周边国家相互合纵连横的历史显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对唐“朝贡”贸易

圣德王以后的罗唐间朝贡册封关系可谓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即王道思想外延扩大的产物。从周边国家的立场来看,籍以中国和周边国家间表面上的臣属关系,确立了既和平又稳定的国际秩序。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新罗国家得以保持稳定的发展。仅在圣德王在位期间(702~737年)新罗政府就有过45次对唐交涉,期间两国的人力、物力交流较过去增长幅度很大。在与唐朝交流过程中,新罗不断接受盛唐文化和西域文化,结果新罗文化得到飞跃性发展。当时新罗被唐朝赞为“君子之国”、“仁义之国”,文化和思想日益成熟。

罗唐外交不是单纯使节往来的关系。通过“朝贡”这一形式,促进了政治文化交流,还进行了广泛的商品交易活动。新罗与唐的公共交易关系再扩展到日本。新罗统一之前朝贡品主要是土特产品,但统一后贡品内容变得丰富起来,增添了技术上优秀的产品。例如,刺绣毛纺地毯、活灵活现的万佛像等微缩产品的技术达到惊人的水平,连唐朝皇帝都赞不绝口。

三国统一后新罗王室和贵族在扩张1.5倍的领土和人口基础上享受着富饶的生活。七世纪末,首都庆州都有三处大市场,统治阶层的物质欲望越发高涨。拥有优秀工匠的王室和贵族们自己开设工坊生产奢侈品,但在品质和种类方面得不到满足,自然而然他们目光开始投向汇集全世界物产的中国和丝绸之路、海上之路等海外市场。

新罗和日本的外交矛盾

新罗和日本在百济复兴运动时是期互为交战国。高句丽灭亡后为了应对唐的压迫,新罗于668年(文武王八年)先向日本派遣使节,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一直保持紧密的关系,频繁交流。截止新罗向日本派使的最后一年779年(惠恭王十五年),新罗派使节次数达45次,而日本则向新罗派遣过25次。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初期间,新罗向日本传播了建设律令国家所需的知识和先进文化。

然而,圣德王执政以后新罗和唐的关系逐渐好转,701年完成大宝律令。此时日本的律令国家体制也得到完善,之后便出现了新罗和日本两国外交礼仪问题上的矛盾。仿照唐朝建设天皇制律令国家的日本在对外关系上把新罗当作藩国来对待新罗并采取相关外交形式。这是不可能的,及时新罗当时处于唐朝和日本两面夹击的处境,也不可能认可新罗和日本的关系等同于罗唐关系。

与此有关,有必要考察新罗和日本使节在对方国家停留的时间。新罗派遣日本的使节在日停留时间最长不超过4个月,平均在2-3个月归国。而日本使者到新罗停留时间多达7个月至10个月以上。这说明,日本的小中华世界对新罗没有多大优势,反而日本使节在新罗学习和接受中心文化。

结果,八世纪以后随着罗唐关系的好转,新罗和日本的关系却疏远。这种变化从神文王时期,即689年日本降低新罗使节的官阶而产生矛盾起已经出现。但两国关系真正恶化是从渤海建国,随之而形成以新罗和唐朝、渤海、日本为中心的新东亚合纵连横关系之后。新罗于733年向渤海派军支援唐朝,作为回报唐朝在735年承认新罗对大同江以南的支配权。新罗和唐朝处于蜜月关系的

726年至732年间,新罗未曾向日本派过使节团,而这期间渤海到时在727年向日本派过使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自从罗唐关系恢复到过去“蜜月关系”后,新罗对日本采取高压姿态。734年,派日使节团自称“王城国”遭到日本的驱赶,736年,来新罗的日本使臣报告说“新罗不守常礼,未接受使臣之意”。日本政府对新罗的态度极为愤慨,甚至都有过征伐新罗的公论。即使这样,742年景德王仍以傲慢为由拒绝接待日本来使。743年,新罗在给日本的国书中,去掉对日王尊重的“调”字,改用“土毛(特产品)”字样。日本也针锋相对,径直遣返了新罗使节。

渤海和唐朝间爆发战争的733年为分水岭,新罗和日本的关系严重恶化。新罗凭借与唐友好关系,对日本采取高压姿态。日本谴责新罗违反了两国在733年以前签订的“常例”。

对日本贸易的扩大

新罗在和日本进行外交较量同时,仍不断向日本派遣使节团,于732年、734年、738年、742年、743年都派使节团,共五次。这一时期派遣使节团规模很大,而越往后派遣的使节团规模越大。据《续日本纪》记载:新罗使节的规模有714年20名、719年40名、723年15名、732年40名左右,可是到了738年则派遣人数有147名,后来在742年187名、752年700名、763年211名、764年91名、769年187名,而到了774年多达235名。虽然新罗和日本两国的外交关系愈加恶化,但新罗派遣使节团的规模却跟关系恶化呈反比,到752年仍持续不断地增加。

在新罗朝廷负责对日外交的官署叫“倭典”,属于内省。内省是总体负责新罗王室业务的部署,其隶属单位多有手工业有关的官厅。据推测,倭典负责鼓励生产对日交易商品、运输和管理交易商品等等相关对日贸易行政业务。王室业务中掌管手工业的行政组织如此庞大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一现象虽然说明当时王室垄断了手工业技术,但从另一侧面表明王室对手工品的需求也不少。王室需求是针对对日交易,需求量大等于是对日贸易的规模大。“倭典”设在内省表

明对日贸易是由新罗王室主导。

新罗对日交易商品中可确认其数量的,有686年60余种、688年80余种、714年日本作为交易品的代价给新罗使节蚕棉5450斤。大体上讲,七世纪末以后新罗和日本的交易量开始大幅增加了。732年以后新罗使节团的规模猛增也跟这种趋势有关。

新罗的对日贸易除王室之外,真骨贵族也有参与。尤其是当时手握大权的上宰相等最高权门在和王室紧密联系之下,积极主导了对日交易。这一点从日本如何理解新罗的外交态度上可以感知。日本认为以733年为分界新罗的外交态度有剧变,是跟负责对日外交的上宰相金顺贞的死后由上大等思恭接替前任执政有关。一般认为思恭是反日人物,但从733年以后新罗派使有增无减来看,新罗执政者包括思恭并没有小看对日贸易的“价值”。

745年,居住在新罗都城禹金里的长春随“海贾(海商)”出海遇到风浪,漂流大海最后生还。该故事说明景德王时期新罗统治阶层热衷于对外交易的一面。尤其是在罗唐关系恢复后,新罗的对外贸易的规模更加扩大。此外,日本在与新罗外交恶化之时,也没有阻止新罗使节在日本九州进行交易。因此733年以后新罗派日使节的规模只能比以前增加。

八世纪新罗的对日贸易商品

八世纪新罗出口的产品中最典型的是用黄铜制作的“铷器(黄铜器皿)”。铷器多出自安城,所以出现“安城定做(意思是‘正合适’)”这样的俗语。朝鲜时期出色的黄铜器皿技术其实也是从新罗开始的。新罗的工匠用黄铜制作花样繁多的大碗、盘子、勺子等,几乎没有做不出来的洋式。金光灿烂的新罗黄铜器皿足以吸引日本贵族阶层。

在新罗把这种黄铜器皿称为“币罗”,日本在进口时也原封不动地接受“币罗”这个名字。因此八世纪以后日本将黄铜器皿称作“萨户拉(佐波理)”。萨户拉是“币罗”的日式发音。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人逐渐遗忘“萨户拉”的本意,即使用它

也不知其由来。有趣的是,在十世纪左右完成的日本文献中有介绍说,“萨户拉”原本的意思是指生产黄铜器皿而闻名的“新罗(币罗<杂罗<新罗)”。正如中国的瓷器迷住英国人,他们把瓷器叫做“China(中国)”一样。日本人也把黄铜器皿叫做“新罗”,完全被黄铜器皿迷住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十二世纪左右称黄铜器皿为“斯罗”。但当时中国某位学者看了介绍新罗和高丽制作规模巨大的黄铜器皿的文章,推测自己使用的“斯罗”可能是新罗的别名“斯罗”而来。就这样,当时在日本和中国一提起“黄铜器皿”就会想到“新罗”。新罗的黄铜器皿在东亚是“无与伦比”的商品。

出乎意料,除了有名的新罗黄铜器皿外,还有很多相关当时交易过程的文献资料留传下来。假如说1200年前新罗出口日本商品,还原封不动地、色彩艳丽地保存到现在的的话,有可能不相信。但确实存在,就在东大寺的仓库“正仓院”,在这里还保存着一千年前奈良时代日本王室和东大寺的日常用品。多达9000



图17 日本正仓院佐波里加盘文书

余件的文物丝毫没有损坏地保存至今,都跟刚刚制作出来似的散发着光鲜的色彩,令人难以置信。

奈良时代日本贵族所使用的这座正仓院里保存着的宝物中有日本产的,但多的是通过丝绸之路或海路传入日本的阿拉伯、中国、东南亚所产的物品,所占比重也相当大。日本通过这些物品宣传日本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以古代日本与世界文化产生共鸣而自豪。目前日本在介绍说这些文物来历是当时赴中国的日本使节或僧侣采购来的。正仓院的文物中确实有通过这种途径购置的。然而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还落后,对外活动并不活跃且跟中国的交流也微不足道。那么,可以说上述日本的介绍与实际不符。

1975年庆州雁鸭池出土的文物,为我们解开了种种疑问。因为出土的物品新罗贵族所使用的,而这些物品与正仓院的文物相吻合。例如,雁鸭池出土的青铜鹅和正仓院所藏文物完全一样,从形态到图案就像是一个工匠制作的作品。这说明当时两国统治阶层所追求的生活情趣大同小异。这是因为八世纪后新罗掌握东亚贸易,而日本正处于新罗贸易圈内。据说对当时日本人的印象中,新罗的商船简直是神话般的存在。实际上正仓院藏品中有很多确定为新罗制造的物品。首先,可以指出发现了《新罗村落文书》,包裹佛经“经帙”。其次,有被装到新罗陶器中运到日本的新罗“羊脂”或“人参”等药品。再次,有当时在日本被称作“新罗琴”的加耶琴。加耶琴前面下端镶嵌着大片波纹状金箔,在波纹间处处用以金色水草装饰着。挂着琴弦的雁足上也刻着金色水草,金灿灿无比华丽。即使现在拿来演奏,似乎也能听到如千年之前那动听的琴声。

这些新罗的经帙、药品、加耶琴等也许是新罗赠送给日王的礼物。即便是如此,在正仓院藏品中也有很多是除了新罗和日本间商业交易之外无法解释它的流入途径。比如说奈良时代东大寺僧侣们使用过的正仓院所藏黄铜制品。正仓院的黄铜器皿叫做“佐波里(碗)”名字,这中叫法在其他地方见不到。正仓院共藏有436个大碗、700个盘子和碟子、345个勺子等佐波里制品。“佐波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萨户拉”一样,是新罗黄铜器皿“币罗”的日式变音。

在所藏佐波里加盘的大碗中间发现了八世纪初期完成的新罗古文书。加盘是将许多个大小逐渐变小的大碗重叠在一起,其上面有盖子的成套大碗,这是



图18 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新罗琴

僧侣钵盂供养(吃斋饭)时所用的佛教用器皿。这些大碗中间夹着古文书,据推测是新罗为防止黄铜器皿表面受损而塞进去的“包装用纸”。

当时新罗将使用过的公文当作废纸收起来,用于物品的包装。正仓院藏品中还有些日本从新罗购入后一次未用,一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成套的佐波里勺子。这套勺子中有2个圆形和椭圆形勺子作为一套,用纸包起来,再把10套摆放很整齐,用绳子捆好后摆放着。从这种佐波里产品的数量及包装状态来看,很有可能是东大寺通过某种途径大量购入的。正仓院里的屏风中发现大量有关752年新罗和日本贸易过程的最新资料。

752年新罗使节与《买新罗物解》

正仓院藏品中有《鸟毛立女屏风》六幅。屏风中绘有以树木岩石为背景站着的丰满美人,使用真羽毛以拼贴技法装点了图中美人服饰。当维修屏风时,发现屏风的裱褙纸和画面内纸是使用了日本古代文书,共整理出30余张。文书的内容很有趣,记录着752年日本贵族购买新罗使节带来的交易商品的内容。这是购物明细单,记下要买的物品名称和数量、价格交给日本相关管辖官署的文书。实际上这是申请购买新罗物品的文书,因此把文书称作《买新罗物解》。

根据文书记载可以了解当时对日交易的商品。除了人参等药品外,还有像苏芳这样的染料、黄金和其他矿物、黄铜餐具类“币罗”、各种仪礼用具、毛织地毯“毛毡”、食品、皮革制品、书等等。这些珍贵香料、药品、化妆品、染料等花样繁多的日用品,有新罗生产的,也有从中国市场、阿拉伯商人手中购买的通过丝绸

之路或海路进来的商品。这些物品体积小、价格高,是新罗人为获取暴利而准备的。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文书内容看,当时新罗向日本出售了百余种物品200件以上。《买新罗物解》文书是偶然发现侥幸留存被公开的。

752年,即景德王十一年新罗向日本派遣使节团,共有7艘船、700余名使节随行。使节团的船舶抵达九州太宰府,在这里卸载370人后继续前行,约两个半月后,6月14日到达日本首都奈良。中途下船的370人一直停留在太宰府或者大阪的难波进行私人或民间贸易。可见,当时新罗的使节团不单纯是外交官,还有不少是有经验的商人。《买新罗物解》告诉我们,正仓院所藏奈良时代日本贵族的文物中,有相当数量是通过新罗赴日使节团的途径购入的。

日本和新罗关系恶化时,日本试图利用遣唐使或渤海使从新开发海外物品进口途径取代新罗,但效果不佳。最后,日本拒绝新罗派遣使节团形式进行交易,只认可以九州太宰府为中心的两国交易市场,以此来进口“新罗物品”。768年,天皇将太宰府的蚕棉赐给日本贵族2万吨或1万吨不等,让他们购买“新罗交关物”。这一事实表明新变化了的两国关系。总之,733年以后两国外交关系的逐渐疏远,最终只剩下“太宰府的交易关系”。新罗对此欣然接受,说明八世纪以后新罗对日外交是追求交易利益而已。752年大规模贸易活动便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对待新罗使节以“藩国”使臣,新罗虽有抗议,但两国关系仍在继续,图的是经济利益。738年,即孝成王二年后新罗一直派遣使节到九州的太宰府进行交易。实际上新罗和日本的外交除了一次应唐朝的要求派遣使节团之外,基本没有实质性的外交。764年,唐朝遣使要求新罗派使确认僧侣戒融的信息。僧侣戒融是在唐留学后经过渤海去了日本。此外,在769年和774年,为递送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书信,新罗向日本派遣了使节。但新罗派使的外交是借以执事省和太宰府之间的业务交涉得以实现。

779年,日本派遣太宰府官僚到新罗请求归还被关押在耽罗的日本使臣和唐朝使臣。日本使臣是赴唐朝归国途中与唐朝使臣一同漂流到耽罗而被拘禁。新罗接受日本请求派遣了使臣,但不满于日本重新要求新罗王上呈“表文”当新罗为自己的藩属国而感到不满,未再向日本派遣过使臣。

新罗断绝跟日本外交关系应该有诸多原因,但最主要还是新罗和日本都认再

不需要两国外交关系。渤海文王时期和唐朝的关系有极大地改善,使得东北亚紧张局势呈现缓和趋势起到重要的作用。新罗认为国际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继续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同样日本也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渤海跟唐朝进行交流,所以到八世纪中叶以后两国关系随着两国交易量的减少而逐渐疏远了。

中代没落的前兆

《三国史记》中记载这各个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情况,共有43种584次的天灾地变记录中有240次集中出现在八-九世纪。这一数字是比前两个世纪多出两倍。按灾变记录多的王朝顺序排列,分别是圣德王时期42次、景德王时期28次、惠恭王时期28次,都集中在中代后半期。这意味着被认为是中代最繁荣时期的圣德王~景德王时期是新罗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

灾变中,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与农民生存带来直接影响或打击的灾变都有饥馑和疾病、洪水、干旱、不合时宜的雪、霜、冰雹、昆虫等。把这些挑选出来按世纪进行观察,会发现其统计数字比例与上述灾变统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八世纪前期,即圣德王时期起呈现激增,而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达到最高峰,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减少。因此前面上述中看到的新罗自然灾害统计数据,不单纯是观测天文异常现象的数字,它是在清楚地告诉我们毁掉新罗社会生产结构的自然灾害频度。可以说,圣德王时期不是国家发展的高峰期,而是中代历史没落的前夕。

由此来看,圣德王至惠恭王之间这中代的最后70余年对新罗人来讲是最残酷的时代。太宗武烈王远征百济、文武王远征高句丽以及旋即出现的罗唐战争,这些对于新罗人来讲,“中代”时期可能是最悲惨的“战争和灾变时代”。这和“一统三韩”而自豪的中代王权另当别论。在景德王时期,已经有上大等金思仁以不断出现灾变为由‘极论’时端的事实。在《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也有记录说惠恭王时期“灾异”频繁,民心背离,国家变得岌岌可危。这说明当时统治阶层也因自然灾害而感到的及其不安。

自然灾害与传染病的流行

八-九世纪新罗社会,由于自然灾害导致饥荒,引发了传染病。而这种现象通过东亚国家间的频繁的外交交流,几乎蔓延整个东亚地区。这个时期也是新罗与唐朝、渤海以及日本等国家相互间的外交和贸易交易最为活跃的时代,因此超越国境的传染病种类随之增加了。尤其是特定疾病的病原菌传入到一些不具备抵抗力的地区,其传染速度和危害性都不可想象,问题非常严重。

八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最高权门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先后染上“豌豆疮(天花)”而死亡;785年新罗宣德王也染上“疫疹”而死亡。传染病面前,条件尚好的统治阶层也无法幸免,普通百姓就不用说了,疾病对穷人更加残酷。

据编年史记载,中代王室针对自然灾害和传染病采取了一些对策。例如,打开仓库抚恤百姓;在官府增设漏刻博士或天文博士预测气候现象,实施预防。还设立医博士培养医学生,当国家出危机时,破格采用医学人才。

众所周知,当时的科技和医术没有那么发达,还不能预知自然灾害、诊治传染病。此时,古代国家多采用咒术和宗教的方法来消除人们的不安合危机感。就在八到九世纪在新罗集中出现具有治病神力的“药师佛”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景德王时期,中央和地方举办过为数不少的佛事活动。皇龙寺的巨钟、奉德寺圣德大王神钟、佛国寺和石窟庵及芬皇寺里建造30万斤以上的巨大药师佛塑像,这些均为国家主办而建成。到目前为止学界一般认为,佛事活动是中代绚丽多彩的文化的体现。但有必要首先考虑到这些国家行为的佛事活动首先是为了安抚百姓不安的心理,驱赶可怕的疾病而采取的非科学的国策。

国际秩序的动摇与禄邑制的复活

唐末发生的“安史之乱(755~763年)”不仅推倒了唐朝内部的政治体制,还给当时东亚国家带来冲击,新罗王权也随之开始动摇。新罗在自然灾害、传染病



图19 庆州南山三陵谷石造药师佛坐像

以及不稳定的国际秩序影响下,统治阶层的矛盾和危机感达到最高潮。尤其是真骨贵族乘机发动叛乱向王权挑战愈演愈烈,导致新罗国家的生产、再生产结构的荒废,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无奈之下,在景德王十六年(757年)重新恢

复过去被神文王废除的“禄邑制”。

统一之前,新罗真骨贵族势力是通过禄邑制保障自己的经济权益。禄邑制是按照贵族的官阶和官职,由国家分给一定的地区的制度。据此,贵族官僚掌管该地区的收税和徭役等,对该地区进行人身支配。这种制度对真骨势力非常有利,使得真骨贵族支配地方权力。新罗统一后,神文王废除禄邑制,施行禄俸制。禄俸制是国家统一收税来充当国家财政的来源,再按贵族所担任的僚所担任的官职来分配报酬的制度。禄俸制是国家控制贵族对农民的私人支配的措施,也是和禄邑制的不同之处。

禄邑制虽有允许真骨贵族的地方支配权这样的问题,但不乏有其能够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的有利之处。而真骨贵族在自己管辖地区为增收税收自给自足,只能管好生产和再生产。新罗建立之初,形成和真骨贵族共同支配的原因,也是因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本身的不稳定,面对自然灾害面前极为脆弱。统一后新成立的中代王室借以高句丽、百济领土的税收而剧增的财政力量,欲以超越原有的“真骨共同体”势力,但在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面前,在古代社会本质性局限性前面被屈服了。

真骨权门的势力扩大

统一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真骨贵族被淘汰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化、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支配能力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统治体制的开放性也有了极大进展。纵然如此,真骨为中心的身份制,即骨品制仍是左右新罗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机制。统一以后,相对增加了头品阶层和其他中、下层身份的人的扬名立身的机会,但在长期和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代社会的阶层变动减少,国王的亲信们独揽权力和财富的现象愈加严重。恢复“禄邑制”等于是给真骨权门扩张势力的良好基础。

《新唐书》中记载:“新罗宰相家俸禄不断,奴僮(奴婢和侍从)3千名,藏有武器(甲兵)数量也与其相仿。还有三千多的牛、马、猪放养在岛上,想吃便射杀。给百姓租佃粮食,秋收还不上则归为奴婢”。这大概引自惠恭王(765-780年)初

期来到新罗的唐朝使臣顾愔所撰《新罗国记》的内容,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新罗最高真骨权门经济情况。

真骨权门拥有广阔的私有土地和牧场,如果是王的近亲或有功者还会拥有食邑。景德王十六年以后,因为恢复禄邑制,真骨权门经济基础越来越壮大了。可谓“俸禄不断”。另外,宰相家拥有三千数量的奴僮、武器来看,若逢非常情况随时可以收集私家兵力。

宰相家还拥有众多智勇双全欲以出人头地的“门客”、“谋士”。这些人在贵族麾下平常是为贵族管理田庄的“知庄”或者向贵族出谋划策的“贤士”,而遇到非常时期这些人便成为组织、指挥私兵的将才。真骨贵族和门客之间虽是受骨品制约的主从关系,但也是个人之间的结合关系。

中古时期,真骨贵族麾下除国家的军事组织之外,还有贵族自己选拔的人才。大耶城城主金品锡的幕客竹竹、金庾信为拯救赴高句丽的金春秋,选拔3000名敢死队的事情便是例子。他们不是亲族或共同体征用的士兵,而是为特殊目的而被选上的人才,完成任务后也与贵族保持私人关系,根据他所担任的职责行动,成为贵族家武装势力,即私兵组织的基础。

地方权势或一些农民到都城谋取生存或想找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些人基本成为满足统一战争而需要的兵力来源。他们或者积极参与征兵活动,或者投身贵族门下,谋求安身立命。花郎道的设立目的是为选拔官吏,花郎和郎徒的关系随着他们的成长有可能改变成贵族和门客间的关系。因为权贵们为扩大政治、军事上的势力积极吸纳他们。金庾信不是新罗旧贵族,他是加耶出身的新进贵族,所以他在新罗没有血缘和地缘上背景基础。他之所以能成长为新罗最高权门,是因为他成功地将那些幕客变成自己的势力。

惠恭王遇害与中代没落

中代末期的真骨贵族私兵组织中,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势力。有记录说,惠恭王时期发生的贵族势力的叛乱是“王都以及五道州郡的96角干之间的斗争”。过去

善德女王十六年(647年)发生的毗县之乱当时,中央贵族的叛乱局限在都城和周边。对于中代初期发生的金钦突之乱,神文王在国书中说是“祸内外相通”,很显然中代时期中央贵族的判断开始利用地方势力。从另一角度看,历史推进中代后,中央贵族势力基础跟从前不同,开始摆脱了都城庆州扩大至全国。

中央贵族利用权势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国家军事组织中的要职上,想把军事组织内外的指挥官召至自己麾下,试图拉拢他们。但国家军事组织中,由于运营问题等各种原因很难确保“公兵”对国家的完全忠诚,所以那些权贵们投入更多精力培养对自己无条件忠诚的部队,也就是私兵组织。因此,参加叛乱的公兵与其说是单纯的公兵,不如说是被权贵们收买的伺机出人头地的地方人。

自恢复禄邑制后,新罗贵族阶层的精力力量越来越壮大了。权贵们所拥有的土地都有寺院、土地兼并、投托等形式积累起来的。而恢复禄邑制政策之后,王权无法制止权贵们无节制的土地掠夺。其结果,农民的生活每况日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成为被人雇佣的“长工”和“奴婢”等。普通农民是农村主要生产力,因而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但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他们的身份转变为权贵田庄主的隶属民。在双重的压制之下,农民生活逐渐贫困。一言以蔽之,新罗惠恭王时期恢复“禄邑制”后为数不少的农民成为了权贵门下的“私民”。

继景德王之后即位的惠恭王年纪尚小,因此他无法拒绝在真骨权贵们的强烈要求,也没有能力去掌控这些权贵创造出新的秩序,维持先王所营造的强化王权的政策。于是景德王亲自改编的九州地名也在惠恭王即位不久便恢复到过去贵族禄邑时的旧地名。虽然惠恭王迁就真骨贵族,通从他们的要求,但很快就爆发了大恭的大规模叛乱。“大恭暴乱”之后都城和地方的真骨贵族在三年之内相继起来叛乱。最后,惠恭王面临五道“州郡”与“96角干”相互争斗的大乱局面。因此新罗的王权在由96名角干所代表的真骨势力的合纵连横中决定其向背。

中代最后一位王,惠恭王(765~780年)无法控制真骨对王权的不断挑战,最终被以镇压金志贞叛乱为借口举兵的上大等金良相和伊滄金敬信所杀。此后,王位落入金良相手中,他就是宣德王。从此,太宗武烈王血统统治的中代王室被落下帷幕,金良相开启了新罗下代的历史。

第二章

下代的揭幕与开展

下代的揭幕
真骨贵族的分裂与相争
真骨贵族的联合
思想界的新动向

1

下代的揭幕

下代的意义

《三国史记·新罗本记》末尾有记载新罗史的时期划分。其内容如下：“国人分自始祖至真德王二十八位王期间为上代，武烈王至惠恭王八位王期间为中代，宣德王至敬顺王二十位王期间为下代”。新罗人认为真德王至武烈王；惠恭王至宣德王的王位更替是新罗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三代的时期划分标准现在也在通用。

中代的许多王都是太宗武烈王子孙。而宣德王与继承其王位的元圣王是奈勿麻立干后裔。元圣王以后登基为王的金氏王均为元圣王后代。如果说中代是太宗武烈王世系时代，那么下代则是元圣王世系时代。

统一战争结束后，新罗一度迎来了和平与稳定的时代。但到了下代则经常出现政治上的混乱和经常上的问题，百姓因歉收和饥荒而受苦。有权有势的豪族逐渐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强化自己的独立势力。随着混乱的加剧，新罗的版图最终一分为三。如果说中代是新罗的鼎盛时期，那么下代则是它的衰亡时期。

据佛教的三时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佛法也会逐渐衰退，经过了正法时代、像

法时代,就到了末法时代,即末世。下代的新罗人认为自己生活在末世,层出不穷的社会混乱也被视作末世的社会现象。新罗人认为惠恭王、宣德王为分界线,新罗国王的世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预示着进入衰退期,结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下代。

进入下代的前半期,经常发生真骨贵族的王位争夺战。趁着贵族的争斗不休地方豪抬高了头扩展势力,其中典型人物便是张保皋。针对地方豪族的兴起,真骨贵族们采取了联合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新罗似乎很稳定,但随即出现了危机。889年,即真圣女王3年发生了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不止于一年,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下去。这种的历史背景之下,新罗帝国开启了“后三国”时代的序幕。于公元935年新罗敬顺王向高丽太祖投降。至此,拥有千年历史的新罗帝国落下了帷幕。

宣德王即位

武烈王与文武王将统一战争引向了胜利。受此影响,王室的权威大大提高,神文王也紧锣密鼓地强化了王权。中代的王权统治在圣德王期间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到了下一代景德王时期,真骨贵族开始对王权统治表示不满,甚至挑衅王权。景德王十六年,即757年3月恢复了过去的禄邑制度。这一措施等于是景德王对真骨贵族的挑战做了妥协。但也沒有放弃强化自己的王权。决定重新提供禄邑的那年的12月,颁布命令将全国州、郡、县名称都改为汉式地名。景德王十八年(759)官府与官职的名称也一同更换为中国式官名。新罗王权施行“汉化政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改地名、官名以求方便,且更为主要的目的是试图借鉴唐朝制度,推行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体制。

真骨贵族挑战王权,自惠恭王八岁即位,由其母后满月夫人摄政时期开始。真骨贵族以此为契机,正式向王权发起挑战。惠恭王四年(768)8月一吉滄大恭与弟弟阿滄大廉引起叛乱。据说叛军气势汹汹地包围王宫,持续33天后被平定。这是一说,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次叛乱在王都以及五道州郡的96角干相互

争斗,一直持续三个月。惠恭王六年(770)大阿滄金融发动了叛乱但很快就被伏诛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叛乱中金庾信后裔也参与其中。说明在中代王权统治之下,社会地位逐渐变低的金庾信家族对王权表示不满。

惠恭王十年,即774年9月金良相成为上大等。其祖父金元训在圣德王时期担任中侍,其父金孝芳与圣德王之女四炤夫人成婚。金良相借助圣德王外孙的身份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而在景德王二十三年(764)作为阿滄被任命为侍中,共任职四年。期间,在为祭奠圣德王建制大钟的工程中,他和上宰相(上相)金邕同为检校使负责全部工程。惠恭王七年(771)完成了大钟的制作。还作为角干兼任肃正台(原司正府)和修城府(原京城周作典)长官。从金良相的家庭背景或政治履历来看,他理应持有拥护中代王权的态度。

但是在金良相任职上大等不到一年,就连续发生两次叛乱。一次是惠恭王十一年,即775年6月伊滄金隐居发动了叛乱。当年8月伊滄廉相和正门有起兵谋反。金隐居曾在惠恭王三年(767)作为国王使臣被派到唐朝禀告新王即位,请求册封。第二年回国后,当年10月至惠恭王六年12月期间曾担任过侍中。廉相也曾在景德王十七年(758)至景德王十九年期间担任过侍中。他在任期内实施过更改汉式官名的政策。正门是作为廉相后任,做了当时的侍中。上这些人基本都是所谓理应支持王权统治的人们。但是,上述在775年发生的两次叛乱的主谋都是所谓支持王权的势力。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王党派内部正在发生政治上的分裂现象。

叛乱被镇压后,金良相及其一党立即采取了大胆的措施。惠恭王十二年(776)正月,他们断然恢复了景德王时期更改的中国式百官称号,恢复到之前的官名。据推测,这一时期一些被更改为汉式地名的州、郡、县名称也被回改过来。这一现象说明他们全面否定景德王所推行的“汉化政策”。于此同时下代正式拉开了帷幕。金良相在惠恭王十三年(777)通过上诉,要求追究惠恭王所施行的统治政策。金良相通过这一系列过程中确立了作为反王派领袖的地位。

惠恭王十六年,即780年2月伊滄金志贞纠集一群人包围宫阙。同年4月金良相与伊滄金敬信一同打着清除奸臣的口号进行反击。结果金志贞等被杀,且惠恭王和王妃也在混战中遭杀害。有记录记载,说惠恭王是被宣德王与金良相(金敬信的误记)弑害,也就是说王与王妃是被金良相一党所杀。在这次政变中

太宗武烈王后裔金周元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武烈王政权是被反对王权的真骨贵族联合势力所摧毁。

继惠恭王登上王位的人就是金良相,他便是宣德王。他是奈勿王第10代后孙。宣德王即位后,只追封其父亲金孝芳为开圣大王。只追封父亲而不追封其他先祖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把外祖圣德王从五庙中迁出来。五庙中供奉着始祖大王(味邹王)、太宗大王(不迁位)、文武大王(不迁位)、圣德大王、开圣大王。这些被供奉的人物中有三名中代的国王,值得关注。

宣德王时期,太宗武烈王后裔金周元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曾在惠恭王十三年(777)10月被任命为侍中。金周元虽然是武烈王后裔,但在政治立场上和金良相保持一致,因此颇受当政者金良相的器重。他在宣德王即位后,在780年辞退侍中一职,但作为上宰相(上宰)仍发挥了政治影响力。金周元是当下最有力的王位继承人,因为宣德王膝下无子。

为宣德王即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是金敬信。他在整个宣德王期间一直担任上大等。金敬信和宣德王同为奈勿麻立干的子孙(第12代孙)。但他的职位是副宰相(二宰),在王位继承排名中也落后于金周元。

宣德王本想在任5年(784)就退位,但在大臣们的挽留之下作罢。第二年正月他在病榻上下遗诏写道“一直想让位退出”。宣德王要禅让,很可能是因为夹在两股势力中间左右为难。支持武烈王系金周元的势力和支持奈勿王系金敬信的势力,这两股势力相互对持的状态下,宣德王很难正常施政。虽说下代已经拉开帷幕,但他无法忽视武烈王系的影响力。

另外,宣德王设立溟江镇,分管礼成江以北地区。在此之前,圣德王三十四年(735)唐朝承认大同江以南地区为新罗主权后开始对此地进行开发。景德王七年(748)在大谷城(平山)以下设10个郡县行政区。到景德王二十一年(762)时,其中的6个郡县修建了城邑。宣德王继承了中代以来的北进政策,在宣德王二年(781)派遣使者去安抚溟江以南的州郡。782年将位于来往礼成江以北地区的中枢地段上的大谷城升格为溟江镇,令百姓迁居到此生活。宣德王四年(783)阿湲休信被任命为大谷镇军主,设置溟江镇的事业告一段落。

后来溟江镇所管辖的地区进一步往北扩大,到了宪德王时期新设置取城郡

(黄州)和3个领县。以此新罗帝国的领域扩大到了大同江南部。后来在宪德王十八年(826),动员汉山北部一万名百姓修建了长达300里的溟江长城。至此,基本完成了礼成江以北地区的国土开发工程。

元圣王系的成立

785年正月宣德王驾崩,之前尚未指定王位继承人。因此,金周元和金敬信二人展开了一段王位继承竞争,最终金敬信取胜,于785年2月登基称王。按记载:当时北川泛滥,使得住在北川北边的金周元无法进入王宫,金敬信趁此机会喧宾夺主。还有一种说法是许多大臣接到宣德王之母贞懿太后的教旨,欲立金周



图1 庆州挂陵(传元圣王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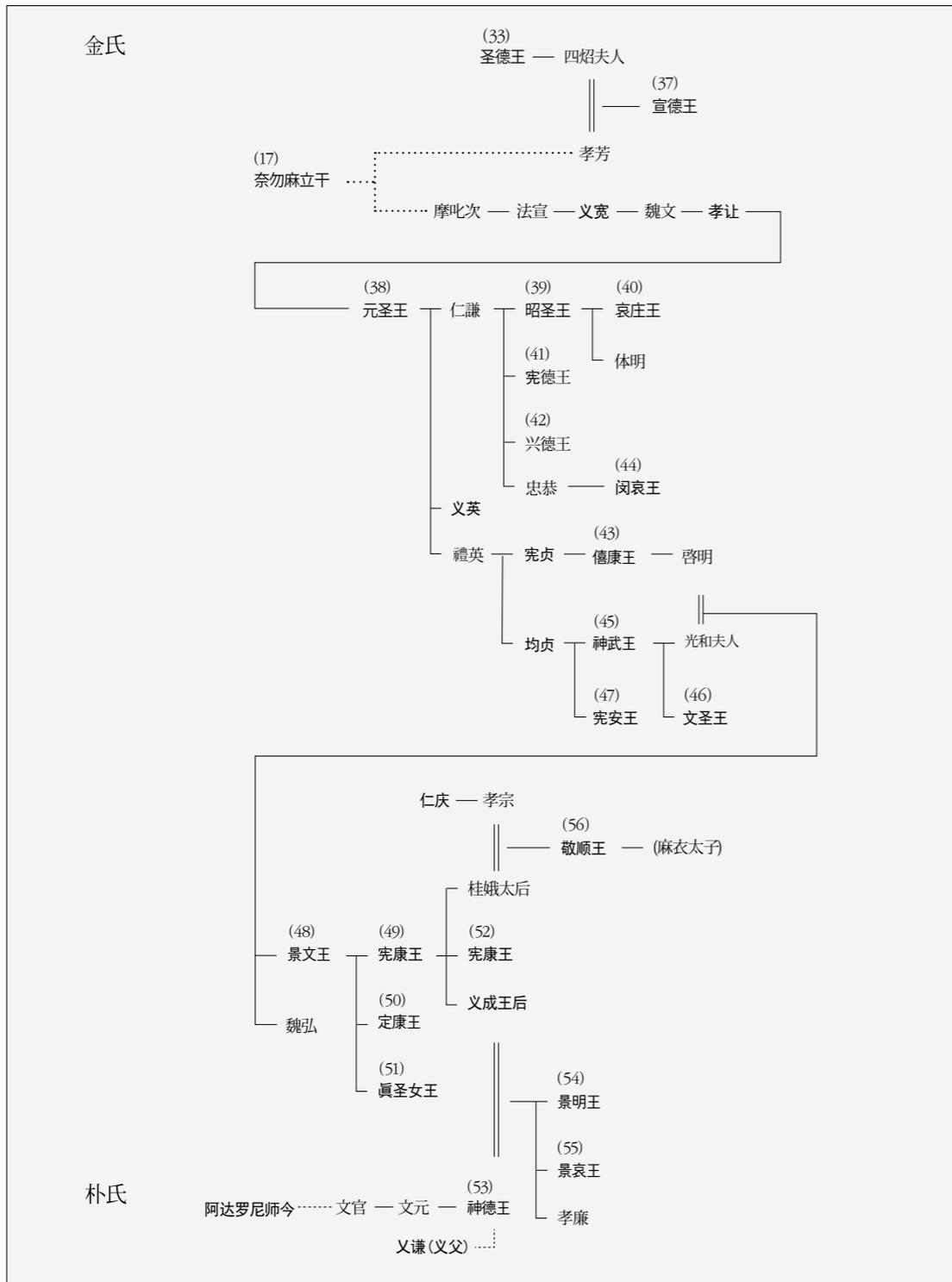


图2 下代王位系谱图

元为王。但金敬信威逼他们不得进宫,自己先进宫当上王了。总之,地位不高、排位靠后的金敬信利用不正常的手段排挤金周元而登上了王位。从此,新罗末代国王当中,除了三名朴氏王之外,其他都是元圣王后代。所谓元圣王系王室出台了。

元圣王即位后拆除了供奉圣德大王和开圣大王的两座庙。而后供奉始祖大王、太宗大王、文武大王以及其祖父兴平大王、其父明德大王等五位,更换了五庙供奉对象。试想元圣王做这样的抉择也不太容易。实际上,到哀庄王时期才实现了全面改编五庙制。到哀庄即位第二年,也就是在801年2月另处别建两座庙宇供奉太宗大王和文武大王。然后以始祖大王为首位,依次加上自己的高祖明德大王、曾祖元圣大王、祖父惠忠大王、父亲昭圣大王等四座亲庙构成了新的五庙。当然主导改编五庙的事宜的人是当时摄政金彦昇。以此抹掉了中代王室的残影。改编五庙制等于是宣布了元圣王系王室的确立。

元圣王于785年2月登基,并册封长子金仁谦为王太子。但没过几年,在元圣王七年(791)王太子去世。翌年立次子金义英为王太子,不料这次王太子也早逝,卒于元圣王十年(794)。无奈元圣王在795年,也就是元圣王十一年正月,再次册封金仁谦之子金俊邕立为太子。利用不正当的手段登基称王的元圣王希望通过尽早册封王太子,稳定王位继承。

798年12月元圣王去世。799年正月金俊邕顺利继承王位,他便是昭圣王。然而昭圣王即位不到两年,即在800年6月去世。昭圣王统治国家仅就一年半,驾崩之前已经册立王子金清明为太子。年仅13岁的金清明继承王位,他便是哀庄王。因为年幼,由叔叔金彦昇来摄政。在哀庄王九年(809)金彦昇谋杀哀庄王,自己登上了王位,他便是宪德王。从此,王室通过立太子继承王位的传统暂被打破。

但宪德王于宪德王十四年(822)将弟弟金秀宗(或金秀昇)立为“副君”(或“储贰”)住进“月池宫”。“副君”(“储贰”)指太子。“月池宫”被认为是东宫。宪德王死后,其弟弟金秀宗即位,他就是兴德王。据记载:“兴德王继承王位,宣康太子监抚”。宣康太子是金忠恭,他是兴德王金秀宗的弟弟。兴德王无后嗣,将弟弟金忠恭立为太子。虽有了一些曲折,但元圣王系王室力求坚持太子

继承王位的宗法。

元圣王册为保障王权顺利延续,除了费心册封太子同时,还遴选王族近亲安排要职。金俊邕在元圣王五年(789)作为使臣赴唐,归来后担任大阿滄。翌年还作为波珍滄,被封为宰相。791年10月到次年8月担任侍中,792年除授兵部令,到795年被立为太子。金俊邕的这些官职不是依次担任,是同时兼任了侍中,兵部令,宰相等要职,之后又兼任了宰相及兵部令两职。再如金俊邕弟金彦昇的升迁做官经历与哥哥相似。元圣王六年(790)他也作为使臣赴唐回国后便成为大阿滄。翌年因镇压前侍中“悌恭之乱”有功又升为迺滄。794年2月担任侍中,796年4月又任兵部令,于元圣王十一年(795)也被封为宰相。金彦昇自795年之后,同时兼任侍中、宰相、兵部令与宰相等职。

王族近亲独霸权力的现象在此之后也并没有停止。金彦昇在侄子哀庄王即位后,兼任御龙省私臣和上大等(801)。在哀庄王五年(804)金秀宗担任侍中,到宪德王十一年(819)又被任命为上大等。金忠恭在哀庄王时期已进入到权力核心。他在817年1月到821年4月一直担任侍中。822年正月又被任命为上大等。这期间金忠恭在政事堂行使了处理内外官人事问题等实权。807年,也就是哀庄王八年到宪德王二年(810)正月担任侍中。宪德王五年他作为伊滄担任了国相、兵部令兼修城府令等官职。金宪贞之弟金均贞自宪德王四年春起到宪德王六年8月一直担任侍中。在发生金宪昌之乱时,他作为伊滄担任讨伐军的司令官。

虽说新罗下代已拉开帷幕,但政治状况来看和中代没有什么区别。哀庄王时期所完成的改编五庙制和惠恭王代的五庙制改革一样,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对王室祖先祭祀来强化王权。包括元圣王在内后期国王大非常重视册立太子的问题,实际上中代也如此。神文王,还有景德王甚至驱逐不孕王妃出宫迎娶新王妃。王族近亲独霸中央要职的状况也跟中代无二致。元圣王系王室所做的一系列王权强化改革引起了真骨贵族的不满和反抗。

2

真骨贵族的分裂与相争

金宪昌之乱

宪德王是哀庄王的叔叔,他是弑杀其侄子哀庄王金清明、金体明兄弟后登基。宪德王即位后重用其弟金秀宗及金忠恭等亲信寻求稳定王权。同时对真骨贵族元老毕恭毕敬。宪德王四年(812)伊滄忠永古稀生日时特赐几杖。宪德王十一年伊滄真元古稀之时亦赐几杖。伊滄金宪贞因病行动不便,虽未及70岁,但也赐给其拐杖。宪德王十五年正月,元顺和平原两位角籍年老请求辞官时,宪德王又赐他们几杖。宪德王是想通过礼遇真骨贵族元老的行动来平息他们不满情绪。这当然是权宜之计,只可惜维持时间不长。就在宪德王十四年(822)3月在熊川州发生叛乱,都督金宪昌是叛乱的主谋。

元圣王即位后,试图改善与金周元之间的关系,特封其溟州郡王,赐予溟州几座邑作食邑。金周元是太宗武烈王的后代,曾经和他一起竞争过王位。又在元圣王六年(790)任命金周元之子金宗基为侍中。

金周元的另一个儿子金宪昌在宪德王五年(813)正月被封为武珍州都督。宪德王六年8月又提拔为侍中,直到宪德王八年正月。之后金宪昌到外地任职曾做

唐朝或日本寻觅食物的情况。金宪昌虽标榜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但由于遇到史无前例的叛乱,王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明显削弱。因而无法施展理想不说,还为地方势力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环境。后来甄萱重建后百济;弓裔重建后高句丽。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宪昌之乱具有其先驱意义。

集权体制的整顿

继宪德王即位的兴德王,为减少金宪昌之乱所带来问题,重用了未参加叛乱的金宗基后孙金昕、金阳等。金昕曾作为使臣兼宿卫学生赴唐求学。在宪德王十四年(822)归国之后,历任南原太守、康州都督等,最后被封为宰相。而金阳自兴德王三年(828)任固城郡(固城)太守以来,历任中原小京的大尹、武州都督等。有关金庾信被追封为兴武大王的时间问题有两种说法,一是兴德王时期;二是在景明王时期。其中兴德王时期的说法更有说服力。若是如此,很显然这是兴德王为收买金庾信后裔而采取的措施。

兴德王为挽回因金宪昌之乱而扫地的国威,重用了弟弟金忠恭、堂弟金均贞等王室近亲。兴德王十年(835)2月任命金均贞为上大等。兴德王三年(828)任用金均贞之子金祐徽为侍中到兴德王六年正月。又在兴德王九年正月重新被封为侍中,后其父亲被封为上大等后才退下来。之后兴德王任命金忠恭之子金明作为其后任。并曾在起用堂弟金均贞为上大等的同时,也任命了侄子金明为侍中。兴德王通过对金礼英和金仁谦后代进行适当安排与任用,以求政治势力均衡。

元圣王系王室也跟中代王室一样以儒教政治为国家理念。为此,在元圣王四年(788)施行读书三品科,通过它选拔具备儒教素养的官吏。799年,即在昭圣王即位元年封清州居老县为学生禄邑。显然这是为提高儒教教育机构的国学实力而采取的措施。

805年8月,哀庄王六年国王颁布了二十余条“公式”,对律令的条目进行了修改。同年也对掌管官吏人事的机构“位和府”和“四天王寺成典”等的长官、次官官名改为中国式职称。比如“衿荷臣”、“上堂”等新罗固有官职名称改中国式“令”、“卿”。与此

同时,还缩减了“例作府”等多个官厅的“大舍”以下“史”等下级官职的编制。

哀庄王七年(806)又颁布了限制佛事教书,不准新建寺院,只允许维修已有的寺院。不仅如此,还严禁举行佛教活动时使用奢侈品。这一措施针对王室和真骨贵族社会盛行修建愿刹和举行盛大佛事,杜绝由此引发的各种弊端。哀庄王九年还往十二方面派遣使者调查全国性现状,并重新编制各地方的行政区域有效统治地方。

兴德王也想通过修改律令整顿集权体制。从兴德王陵碑铭文中刻有的“格式是皆”之句看,当时可能进行过格式编撰以及修订工作。虽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但在相关内容中有关兴德王四年(829)“执事部”改称“执事省”的事实值得关

图4 庆州兴德王陵



注。更名一事说明进入下代后执事部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了。这种措施可以解释为模仿唐朝三省制,以此来强化王权。这一点与景德王十八年(759)采取更换官府、官职名称来加强王权强化王权采取的措施五二致。以上措施都可能与二十余条“公式”有关。

兴德王还尝试整治身份制,这一点从兴德王九年(834)所颁布的国书中可知。兴德王在国书中说:“人有长幼,地位有尊卑,名称与法式不同,服饰也不同。如今风俗日益刻薄,百姓以奢侈、豪华为荣,崇尚舶来品中珍奇之物,厌恶粗糙的土产品,达到伤风败俗的地步。”实际上,当时骨品制社会的规范变得松散,尤其是贵族社会蔓延着奢侈的风气。为了整治统治阶层的风气,制定真骨以下分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平人、百姓等身份制度。其内容载入《三国史记·杂志》色服、车骑、器用、屋舍等条目中。

兴德王颁布国书的背景有以下几个部分,即针对风俗加以政治限制、重新评价骨品制社会里的同族集团、重组地方的各种集团等等。还有观点认为兴德王通过一系列行政制度的改革抬高王权,相当于中国皇帝地地位。从这一点来看,颁布国书和改称“执事省”均是兴德王欲以强化王权的措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苦心。

王位争夺战

宪德王无后,立其弟金秀宗为太子。兴德王也因无后嗣,而立其弟金忠恭为太子,不料兴德王十年(835)2月去世。于是兴德王任命其堂弟金均贞为上大等。虽没有直接封太子,实际上和立继承者别无二致。或者把金忠恭之子大阿谿金明当作考虑到继承者人选。不过金明才19岁,尚为年轻,政治经验也不足。而金均贞在宪德王时期就已担任侍中,并曾在平定金宪昌之乱过程中立下悍马功劳。兴德王在近亲王族中找不到能与金均贞相匹敌的王位继承人选。任命金忠恭系人选金明为侍中,牵制金均贞。

836年12月,兴德王去世,在位11年。弥留之际仅留下与已故王妃合葬的遗

言,只字未提王位继承人的事。真骨贵族拥戴上大等金均贞为王位继承者,而金均贞也认为理所当然。被推戴为王的金均贞带领其子金祐徵和礼徵、金周元系的金阳等入住了积板宫,并得到了族兵的护卫。但侍中金明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所拥戴的人选是金均贞的侄子,同时也是他妹夫金悌隆。之前他已做工作把阿谿利弘、裴萱伯等贵族拉拢到自己一派。金明、利弘等带领兵力前来包围王宫,欲以武力铲除金均贞一派。在冲突中金均贞被杀,金阳中箭后与金祐徵等人躲藏起来。这次王位争夺战以金明一派的胜利而告终,随即金悌隆即位(837年正月),他便是僖康王。

僖康王即位后分别任命侍中金明为上大等,阿谿利弘为侍中。当时政治实权还是掌握在金明手中。而对金明不满的金祐徵到处散布谣言说对金明不利的話。僖康王二年(837)5月金明欲以制止时,金祐徵担心遭殃跑到清海镇躲避。曾在兴德王三年(828)4月设立清海镇时,金祐徵身为侍中,可能与张保皋建立了特别的关系,所以遇到危险去找张保皋了。很快礼徵与阿谿良顺等也到清海镇与金祐徵会合。

僖康王三年正月,金明与侍中利弘等在宫中发动叛乱,逼僖康王自杀,后自己当登了王位。他就是闵哀王。同年2月,金阳到处招募士领兵进入清海镇,和之前到这路的金祐徵他们商议清除闵哀王的计划。闵哀王篡权为金祐徵一派提供了“弑君”的名分。金祐徵把这消息告诉张保皋,请求为他们支援兵力报(金明)杀父之仇,讨伐弑害国王逆贼。张保皋派遣自己的老友郑年,命他率领5千士兵帮助金祐徵一派举事。

金阳负责总司令率领金祐徵、张保皋联军。在两次战斗中击败官军,闵哀王被联军杀死(839年闰正月)。随即金祐徵登基称王,他就是神武王(839年四月)。早先在金宪昌叛乱时神武王作为指挥官参战,立下了悍马功劳。神武王不仅有帅兵能力,后又任职侍中过程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但可惜,神武王即位半年就去世(839年七月),没能施展自己的经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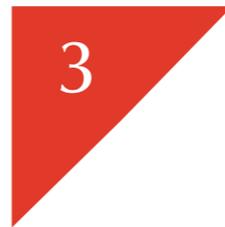
兴德王死后,重新激活的王位争夺战在元圣王系的内多个家族的联合与对决中展开。元圣王的两个儿子,即金仁谦系(金明=闵哀王)与金礼英系(金均贞);金礼英的两个儿子金宪贞系(金悌隆=僖康王)和金均贞系(金祐徵=神武王)之

间相互交织争斗。金周元之后金阳支持金均贞、神武王,而金昕则站到了闵哀王一边。

根据骨品制原则,真骨贵族后代只要不出现特别大的差错就可以维持其身份。虽有被自然淘汰或因政治斗争而没落的情况出现,但真骨贵族的人数继续增加。在人多而权力分配不均的情况下,真骨或在被称作武烈王系或元圣王系这一大范围内的所谓连带意识逐渐弱化。相对而言,以家族成员为名集结的情形较多。五庙制的确立,重视直系继承的观念,加重了这种倾向。包括王族在内有权势真骨贵族门中也出了现以各个家族为单位的分支,以此发挥社会、政治性机能。

另外,在王位争夺战中动用真骨贵族私兵的现象值得关注。上面所提到的护卫金均贞入住积板宫的“族兵”即是私兵;之后又有金悌隆与金明所率领的兵力也应是私兵。金宪昌之乱时,曾有花郎明基和安乐率领花郎徒出战,有人认为这些花郎徒也属于私兵集团。叛乱被镇压之后,金宪昌的宗族、党羽239名被处死,他们中一部分也可能是私兵。

统一新罗有权有势的真骨贵族长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一情况在中国文献中也有记载:“宰相家俸禄不断,奴僮3千名。甲兵(铠甲与武器)与牛、马、猪也(与奴僮的数量)相当。家畜在海中(岛上的)山上放牧,需要时射箭捕获。”真骨贵族家拥有三千铠甲和武器,可谓蓄养相当数量的私兵。这些私兵,有可能是将奴僮(奴才)武装起来作为私兵或着是收留战乱中的流民当作私兵。有权势的真骨贵族以禄邑或农场、牧场等为经济基础,暗中蓄养相当数量的私兵,这些私兵可能会被投入到王位争夺战中。



真骨贵族的联合

张保皋的兴起

张保皋于9世纪初期前往唐朝担任过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武宁军军中小将。当时武宁军作为徐州节度使的主力部队,在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战役中负责先头部队。军中小将是帅兵一千的高级将领。在这场战役中张保皋立下了战功而出人头地。

819年2月以击溃李师道为最后战役,唐朝基本平定了向朝廷举反旗的地方节度使。此后,唐朝缩减军备,大量缩编各节度使麾下兵力。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张保皋离开武宁军。据日本文献记载,约在824年张保皋与日本博多地区建立交往关系并开展了贸易活动。张保皋是在离开武宁军后便从事海上贸易。

唐“安史之乱”以后,李师道祖父李正己及其后人统治山东省一带约有55年之长。李氏一家除了平卢淄青节度使的本职以外还兼任了“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藩使”,基本独占了黄海的海上贸易权。至819年李师道被击溃后李氏家族贸易开始走向了没落,从而迅速兴起了私人贸易。当时在武宁军中做过军中小将的张保皋有可能这时候起投身了贸易活动。山东半岛是连接中国大陆与韩半岛以

及日本列岛的交通要道。在这里除了各国使臣往来之外,还有民间往来亦非常频繁。特别是新罗商人在山东半岛一带已然形成了“新罗坊”的专门贸易区。张保皋也把新罗坊当做了自己交易活动的根据地。

828年,也就是兴德王三年张保皋回到新罗。他向国王建议在莞岛一带设立“清海镇”并承诺定要惩治海盗抓新罗百姓卖为奴隶的恶行。兴德王封张保皋为大舍(大使),赐一万兵力令其防守莞岛和西南近海。自设立清海镇以来不久曾在韩半岛西南海岸出没的海盗无影无踪了。考察中国文献记录,也可知自从唐文宗太和年间(827至835)起,也是就新罗兴德王在位期间再没有发现海上抓新罗百姓的事。

有件事,就是当时朝廷赐给张保皋一万士兵这事值得商榷。考虑到当时新罗刚刚经历金宪昌之乱,财政和兵力都很紧缺的历史背景下更难想象。很可能是给他招兵的权力,允许他在莞岛一带召集一万士兵。莞岛可能是张保皋的故乡。那么也有可能是他在莞岛构建势力基础之后,向兴德王请求承认自己的势力。总之,清海镇的军队不一定是国家军队,很可能是张保皋私兵集团。另“大舍”官衔也是个例外,在新罗体制的职衔中找不到。新罗行政体制中,有在边境和海岸设军镇,但其长官称作“头上大监”(也称“都护”)或“镇头”。兴德王赐给张保皋“大舍”官衔说明他和清海镇的独立性。

张保皋通过海上贸易积累财富。他派遣“大唐卖物使”和“交关船”与唐进行了交易。“交关船”来往于山东登州文登县青宁乡赤山浦(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及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地区等进行交易。当时的扬州是一座东南亚和阿拉伯商人经常光顾的国际性贸易城市。张保皋做转口贸易,将购买的这些外国商品再销到新罗和日本等地,获得中间利益。当时张保皋专往日本派遣的贸易船和“廻易使”。张保皋还在日本博多地区设立了贸易基地与日本官员进行直接交易。通过张保皋贸易船所带去的物品在日本被称作“唐国货物”。虽然价格非常昂贵,但仍受欢迎。

神武王金祐徵在登基过程中张保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神武王封张保皋为“感义军使”,并赐给他二千户食邑。继神武王登基的文圣王也为张保皋颁布了国书,高度评价张保皋为先王即位做出的贡献,封张保皋之后为“镇海将军”并赐“章



图5 莞岛清海镇遗址

服”。当初神武王金祐徵曾向张保皋承诺过,谁帮助自己当上国王则会迎娶其女为王妃。在文圣王七年(845)3月文圣王欲娶张保皋之女作为自己的第二王妃。然而此事遭到了朝廷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说“眼下弓福(张保皋)是岛民,其女怎可成为王室配偶?”最终文圣王迎合了大臣主张,没有履行纳妃的承诺。张保皋对此怀恨在心,在文圣王八年谋划叛乱,不料被朝廷派来的刺客阎长所杀。文圣王十三年(851)2月,文圣王废除清海镇,把当地百姓全部迁移到了碧骨郡(金堤)。清海镇就这样消失了。

关于张保皋的死亡时间,学界对此有不同学说。与国内文献记载不同,据日本文献记载,张保皋死于841年11月。若是如此,当时有关“纳妃事件”和张保皋谋反应该是发生在文圣王三年,即841年11月之前。与此相关,在842年3月文圣王迎娶金阳之女为王妃的记录得到了关注。按此可以推测当时有一个人也为神武王即位做了重要作用,他是称为一等功臣的金阳。或许是他主导了“纳妃之事”,反对张保皋之女成为王妃。事后却令自己的女儿当了王妃。

张保皋身为岛民,身份归属地方人。若张女成为王妃,那么张保皋可以进入中央核心,其政治影响力肯定会扩大。从新罗真骨贵族立场考虑,他们不能容纳一个地方人进入中央。新罗骨品制是为都城贵族的特权而设计的。以此看来,张保皋不仅是海上之王而且还是抵抗骨品制,向权力中心真骨贵族发起挑战的人。

九世纪30年代末,新罗王权阶层内展开了激烈的王位争夺战。那些强有力的王位继承者金均贞和僖康王、闵哀王等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相继死去。王宫和都城变成了明争暗斗的没有硝烟的战场。甚至激化到了由地方军阀张保皋来决定王位去向的地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力明显弱化。张保皋虽然失败了,但在此之后地方势力在全国兴起,直接威胁真骨贵族的共同利益。为此在新罗社会的真骨贵族间形成了某种联合的态势。

金均贞系与金宪贞系的联合

神武王死后,于839年8月太子金庆膺即位。他就是文圣王。文圣王即位后立即任命在王位争夺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金阳为苏判兼仓部令。文圣王二年

(840)正月又任命礼徵为上大等、义琮为侍中、良顺为伊滄。文圣王以帮助神武王即位的功臣为中心整编了政界结构。

然而,频繁发生的王位争夺战带来的余震仍在继续。在大大小小的叛乱中,张保皋谋反就是一个典型性例子。此外,文圣王三年(841)发生了一吉滄弘弼谋反,败露后逃往海岛。文圣王九年在拥立神武王即位时立功的前侍中伊滄良顺和波珍滄兴宗也因谋反而被处死。文圣王十一年,伊滄金式和伊滄大昕等也因谋反而被处死。大昕是当初率领闵哀王系军队对抗金阳所率领的金祐徵、张保皋联军作战的人物。

文圣王试图通过调和元圣王系内几个派系来处理王位争夺战以后的混乱。首先令僖康王之子金启明与文圣王姐姐光和夫人联姻。联姻时间约840年前后,即文圣王即位时期。因此可以说是神武王促成的。这桩婚姻也是文圣王调和对立、竞争两个派系,即金均贞系和金宪贞系、泛金礼英系的矛盾和冲突的对策而具有意义。

文圣王九年(847)册立儿子为太子。此时金阳任侍中兼兵部令。文圣王十年夏天金阳辞去了侍中一职后由金启明继任侍中。文圣王十一年义正被任命为上大等。义正是文圣王叔父,是金谊靖为同一人物,他后来成为继文圣王即位的宪安王。文圣王后半期,以王和太子为核心,兵部令金阳和金均贞系人物金谊靖、金宪贞系人物金启明共同执政来实现了一度势力均衡。

文圣王十四年(852)11月,太子死去。文圣王十九年月,金阳也去世了。金阳是当初拥立神武王的一等功臣,也是作为文圣王的岳父支持王政的顶梁柱。因此文圣王对金阳去世表示极度哀痛,按照金庾信之礼为金阳举行了葬礼。金阳之死似乎给文圣王带来不少打击,同年9月,文圣王相继去世。

文圣王临死立下遗诏,册立叔父金谊靖为王。857年金谊靖即位,他便是宪安王。遗诏中说,金谊靖作为上大等长期担任宰相辅佐国政。在文圣王期间他的身份与金阳对等,人称“南北相”。从此记录看,金谊靖很可能和文圣王二年(840)被任命为侍中的义琮也是同一人物。值得关注的是,宪安王是元圣王系后代中两个分支派系,即金仁谦系与金礼英系所结合的象征性人物。也就是说,宪安王父系是金均贞-金礼英而母系是金忠恭-金仁谦的派系。宪安王即位之

后,让金安接任了上大等。很可能由金启明继续留任侍中,但没有记录可证。

宪安王聘金启明之子金膺廉作驸马。金膺廉曾作为花郎参加过宪安王四年(860)9月在宫中举行的宴会。当时宪安王和他谈论时,问其是否遇见过品學兼优的人,金膺廉回答说,居高位而谦虚的人、富有而朴素的人、有势力而不展露的人等三种类型的人。宪安王听后非常赏识金膺廉,决定招他为女婿。由此,更加巩固了金均贞系与金宪贞系的联合结构。

861年正月,宪安王去世,接着驸马金膺廉即位,他就是景文王。宪安王留下遗诏指名女婿膺廉继位说:“寡人不幸无子,惟有女儿。回顾历史虽有善德、真德两位女王,但这无异于母鸡打鸣不可效仿。女婿膺廉虽年轻,但已具备老练的品德。”在这之前,有过文圣王留下遗诏将王位传给了叔叔宪安王的事情。实际上从那以后利用遗诏形式来确保了王位继承的稳定和顺利。即使不是父子承



图6 大邱桐华寺闵哀王石塔舍利盒

接,也保证了其正确性。宪安王即如此,后来的定康王将王位传给真圣女王时也使用了遗诏。真圣女王册立侄子金尧为太子后,颁布了遗诏性质的禅位国书把王位传给了其姪了。

景文王即位,意味着王统由金均贞系转到金宪贞系手中。景文王试图通过佛事谋求与元圣王系后代的和解。景文王二年(862)计划重修愿刹鹤寺祭奠元圣王。实际上鹤寺的重修事业是拖延3年后才开始。但景文王策划修建愿刹本身无疑是为元圣王系后代考虑,以此来谋求两股势力的团结。景文王三年9月10日,在大邱八公山桐华寺愿堂前修造了石塔,这是为祭奠闵哀王的措施。景文王十年(870)5月,景文王在宝林寺内立了南北两座石塔。这两座石塔是为祈求宪安王的往生而建的。总之,景文王是通过修建石塔,金仁谦系当然把金均贞系系势包容,以期融合。

871年,即景文王十一年正月开始维修皇龙寺九层木塔,到翌年11月25日竣工。众所周知,皇龙寺乃新罗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寺院。传说新罗有守护国家的三件宝物,其中有两件藏在皇龙寺里,就是丈六尊像和九层木塔。景文王兴起佛事重新维修九层木塔的意图在于以是祈求提高王室神圣的地位,拉拢各种政治势力。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势力反对景文王政策,试图谋反。先是景文王六年(866)10月有伊浪允兴与弟弟叔兴、季兴等谋划叛乱。再者,景文王八年正月有伊浪金锐和金铉等谋反,景文王十四年5月有伊浪近宗等发动叛乱。866年正月,景文王追封其父亲为懿恭大王,册立王子晟为太子。上述允兴之乱看上去与此有关。金锐是文圣王的堂弟。他在文圣王十七年(855)担任熊州祈梁县(牙山新昌面)县令,当时他和国王堂叔金继宗、金勋荣等一同负责修建庆州南山昌林寺无垢净塔。上述的连续三次的谋反事件,很可能与金均贞系不满王统落到金宪贞系手中而怀恨在心有关,因此屡次发动了反抗。

景文王对谋反作出强硬的态度,派兵镇压。抓回逃到岱山郡(星州或者是井邑市七宝面)的允兴等,把他们诛杀后诛灭三族。当近宗进攻王宫时,派出王室护卫军禁军平定他们。近宗被生擒,车裂而死。景文王谋求元圣王系



图7 庆州皇龙寺遗址九层木塔出土刹柱本记

内各派间的融合,对挑战王权的王族乃至真骨贵族进行强硬应对。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制改革来强化王权。

近侍机构和文翰机构的扩大

景文王即位前曾是花郎。他听从花郎徒的教师兴轮寺僧侣范教师的忠告而与宪安王的长女成婚。因此他即位后,得到了邀元郎、誉昕郎、桂圆、叔宗郎等国仙们的支持。景文王在即位以及国政运营中,花郎势力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不小。

另外,景文王执政前后曾施行过不少试图通过汉化政策来强化集权体制的措施。这一点通过九世纪后期的金石文资料中可窥一斑。有记录说,在当时重新使用了曾在景德王十八年(759)至惠恭王十二年(776)初期间所使用过的唐式官署、官职名称。例如,官署名称中,“稷宫典”改为珍阁省,“领客府”改为司宾府,“内省”改为殿中省,“司正府”改为肃正台等;官职名称中,兵部次官职“大监”改为侍郎,其下的“大舍”改为郎中,“弩舍知”改为司兵等;仓部次官职位“卿”改为侍郎,其下的“大舍”改为郎中,“租舍知”改为员外郎。涇江镇的将领原本为“头上大监”,但在推算为九世纪末的各种金石文中以唐式名称“都护”出现。

景德王所施行的汉化政策是为了强化王权。照此来看,九世纪后期推行的

汉化政策可以说是为了恢复因之前激烈的王位争夺战而丧失的王权。与此相关,值得关注的官署是中事省。中事省原本是“洗宅”,而在景德王时期改为中事省。后在惠恭王时期恢复过原来名称。景文王十二年(872)之前又改称中事省后,一直保持到新罗灭亡。

当时中事省有两个分别隶属国王和东宫。侍奉国王和太子似乎是其原本的职务机能。但九世纪后期,其所属官员职能呈现出了文翰机构崇文台的“学士职”性质。例如,景文王时期书法家姚克一兼崇文台与东宫中事省的官职。中事省除了侍奉任务之外,还兼有拟定诏书、向太子讲授儒学等文翰机构的功能。

从这种近侍机构的功能扩大现象看,还出现在“宣教省”,令人关注。有关“宣教省”的记录仅出现在九世纪后期金石文中。应该是在宪安王四年(860)以前设立。“宣教省”是直接听取国王命令的中央直属官署。但就名称而言与渤海的“宣诏省”相似。从这点上看,“宣教省”也有可能是制定并宣布国王教书的官署。

九世纪中叶,相当于恢复王权时期。自然有必要多设奉命行驶的机关。结果,过去属于单纯侍奉国王的机关“洗宅”改为中事省后,其功能发生变化已然形成内朝,发挥了重要作用。景文王通过中事省、宣教省等机构的改革逐渐形成了亲信势力集团,有效地加强了王权统治。

875年7月8日,景文王在位十五年后去世。随后太子金毳继承王位,他就是宪康王。宪康王即位后立即封伊滄金魏弘为上大等、大阿滄义谦(或锐谦)为侍中。金魏弘是宪康王的叔父,很受景文王器重,参与国政很深。景文王五年(865),他与继宗、勋荣等负责重修鹄寺佛事工程。还代表景文王向宗庙传达了唐册封景文王事宜。自景文王十一年(871)起,他以上宰相、兵部令身份总体负责了重修皇龙寺九层木塔工程。宪康王即位时应在15岁左右,因此当时魏弘摄政的可能性很大。

宪康王时期,文翰机构备受重视,大大升格而又扩大。考察九世纪后期的金石文资料,可知,宪康王六年(880)原“翰林台”改为“瑞书院”,替翰林郎配有“学士”和“直学士”职位。崔致远、朴仁范等代表性渡唐留学生都被起用为“学士”。“瑞书院”成为当时文翰机构之中心。与景文王时期一样,此时文翰机构与近侍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崔致远曾担任侍读同时兼翰林学士、知瑞书监事等职。因

此不免有些文翰机构和近侍机构一体化的感觉,这就是宪康王强化内朝的有力措施。

宪康王六年(880)9月9日,宪康王与左右大臣们登上月上楼眺望四方。都城民宅林立,远处传来阵阵歌声。王问侍中敏恭“听说现在民间里不是用草而是用瓦盖屋顶,不是用木头而是用炭来做饭,是真的吗?”敏恭回答说果真是那样并称颂国王善政,宪康王却把功劳归到了大臣的身上。翌年3月,宪康王在临海殿设宴款待了诸多大臣。在国王弹奏的玄鹤琴声中,大臣们纷纷题诗词歌颂太平盛世。但事实上,在盛世景象的背后已出现了阴影。

据传,宪康王视察金刚岭时有北岳之神显现而载歌载舞;在同礼殿设宴时有地神显现而翩翩起舞。山神在唱歌时说了句“智理多都波都波”。意思是治理国家的智者已经纷纷逃走,城邑即将被破坏。似乎地神、山神预知国家灭亡,提前做了警告,但宪康王和贵族官僚们中无一人领会这一点。果然从此国家走向了灭亡了。



思想界的新动向

六头品身份儒学家的动向

骨品制度来看,六头品是底于真骨一等的身份。与真骨相比,六头品在政治上出人头以及地诸多方面,受到很多身份制约。因此他们中有人很早开始修学,靠学问来开拓出仕宦之路。例如强首与薛聪是凭借文章或儒学实力而出人头地的典型。这些六头品身份的儒学家明显带有欲利用学问和见识勾结王权的倾向。

新罗在元圣王四年(788)春实行了“读书三品科”。读书三品科是根据阅读理解儒家经典与历史书的水平来,分上品、中品、下品三个等级,授予官职的制度。包括上品之上有特品,实际上是四品制。

表1 读书三品科

等级	考试科目
特品	《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
上品	《礼记》、《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文选》
中品	《曲礼》、《孝经》、《论语》
下品	《曲礼》、《孝经》

随着该制度的实施,“此前仅通过弓箭选拔人才”的制度,直到此时才有所改变”。读书三品科的实施令那些不习儒学的人,原则上是当不了官吏的。

实施读书三品科的第二年(789),即元圣王五年任命子玉为杨根县小守的过程中发生了争议。执事部最下级官吏(史)毛肖驳斥说:“子玉不是以文籍出身当上官吏,因此不能担任分忧之职(地方官)。”但侍中却认为子玉是赴唐留学生,起用他不成问题。再次获得国王认准后任命了子玉。所谓“文籍”是指国学或读书三品科。可见新罗政府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包括渡唐留学生在内的具备儒学知识的人。

自九世纪起,赴唐留学成为一种流行。僖康王二年(837)3月,在唐朝国子监学习的新罗儒学生多达216名。文圣王二年(840)在唐学习时间超过十年的所谓“宿卫学生”105人被勒令回国。就在此时新罗朝廷内部的王位争夺战非常激烈,其余热尚未平息。因此,上述留学儒生中或许还包括一些观望国内政局,推迟归国的人。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不难看出渡唐留学生数量相当大。

宪德王十三年(821)金云卿在唐朝宾贡科考试及第。至于宾贡科有两种说法:一是指针对外国人实行的科考。二是指考中唐朝进士科的外国人称作“宾贡进士”。从金云卿科考及第开始算起,在唐科举考试及第的新罗留学生人数有58名。其中,以景文王十四年(874)合格的崔致远为首的朴仁范(宪康王二年,876)、崔承祐(真圣女王七年,893)、崔彦撝(孝恭王十年,906)等人是著名的留唐儒生。

在读书三品科里获得优异的成绩者主要是国学生或国学毕业生。他们中有为数不少的六头品身份。他们是通过读书三品科获得步入官阶之保障。还有从“子玉事件”加以看出,赴唐留学生也受到优待。在唐的科举及第者中,有些人留在唐朝直接做官,他们回到新罗后,称“国士”,待遇极高。赴唐留学、考中宾贡科的合格者当中,不少六头品身份的人。与国学到历经读书三品科或者赴唐留学到考中宾贡科,这种治学途径是六头品身份的儒学家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阶石。

到了下代,诸多六头品身份儒学家像前辈儒学家一样,也有辅佐国政。例如,禄真在宪德王十年(818)任执事侍郎,官阶停留在阿谿。从这点看得出他是六头品身份。禄真对当时的上大等金忠恭进言说:“大才置于要职上,小才安置于微职上”,强调要因才适用。

景文王于王三年(863)2月到国学巡行。令博士以下的教授讲论经义,并赐物给他们。宪康王也于王五年(879)2月巡幸国学。两位国王都重视国学,认为国学是儒教教育和儒家政治理念的根本。也有人认为此时国学改为国子监、太学。同时,这一时期为加强王权而推行了扩大近侍机构与文翰机构的措施,多重用赴唐留学归来的六头品身份儒学家。他们在瑞书院等文翰机构作为学士展开活动。

六头品身份儒学家试图赖以王权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政治、社会力量。尽管如此,最终他们仍无法跨越“真骨低一等”的身份局限。因此,有人提出引进科举录用人才的制度改变现状,还有人干脆否定骨品制本身。

真圣女王的政治保护伞魏弘突然死去后,女王将权力交给了少数的亲信宠臣。因此在当时舆论中出现大量关于朝政纲纪紊乱的责难,流传谴责女王及其亲信的文章。朝廷以为是大耶州隐居的王巨人所为,将他关进牢房。王巨人在牢房把自己的冤屈、愤怒的心情写在墙上。当晚天上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冰雹。最后他被释放。据推测王巨人是六头品身份儒学家。此时之前,曾有人预言说:宪康王时期智者都会逃走,国家将会灭亡。六头品身份儒学家中,也有不少批评王室政治弊端、或离开都城归乡的人。

真圣女王八年(894)崔致远上书真圣女王“时务十余条”,其内容已失传。但可以想象里面应该包含解决新罗下代混乱局势的方案。崔致远是渡唐留学生,他科举合格,在唐当过官。从这一点可以推测,他的“时务十余条”中会提出一些引进因才适用的人才录用制度。此外,崔致远还有在地方作官的经历,非常清楚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他的时务之策中少不了针对农民起义和豪族兴起的对策等等。

有记录证明真圣女王欣然接受崔致远进呈的时务之策,并赐予他阿谿官衔。可是崔致远的时务建议似乎未能实行。因为他上呈时务之策后,没过几年就辞官隐居于海印寺。改革现实的对策失败后,崔致远步王巨人后尘,选择离开政治。崔致远、崔承祐、崔彦撝三人以“罗末三崔”而名声大震。崔承祐在唐科举考中后,留在唐朝节度使麾下作官,回国后侍奉后百济甄萱王。崔彦撝回国后有一段时间负责新罗的文翰,后来归顺到高丽。

新罗下代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出身的知识分子。黄州土山(兔山郡)出身的崔凝精通经典,擅长文章。他在弓裔王时期做过翰林郎,到高丽做过元凤省的长官等,负责文翰。朴儒是光海州(春川)出身,经典与史书皆通。泰封时期做过东宫记室,后为躲避弓裔王的暴政而隐居。太祖王建对其评价极高,将其比喻成姜太公。灵岩出身的崔知梦熟知经史,精通天文和卜筮,他也在高丽为官。高丽初在清州已设有学校。这说明新罗末期在新罗五小京或九州的重要城市中已经开设了学校或教育机构。归乡隐居的知识分子在地方一方面培养儒学后进,另一方面也为豪族或新的国家工作。

禅宗与风水地理学说

高僧义湘被推崇为新罗佛教华严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华严思想是想通过一心来通涉宇宙万象的圆融思想。它为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新罗中代王室对华严宗大为欢迎,到了下代也如此。

海印寺是“华严十刹”或华严教学繁盛的“十山”之一,在华严宗极有影响力。该寺是在王室大力支持下于哀庄王三年(802)创建,后一直受到王室的支持。法宝殿的毗卢遮那佛上发现了墨书铭,这是在宪康王九年(883)为了大角干和王妃在佛像上涂金而成。另,海印寺还有“北宫海印藪”叫法。真圣女王即位前曾在这里的北宫居住过,所以人们也叫她“北宫长公主”。海印寺与真圣女王有着密切的关系。真圣女王二年(888)金魏弘一死,女王就将其追封为惠成大王而安置在海印寺,因此海印寺也是为他祈求冥福的愿堂(惠成大王愿堂)。因为此海印寺一直受到了宪康王和真圣女王的资助。

在新罗末,华严宗的两位宗匠,即观惠和希郎居住过海印寺。观惠大师支持后百济甄萱王,希郎则支持高丽的太祖王建。他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佛教思想上都持不同的态度。因此他们的意见相左,导致了他们弟子之间的针锋相对。观惠的门派(法门)叫南岳,希郎的门派叫北岳,这两派之间矛盾叫做南北岳之对立。然而,受了新罗王室支援的海印寺内两位大师不支持给他们提供后援

的新罗反而支持甄萱王和太祖建的这一事实,说明了新罗已趋于没落。

下代则流行禅宗。道义于宪德王十三年(821)向佛界介绍了南宗禅,未没有得到认可和欢迎,于是他到雪岳山隐居。后来洪陟和慧昭继承了道义的佛教思想。自文圣王七年(845)开始兴起的所谓“会昌废佛”运动前后,许多禅师游唐归来。王室便邀请他们到王宫,聘为“国师”等职位给予了支持。归国禅师们为弘扬禅宗也积极响应。

830年,实相山门的洪陟禅师应召访问王室觐见兴德王和宣康太子,此后国王陆续召见了许多禅师。洪陟的弟子秀澈到王室向景文王讲述了“禅教同异”,后又被宪康王也召见过。景文王和宪康王对禅宗和禅师表现出极大兴趣,除了召见秀澈之外,还与圣住山门的朗慧关系密切。

文圣王给朗慧所主持的寺院赐名改为“圣住”,使其编入到大兴轮寺。宪安王即位前就对朗慧备弟子之礼,即位后在国政问题上多次接纳了朗慧的建议。朗慧劝诫国王要铭记鲁国周丰之言,只有修炼礼仪、忠信、诚实等君子之德,百姓才会赖以跟从。景文王十一年(871)朗慧接受景文王邀请,到王宫和国王谈论佛教思想。宪康王即位后也向朗慧咨询国政问题,对此朗慧劝诫说:“善于录用人才(能官人)”。此后宪康王也多次向他咨询过相关国政的计策。朗慧对宪康王讲述了南朝宋国宰相何尚之向文帝谏诤的内容,婉转地劝王皈依佛法,遵守戒律。后朗慧禅师被封为“国师”,这是首例“国师”之举。

禅师是当时的知识人,国王向禅师咨了询国政或时务相关策略。因此可以说禅师们担任国王的顾问角色帮组解决时务。换个角度讲,禅师们希望通过这种渠道振兴禅风。后来的国王们也在努力争取禅师为其服务。

孝恭王十年(906)封崛山门禅师行寂为国师。行寂于神德王四年(915)奉神德王之命重新来到都城。王令他留住南山实际寺。这座寺院是神德王登基即位之前的居所。神德王也封行寂为国师,备大礼优待。景明王二年(918)王邀请了凤林山门审希。当时审希向王提出了治理国事、安定百姓的策略。审希圆寂后,景明王亲撰其碑文并立碑。

然而,到了真圣女王时期禅师们开始与豪族交结在一起,比和王室联系。受景明王厚待的审希与金海地区豪族金律熙(又叫苏律熙)、金仁匡他们勾结,获



图8 保宁圣住寺遗址朗慧和尚塔碑

得了他们的支援。虽然有景明王封其国师之事,但最终审希还是回到了凤林寺。崛山门禅僧开清得到了溟州豪族金顺式等的支持。后景哀王派使执国师之礼邀请,被他拒绝了。禅宗的个人主义倾向与豪族们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做法

有些类似之处,并且以地方为据点的禅师们当然需要就近地方的实力家豪族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禅僧们与后百济甄萱王或高丽太祖王建联系越来越密切。实相山门禅僧片云是开山祖师洪陟的弟子,创建了安峰寺(星州),其僧塔尚留在南原实相寺曹溪庵遗址中。据铭文记载,僧塔修建于“正开十年庚午”。“正开”是后百济的年号,其十年“庚午”为910年。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出实相山门与甄萱王的关系。桐裹山门禅僧道洗的弟子庆甫赴唐留学后于景明王五年(921)归来,后与甄萱王有联系,得到了资助。他最初住在甄萱王为他提供的全州南福禅院,后来在甄萱王的帮助下搬到道洗做主持的玉龙寺(光阳)。那么,甄萱王为什么重视和支持,利用道洗的风水地理思想来将其后百济的存在合理化。

太祖王建积极收罗各个禅门的禅师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事。利严、丽严、庆猷、迥微被称作“四无畏士”。其中庆猷被封为王师。太祖给了他王师礼遇,征求治理百姓的教诲。景明王七年(923),太祖还让利严留在开京,为他讲解说法。利严觉得百姓很可怜,劝诫王不要乱杀无辜,严惩罪人。庆猷于敬顺王六年(932)奉太祖王建之命,住持海州广照寺,开创了须弥山门。丽严禅师劝诫王遵循尧仁舜德之治,以求国家富强、百姓平安之路。“四无畏士”对王的劝诫和建议均包含儒教的政治理念。他们所提倡的禅宗思想是有明显的融合华严思想的禅教的倾向。这种融合的禅宗成为了太祖王建联合性统一思想的理论依据。

景哀王元年(924)玄晖自唐归国后,太祖王建即封他为国师,令其留在忠州净土寺。玄晖的思想也有禅教融合倾向,他在禅宗立场上融合华严思想与法相宗思想,力求形成“性相融会”的思想结构。除了玄晖,还有很多禅僧和太祖王建有着密切关系。

新罗下代还流行风水地理学说。这种学说在元圣王时期(785-799)已传入相关书籍并流通。但真正接受风水地理学说并广泛传播的人物是桐裹山门禅僧道洗。他将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与阴阳五行说等结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理论。此外,他还游遍全国山水占卜地势与吉凶。

孝恭王十年(906)弓裔王掌握了尚州一带。这样他就预备了逼近新罗都城的据点。同一时期弓裔王以其雄厚的实力基础,胸怀吞并新罗之意。且叫人称新罗

为“灭都”。“灭都”指新罗的首都金城。弓裔王利用风水地理学说预言金城以及新罗国家即将没落。由此当初以金城为国家核心的国土观便失去了立足之地。

然而,太祖王建却依据道洗的观点大肆宣扬松岳出现统一后三国之人物的明堂。而《十训要》中说车岭以南、公州江外地区的山形与地形属于“背逆”,因而当地人心也会随之“叛逆”。所以警告说勿封当地出身者为官,也就是说让警惕后百济出身者。各地兴起的豪族和建国者们凭借风水地理学说,鼓吹他们所选定的据点是神明指点的明堂。以此来显示其兴起的正当性,攻击其他竞争者或敌人所划定的根据地为背逆之地。

末世意识与弥勒下生信仰

中代末期,弥勒信仰的传道者真表认为当代属于末世。因此在弥勒佛下生之前,极其重视地藏菩萨拯救末世众生、令众生忏悔的“占察法会”。真表的末世意识和弥勒信仰通过他的弟子们传遍了全国。

禅宗也认为下代是末世。迦智山门第二祖廉居于文圣王六年(844)圆寂。在为他修建的塔志中说:“释迦牟尼佛涅槃已有1804年”。人们相信释迦涅槃后,过正法500年、像法1000年,即就末法的时代,即末世来临。然而,计算释迦涅槃起年限“佛灭纪元”是从他们认为生活在末世的自我认识中产生的。这种例子在迦智山门的中心寺院宝林寺铁造毗卢遮那佛像铭文中也能找到。这里虽然不是禅宗寺院,但在铁原的到彼岸寺铁造毗卢遮那佛像上所刻的铭文中也可找到佛灭纪元。佛像在景文王五年(865)制成,铭文中有“佛灭后1806年”的记录,可以看出末世意识。

在新罗下代社会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在宗教界有教宗和禅宗尖锐的对立;在国政中朝廷内围绕王位继承展开激烈的争斗;在地方因荒年而涌现流民和盗贼等等。人们觉得当时是佛法衰退,整个国家因连连不断的饥饿、疾病、战争等陷入严重的危机,而认为末世来临了。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意识下,修建毗卢遮那佛是希求通过信仰来摆脱所面临的末世。真表所提倡的弥勒信仰是希



图9 原州兴法寺遗址廉居和尚塔志

望弥勒能下生来拯救处在末世的众生。

据经书记载,弥勒会在很久的未来诞生,在龙华树下成佛并拯救众生。弥勒佛今后降生的唯一佛祖。因此人们相信只有弥勒降生才能拯救受苦受难的众生。真表倡导的弥勒信仰深受地方农民阶级的欢迎,他们迫切希望弥勒降生、拯救众生,认为弥勒下生会实现地上净土的愿望。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弥勒下生信仰具有一定的改革现实的性质。因此,弥勒信仰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背景。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章

新罗的灭亡

王位继承出现异常
农民起义与豪族的兴起
后三国鼎立与新罗灭亡
从新罗到高丽

1

王位继承
出现异常

女王即位

宪康王是在位十二年(886)7月5日去世的。王妃懿明夫人无子,只有女儿。之前宪康王在打猎时认识一个女人发生关系生下儿子叫金尧,但尚未被知晓。在这种情况下,宪康王之弟金晃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定康王。不料定康王即位一年后,就是在887年7月5日去世,葬于菩提寺东南侧。定康王在弥留之际,给侍中俊兴留下遗诏说:“不幸后继无子,但妹妹曼天性聪明伶俐,骨法如大丈夫。你们最好仿效善德、真德之典故,令她登上王位。”按遗诏金曼顺利登基,她就是真圣女王。

在新罗史上有宪康王、定康王、真圣女王兄妹三人皆登上王位,实属史无前例。继善德女王、真德女王之后,太宗武烈王成为王,此后一直是真骨阶层男性登上王位。因此,真圣女王即位再次打破了常规。宪安王五年(861),国王留下遗诏册立女婿金膺廉为王时,说虽曾有过善德和真德两位女王,但拥立女子为王是不可效仿之事。但这次真圣女王的出现是个例外,而这个例外正说明景文王的后代们挂着血统来独霸王权。他们兄妹相继即位,尤其是女王登基的背后时有金魏弘在。他是景文王弟弟,是哥哥最得力的政治帮手。作为宪康王、定康王、真圣女王的叔父,他也成为了侄子、侄女的

政治保护伞。他和真圣女王的关系尤为亲近,还流传着他们两个人是夫妻的说法。

金魏弘于真圣女王即位8个月后,即888年2月去世。女王封他为惠成大王,将海印寺作为他的愿堂,办三年丧等给予他高规格的葬礼。失去政治保护伞的女王给两三名年轻美男子要职,让他们负责国政。他们本是帮金魏弘干预过女王即位及即位初期政事的人,或为花郎或花郎出身者。但他们施政不当,出现了政治上的失误,并导致政治纲纪的紊乱而遭到了批判。有人在官府墙上贴了大字报揭露真圣女王即位不合理、国政运营不正常等事情。据其他文献记载,还有人利用陀罗尼的暗语写出来扔到马路上,暗语的内容大概是女王与金魏弘等部分奸臣正在葬送新罗。

同一时期,在地方也纷纷起来造反,事态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真圣女王三年(889),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中央政府督促交纳贡赋而蜂起,且连续不断。负担贡赋者都是农民,由于他们起义而不耕作,招来了新罗国家经济基础的崩溃。另外,各地豪族为防御起义农民进攻而加固城墙、增加私兵数量。从另一个角度讲,农民起义倒成了各地豪族强化自己势力,从中央政府分离而独立的契机。

真圣女王为摆脱危机特别提拔金孝宗而重用。金孝宗是第46代王文圣王之后,其祖父是宪康王时期担任侍中的金敏恭,父亲则是真圣女王时期做过第三宰相的金仁庆。金孝宗曾是花郎,他手下的花郎徒据说多达数千名。当时韩歧部百姓知恩因家贫而卖身奉养寡母。她的窘境传到金孝宗耳中。他拿出不少物品来救济她,花郎徒们也团结起来帮助孝女知恩。这是一则故事,但故事中可窥金孝宗在花郎徒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以及他的政治实力。

真圣女王得知知恩一事,说“虽年轻,但可看出老成之美”,令金孝宗与宪康王之女成婚。这一事例使人想起已故宪安王留下册立花郎金膺廉继位的遗诏中说“虽年轻,但具有老成之德”之句。金孝宗完婚后成为了最有力的王位继承者。真圣女王试图利用金孝宗家族的政治力量及其手下的花郎徒来打破危机局面。

当时还有一位受到女王的重用,他就是义谦。他在宪康王即位时被任命为侍中,并一直任职到宪康王六年(881)2月。他和金魏弘是宪康王前期领导国政的主要人物。到了真圣女王时期,义谦的义子朴景晖(或朴景徽,神德王)与宪康王另一个女儿成婚。显然朴景晖也成为了有力的王位继承者之一。此中可能有义谦的政治影响力在起作用。

真圣女王前期国政由金孝宗领导,到后期则由义谦主导。这就预示着金孝

宗与义谦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这说明了真圣女王想利用这一格局维持王权的意图。再者金孝宗先代及义谦都是与宪康王结缘的人,女王试图利用宪康王时期的旧臣势力来突破难关。但女王没有意识到,拿不出针对农民起义和豪族兴起的根本对策,任何试图都会无济于事。

真圣女王八年(894)2月,崔致远进呈真圣女王《时务10余条》。女王欣然接受立即授崔致远阿谀的官阶。目前《时务10余条》没有流传,但可以猜出它是关乎当时混乱的国政局势的对策。然而,崔致远上呈时务之策后没过几年就离开了政坛。真圣女王虽接受了时务之策,但没有推行。即使接受了可能也无法改变现状。总之,女王及其后孝恭王的不合理即位、农民起义和地方豪族兴起等体制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革,再有效的时务之策也很难得到应有的效果。这正好说明了新罗帝国即将灭亡。

非真骨王的出现

真圣女王在位十年后,于897年6月将王位让给宪康王的庶子,即侄子金尧。女王深知重用奸臣失误、地方社会的背叛的后果,采取退位的形式。

金尧生长在民间。真圣女王在位九年(895)时才得知这一事实。女王立即招他进宫,抚摸着其后背说:“我家兄弟姐妹骨法与他人不同。这个孩子背上有两块骨头突起,是宪康王的儿子”,即承认他并在10月册封他为太子。真圣女王十一年(897)6月进行禅位仪式继让王位,他便是孝恭王。

金尧虽是宪康王之子,但其身份不是真骨。上述真圣女王谈论“骨法”是为了掩盖这一弱点。借组禅位仪式也是出于同样理由。在已有两位符合继承资格的王位继承候补人选的情况下,决议要禅让给金尧的原因就是希望景文王系独霸王位。

孝恭王二年(898)正月,任命俊兴为上大等、任命继康为侍中。俊兴在上大等位子上一直做到孝恭王十年(906)正月。他也是曾在定康王时期担任了侍中,奉定康王遗诏帮组真圣女王即位的人物。真圣女王时期也担任了侍中,任职时间共有20年之久。他始终坚决支持景文王系国王的立场。孝恭王三年(899)3月,王迎娶伊滄义谦之女为王妃。义谦在宪康王时期担任过侍中,到真圣女王时

期也发挥过政治影响力。现在他作为王的岳父更是深深介入国政。

孝恭王六年(902)任命金孝宗为侍中。他是宪康王的女婿,也是王的妹夫。就在(901),也就是在孝恭王五年8月,后百济进攻大耶城(陕川),而大耶城是通往都城的重要军事要塞。守卫大耶城的新罗将领是金亿廉,他在这场战役中取得胜利。而金亿廉是金孝宗的哥哥,也是敬顺王的伯父,将来又成为高丽太祖王建的岳父。此次战胜消息为金孝宗当上侍中提供了帮助。孝恭王也在试图重用自先王以来支持景文王系王室的旧臣势力来维持政局。

有人认为,孝恭王时期,地方统治体制转换为知州诸军事及城主为中心。此改革方案在真圣女王8年(894)崔致远所呈《时务10余条》时提出,到孝恭王时代已经施行。即,在地方认可代替都督掌权的地方势力的独立性和统治权,并赋予“知州诸军事”的官职。作为代价要求他们忠于王室,保护王室。为应对新罗末期农民起义和豪族的兴起,将把原先“太守”、“县令”等官名改称具有军政性质“城主”。

但是,称为知州诸军事的人出现一些以此为夸耀权威的例子。例如甄萱,他在占领武珍州之后自称“全武公等州军事”。后来连豪族也自称知州诸军事后,要求中央政府默认或后被认可的情况也出现。真圣女王三年(889)发生农民起义时,也出现过称作城主、将军的豪族。事到如此,知州诸军事及城主制的施行说,这一主张还是有困难的。虽然已经出现不能保持其原来意义,也不会期待有很大的效果。孝恭王四年(900)甄萱已经建立“后百济”。翌年弓裔又建立“后高句丽”。由此正式来开后三国时代的帷幕。

孝恭王九年(905)8月,弓裔王的军队掠夺新罗边境邑城,直取竹岭东北部。但新罗孝恭王无力阻挡弓裔王进攻,只叮嘱诸多城主不要反击,要求以加固城墙防守为主。906年,弓裔王军队和甄萱王军队在尚州发生正面冲突,最后弓裔王取胜,控制了尚州一带。907年,而甄萱王已经占领了一善郡(善山)以南10余座城池。对此,新罗已丧失了王权,无法采取任何措施。

孝恭王末年,所谓支持国王的俊兴、义谦、金孝宗等人或死或隐退都不在。面对后百济与摩震(后高句丽)的进攻,孝恭王没有做出妥善应对,其结果,新罗领土逐渐缩小,仅剩庆尚道一带。孝恭王无法摆脱自己无力感,整日沉迷于酒色不理政事。911年,也就是孝恭王十五年大臣殷影进谏不成,索性杀死了国王的贱妾。

朴氏王室的出台

912年4月孝恭王去世。王死后真骨贵族们拥戴朴景晖为王,这就是神德王。这次王位继承有些特别。神德王是新罗上代时期朴氏王室最后一位王,即阿达罗尼师今(154-184)的后代。新罗自从第十七代王奈勿麻立干以后,一直由金氏家族继承王位。但到了新罗末期发生变化,再由朴氏占据王位。

有关中代以后的文献记录中,很难找到与朴氏真骨贵族有关的内容。关于朴氏王的突然出现,曾有人对其实际存在提出质疑。有种说法说神德王原本姓金,他意识到唐朝制度中有同姓不通婚制度,出于推陈出新之意而姓改为朴。还有种说法,朝鲜时代把高丽王氏子孙的禑王和昌王改认为辛吨子孙一样,到了高丽时期标举新王朝的正当性而改金氏为朴氏。但已有文献记录为朴氏王的出现,该是毋庸置疑。

实际上当孝恭王死后,具有王位继承权的人选是金孝宗和朴景晖。这两人都与宪康王之女结婚。金孝宗身为有影响力的花郎,深入参与了真圣女王时的政治运动。到孝恭王时期做过侍中。而朴景晖的经历则不为人所知。其祖父为文官海干,父亲是文元伊干,外祖父是顺弘角干。关于他们的经历在文献记录无可查询。但是其义父义谦为孝恭王的岳父,还是有意介绍给王室作驸马。由此可推测在朴景晖登基即位过程中义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到新罗末期朴姓继承王位这事值得关注。因为定康王、真圣女王、孝恭王等景文王子孙不合理即位曾经引起统治阶层内部的抗议。针对农民起义、豪族兴起及后百济和后高句丽的建立等等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真圣女王和孝恭王都未能正确应对。因此在朴姓继承王位的背景中,或许隐含着统治阶层对金氏王室的不满与不信。朴景晖能够击败强有力的王位继承人选金孝宗即位也是这个背景使然。

神德王在912年即位。同年追封父亲为大王,甚至连义父义谦和外祖父也追封为大王,为自己铺垫王权基础,强化王权。再把儿子朴昇英册立为太子,阐明今后将维持朴姓王室。不过神德王出于当时国政危机的现实,不得不与金氏真骨贵族进行妥协。917年神德王去世后,太子朴昇英顺利继承王位,他便是景明王(917-924)。即位后任命其弟朴魏膺为上大等、近亲王族安排在要职上。还任命金裕廉担任侍中。金裕廉是金孝宗的侄子,当时金孝宗已退出政治舞台,其势力由儿子金傅(后来的敬顺王)所继承。景明王任命金裕廉为侍中,是想以此收买金孝宗遗留下来的部分势力。

农民起义与豪族的兴起

农民起义的背景及经其过程

背景

三国统一后,真骨贵族为核心的新罗统治阶级籍以广阔的土地及增多了的百姓,享受了富饶的生活。他们聚集生活的都城,即金城(庆州)到九世纪后期迎来了全盛时期。宪康王时期,都城的人口多达数十万人。到处是用金银或镀金装饰的豪华大宅邸,当时被称为“金入宅”。

与此相反,当时支撑都城的繁荣的主要生产力农民的生活处境却十分恶劣。若遇到荒年,到处出现盗贼和流民。宪德王七年(815)8月,西部边境州郡大闹灾荒,盗贼四起,有朝廷直接派兵镇压。宪德王十一年3月,多处出现草贼,朝廷命令地方官进行镇压。宪德王十二年因春夏干旱,冬季发生饥荒,甚至有人无法忍受饥荒而卖子苟延残喘。宪德王八年发生灾荒后,流浪到唐朝浙东地区沿街乞讨的人都有170名之多。自宪德王三年8月至宪德王十六年5月,前后13次共有826名新罗人出海漂流到了日本列岛,其中大部分都是游民。

宁越世达寺附属农场的知庄调信讲述梦里经历的小说话中,生动地反映了

地方农民的悲惨情况。调信和自己所爱慕的金昕之女婚后生活了四十余年,生了五个孩子,但家徒四壁,连野菜粥也断顿。因此,十年间带着孩子四处流浪,饭不饱食、衣不蔽体。老大饿死了,无奈之下夫妻各分两个孩子即将分离时从梦中醒来。在新罗都城的繁荣与华丽的背后尚有无数的贫穷和饥饿中呻吟的地方农民。

兴德王三年(828),汉山州瓢川县(坡州?)有妖人自称藏快速致富的魔术,有很多人被迷惑。国王下令说“根据先王之法,严惩以邪道来迷惑群众者”,将其流放至很远的孤岛上。所谓“速富之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农民贫困到了极点。遭受贫穷的百姓认为末世来临了,企盼弥勒降临现世,拯救生活在窘困中的人们。弥勒佛是这个世界上出现理想世界的佛,因而当时流行的弥勒降生信仰预示着现实将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在地方农民间不稳定的气氛繁衍。

真圣女王三年(889),在全国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具体情况可从“境内很多州郡不上交贡赋,都城府库空空荡荡,国家的财政(国用)极为不足。国王派使臣督促交纳贡赋,各地盗贼蜂拥而起”的描述中可知。农民对督促交贡奋起反抗。这些农民是相当于自营农民,耕作自己的农田维持生计,也是主要的交纳贡赋者。曾是新罗经济的主要生产力的自营农民也参与了叛乱,说明889年蜂起的农民暴动情况非常严重。

真骨贵族不择手段地扩大农场。寺院也利用接受捐赠或购买农田时而兼并来极力扩展专用土地。这些土地的相当部分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在赋税对象中白排除,减免赋税。那么被减免的赋税都到负担原封不动地转嫁至农民身上。农民交不起繁重的赋税,背井离乡变成流民,以此类推,离乡农民的赋税自然再转嫁到留下来的农民哪里。总之,889年农民暴动的直接原因便是沉重的贡赋。在此,有必要考察以禄邑制或村落共同体为基本单位的“烟受有田沓制”。

景德王十六年(757)禄邑恢复之后,村落社会受到以禄邑为媒介的贵族官吏的私人支配和地方官的公共支配。但随着中央集权力的弱化,私人支配得到强化,出现了任意、超重的榨取。禄邑民的经济处境恶化,流民增加,禄邑民减少。其结果是,留下来的禄邑民被强制性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而一般农民负担的



图2 陕川五台山寺吉祥塔词

各地(九州百郡)皆被盗贼放火烧得一片凌乱,似见到大火的灰烬,杀人如麻,尸骨如林(略),礼仪之邦变成病入膏肓之国”,语气十分绝望。此外,孝恭王即位后在把此事告知唐朝的外交文书中也哀叹道:“(略)目前整个城邑几乎变为盗贼的巢穴,山川皆为战场,苍天降灾殃为何仅我之国家(海东)乎”。

总而言之,889年各地蜂起的农民起义不仅没有被镇压,反而更加猖狂。其结果导致女王退位。事实上新罗是直到敬顺王935年归顺高丽后落下帷幕,但可以说,新罗的灭亡是从889年农民起义起已经宣告终末。

豪族出身及其独立性

出身

新罗统一后设置了九州和五小京,指派官僚治理全国的郡县,体现了中央政

府的统治力遍及各地。然而从中代末期开始,真骨贵族内部频繁发生权力之争,尤其是围绕王位出现尖锐的矛盾,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因而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其统治力逐渐变弱。乘机机会,地方有权有势者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地方权势者被称作“豪族”。

清海镇大商人张保皋素有“海上之王”之誉。而从某种角度讲,他也是“豪族”的先驱人物。自张保皋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豪族。甄萱王之父阿慈介务农为生,“光启年间(885年~887年)盘踞在沙弗城,今尚州,自称将军”。新罗末的豪族多是自称“城主”、“将军”等。大约在887年(真圣女王元年)阿慈介在尚州沙弗城已然以“豪族”行驶权力。

寿昌郡(大邱)护国义营都将重阨粲异才于孝恭王十二年(908)为国家修建了八角登楼。他在高处砌城治理该地区长达10年。异才是统治寿昌郡的豪族。真圣女王三年(889)在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蜂起时,他作为城主一边保护自己领域内的农民,一边加强了自己的势力。碧珍郡(星州)被盗贼包围时,城主李恩言加固城墙,阻挡起义军进攻,保护了当地百姓。

自889年起,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蜂起时,新罗的中央政府没有及时镇压,连相应的有力措施也没有拿出来。这时地方的豪族们站起来修城,动员私兵保护自己领地的农民。事已至此,豪族已经摆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显示了“豪族”的独立性。

豪族中有些返乡的中央贵族身份。比如寿昌郡豪族异才是“重阨粲”,即“重阿滄”。重阿滄是无法晋升为大阿滄的六头品阶级的重要官阶。异才本是六头品身份,在中央政府感到无法逾越身份鸿沟身份局限而返乡。金义(后被太祖王建赐姓王,称作王义)是继溟州将军金顺式(后被太祖王建赐姓王,称王顺式)之后任溟州统治者的“豪族”。他是金周元的后裔,而金周元就是当年和金敬信(元圣王)争夺王位的竞争者,落败后退居到了溟州。

新罗政府令都城的贵族移居到小京等地区居住。这些迁居的贵族中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豪族。十世纪中期,清州“州里豪家”、“乡间冠族”身份的堂大等金芮宗建立“幢竿”。他死后,其堂兄堂大等金希一和大等金守△、金释希、金宽谦等继续筹措维持“幢竿”所需的钱财并进行监督。清州是统一新罗时期的西原



图3 清州龙头寺遗址铁幢竿,铁幢竿铭文

京。成宗二年(983)堂大等、大等的名称分别改为户长、副户长。主导幢竿修建的金氏家族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从西原京移居生活的真骨贵族之后,是清州的大豪族。

中央政府为了边境与海岸地区的防范而设立了军镇,驻扎军队。然而出现了以军镇的军事能力为背景的豪族。政府为治理礼成江以北、大同江以南地区,于宣德王3年(782)在黄海道平山设了溟江镇。平山朴氏始祖朴直胤虽为朴赫居世之后裔,但自从担任平山地方官后索性定居下来,自称大毛达(大模达)。大模达是可与中国的将军相媲美的高句丽武官职。朴直胤由溟江镇的指挥官成为了平山地区豪族。从他自己不叫新罗将军而称高句丽大模达这一事实中,可见他在标榜继承高句丽的意识,以高句丽大模达统治该地区的居民。除溟江镇之外,包括有驻扎陆军的三陟之北镇、驻扎海军的江华穴口镇、华城唐城镇等地区,还有西海岸和南海岸尚未流传其名军镇的指挥官,也有可能成为地方豪族。

清海镇解体后,在西海岸与南海岸的许多地方陆续出现了海上势力。传说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说太祖王建之祖父作帝建乘坐商船在西海航行中遇到西海龙王,后与西海龙王的公主结婚,作为聘礼他得到七种宝物归来,之后礼成江和汉江河口一带四个州三个县的人民为他修建了永安城宫室。这则故事表明作帝

建从事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以此为基础在松岳(开城)一带行驶了政治影响力。作帝建的儿子王隆于真圣女王十年(896)作为松岳郡的沙祭,“举郡归顺弓裔”。王隆是松岳地区豪族或可与豪族类似的人物。

景明王八年(924),王逢规以泉州节度使的身份向后唐派遣使者朝贡,传递书信。景哀王四年(927)3月,后唐的明宗任命权知康州事王逢规为怀化大将军。同年4月,王逢规又以知康州事的身份派遣林彦赴唐朝贡,明宗在中兴殿召见林彦,赐丰厚的礼物。泉州是庆尚南道宜宁,节度使是唐朝负责地方军事行政的官职。康州是现在的晋州,知事似乎是唐朝知州诸军事的简称。王逢规是一位自称节度使或知事的豪族。他是通过跟后唐进行贸易积累财富,以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豪族当中也有一些参与农民起义,成为领袖后来转变成豪族的人。孝恭王九年(905)平壤的城主、将军黔用和平壤附近甑城(甑山郡)的赤衣、黄衣贼明贵等归顺到弓裔王。黔用是城主、将军,而明贵等是盗贼。明贵等利用赤衣、黄衣来标志自己这一点与曾以赤裤子作为标志的赤袴贼有共同之处。不管是赤袴贼还是赤衣、黄衣贼,全都由起义的农民构成。但前者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到处打游击后被消灭。与此相比,赤衣、黄衣贼是有固定根据地甑城,后来成为豪族。

压海县(新安押海岛)盗贼首领(贼帅)能昌是召集亡命之徒集结成势力的人物。孝恭王十三年(909),他与附近岛屿的其他盗贼(小贼)联合攻击王建及镇压军队,反而被生擒押送到弓裔王。王嘲笑他说:“海贼拥戴你当首领,现在你却成了俘虏”。从这句话中可知能昌可能在新安一带已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名气也不小。能昌纠集那些盗贼或流浪民、渔民等形成了统治压海县的豪族。

村主是地方土著权势者,辅佐中央派遣的地方官管理村里的行政业务。在地方官府中负责基层行政的小吏也是土生土长的权势者。他们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力度越变越弱的机会,提高了自己的在地方上政治、社会地位。村主祐连是在镇压元宗和哀奴率领的尚州农民起义军时牺牲。祐连的牺牲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着基础,不受起义军侵犯,国王对此认可,命名祐连的幼小的儿子继承村主的地位。889年兴起的农民起义,成全了村主和小吏等地方土著权势者成为豪族的可能性,使其强化了自己的独立性。

独立性

地方豪族效仿中央政府,设了官府和官职。景哀王二年(925)高郁府(永川)将军能文率士兵归顺到高丽。当时有侍郎和大监等官员跟随他。侍郎是执事省的次官,大监是兵部、侍卫府等相当于次官的官职。溟州地区的金义于太祖二十三年(940)作为都令拥有佐丞的官阶。而他的属下有执事郎中、员外郎、色执事等官职。清州地区大豪族们自称堂大等和大等是由“和白会议”成员上大等和大等的官名而来。凡此种种,清州豪族们已然构成会议体制,处理该地区的重要政务。而且还设有兵部、学院等官府等隶属机构,备有侍郎、兵部卿、学院卿、学院郎中、司仓等官职。

豪族的身份和统治权被世袭。即使不这样,同一血统族团内延续其身份的情况很多。如果是被他血统族团占据其身份,那便是相互妥协或实力对决的结果。与此相反,地方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原则上是定期交替官位。因为在一个特定地区长期任职会出现和当地土著权势勾结的现象,为防止这种现象而采取定期交替的措施。中央政府派外司正监督地方官也是出于同样想法。从这一点看,显然豪族与地方官的差异不小。

豪族向农民收取贡赋或征用劳动力,这些被用来保持并扩大豪族的势力基础。豪族将奴僮武装起来或召集流民养私兵。非常时期还能调动农民。然而,地方官不同,他们向农民征收贡赋上缴到中央政府,有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才可以调用农民作劳役,或调动被安置在地方的军队或地方军守护当地的治安。这一点也是豪族与地方官的差异。豪族除了政治,在经济、军事上也独立于中央政府。

豪族当中也有些忠于新罗政府的人。例如寿昌郡“护国义营都将”异才即是。然而更多的豪族都和新罗反目,采取了相对独立的姿态,归顺到后百济或高丽的豪族也不少。比如,昧谷县(报恩郡怀北面)将军龚直归顺于后百济,成为甄萱王亲信。但再后来他归顺到高丽太祖王建那里。豪族根据利害关系,从新罗、后百济、高丽中选择其归顺的国家。直到现在,新罗的命运要看豪族的跟从与反对了。

3

后三国的鼎立与 新罗的灭亡

后百济与后高句丽的建立

甄萱出生于新罗景文王七年(867),是沙弗城将军阿慈介之子。他20岁时从军,进入都城。后来被分配至守护西南海岸的部队,当上了裨将。真圣女王三年(889)全国各地蜂起农民起义时,他也趁机举反旗攻击新罗。甄萱于真圣女王六年(892)占领了武州(光州)后称雄。但他没有公然称王,而自称“新罗西面都统”云云。形式上是以治理新罗西部地区的地方官自居。因为据他判断,坚持和新罗讲义气对他有利。

孝恭王四年(900)甄萱以百济复仇为名建国。到完山州(全州)甄萱宣布说:“当年新罗金庾信扬起尘土,经黄山抵达泗泚,组建罗唐联合军消灭了百济。现在我敢在完山建都,将为义慈王报仇雪恨!”他是利用当地人们怀念旧百济义慈王的心里重建了百济。为与之前百济区别称之为“后百济”。

甄萱王建国后立即派使臣赴吴越朝贡。对此,吴越王回派使臣作以答谢,赐以甄萱王检校太保一职,其余照旧执行。在这里,交换使臣的时期虽有可疑之处,但甄萱王想通过从吴越获得国际认可,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一点

不可否认。后百济王甄萱是地方豪族之后，还曾做过防守军指挥官。所以他为了抗衡新罗的权威而迫切需要得到中原国家的承认。

孝恭王五年(901)8月，甄萱王进攻大耶城(陕川)。大耶城是战略要地，早在三国时期也曾有是百济与新罗为争夺此地而交锋。新罗取胜后派金春秋之婿金品释守护此地，而在百济军再次攻击时金品释战死。从新罗的角度看，大耶城是阻挡后百济进攻的最前线基地。新罗通过在本次大耶城战役中获胜，暂时阻止了后百济的东进。

弓裔是宁越世达寺的僧侣，于真圣女王五年(891)归属竹州(安城竹山面)权势箕萱的部下。没过多久，他转到北原(原州)地区梁吉麾下，非常活跃。到了真圣女王八年(894)形成了独立的一股势力，真圣女王十年(896)以铁圆(铁原)为中心占领中北部地区。孝恭王三年(899)击败先前自己的主子梁吉的军队，孝恭王五年(901)终于建国。弓裔说：“过去新罗向唐朝请兵打垮高句丽。所以现在的平壤废都长满了杂草，我定报此仇。”弓裔打着为高句丽复仇的旗号，建立了高丽，史家称之为“后高句丽”。孝恭王八年(904)，弓裔王改国名为摩震，到孝恭王十五年(911)又改国名为泰封。

弓裔王于孝恭王十年(906)占领了尚州一带。之后，他籍以用风水地理学说，广泛传播了金城即将衰落的预言。而且有就杀掉从新罗前来投降人的传说，弓裔王流传预言、歼杀降者的传说或许是一种姿态，以此表明他推翻新罗统治的意志。弓裔王有次巡行到浮石寺，当他看到新罗国王的肖像画，便拿起刀猛击击墙，撕碎肖像画。刀痕直到高丽时期仍存在。浮石寺事件的意图与流传谣言等别无二致。进入尚州之后，弓裔王公开宣布了对新罗的敌对立场和政策。

弓裔原来是王子身份，出生不久差点被父王处死，险些捡了一条命。但直到编撰《三国史记》时，没有明确其父王到底是谁。不尽使人对其“王子之说”产生疑惑。还有人认为弓裔父亲是一位真骨权贵，在中央政权争斗中被牺牲，因此弓裔小小年纪就被赶到地方。弓裔王的反新罗言行很有可能来自对新罗王室和统治阶层的家族仇恨。

弓裔王公然表露吞并新罗之意，但在文献中却找不到此后他进攻新罗的记录。他于孝恭王八年(904)将国号定为摩震，年号为武泰，力图重新改变国家面

貌。弓裔王似乎认为对内整顿体制极为重要。他调整广评省等各种官府和官职，备齐一套官阶体系。孝恭王九年(905)从松岳迁都到铁圆。自孝恭王十三年(909)起，围绕罗州一带与后百济展开了多次战斗。或许是因为这，弓裔王无法再对新罗发动进攻。后百济也在本次战事后没有再进攻新罗。从而，给新罗一个喘气的机会。

弓裔王自称是下生的弥勒佛。他作为国王除了政治权威外，还独占了宗教权威。他打出通过“弥勒观心法”能看透他人之心的旗号，以谋反为罪名肃清反对自己的政治势力。他追求“神政的专制主义”，这一点遭到了反对。918年6月，以王建为首的一股势力发动政变消灭泰封，建立了高丽王朝。王建即位，他便是高丽王朝的太祖。

亲高丽政策与后百济进攻金城

景明王四年(920)正月，新罗与高丽互派使节，缔结了友好关系。同年10月，甄萱王率步兵及骑兵1万人马攻陷大耶城后向进礼(金海)方向进军。新罗面临着大危机。于是，景明王派阿浪金律去向太祖王建求援。王建派了援兵，甄萱王随即撤军。景明王又和王建缔结包括军事同盟在内的外交关系。景明王五年(921)2月，靺鞨的别部达姑人有171人入侵新罗北部边境登州(安边)。此时，守护朔州(春川)的高丽将军坚权率骑兵抗击，败退了入侵者。事后景明王派使送信向王建表示感谢。新罗与高丽已然形成了军事同盟国。

景明王四年(920)10月，当太祖王建见到新罗使者金律询问新罗的护国三宝，即皇龙寺丈六尊像，九层塔及老天赐予真平王的玉带。新罗国家是用此三宝来做后盾，保障其权威之神圣，太祖王建对此三宝表示关心等于是对新罗权威的关心。对于通过政变掌握政权的王建来讲，正面临着对内要摆平弓裔王残余势力和反对自己即位的势力；对外则要派使者去送上厚礼拉拢各地豪族，且要用谦虚谨慎的言辞阻止他们脱离。太祖王建通过这种方法，与自己最大的敌对国后百济暂时性地缔结了友好关系。面对内外较复杂多变的情况，作为松岳

豪族出身的王建，曾在弓裔王手下做过将军、宰相的他来讲，眼下最需要的是树立强有力的王权。从这一点出发，高丽出面改善与新罗的关系。

另外，景明王也认为新罗有必要和新生王国高丽保持友好关系。首先，弓裔王没落的消息，对新罗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弓裔王曾是新罗最大的敌人。可以推测，太祖王建对新罗采取尊重的态度，这是因为刚刚建立高丽的王建的处境尚需与新罗权威对峙。同时，新罗必须阻止高丽与后百济缔结友好关系。甄萱王于918年8月派一吉察闵郃去祝贺王建即位。王建给了闵郃丰厚的礼遇。王建即位初，对甄萱王派来使者这事没有太在意。但此事到新罗那里，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新罗开始密切注视高丽和与百济两国关系的进展，开始忧虑这种关系威胁新罗，索性派使者到高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新罗与高丽建交的背景。

新罗与高丽的建交，对高丽具有益的，那就是新罗正式认可了高丽王国不是叛乱势力所建立的国家。高丽和新罗平起平坐，说明高丽的地位提升了。自两国建交后，景明王四年(920)2月康州(晋州)将军闰雄归顺高丽，庆尚道一带豪族也纷纷归顺高丽。景明王六年(922)正月，下枝城(安东丰山)将军元逢和溟州(江陵)将军顺式均归顺到太祖王建(或有元逢6月归顺之说)；真宝城(义城)将军洪述(或洪术)此时也有意归顺高丽，于同年11月派使到高丽请求投降，次年11月还派儿子王立献高丽30套铠甲。景明王七年(923)7月(或8月)，京山府(星州)将军良文等归顺高丽。事已至此，新罗只能承认高丽，与其建交。

景明王于924年8月去世时，高丽太祖王建派使吊唁。继景明王登基的景哀王于9月派使到高丽，向王建表达了感谢之情及今后保持友谊的决心。曾在景哀王二年(925)10月高郁府(永川)将军能文归顺王建。王建留下能文麾下的侍郎盃近和大监明才、相述、弓式等后规劝能文回到高郁去。王建如此处理，也许是为新罗王室考虑，因为高郁府地接新罗都城。但更重要的是高丽要监视新罗都城，需要确保能了解其情况的前线基地。

景哀王二年(925)10月，高丽与后百济互换人质后休战。此次休战是高丽先提出来的，因为高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无法继续战争。当年11月，新罗景哀王向太祖王建派使表达了拒绝和亲之意。景哀王三年(926)4月，后百济人质突然

死亡。甄萱王判断高丽是故意杀害人质，派军队到了熊津(公州)。王建向许多城下令加固城墙，勿出去厮杀。此时，景哀王却派使纵容王建进攻后百济。对此，王建回信说在等待时机，实际上王建兵力尚无法抵挡后百济军进攻。景哀王虽计划鼓动高丽扫除后百济，但因高丽在军事上的劣势而未能实行。

景哀王四年(927)正月，太祖王建率军袭击后百济占领的龙州(醴泉龙宫)时，景哀王派军队支援。新罗景哀王到底派多少规模的兵力，没有记录不得而知，但高丽、新罗两军联合作战这件事的象征意义并不小。就此，景哀王对后百济实施了一连串的敌对政策达到了极点，对甄萱王造成了极大的压迫。终于甄萱王直接向金城(都城)开展。

景哀王四年9月，甄萱王袭击高郁府，逼近都城，在附近扎营。景哀王派连式到高丽向求救，太祖王建命侍中公萱率领1万精锐兵前去救援。可是，甄萱王在11月趁援兵未到之际突袭都城攻陷。当时出巡鲍石亭的景哀王和王妃还有后



图4 庆州鲍石亭

宫 一时逃脱,终于被抓百济军生擒。甄萱王逼迫景哀王自杀,拥立金傅为王,号敬顺王。然后抓来真骨权贵当人质,掠夺各种宝物后回去。王建得知情况便派使去吊唁景哀王,还亲率5千精锐兵在八公山桐华寺附近与后百济军激战,遭到惨败。王建也险些送命,失去一位心腹大将。通过这次三国连战,可以看出新罗连守护都城的兵力都没有具备。

甄萱王袭击金城回去不久,也就是在12月给太祖王建送信。信中极力狡辩说:自己注重“尊王”义理,本想到都城解救社稷和宗庙,但不曾想一到都城便遇到“奸臣逃走,国王去世之变故”。对此,王建回答说,自己帅军赴都城也是“想拯救朝廷,解决国家危殆”,同样打出“尊王”义理的旗号。不难看出,这些是外交文书中经常出现的客套话,但就对新罗的态度显然和弓裔王对新罗敌对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当时,新罗的军事力量虽微不足道,但它的象征性地位很高,因此甄萱王与王建都把新罗作为宗主国对待。

另外,有人推测景哀王的死跟新罗金氏王族与后百济结盟有关,是他们利用新罗朴氏政权看不惯甄萱王为由,把甄萱王拉进来合谋除掉景哀王。换句话说,甄萱依靠金氏真骨势力的默认或内应才能顺利袭击金城,除掉景哀王。还有拥戴金傅为王,也是接纳金氏真骨的要求而已。

敬顺王归顺高丽

敬顺王在即位元年(927)11月为先王景哀王举行葬礼,太祖王建派使臣前去吊唁。此后高丽和后百济冲突持续不断,基本上后百济占了上风。

927年12月,甄萱王入侵大木郡(漆谷郡若木面)烧毁了粮食。敬顺王二年(928)正月,高丽将领金相在草八城(陕川郡草溪面)与后百济将领兴宗交战中战死。同年5月康州将军有文归顺了甄萱王。同年8月甄萱王命将军官昕在阳山(永同)砌城,但因受到王建属下命旨城(抱川)将军王忠的攻击而撤退。甄萱王不得已退到大耶城驻扎后,派士兵去抢劫大木郡的粮食。同年10月后百济军攻陷了武谷城(位置不详)。11月甄萱王选拔精兵,攻陷了乌於谷城(位置不详)。这

样,新罗的领土被后百济、甄萱王一点一点被占领,逐渐缩小。

到敬顺王三年(929)后百济的进攻仍在继续。同年7月甄萱王攻打义城府城(义城郡),新罗将军洪述出来迎战甄萱王而战死。后来连顺州(安市市丰山面)将军元逢也不战自降,投向甄萱王。同年10月甄萱王攻打加恩县(闻庆市加恩面)却未能攻陷。

敬顺王四年(930)正月,太祖王建在古昌郡(安东)瓶山对战甄萱王,击败甄萱王获得大胜,改变了一直以来的不利的局面。同年2月,王建向敬顺王告知获胜消息,敬顺王派使臣要求会面。此时政局对高丽非常有利,有安东和青松一带数十个郡县归顺王建。同年,溟州到兴礼府(蔚山)的约110余城邑也都归顺到高丽王建。

敬顺王五年(931)2月,太祖王建率50余名骑兵来到京畿求见敬顺王。虽然高丽和新罗力量悬殊,高丽远比新罗强大,但王建还是对敬顺王遵循礼数,诸如所带兵力极少、请求同意入京等等。敬顺王率百官到郊外迎接王建。王建在都城住了2个月以上,和敬顺王协商相关新罗命运的各种事宜。回到开京后,于当年8月王建向敬顺王赠送彩色绸缎和配马鞍的骏马,还向新罗大臣和将士赠送了布匹和绸缎。王建还分给百姓分茶和幞头,分给僧尼茶和香。王建用这种方法拉拢人心,引导民心有利于自己。

另一方面,太祖王建严密监视都城动态,没有放松对都城的控制。他在离都城不远的浦项神光面设立昵於镇,于930年2月亲自巡防。访问都城后,仍派大匡能丈等将领驻扎在庆州附近待命。敬顺王七年(933),王建得到后百济军队在槽山城(庆州附近)和阿弗镇(庆州附近)等地出没的消息后,派大匡庾黔弼去阻止他们入侵都城。庾黔弼在槎滩(庆山河阳)击退后百济统军神剑所率领的军队,直接进入了都城。当时都城居民出来欢呼他们,哭喊着说“如果不是大匡,我们将会鱼肉般惨死的”。这说明都城居民对后百济入侵都城感到非常不安。庾黔弼在都城滞留7天,在返回的路再次击败神剑军队,解除了都城的危机状态。

敬顺王八年(934)9月,高丽和后百济在运州(洪城)交战,高丽获得大胜。至此,高丽和后百济两国关系中,高丽占据了优势。甄萱王率5千甲士亲自出征,被庾黔弼打得稀里哗啦,死虜3千多名后百济的将士。消息传开,熊津以北的30余



图5 涟川敬顺王陵

城邑都归顺到了高丽。

此时,在后百济内部围绕即位问题出现巨大变动。甄萱王娶了很多女人,儿子就有10余名,其中特别宠爱第四个儿子金刚,想把他立太子传给王位。对此大儿子神剑、良剑、龙剑等表示不满,极力反对。935年(敬顺王9年)3月,神剑等发动政变,将甄萱王幽禁在金山寺(金堤)。当年6月,甄萱王便率领家眷经罗州亡命来到了高丽。由此,战局完全倒向高丽,连甄萱王也投靠到高丽。

敬顺王九年(935)10月,国王和许多大臣商讨投降高丽一事。虽然大臣们有赞反两种意见,但最后还是同意投降。于是国王命侍郎金封休给太祖王建送信,表明投降之意。有位王子坚决反对投降,最后离开王宫入皆骨山(金刚山),以岩石为家、穿麻衣吃草,终其一生。他便是“麻衣太子”。11月,敬顺王率百官离开都城,其出行队伍长达30余里。王建在郊外迎接敬顺王,为他安排很好的住处,并将长女乐浪公主嫁给了他。12月,封金傅为正承公(或政丞公),俸禄1千石。将金城改名为庆州,封为金傅的食邑。从此,千年新罗落下了帷幕。

4

从新罗到
高丽

新罗灭亡的原因

据有力的说法,新罗的灭亡与高丽的建立是从古代进入中世纪的转换点。这与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中世纪的开启的西洋史有相似之处。对于新罗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借鉴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综合讨论千年王国新罗的灭亡原因。现将新罗灭亡原因,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国际方面整理。

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和白会议在统一后依然存在。但到了中代和白会议失去了作为决策机关的重要性。与此相比,执事部作为国王的直属机关备受重视,起到了连接国王和各官府之作用。执事部长官,即“侍中”的作用是保障王权、强化王权,以至于权力被武烈王系近亲王族所独占,而受到被忽略的真骨贵族强烈反抗。

历史进入到下代,元圣王系近亲王族仍独占权力。因而导致真骨贵族的分裂与争斗,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宪德王时期,武烈王系金宪昌发动了叛乱,也是对之前的元圣王系独霸权力的不满引起的。他标榜推翻新罗、建立新国家的口号,当时叛乱军威震四方。到了兴德王死后发生了王位争夺战,持续2年

多的时间。在这场斗争中,最有力的王位继承者金均贞和僖康王、闵哀王等为了牺牲。他们都是元圣王的子孙,王室内部围绕王权的斗争持续不断。

中央政府的真骨贵族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这一时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权逐渐削弱。再加上频繁发生干旱等自然灾害,因此农村的收成也连年减少。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地方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逐渐失去有效的应对能力。饥荒导致大规模流民,他们加入盗贼团伙扰乱秩序。同时,在地方出现豪族势力盘踞各地,其势力越来越扩大。新罗统一后,将地方编为九州五小京,设置郡县,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从被发现的“新罗村落文书”内容,可以了解当时中央政府对各村的情况掌握得相当仔细。但到这个时期,地方的统治权逐渐被豪族掌握。总而言之,新罗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农民起义与豪族的兴起,但也不可否认真骨贵族的分裂和争斗是引起农民起义和豪族兴起的根本原因。

景德王时期恢复的“禄邑制”成为真骨贵族重要的经济基础。真骨贵族除了禄邑之外,还拥有祖上留传下来的私有土地,根据情况有些拥有牧场。真骨贵族在既有的情况下,采用买卖、兼并等方法极力扩大所有土地。另外,各地寺院也占有大量土地,其中有王室和真骨贵族捐赠的土地、通过买卖和兼并占有的土地。寺院的农场通过合法或非法享受免税优惠。然而,贵族和寺院的土地占有量越大,失去土地的没落农民则越来越多。本应是真骨贵族或寺院该负担的贡赋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甚至连流亡农民的贡赋也转嫁到了剩余农民身上。

新罗的农民在三国统一战争期间,作出了大量牺牲。后来又因荒年和饥馑,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生活负担和赋税的压力。学界对“村落文书”的看法不一,针对文书的制作时期、相关村落的性质等诸多方面,研究者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关当时村落逐渐变得零落的观点上,得到了研究者一致意见。村落的家户分为从上上到天下分九个等级。从各种等级的分布看,最高等级的家户为仲下烟,这种家户只有少数,而最低等级的下下烟最多。其中也有逃走或流离的家户,显然能看出人口有减少的倾向。再看壮丁人数比丁女人少很多,这似乎与逃避劳役而流亡的倾向有关。文书中显示了当时农民的真实情况,可以说这种恶劣的农民状况是引发889年,即真圣女王三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直接

原因。

兴德王九年(834)新罗朝廷颁布国书,制约了贵族生活中奢侈风气。禁用品目都有塔什干和咸海地区产的宝石“瑟瑟”、波斯产高级毛料、柬埔寨产翡翠毛、婆罗洲、爪哇产玳瑁、爪哇、苏门答腊产香味紫檀等很多外来奢侈品的名字。代表真骨贵族奢侈生活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所谓“金入宅”。“金入宅”是在相当于昌庆宫内的演庆堂规模的大型建筑上使用金箔装饰而成。这种豪华宅邸在都城内有39座以上,这足以说明新罗贵族的奢侈生活。在日本历史上,曾有因奢侈而灭亡的室町幕府,其建筑跟新罗下代“金入宅”相比只不过是小楼阁上贴金箔或银箔而已。

九世纪都城贵族的奢侈与颓废的风气被定为“病态的城市文化”,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化必然会被“健康的农村”所消灭,这种见解值得关注。都城的繁荣正是用地方农民的牺牲来换取的。因此,我们认为于889年兴起的农民起义是农民对政府的大发泄,也是为了打倒它。

骨品制的产生,是为了保障都城人的特权而制定。中央政府作为国策实施了真骨贵族等都城的统治阶层迁居到九州与五小京生活的制度。迁居后,他们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会不多,逐渐诸多方面受到限制。统一新罗的五小京中,除了金官小京以外大部分位于原新罗领地的外围,形成围护京都的局面。另一方面,给都城贵族“京位”而给地方权势人“外位”,经过战争等非常时期,给过一些地方权势“京位”。即使这样,然而他们也不能成为骨品贵族,等于是通向中央政府官吏的门户被堵住了。村主只享受四斗品,五斗品相当的待遇。

新罗下代,在全国各地兴起地方权势势力,他们被称作“豪族”而摆着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姿态。900年,甄萱打出为百济复仇的旗号而建立了“后百济”国。901年,弓裔高喊为高句丽报仇而建国,国号为“后高句丽”。王建918年通过政变掌握弓裔政权后,国号为“高丽”,标榜自己对高句丽的继承。他们这是试图得到原百济、高句丽遗民的支持而建国。地方豪族中有很多对新罗不满归顺到后百济或高丽的势力。一言以蔽之,这是新罗政权没能解决地方分割主义,固守都城为中心的封闭性所招来的结果。

在新罗中代,底层人当中流行阿弥陀净土信仰,蔓延一些厌世、逃避现实倾

向。逃避现实虽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但这并不是进行改革。从这一点看,阿弥陀净土信仰反而对维持新罗中代统治作出了一定的肯定作用。与此相比,新罗下代流传着“末世意识”,农民渴望弥勒佛降生,解救众生。弓裔王自称弥勒佛就是出于这种时代背景。然而,弥勒佛是到这个世界来实现理想世界的佛祖。因此弥勒下生信仰自然会跟改革现实有着密切关系。据推测,末世意识的深化与对弥勒降生的期盼是新罗末农民走向起义的背景之一。

自新罗中代以来,王室与真骨贵族极为尊崇华严宗。进入下代,他们改换接纳禅宗并逐渐扩大了禅宗的影响力。那些禅师们通过接受王室的资助为王室图谋划策的方式,接近王室并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但后来禅宗逐渐疏远王室接近地方豪族,并与豪族结成联盟。禅宗的个人主义倾向和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性质,恰好适合割据地方的豪族口味。禅宗接受叛乱国家后百济或高丽王室资助的例子也越来越多。禅师所主张的风水地理学说深受豪族欢迎,豪族纷纷利用风水学说把自身的存在进行合理化。由此,过去以都城为中心的国土观自然而然地被打破。

新罗的兴亡与东亚世界局势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隋、唐帝国在统一中国后,追求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一点成为了当时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间愈演愈热的矛盾相衔接,最终归结到统一新罗和渤海的对峙。同一时期,日本建立了以标榜大化革新和大宝律令古代天皇制国家。

新罗的灭亡在时间上与唐帝国及渤海的灭亡、日本天皇亲政的结束及藤原氏所谓摄关政治的兴起等等东亚各国王朝的变动相链接。有学者提出韩国历代王朝存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采取了对中国的朝贡制度。这一见解很有说服力。唐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导致接受唐册封的新罗国王地位的弱化。

唐帝国因受755年兴起的9年“安史之乱”而受到重创。原本仅限于边境地区的设置节度使制度,到这一时期扩散至全国,这些节度使在地方逐渐自立、扩大势力向中央政权发起挑战。875年发生黄巢之乱,并一直持续到884年。黄巢之乱是唐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唐帝国内部的这种历史现象与新罗末期农民起义和豪族的兴起很相似,不仅是有衔接点,还能从中找到新罗与唐朝政局的变化同步的事实。

新罗末到高丽初的历史与中国的唐末、五代的混乱及宋的统一相互对应。几乎同一时期,在日本出现了镰仓幕府,进入中世纪历程。从东亚的角度比较考察韩、中、日三国历史现象,新罗的灭亡与高丽国的建立在东亚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社会变动的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部分历史书都认为截至新罗下代为古代,高丽时代为中世纪。这种历史划分并非具有确凿的理论根据,只是考虑到时间的远近和王朝交替来加单划分而已,具有片面性。自三国统一后王朝历史来看,王朝更替只有新罗到高丽,高丽到朝鲜这两次,且两个王朝寿命都很长。所以说,假如王朝交替了,随之会发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巨大变化。单从这一点上,可以肯定上述的历史划分具有其意义。

同时也学者重视新罗末高丽初期社会总体的变动,提出把这一时期视作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的看法。概括这种看法有如下:历经这一时期血统集团的规模越变越小,统治势力编制中起着中枢作用的血缘关系网被崩溃了。地方豪族趁下代真骨贵族内部斗争之际起来,而成为地方势力基础的农民摆脱了古代隶民的性质。另外,六头品等中间阶级提倡儒教政治理念,创立禅宗成为中世纪的知性。实施科举制度,彰显在组织原理上与骨品制度为主的统治体制的本质差异,成立了模仿唐宋制度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还有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划分新罗末高丽初期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分界线的见解。这是关注对农民税收标准的变化来判断的首例分析报告。统一新罗的税收是以人丁与家户为中心的人口支配性的税收方式。与此相比,高丽时期实行了以田结为单位支配收租权,由此改变了收租方式,之前以人口支配性收租方式改为以土地为标准的税收方式。该研究还着眼于亲族集团的变化。经过新罗末高丽初时期,以祖先为基础的集团亲族关系逐渐解体,最后消失。而以个人为标准的亲族关系(亲属)扩大并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出现了一些向非血缘要

素发展的趋向。对社会成员进行合并,并维持共同体秩序,这种秩序被认为是中世纪社会的普遍特征。同时也关注了由豪族及其后身,即“乡吏”所主导的“乡徒共同体”。

从世界史观点来看,新罗末高丽初期也是古代、中世纪的分界线。这是以封建制度作为理论依据来判断的。也就是说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体制衰落或弱化后,期望复苏的政治现象,把这种现象称为封建制度的理论。高丽整合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豪族势力,对新罗末期以来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拨乱反正这一事实,与科尔本(Rushton Coulbon)所说的“大型帝国崩溃后在其周边发生的政治恢复运动是封建制的产生”假设具有一致的方面。

与上述观点不同,有观点是以社会统治势力(主导势力)的变化为基准来规定新罗末高丽初期的时代性质。即认为这一时代是豪族时代,这是把这一时代和先前的新罗中代专制王权时代、后面的高丽前期门第贵族社会进行划分。对此,有人质疑说所划分的各时代,缺乏有关契机性的理论依据。但这种历史划分也有其意义,它是以社会势力的人类集团为中心,针对特定时代的社会构成或政治机构、经济组织的实际运营、思想趋势等等进行了综合考察。

决定新罗社会的基本原理是骨品制。根据骨品享受政治、社会特权。从政治上讲,骨品制与个人成功有着密切联系,因为身份不同其官阶受局限。从政策上规定只有真骨贵族才可以担任中央政府的官阶要职。进入下代,有六头品出身的儒学家中对此进行批判或提出改革方案。但没有被新罗下代政权所接纳,新罗直到灭亡仍固守骨品制。骨品制还有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它仅限于都城人为骨品制对象,即使是地方权势也无法拥有骨品,因此骨品制也堵塞了地方人才或势力的出路。

进入下代,各地兴起“豪族”势力。地方豪族根据政治形势,有些忠于新罗,也有些归属后百济或高丽。最终在这些地方豪族中出现了推翻新罗建立新的统一王朝,即高丽的势力,成为居住在开京的都城人。高丽前期的统治势力一般被称作门第贵族,他们本来是豪族出身。而新罗的贵族阶级,即使是新罗的王族、贵族出身,在高丽社会已然变成地方人。门第贵族把自己原来的出身地称作“籍贯”。这是让人们知道自己家族的同时,又跟其他家族区别开来。他们是由

各个地方出身的异性贵族共同构成。这一点与之前只有都城出身的王族为中心的真骨贵族才能拥有统治权的新罗有这很大差异。

高丽政府成立后,力图中央集权化的同时,开始削弱了豪族的势力。983年(成宗二年)向十二牧派遣地方官,开始改革乡职。此后的豪族辅佐地方官,成为负责地方基层行政的“乡吏”。但他们的地位与新罗时期“村主”不同。不过,高丽时代并不是向所有的行政单位派遣地方官。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派遣地方官的地方有146处,而未派的地方竟多达374处。与新罗相比,高丽时代中央集权化的程度明显变弱。在未派遣地方官的属郡县的乡吏,事实上发挥了首领的作用。他们是豪族的后身,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地方统治者的面貌。

高丽社会也与新罗社会一样是身份制社会。因此从原则上身份及职业也成为世袭。但是乡吏以地方上地位为基础,通过科举可以成为中央的贵族。中央政府也对此进行积极引导。此外还有通过征兵,即“选军”成为军人或当上武臣后也有崭露头角,还有一些是立下战功而出人头地的。总之,高丽时期的地方权势能成为中央贵族的通道是敞开的,这一点是缘于中央官僚和地方豪族两者皆为豪族出身有关,这也是与新罗有很大不同的特点。

新罗下代的地方豪族势力推倒了骨品制以及享有最多特权的都城真骨贵族势力。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新王朝高丽的新统治势力。与他们一样,豪族的后身,即乡吏在保持地方统治者之面目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方法融入到了统治势力中。尤其是高丽后期出现的乡吏出身的士大夫们,在开创朝鲜王朝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在扩大统治势力的角度讲,新罗下代豪族的兴起极具历史意义。

执笔班子 朱甫暉 庆北大学

(执笔部分) 前言
第1篇

尹善泰 东国大学
第2篇第1章

赵仁成 庆熙大学
第2篇第2章、第3章

审校 李春姬 启明大学



编著者 《新罗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编纂委员会

发行人 庆尚北道知事
36759 庆尚北道安山市丰川面道厅大路455
T. 054-880-3176 F. 054-880-4229

发行处 庆尚北道文化财研究院
38874 庆尚北道永川市琴湖邑元堤2街38
T. 070-7113-9011 F. 054-336-8323

设计 任昭罗, 金多英

图片 吴世允

制作 设计工房
04554 首尔特别市中区忠武路13 ELORU Metro City 616号
T. 02-2285-4132 F. 02-2266-9821
<http://www.designgb.co.kr>

印刷 (株)Taeung C&P

印刷日期 2016. 12. 1.

发行日期 2016. 12. 30.

ISBN 978-89-6176-246-5 98910
978-89-6176-245-8 98910(SET)

本书的著作权归庆尚北道所有。
未经庆尚北道许可, 不得进行转载、复制或变相使用。
copyright@2016 by Gyeongsangbuk-do